

# 重新认识中国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序言

童世骏

在新中国成立 60 年之际推出的这套丛书,是为了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

近年来,谈论“重新认识中国”的,常常是国际场合。面对这个变化迅速、面貌多样的古老国度的时候,外国人常常会感慨他们先前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已基本过时;受到外国人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的时候,中国人也常常感到有必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不管是先前连续多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还是当前在全球经济一派萧条景象中依然保持宝贵的信心和信誉;不管是举全国之力战胜特大地震,还是向世界展示美轮美奂的奥运盛况——近年来我们确实有不少理由庆幸,我们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朋友们失望,也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其他人小看或轻松。

但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不仅是外国人,而且是我们自己——更确切些说,首先是我们自己。外国人有的把中国当作一个“问题”甚至“威胁”,有的把中国当作一种“范式”甚至“榜样”,这些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但不宜被我们奉作权威。对我们来说,“重新认识中国”是对自己、对子孙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更好地为人类作贡献的前提。

比方说,“五四”运动 90 年之后,中国的“传统”到底是什么,需要重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 年当中,中国的“现实”发生了哪些变化,也需要重新认识。30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这一代人留给后代们的物质遗

产和精神遗产,等等。这些都需要重新认识,特别是需要我们自己来重新认识。

又比方说,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放在更为广阔背景下进行重新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意味着我们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但我们又要看到,已载入宪法的这条原则,在今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实语境的。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因此,在“不要资本主义”的同时,我们还是可以“要资本”的。理论上得到论证的这个道理,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是否确实能够一方面利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另一方面遏制资本的野蛮化趋势?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社会主义。但经过60年的新中国建设和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知道“科学”一方面必须与“人文”相结合,另一方面必须与“民主”相结合。这两个“结合”并不容易,如西方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争和“民主政治”与“专家政治”之争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设法实现这两个结合: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就是要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说“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民主像我们的社会主义一样也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像社会主义一样也还要大大往前发展。理论上得到论证的这些道理,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是否确实能够把科学和民主内在地、有机地统一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活动当中?这些问题也没有现成答案。

我们的社会主义当然也是具有具体特点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超越一切地域、时代和文化个性的社会主义。不管是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道理,还是作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常识,这一点都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国情特点和国际地位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

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也要更加注重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并且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些理论上经过论证的要求如何转变为具有具体可行性的实践措施，也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邓小平说过，“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对外国人重新认识中国，而且对我们的自我认识，也是一个严峻挑战。认识中国意味着“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这两者虽可以适当区分，但终究是相互依赖的：“理解”的基础是“了解”，而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也离不开“理解”。“理解”中国不仅要描述中国（知其所然），而且要解释中国（知其所以然）和评价中国（知其所当然）。对中国做这种意义上的“理解”，中国人有独特优势，但也需要格外小心：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观察，但也切不可没有客观的观察。对中国的国情，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让我们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持着对知识、对真理、对科学研究的满腔热情，更好地认识中国，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吧！

2009年3月

## 前 言

# 社会主义不是成衣,而必须度身定做

德国人威纳尔·桑巴特在其著作《德意志社会主义》中曾提出问题：“何谓德意志社会主义？”他认为，“不应当把它当做德意志人的社会主义讲”。他强调，德意志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国族”的社会主义，不问其主张之人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而“是一个单独并专门适用于德意志国的社会主义，并且是为我们时代的德意志国，因为它是按照德国情形而制订的，所以这社会主义好比是一袭按照德意志国身材裁制的衣服，即是定做的（不是成衣）。”<sup>①</sup>相对于德意志人的“肉体（风土、人口数量、人种特质等）”、“心灵（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等）”和“民族精神（民族伟人的言行、信仰宗教等）”，他更强调“德意志社会主义之目标与途径”，即“要把德意志民族导出经济时代的沙漠”。<sup>②</sup>桑巴特所说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不是成衣，而是必须按照德意志国度身定做的思想，“德意志社会主义”要把整个民族“导出经济时代的沙漠”等寓意，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不是成衣，必须度身定做的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考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精神。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不是教条式地预测未

---

① [德]威纳尔·桑巴特：《德意志社会主义》，杨树人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② [德]威纳尔·桑巴特：《德意志社会主义》，杨树人译，第189页。

来,而是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在揭露和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预测新社会。他们丝毫没有制造一个社会乌托邦的幻想,没有从理性原则出发来预定未来社会的模式,没有过早地描绘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虽然他们没有严格区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没有专门对社会主义的特征作更多的描述,但他们也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生产资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人们结成平等合作关系有计划地为全社会进行联合劳动,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逐渐消灭阶级差别,国家政治职能渐渐消退等。<sup>①</sup>他们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主义视为一个不断发展和变革的历史过程,坚决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倾向。恩格斯明确表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sup>②</sup>他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sup>③</sup>《共产党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制定了建设未来社会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但马克思恩格斯也曾郑重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sup>④</sup>当有人要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时,马克思声明说,这是对他的历史理论的误解,这样做会给他过多的荣誉,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他强调,想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万能钥匙”来解决一切复杂的历史现象,那是永远达不到的。

其次,对于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不是成衣,必须度身定做”的思想历程具体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目标与途径的四次历史性认同,这是一个从民族意识到国家意识、执政党意识和人民意识的

① 李忠杰:《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

步步深入的认同，恰恰与“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的内在一致性”相吻合。

第一次认同，表现为在民族意识层面上认同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成为一个大问题。当时代表中华民族表示对社会主义认同的人物主要有孙中山和李大钊。孙中山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他认定“社会主义能够解除中国的疾苦”，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李大钊则提出“社会主义理想要尽量适用于环绕他的实境”。

第二次认同，表现为在国家意识层面上认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考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时，曾宣布：“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sup>①</sup>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者，他强调：“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sup>②</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始于毛泽东，始于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三大改造运动完成后，他又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探索，这一历史进程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认同。

第三次认同，表现为在执政党意识层面上认同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包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具有执政党意识的是邓小平。“十年文革”动乱后，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全党思考的问题。邓小平经过认真反思后代表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示认同，强调：“过去搞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党国际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5月27日。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500页。

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sup>①</sup>。在十二大开幕词中,他郑重宣告:“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up>②</sup>。正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为了使党更好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成了执政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使命。

第四次认同,表现为在全体社会成员即人民意识层面上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形态,构建起从社会和谐到深层次的社会公正与普遍幸福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30年之际,如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胡锦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代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次表示新的认同。他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阶段,他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求真务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开创了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新局面。

最后,社会主义不是成衣、必须度身定做的思想还突出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建共享”的历史创造精神和历史主人翁精神上。2007年3月,在全国政协工青妇委员联组讨论会上,胡锦涛提出了“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的理念。这一理念标志着13亿中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共识,标志着当代中国人的发展理性与和公正理性的高度融合。胡锦涛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才能使这一宏伟目标变成现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和谐社会建设中得到实惠,才能使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和谐社会建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行动”。他还强调，“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从思想理论的透彻性和根本性上讲，这段话完整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的实质与核心，指明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亿万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创造活力与“共建共享”的实践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发展理性来促进社会公正理性的发育，并以社会公正理性进一步促进社会发展理性的落实，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

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史，人们不难意识到，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亿万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创造活动和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历史进程。虽然社会主义运动目前在世界上处于低潮，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是“风景这边独好”。在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同时，胡锦涛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根本上指明了党的群众观念的本质和核心。在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时，胡锦涛强调，社会活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基本原则。在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候，他的着眼点也还是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并且，他一再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事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地去做。他重申，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时刻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下大力气做好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多办顺应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他非常重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时时处处强调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2007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更是强调：“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他还说，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艘航行最快



的船只,而是那艘最慢的船只。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应该说,“共建共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和形成是一个重要标志,表明我们党的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总 论

与其说写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初衷是受朋友启发而为,还不如说我们这一代“共和国同龄人”感同身受祖国这30年的巨变,主动探求“中国崛起”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原因和文化动因,更为准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有近三亿人脱贫、近两亿人进城、近一亿人进入中产阶级,经济总量全球排第四,进出口总额全球排第三。难能可贵的是,期间没有出现西方大国崛起时常有的那种大规模向外移民或对外军事扩张。“中国崛起”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球化”进程是当代世界历史中“同时态”的历史性事件,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缺一不可。在研读十七大报告时,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所鼓舞;在实现“百年奥运企盼”的喜庆日子里,更为中国成功举办一届“无与伦比的真正奥运会”所激动。奥运会、世博会,究竟是否意味着中国跻身于世界大国的行列?正如一位国际友人所说,中国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敌人,可以和任何人平等来往,可以和任何人做生意,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仅这一点,就足够引发我们这些读书人深思与遐想了。

曾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内部无法形成自我主导的变革,只能在外力强制下被迫进行,任何社会变革的结果都是失败。历史学家唐德刚就有“历史三峡”一说,即认为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转型,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转型大致要历时200年。如果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

清福,就算是很幸运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sup>①</sup>也有学者认为,直到今天,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国家演进的冲刺阶段,国家转变的过程充满了屈辱,我们迫切地要获得与别人平等的地位,一代代中国精英始终充满了强烈的“身份焦虑”。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得越紧密,这种焦虑感越强烈。经济增长和 13 亿人的市场是新一代中国人主要的信心来源,这种信心既容易使人膨胀,也经常脆弱不堪,因为它与个人尊严并非紧密相关。<sup>②</sup>

不论是“历史三峡”也好,“身份焦虑”也罢,我们这一代“共和国同龄人”更愿意相信:“中国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且也是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文明的崛起,“中国崛起”即使成功,也只是短暂的。<sup>③</sup>在探寻“中国崛起”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动因时,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精神魅力和实践威力。

从理论上讲,我们内心是信服“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是内在地一致”的观点。但按照西方社会的理解,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悖论”,即“似非而是”,“看上去是说不通的,但实际上却是存在的,是通的”。西方人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似非而是”的社会,按西方逻辑讲不通的社会。譬如个人与社会,投入与产出,人与自然等关系,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早就出大问题了,但实际上却没有。这里,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发生了严重背离。其实西方人不了解的是,中国社会历史上没有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曾面对的严峻的宗教冲突、民族对立、阶级对抗等问题。这大概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的一个根本差异。中国社会只有“家族奴隶”,没有独立的“奴隶制社会”阶段;“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及其精神元素并未完全遭受解体;东方社会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利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就来完成产业革命,又不必经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卡夫

① 张剑荆:《中国崛起》,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 页。

②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③ 张剑荆:《中国崛起》,第 19 页。

丁峡谷”的痛苦……所有这些理论的共同结论就是中国可以走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近现代历史环境中,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起到发展民族经济和初创工商产业的独特历史作用。在当今世界的“全球经济融合”潮流中,国际竞争力成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话题。所有这些,都无法离开中国独特的国情和独特的历史环境,也可能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破题的关键所在。

西方人难以理解中国发展的真谛,中国人要成功解释中国发展的意识形态原因及其世界意义,也并非易事。正如中国科学发展遵循着自己的内在规律那样,“李约瑟问题”有自己合理的答案。这一答案必须回溯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运动,才能获得比较合理的解释。中国的发展遵循着自身的文化矛盾运动规律,由此演绎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形态创新。中国文化内部既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文化专制主义,同时又具备“存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的人格自由、自律、自主的精神,这一文化因素可以导出“自治”即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的民主精神。西方工业化的基本精神就是奠基于“簿记制度”上的“效率”和“节约”意识,而中国文化富有“勤俭”精神,主张开发利用每个人的有限资源,使其发挥最大的功能。这一“勤俭”精神吸纳西方“效率”和“节约”意识,可以加速工业化的发展,而丝毫不损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中国文化素有“东方和平主义”思想,其中,儒家“致中和”、“中庸”,重“秩序”,讲“和谐”;墨家尚“兼爱”、主“非攻”与“尚同”;道家“法自然”、崇“无争”。所有这些文化元素都构成“东方和平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国文化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有机结合发展到今天,演绎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困境的战略思维:对内“和谐社会”、对外“和平发展”、对台湾地区“和平解决”统一大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对于中国文化矛盾运动的理性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运用中国文化智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诠释。“以人为本”融合了西方的“人权”观念、中国的“民权”理念和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思想,

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当代每一个中国人的积极性，“全面协调”运用中国整体有机宇宙观智慧处置各种错综复杂的自然社会深层矛盾。“可持续发展”则是新历史条件下的“天人合一”，提倡中国式的平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就是在这样的基本假设和基本概念统摄下构思起来的，并着力体现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全书分为四大板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思想渊源”板块，包含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李大钊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理想，陈独秀科学、人权并重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苏俄社会主义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体现中国人从民族意识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认同。“理论探索”板块，包含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陈云的经济思想，张闻天的经济思想，邓小平的党建思想，以及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体现着中国人从国家意识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认同。“思想形成”板块，包含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陈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和“三个代表”思想，以及苏东剧变的反思与启示，体现着中国人从执政党意识层面上对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认同。“创新发展”板块，包含胡锦涛“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平发展的“和谐世界”建设，以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着中国人从全民意识层面上对社会主义价值形态的认同。

以“思想史”的方式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理论探索”、“思想形成”到“创新发展”，对于我们这一群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专业的读书人而言，确实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要视读者接受的程度。在这一领域，从“合理偏见”到“视界融合”种种精神现象都是可能的。在长期呼唤并

认真履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今天开始逐渐懂得文化宽容与和谐社会的时空环境中,我们一定能够“和而不同”地迎来中国文化创新发展与学术繁荣的新世纪。这恰恰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

# 目 录

前言 社会主义不是成衣,而必须度身定做	1
总论	1

## 第一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

第一章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3
第一节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	3
一 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4
二 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5
三 民权思想的崛起	6
四 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动	8
第二节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10
一 “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	10
二 以社会主义政策“防止资本家垄断之流弊”	11
三 “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	14
四 “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	15
五 “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	17
六 “使物产之供给,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	19
七 “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	21
八 “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	23
第三节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意义	24
第二章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	28
第一节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	29

	一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29
	二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31
第二节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32
	一 “政治离心主义”取代“政治向心主义”的世界潮流	33
	二 离开特有的史观去考社会主义简直不可能	34
	三 社会主义“就是反对现在经济组织的精神和运动”	35
	四 “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	37
	五 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38
	六 对“第三之文明”的企盼	39
第三节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意义	41
<b>第三章</b>	<b>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b>	43
第一节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	44
	一 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需要	44
	二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理论需求	45
	三 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思想武器	47
第二节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49
	一 “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	49
	二 消灭私有财产制的“平民社会主义”	51
	三 唯物史观: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 理论基础	54
	四 “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乏”	56
	五 “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将误尽天下后世”	58
第三节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意义	61
<b>第四章</b>	<b>苏俄社会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b>	63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与 俄国革命	63
	一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的设想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63
	二 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 行动条件和方向	67



三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与俄国革命道路	69
四	俄国革命及其后果	73
第二节	苏俄东方战略与中国革命道路选择	74
一	从世界革命战略到东方战略	75
二	在中国寻找革命盟友和推动国民革命	78
第三节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	83
一	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84
二	抗战时期的共产国际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	87

## 第二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

第一章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	93
第一节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背景	94
一	“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的舆论环境	95
二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	96
第二节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内涵	97
一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97
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100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103
四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105
第三节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106
一	“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107
二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108
三	“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110
四	“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112
五	“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113
六	“用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对“既得利益者”不利	115

<b>第二章 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b> .....	117
<b>第一节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b> .....	117
一 从农村到城市的工作重心转移.....	118
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 问题.....	119
三 经济建设必须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和冒险主义的 倾向.....	121
<b>第二节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涵</b> .....	122
一 和平消灭资产阶级.....	122
二 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具体过程.....	124
三 城市工作中的劳资政策和剥削问题.....	127
四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的地位和权益.....	128
五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工人与剥削问题.....	129
六 劳资问题中的“左”与右.....	133
七 农村工作中的合作社经济与新富农问题.....	134
八 新富农问题.....	136
九 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评以及对农民自发势力的思考.....	138
<b>第三章 陈云的经济思想</b> .....	141
<b>第一节 陈云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经济思想与实践</b> .....	141
一 历史背景与任务.....	141
二 根据地时期陈云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142
<b>第二节 过渡时期的财经工作</b> .....	147
一 历史背景.....	147
二 主要内容.....	148
<b>第四章 张闻天的经济思想</b> .....	151
<b>第一节 张闻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b> .....	151
一 坚持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151
二 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构想.....	152
三 农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性质的和平过渡.....	153

第二节	张闻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	155
一	国内外历史背景	155
二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探索	156
<b>第五章</b>	<b>邓小平的党建思想</b>	158
第一节	邓小平在抗战时期的党建思想	158
一	加强党的领导,强调建立党组织	159
二	反对“以党治国”,初步提出党内外监督的民主思想	159
三	党政分开	159
第二节	初步形成执政党的建设思想	160
第三节	初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	162
一	必须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162
二	正确评价领袖在历史中的作用	162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	162
四	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发展思路:“猫论”	163
<b>第六章</b>	<b>模仿、反思、强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b>	165
第一节	“以俄为师”——斯大林模式	166
一	斯大林模式在中国推行的历史条件	166
二	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	168
三	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169
第二节	“以苏为鉴”——反思斯大林模式	171
一	苏共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推动了“以苏为鉴”思想的提出	172
二	苏共二十大成为由全面学习苏联走向反思苏联经验的转折点	173
三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起点	174
第三节	“反修防修”——斯大林模式	180
一	中苏论战严重干扰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80
二	1964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由反思走向全面维护	

	斯大林模式的转折点	182
	三 斯大林模式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强化	183
第四节	“斯大林模式”强化的原因	186
	一 未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问题	186
	二 未搞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 的问题	188
	三 对斯大林模式的再肯定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189

### 第三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第一章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93
第一节	领导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奠定思想基础	196
	一 初步反对“两个凡是”	198
	二 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驳斥“两个凡是”,倡导“实事 求是”	199
	三 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05
	四 对思想路线作用认识的深化	207
	五 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完成思想路线拨乱反正	209
第二节	领导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奋斗目标	211
	一 倡导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为党的政治路线	213
	二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目标	216
第三节	领导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常青常新	224
	一 倡导恢复和健全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制原则	225
	二 倡导恢复群众路线	231
	三 确立领导干部选拔标准,推动领导干部年轻化	233
第四节	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的问题	238

一	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239
二	探索和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243
三	领导创立邓小平理论·····	270
<b>第二章</b>	<b>陈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b> ·····	<b>276</b>
<b>第一节</b>	<b>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拨乱反正方面的贡献</b> ·····	<b>276</b>
一	支持邓小平复出·····	276
二	提请中央处理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277
三	关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277
<b>第二节</b>	<b>陈云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b> ·····	<b>280</b>
一	风格稳健·····	280
二	重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	280
三	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286
<b>第三章</b>	<b>江泽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b> ·····	<b>289</b>
<b>第一节</b>	<b>国内政治风波危及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之际， 江泽民临危受命</b> ·····	<b>289</b>
<b>第二节</b>	<b>积极应对各种经济风险，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b> ·····	<b>290</b>
一	成功治理通货膨胀·····	290
二	积极推动经济发展·····	293
三	慎重处理“好”与“快”、“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294
四	全面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95
五	及时做好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工作，掌握 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303
<b>第三节</b>	<b>锐意创新，全面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b> ·····	<b>305</b>
一	面对世界社会主义低潮，坚定地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305
二	积极探索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	307
三	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308
<b>第四章</b>	<b>苏东剧变的反思和启示</b> ·····	<b>318</b>

第一节	反思的基础:改革成就与思想困惑	319
第二节	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24
第三节	既防“左”,又防右	327
第四节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	332
第五节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335
第六节	关于党的建设	339
	一 思想建设方面	340
	二 组织建设方面	342
	三 党风建设方面	344
<b>第四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b>		
<b>第一章</b>	<b>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b>	349
第一节	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	349
	一 催生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背景	349
	二 60年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特别是30年改革开放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根据	354
	三 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要求和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直接时代背景	356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要求和意义	359
	一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	359
	二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364
	三 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365
<b>第二章</b>	<b>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b>	368
第一节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	369
第二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371
第三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定位和意义	375
<b>第三章</b>	<b>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b>	379
第一节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时代背景	380
	一 当前我国的社会思潮	380

二	当前我国的价值观状况	381
三	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理政、安民固邦的经验教训的必然选择	383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385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	388
<b>第四章</b>	<b>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b>	<b>391</b>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诞生于新时期	393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拓了新思路	395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塑造了新农民	397
第四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蕴含了新的历史意义	398
<b>第五章</b>	<b>创新型国家</b>	<b>401</b>
第一节	世界潮流的发展和创新型国家的提出	402
第二节	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	403
第三节	建设创新型国家体系的几个重点环节	405
<b>第六章</b>	<b>和谐世界:共建共享</b>	<b>407</b>
第一节	“和谐世界”思想提出的背景探析	408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和”的思想基础	410
第三节	和谐世界:共建共享	411
<b>第七章</b>	<b>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b>	<b>415</b>
第一节	“后社会主义”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15
一	“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	416
二	“后社会主义”是带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417
三	与资本主义的妥协并非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而是使中国回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必要一步	419
四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变革,社会主义已经扩展	

	到整个世界.....	421
第二节	“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22
	一 制度扩张和全新商品生产:当代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 两个基本策略.....	422
	二 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消费主义取得文化 主导权.....	424
	三 苏联解体、乌托邦的意义、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	426
	四 对于市场经济的社会权力结构,乌托邦的 集体理想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	428
第三节	“北京共识”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30
	一 “北京共识”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而不是靠 外国因素推动.....	431
	二 “北京共识”的三大定理.....	432
	三 “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	434
跋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435
后记	.....	439



# 第一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思想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近现代中国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艰辛探索的思想结晶。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停留在承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命题是远远不够的。这一命题的“当谓”与“应谓”似乎应该是造反有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更加合理。其实，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是一个远远早于“十月革命”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集体选择和理性认知。从孙中山到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廖仲恺，从李大钊、陈独秀到陈望道、李达、恽代英、杨明斋、杨铨，都或多或少认真研究过和热忱传播过社会主义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渊源看，孙中山、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独特的理论风采和强烈的社会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理论启迪和重要的警示作用。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说法，恰是这一理论现象的真实写照。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到今天“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到今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等理论命题，都是明证。由此看来，要真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精髓，不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是不行的。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要彻底就必须抓住根本。这个根本，从思想史的结论来看就是民生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与精髓实质就是解决民生问题的社会公正公平性，社会主义的和谐特征只是一种社会状态和社会结果，而社会和谐的实现必须依赖社会公正的实现。认同和实现民生社会主义，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上考察，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当然这个任务恐怕需要有另一本专题著作来完成。

## 第一章

#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早的思想渊源。孙中山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泪史,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知有多少黄金白银哗哗外流。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多少志士仁人救亡图存的愿景破碎。“振兴中华”是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提出的振聋发聩的口号,其后的 100 多年中,一直激荡着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前赴后继、英勇牺牲;多少站在时代前列的杰出人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又相继提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口号,激励着无数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为之奋斗。这些口号中蕴含的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理论意义,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所有向往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人认真揣摩、仔细斟酌、身体力行和不懈践履。

### 第一节 孙中山社会主义 思想的时代背景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自于他所处的时代,来自于他所肩

负的历史使命。孙中山所处的时代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1840年，在鸦片殖民主义者的隆隆炮声中，中国近代文明和民族危机同时降临。中华民族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受辱沉沦，要么奋起自强。洋务运动嫁接资本主义的幻想随着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宣告失败，然而更多新型知识分子依然孜孜不倦地从西方思想库中寻觅拯救民族生存的法宝。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毛泽东还把康有为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康有为在《大同书·甲部·绪言》“人有不忍之心”中说：“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想，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人生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康有为不仅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大同思想及其《大同书》，思想来源错综复杂，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也有西方从空想社会主义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子，虽被称为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他所设想的“大同”社会理想，基本框架就是所谓“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康有为虽然著有《大同书》，却秘不示人。他认为，今方“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以至于后来他的弟子梁启超都评论说：“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以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sup>①</sup>就是这一被康有为“不愿其实现”而又“至善至美”的大同理想，却在康有为的弟子们的努力传播下，在当时社会的青年人中影响极

<sup>①</sup> 钟叔河：《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9页。

大。毛泽东青年时曾写道：“人处在不太同时代，而渴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sup>①</sup>除了毛泽东，还有很多杰出人物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大同书》的影响。到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则明确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sup>②</sup>尽管如此，《大同书》毕竟是在孙中山之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产生的重要思想成果，表明中国人不仅认真思考社会理想问题，而且开始思考社会理想实现的实践途径。这一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对青年孙中山也起到了一些启蒙作用，使他逐渐担当起中华民族寻找理想社会的历史使命。

## 二 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首先是民族主义，他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中。这是符合历史逻辑“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在孙中山心目中，“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我们现在所受政治力、经济力两种压迫已达极点，惟我们现在的民族还大”，“因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才能打破我们。如果民族思想没有失去，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一定打不破我们。”十分显然，他把民族思想即民族主义看得非常重要。“此后我们中国人如果有方法恢复民族主义，再找得一枝竹竿，那么就是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无论怎么样来压迫，我们民族就是在千万年之后，决不至于灭亡。”<sup>③</sup>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首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后在1905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0~219页。

中国同盟会盟书中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两者相比较有所发展,主要就是从汉族民族主义走向中华民族主义。孙中山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孙中山看来,“五族之统一”只是中华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他批评了那种以为“推翻了满清政府便是‘五族共和’”的肤浅看法。1919年,他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说:“我国人自汉族推覆满清政权、脱离异族羁厄之后,则以民族主义已达目的矣。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合之。”他把民族主义的实行看作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指出:“夫汉族光复,满族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这段论述清楚而深刻地表明,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才是真正的民族意识大觉醒。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民族主义的实行仍任重道远。不仅要清理厚重的各民族的历史遗产,还要开始民族主义新的建设征程。可惜,孙中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的“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sup>①</sup>以及“联俄”、“联共”、“唤起民众以及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等理想和主张在他生前未能实现。实际上,孙中山是我国知识分子中从中华民族意识层面上表示对社会主义认同的第一人。

### 三 民权思想的崛起

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尝试救国,因李不予理睬而遭失败,此后他就下定决心要“改良祖国”。1895年2月,他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此后确立了“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在后来的

<sup>①</sup> 孙中山:《三民主义十六讲》,1924年。

回忆中,他认为当时自己已认识到“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sup>①</sup>。1900年,八国联军残酷镇压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一方面扼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另一方面使人们看清了初而利用义和团、最后协助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的清政府的反动本质。20世纪初,民权主义思想在章太炎、郑天华、邹容等进步知识分子中酝酿成熟。邹容写了热情洋溢的《革命军》,鲜明地提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蓝图。他认为,在那个“中华共和国”里,无论男女都是“国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生命、言论、思想、出版等天赋的自由权利,政府的权力由人民所授。以孙中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批判君主立宪派“真保皇、假革命”主张的过程中迅速成长。孙中山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理不相容,势不两立”,推翻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实行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诚为救中国之良剂”。<sup>②</sup> 1903年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对华侨演说时指出:“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sup>③</sup> 1904年,他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提出“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他首次提出了“中华民国”的概念,并赋予未来中国的政权以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的形式。<sup>④</sup> 此后,他多次论述了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正式用“建立民国”代替“创立合众政府”,更加突出了民众在未来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主人”地位,开始强调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孙中山投身革命斗争屡次受挫,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的民权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就“应再来一次革命”,彻底“扫荡”由腐败官僚、跋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58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1~237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6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页。

扈武人、作恶政客所组成的“当权集团”<sup>①</sup>。孙中山开始重视民众力量,号召学生起来“唤醒国魂”,并对法、美旧式共和国表示怀疑和不满,主张要造成一个俄国式的最新式的共和国,一直到后来他提出“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等政策主张。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孙中山新民权主义思想的崭新内容。

#### 四 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动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在传播社会主义学说方面,曾作出了相当杰出的成绩。才华横溢的革命理论家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和廖仲恺等人,就是在社会主义思潮涌动中推波助澜的人物。毛泽东曾称赞朱执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他还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sup>②</sup>

1906年1月至4月,朱执信在《民报》连载《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不仅介绍了马克思和拉萨尔的生平传略,也涉及恩格斯、倍倍尔等,而且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要点。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以德意志为最,其成败的足迹为鉴者多,而其功业都是马克思、拉萨尔、倍倍尔所建立的。他对马克思十分钦佩,称颂道:“其所为文,奇肆酣畅,风动一时,当世人士以不知马尔克(即马克思)之名为耻。”他较为准确地转述了《共产党宣言》的要旨,概括为十条:禁私有土地,而以一切地租充公共事业之用;课极端的累进税;不认相续权;没收移居外国及反叛者之财产;由国民银行及独占事业,集信用于国家;交通机关为国有;为公众而增加国民工场中生产器械,且于土地加之开垦,更时为改良;强制为平等之劳动,设立实业军;结合农工业,使之联属,因渐泯邑野之别;设立无学费之公立小学校,禁青年之执役于工场,使教育与生产之事为一致。

朱执信不仅高度评价《共产党宣言》,而且称赞《资本论》,认为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2页。

<sup>②</sup> 《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马克思在学理上的建树“尤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1906年6月，他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并行》，认为社会主义自“马克思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学说的各种派别中，他尤为重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派。

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中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认为社会主义发源于圣西门、傅立叶，中兴于路易·布朗、蒲鲁东，盛极于拉萨尔、马克思，是“奇伟光明之主义”、“今世一大问题之最新公理”。他称颂“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君武概述了“人群竞争”，试图说明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并认为马克思高于达尔文。他提出：“英雄造时势乎？时势造英雄乎？时势与英雄，固互造也。组织最善之社会，必能多出最奇伟、最雄大之个人。此个人既出世，又必能为社会增无限力量。”这里，马君武已接近唯物史观的思想。

1906年，宋教仁在《民报》上发表《万国社会党略史》，概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情况和马克思的革命斗争，对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加以赞扬。他认为世界15亿人口形成为两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或称为富绅与平民。他站在平民阶级一边，认为从《共产党宣言》则“可以观万国社会党之大主义矣”<sup>①</sup>。在讲到万国社会党起源问题时，他认为：“万国劳动者同盟，实由于马尔克之指导而成，而亦为经济的情势必然之结果也。”在他看来，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党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党因“旗色”不同而“惹起争论”，万国劳动者同盟终在1872年海牙大会上“两党遂布离散之势”。

廖仲恺也在《民报》发表《社会主义史纲》和《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篇译文，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分期，阐明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并谈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他指出，“社会主义者，为欲得自由宜利用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则欲废绝国家”，虽然“究极之目的”两者可谓无不同，即“皆以求个

<sup>①</sup> 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72～373页。

人之最完全的自由者也”，然而，两者的方法手段真可谓黑暗与光明之别。

所有这些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交相辉映，成为照亮黑暗中国的一抹曙光。

## 第二节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多彩，是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理论宝库。

### 一 “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

身逢乱世而思救世之策的孙中山可能是中国最早探讨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也是中国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人。被人们誉为最早在中国以文字介绍社会主义、介绍过马克思的梁启超曾说：“孙逸仙(文)，他不是个学者，但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sup>①</sup>这说明梁启超承认孙中山是在他之前知道并信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美国学者 M. 伯纳尔在《1907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中说：“孙中山在伦敦研究过社会主义是毫无疑问的。”<sup>②</sup>另一美国学者史扶邻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说：“他大概还研究了马克思、乔治·穆勒、孟德斯鸠以及其他的人。另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个人接触，包括一些俄国政治流亡者。”<sup>③</sup>

宋庆龄也多次讲到：“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产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期

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② 《1907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第 39 页。

③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119 页。

间,开始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他还没有能够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尽管如此,他心里已经逐渐明白,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sup>①</sup>虽没有直接史料,但许多间接史料证明,1896年9月至1897年7月孙中山在伦敦期间知道了马克思,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大致就是在那时萌生的。

1903年12月孙中山给友人的信,是我们所看到的孙中山最早提到社会主义的文字。他在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欧美今日只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剂于平均,可断言也。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sup>②</sup>这里孙中山所讲的“不能须臾忘者”,并且在我国可以“切实施行”的社会主义就有平均地权的大政策。他强调:“近来欧美已有试行之改革,然彼国势已为积重难返,其地主之权直与国家相埒,未易一躐改革。若吾国,既未以机器施于地,作生财之力尚恃人功,而不尽操于业主之手,故贫富之悬隔,不似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则我之措施当较彼为易也。”<sup>③</sup>这是孙中山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一直认为相对于欧美而言,中国既无资本家,也没有既得利益,因而进行有利于民生的社会革命就比较容易。他后来一直强调,社会革命一日未成就,即多数人无一日能享受完全之快乐与幸福。此种幸福仅为少数资本家所享有,劳动群众仍日度其困苦之生活,而未能稍事休息。在他心目中,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而平均地权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今日中国可以切实施行的事情。

## 二 以社会主义政策“防止资本家垄断之流弊”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多次谈论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深入研究过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想。他亲身经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537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8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

历了曲折残酷的政治斗争,特别是1895年9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漫游欧美诸国,使他的政治思想结构发生了激烈的震荡和改变。他想以欧美为前车之鉴,既步资本主义之后尘,又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不均、劳资对立的弊病,这是他对社会革命、民生主义亦即社会主义的最初设想。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平均地权。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的资本主义思想一样,存在着理智与情感的矛盾,虽有对劳工同情的思想感情,却缺乏实行的可靠途径。孙中山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家”,这特别表现在辛亥革命后的一系列演讲中。

1911年8月19日晚上,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各地革命党人纷起响应,出现了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1911年底,各省代表会集于南京,商议成立中央临时政府。已经独立的十七个省,都派代表与会。会上,孙中山以十六票对一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元旦正式就职。为了应付危局,清朝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出任掌握军政大权的内阁总理,负责镇压革命。袁世凯在列强支持下,一方面派重兵直逼武汉三镇,一方面借革命力量的声势,逼迫清帝退位,并以此为筹码,与革命党人约定,若他能使清帝退位,就由他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迫于革命形势和袁世凯的催逼,清王室颁布了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宣告覆亡,这标志着长达2000余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当天,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行会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说解职之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在他看来,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而民生问题,实乃社会革命问题。社会革命在文明进步、工商业发达的欧美很难;但在文明未进步、工商业不发达的中国却很容易,只要做到“平均地权”,它就成功了“七八分”。这一说法,虽然不太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但仍不失为一种真知灼见。他认为:“英美诸国资本家已出,障碍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难。中国资本家未出,障碍物未生,因

而行之故易。”他甚至还想到：“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他十分重视土地问题，称“地为生产之原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则易行”，“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势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价，与百年前相较，至少亦贵至万倍。中国五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能够认识到资本专制权力的压制手段比专制君主厉害，且主要经由“土地腾贵”实现，这是孙中山的先见之明。

在上述演讲中，他明确提出开发中国生产力的问题，强调“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中国各地生产未发达，民人无工可作，即如广东一省，每年约有30万“猪仔”输出，为人做牛马。若能输入外资，大兴工作，则华人不用出外佣工，而国中生产又不知增几倍。他力主引进外资，批评国人害怕外资的心理；并呼吁讲究时效，批评国人只知金钱而不知时间的积弊。他说，国家兴办大实业，苦于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国人“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砒毒，不知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美国之发达，南美、阿金滩、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而“西人所谓时间即金钱，吾国人不知顾惜，殊为可叹”，完全是“顾小失大”。<sup>①</sup>既要开发生生产力，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解决民生问题，又要避免资本权力过分集中，这是一个矛盾。由此，孙中山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政策防止资本家垄断实业的主张。他认为，国家大办实业，开发生生产力，“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而“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亦即同盟会所宣布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中国当取法于德，能令铁道延长至二十万里，则岁当可收入十万万。只此一款，已足为全国之公用而有余。”在孙中山心目中，只要大兴实业，又实行防止资本家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所谓国利民富道不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19~322页。

逾”，“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sup>①</sup>大兴实业，将关系铁路、电气、水道等国计民生大业收归国有，这一政策被孙中山认为是“国利民福”互不矛盾的社会主义大政策。

在上述演讲中，孙中山还清楚地指出：“如果我们从中华民国存在之日起就不去考虑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在最近将来的孳生崛起，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比清朝专制暴政还要酷烈百倍的新专制暴政，要挣脱这种新的暴政就必须用流血手段。那是何等暗淡的前途！”他主张：“新政府一成立，就必须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虽然他还不懂级差地租的概念，但他明白“将来必须使税和地价相称”，“从现在就作出决定，使地产价值的增殖额，成为创造这一价值增殖额的人民的财产，而不是成为那些侥幸成为土地私有者的个别资本家的财产。”<sup>②</sup>他在演说中解释了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的实质，指出民族问题就是“中华民国自主，即不受外族之统治”，民权就是“政府受人民之支配”，民生就是“国家财富受人民之支配”。<sup>③</sup>他认为：“吾人于共和国初成之日而不预谋及此，一旦资本主义渐次成长，则其所予吾人之压迫，必将更甚于吾人所推翻之专制政体。”<sup>④</sup>应该说，孙中山意识到共和国成立后的重要事情是限制土地私有的“资本家财产”形成，防止“新专制暴政”的出现，这是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见解。

### 三 “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

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第四天，孙中山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开宗明义地讲：“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社会革命比诸政治上革命愈属重大，且非兵力所能援助，必须以和平手段从事。中国现有无数荒野地段，未经开垦，故社会革命事业比诸欧美各国较易达到目的。”他宣称：“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择显理佐治氏（即今译亨利·乔治）之主义施行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3～324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6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7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8页。

于中国。中国无资本界、劳动界之竞争,又无托拉司之遗毒。国家无资财,国家所有之资财,乃百姓之资财。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其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sup>①</sup>他以为,没有劳资双方的竞争,又没有垄断资产阶级的阻碍,国家所有资财都是民众百姓的资财,这样的社会革命非常容易。显然,孙中山低估了在中国发展经济和社会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1912年4月,孙中山在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上说:“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世间颇误认同盟罢工为社会主义,而实非也。罢工一事,乃无法行其社会主义而始用之,以发表其痛苦,非即社会主义也。”<sup>②</sup>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拥护国利民福而非罢工才是社会主义。

1912年4月,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演讲中宣称:“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民权主义,为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sup>③</sup>孙中山能意识到民生主义是为了让人民共享生产上的自由,排斥少数资本家对于经济的垄断,他的民生主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 四 “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

1912年4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上提出:“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针对某些人所谓社会主义反对资本家、社会主义均贫富,中国万万做不到,他重申:“资本家之流弊,则不能不防备。譬如美国大资本家如煤油大王、铁路大王,全国财政几操此数人之手,任其专利,以致其国虽强,其民仍复苦楚。中国有鉴于此,既求国利,更应求民福。至贫富相均之谓,乃谓富者不能以专制剥削民财,贫者乃能以竞争分沾利益。彼谓夺富者之财以济贫,如是谓之均,乃误会也。”这里,他解决了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3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9页。

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误会,以为社会主义即是劫富济贫,即是均贫富。其实,社会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使富者不能以专制剥削民财,贫者乃能以竞争分沾利益”。至于如何分沾利益?孙中山强调:“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sup>①</sup>而要提倡实业,则需要资本,“外债非不可借,但合办则流弊甚大。”孙中山的意思是:“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欧美各国无限制投资之事,盖一国之力有限,合各国之力则力量甚大矣。”<sup>②</sup>

在上述讲演的另一记录稿中,孙中山这一思想表达得更为清晰:“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所惜者,社会主义未能明了,以致贫富不均,实业不发达,对于民生主义亦未易收效。”“民福即国富,既富即强。此则全赖实业诸君研究社会主义,次第举行,以挽回莫大之利源。余有厚望焉!”<sup>③</sup>至此,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已经讲得十分透彻了。换句话说,民生主义的彻底实行,非社会主义不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根本解决贫富问题,才能发展实业解决民生问题。

“民生主义非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的深层道理,孙中山到了广州才完全解释清楚。1912年5月4日,在广州报界欢迎会上,孙中山说:“若美利坚,若法兰西,为共和之先进国,在今日社会主义尚阻碍不行,何以故?则以两国之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解决的方法,在他看来就是“必须实行税契及平均地权之法”。他所讲的“平均地权”不是封建时代的井田之法,不是举国成为“一赌世界”。他警告:“二三十年后,不切实整顿,则地权愈不平等,将举国成一赌世界。”“世界最大之赌赛,莫如买卖土地之投机业,如今日英属之加那大是。世界有一公例,凡工商业发达之地,其租值日增,若香港、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1页。



上海,前一亩值百十元者,今已涨至百十万有奇。及今不平均地权,则将来实业发达之后,大资本家必争先恐后,投资于土地投机业,一二十年间,举国一致,经济界必生大恐慌。”“土地有限,投机者无限,势必千年未尝以文明法治之,今治之,而亦既进步矣,乃一日将社会为赌世界(即土地投机业)所累,不大可哀耶!”<sup>①</sup>他认为:“地权既均,资本家必舍土地投机业,以从事工商,则社会前途将有无穷之希望。盖土地之面积有限,而工商之出息无限,由是而制造事业日繁,世界用途日广,国利民福,莫大乎是。否则,我辈推翻专制,因为子孙谋幸福,而土地一日不平均,又受大地主、大资本家无穷之专制耳。遗害子孙,何堪设想。此则在今日宜实行民生主义之第一级也。”<sup>②</sup>意识到土地投机、大资本家的土地投机业必定会造成社会的贫富差别,他才把平均地权视为“民生主义之第一级”。

1912年6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行辕与各界谈话,又一次谈及:“及今不图,他日人民进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其害伊于胡底!如外国土地权全操于少数大资本家,其势必流于资本专制,其害甚于君主专制。”<sup>③</sup>孙中山把大资本家的土地资本专制看得比封建君主专制还要厉害,致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一思想是他同时代人所没有达到的境界,是他终身反对从封建君主专制到土地资本专制的所有专制主义的彻底性的突出表现。

## 五 “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解决民生问题要抓住根本,“发展物力”的思想。1912年8月22日,他在给宋教仁的信中讲道:国民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sup>④</sup>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想割舍政事,“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5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5~356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75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4页。

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次日在塘沽与某报记者谈话时，他再一次谈及“振兴实业”计划，说：“余之来意尤在振兴实业，但欲振兴实业，必自修造铁道入手。”<sup>①</sup>既要振兴实业，要建筑铁路，就要有资金，孙中山认为，借资的办法“较之往日借债筑路条件优胜甚多：一、事权不落外人之手；二、国家不负债务；三、到期收路，不出赎资”<sup>②</sup>。

虽然发展物力可使民生充裕，但在专制条件下仍存在不让贫民受到富人损害和剥夺的问题。1912年8月25日，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再次解释民生主义的实质含义，并对所传的误解进行解析。他指出：“北方同胞误会吾党民生主义，以为劫富济贫，扰乱社会秩序。此荒谬绝伦，公理上决无此事，富人幸勿恐怕。要知民生主义，富人极应赞助提倡之。何则？民生主义盖防止富人以其富专制毒害贫民。”“民生主义即以富人虽富，不使以其富害贫人。”“吾国受君主专制之苦，尚未受资本家之苦。举一例以明之，美国资本家以买空卖空手段，以十万元之股票吸收人民数百万元之现金，致人民不能聊生，此即资本家以毒害人民之法也。吾国资本家尚无，然不可不预为富人劝告，预为贫人防备。此即民生主义也。”<sup>③</sup>孙中山这一提醒值得今天深陷“全民炒股”社会氛围的中国股民们深思。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看到了“预防资本家压制贫民”问题的世界性和普遍性，称英美的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都曾“以一资本家之操纵，贻祸全国，过于天灾，甚或影响且及于世界”，“则欲解决此问题甚难，而贫民之受祸最惨。”<sup>④</sup>他非常庆幸：“吾国则资本家尚未发生，但能预防资本家之压制，民生目的即可达到”<sup>⑤</sup>。他对于预防此类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忧虑，每有机会都提醒人们要注意、要当心，这几乎成为他的一块心病。他的良苦用心，对于今天全中国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们恐怕不无启迪。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5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4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9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0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0页。

孙中山还对民生主义的归属作了分析。在北京共和党本部欢迎会上,他认为:“使大多数人享有幸福,非民生主义不可。但外间对于此问题,颇有疑虑,与前二十年反对革命相同。殊不知民生主义并非均贫富之主义,乃以国家之力,发达天然实利,防资本家之专制。德国俾士麦反对社会主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十年以来,举世风靡。”“中国十年以后,必至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此时杜渐防微,惟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此则兄弟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之微意也已。兄弟欲办铁路,每主张铁路国有,是国家社会主义,为国民富强之基。”<sup>①</sup>

## 六 “使物产之供给,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

如果上述引文还不足以说明他的意思,那么下面的引文则能清晰地显现孙中山的原意。1912年10月10日,他为武昌起义周年纪念给英文《大陆报》撰写《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设问道:“惟民生主义之意义维何?吾人所主张者,并非如反动派所言,将产业重新分配之荒谬绝伦。但欲行一方策,使物产之供给,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此即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的定义。”<sup>②</sup>这里他第一次明确提出“民生主义的定义”:使物产之供给,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

什么是“物产供给按公理而互蒙利益”呢?孙先生说:“余所以主张民生主义制度者,盖欲用一种制度,使国民对于国事发生直接之兴趣,愿全国人民皆享受其生产之结果。余更愿国家对于直接管辖之税源,得到其所产利益之全部。凡铁路、电车、电灯、瓦斯、自来水、运河、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地产收入与矿产收入,为国家收入之渊源。”他还强调:“余将使劳工得其劳力所获之全部。将来中国之实业,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之上。政治与实业皆民主化。每一阶级,皆依赖其他阶级,而共同生活于互爱的情形之下。”“依照此种计划,生产将日益增加,以最少限度之穷困与奴役现象,以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1~442页。

<sup>②</sup>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2页。

达到最高限度之生产。对于待开发之产业,人人皆得按其应得之比例,以分沾其利益,享受其劳力结果之全部,获得较优良之工作状态,并有余暇之机会,可以思及其他工作以外之事件。如此,劳工必能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此种娱乐与幸福,本为一切人类所应享。”<sup>①</sup>凡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收归国有,政治民主,实业合作,利益均沾,闲暇时间则娱乐幸福,这种理想社会愿景,不是中国人日思夜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什么?孙先生总结道:“故在一个民族之中,须给人民全体以生活之机会并与以完全之自由。此即余之希望。”他还放眼展望未来社会的远景:综上述之各种收入,将供给国家政费之需要而有余,然后举其余额,以兴办教育及最要之慈善事业,如养老恩俸、收养残废跛瞎之人。吾人应注意青年之养育与衰老羸弱者之安抚。新中国之人民,今得生存于开明政治之下,解除数百年之专制压迫,而目睹将来愉快之黄金时代矣。当今之所急需者,惟在国人之同心合作而已。<sup>②</sup>开明政治,解除专制,是孙中山推行民生主义的政治途径。

孙中山还把民生主义关于资本、土地、铁路实业、教育的四大纲领归结为社会主义理想所致。1912年10月14~16日,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演说中,他指出:“真正纯粹之社会主义”被无政府主义等学说弄得“湮没于云雾之中,缥缈而不可以迹”,幸亏德国马克思出,“苦心孤旨,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sup>③</sup>根据自己的体会,他认为:“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其主张激烈,均分富人之资财者,于事理上既未能行,于主义上亦未尽合。故欲主张平均社会生计,必另作和平完善之解决,以达此社会主义之希望。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也。”“社会主义不独为国家政策之一种,其影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3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6页。

响于人类世界者，既重且大。”<sup>①</sup>能够意识到中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具有共产主义的文化基因，实在是难得的先知先觉。

在演讲中，孙中山详尽分析了社会主义流派，指出：“社会主义所以尽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缘社会主义本与专制政体极不相能，故不能存于专制体制之下。”“尝考社会主义之派别为：一、共产社会主义，二、集产社会主义，三、国家社会主义，四、无政府社会主义。在英、德，又有所谓宗教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分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盖以国家社会主义本属于集产社会主义之中，而无政府社会主义又属于共产社会主义者也。”“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此，孙中山对以“集产”、“共产”为界线的社会主义流派区分得十分清楚，评价也有独到之处，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分也看得非常清晰。“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尽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数，任取所需而未尝稍尽所能者，随在皆是。于是尽所能者，其所尽未必充分之能，而取其所需者，其所取恐又为过量之需矣。狡猾诚实之不同，其勤惰苦乐亦因之而不同，其与真正之社会主义反相抵触。”“故我人处今日之社会，即应改良今日社会之组织，以尽我人之本分。”这里他对社会主义的实行有了比较务实的认识，对国民道德的评论颇为精彩。他强调：“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惟一之要图。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于公理之平允。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sup>②</sup>这些分析，今天看来仍是先见之明，发人深省，令人三思。

## 七 “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

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达到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7页。

<sup>②</sup>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9页。

了一个新的高度，即人道主义的精神境界。他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者也，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sup>①</sup>为什么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呢？他的理解是：“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经济学者专从经济一方面着想，其学说已成为完全之科学，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sup>②</sup>孙先生对社会主义为人道主义的理由，想得十分透彻。他联系“弱肉强食、劣败优胜”的殖民主义政策，认为社会主义“主张人道，扶持公理”，“唯下流社会中之工人贫民，因社会主义能救己之疾苦，遂崇之信之。”“社会主义学说遂得排经济学、统计学、天演论种种之科学，巍然独标一帜，而受社会之欢迎矣！”他还坚持：“社会主义虽为救拯社会疾苦之学说，其希望见诸实行，仍必根据经济学之分配问题而研究也。”<sup>③</sup>“麦克司之《资本论》，主张资本公有。”“专论资本，谓资本亦为人造，亦应属于公有。”“其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者一也。”<sup>④</sup>总而言之，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国家有铁路、矿产、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稅之完纳，府库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社会主义学者遂可进为经理，以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sup>⑤</sup>他最后回到我国的现实，强调：“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0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0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3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4~515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23页。

本家之发生可矣。”<sup>①</sup>由此可见，他的根本出发点是人道主义。

## 八 “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

孙中山于1915年11月10日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的信件，是他信奉社会主义并决心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证据。1989年台北出版的《国父全集》第4册收录这一信件，第10册“英文著述”录入英文原函，系孙中山亲笔所书。原函共13页，现摘录如下：

“在第一次革命完成，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时，原计划以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建设中国”；“经过二十年的艰辛，我已完成了把绝对的君主政体转变成共和国的任务，我迫不及待地想着手培育有思想而前进的人来为社会主义进行铺路的工作”。这里所讲的是孙中山信奉社会主义的明证。

“我让位给袁世凯以后，立即完全脱离政治，潜心研究逐步的社会主义理想来塑造政府的最佳途径。在彻底体认我这一生奋斗的惟一目标和愿望之后，我坚信，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苦痛也才能减轻。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这里他强调了他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念。

“我希望使你们深切了解，中国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度应该用来作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中国的资源丰富，数万万百姓都是热诚、勤劳的工人，生性怡淡，易于领导也易于满足。”“中国的工业尚未发展，资本主义尚未开头，一般大众服从而守法，因此这个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塑造成任何形状。”这里他突出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行性。

“我吁请你们协助我把中国建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你们的注意力和力量放在中国，提供各行各业的人才协助我。我需要像贵局这样的机构，提供人才，以便从事这项伟大的事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20页。

业。”<sup>①</sup>这里表现出孙中山求贤若渴。

能够如此清晰地认识“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这在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确属凤毛麟角，据此判定孙中山是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的伟大先行者一点也不为过。值得探讨的是，孙中山此时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建立紧密联系，并一心希望得到他们全力支持的企盼能否圆满实现，还悬而未决。当时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自身困难重重，与中国先进政党组织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与信息落差，能否达成真正的共识和理解，能否实行崇高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提供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所需的人才资金，实在难以预测。即使派来所谓“指导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才”，会不会发生后来那样同共产国际“代表”的摩擦与斗争，也难以想象。但孙中山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是一种国际先进思潮和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对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寄予极大和极为真诚的期望。为了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他确实需要冒巨大的风险。除此之外，他简直找不到更加适当的办法与途径。他真诚信奉社会主义，对一切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人和机构都怀有极度的信任和企盼。今人也许难以想象，而这恰是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力量和真实文化性格所在。

### 第三节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比较系统地研读孙中山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献之后，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孙中山确实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尽管这种社会主义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有着一定的距离。在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归宿。在他的一生中，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只是部分地、局部地得以实现，唯有民生主义

---

<sup>①</sup> 姜义华：《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的伟大先行者》，载《当代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才是他毕生追求和奋斗的目标。这充分显现在他提出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命题中。

在孙中山心目中,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也就是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和群众的生命。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这就是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是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是要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防止资本专制权力的,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相冲突,而是好朋友的社会改革政策。由此可见,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是一种最早以中国人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这种社会主义,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没有大资本家的中国资本主义”,而恰恰是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孙中山的设想中,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这两种主义并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三民主义的大目标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为此,他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他赞成土地公有、资本公有,希望所得的利益归人民所有,而不是少数人增殖势力,直至成为财阀。在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下,在种种现实条件下,他容纳和赞许私人资本家的存在,但更看重国家资本作为社会的主要经济构成,奉行劳资和平协作发展的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

应该说,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是中国本土出现的第一种原生形态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难以估量。毋庸讳言,在他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中,“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是难以实行的,因为民族尤其是民权问题并未真正解决。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来说,也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但作为一种建设新社会的理想,对于启迪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智慧,却十分必要和紧迫。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这个启蒙过程,从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中汲取了大量有益的智慧 and 知识。

即使在今天,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对于我们也有重要启

迪。启迪之一,孙中山强调社会主义的真谛在于“使富者不能以专制剥削民财,贫者乃能以竞争分沾利益”。他提出的办法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他所讲的“平均地权”并不是封建的井田之法,而是不要举国成为一个“赌世界”。“平均地权”与“赌世界”之间存在什么内在联系呢?他认为,世界最大的赌赛是买卖土地的投机业。因为土地有限,投机者无限,加之没有文明与法治,如果不早日“平均地权”,将来实业发达之后,大资本家必争先恐后投资于土地投机业,中国社会将为土地投机业的“赌世界”所累!当前有许多人在探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真实原因,但讨论来讨论去,“地权”平均与不平均仍是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这里不仅包含失地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而且还有城市贫民的居住地权利问题。

启迪之二,孙中山提醒人们要防范富人以股票市场买空卖空的“资本专制”手段。他强调,富人也应该赞助提倡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就是防止富人以其财富专制毒害贫民。他举例说明,称美国资本家以买空卖空手段,以十万元的股票吸收人民数百万元现金,民不聊生,这就是资本家用买空卖空、在股票市场上盘剥贫民的“资本专制”手段,而同时他也看到了“预防资本家压制贫民”问题的世界性和普遍性。今天,在金融问题上,我们实践经验不够,理性认识不成熟,教训不少,孙中山当年的提醒决非无的放矢。

启迪之三,孙中山强调民生主义要使全体人民共享全部劳动成果。他认为,将来中国的政治和实业都将民主化。开明政治,解除专制,是他推行民生主义的政治途径。他强调:实业必须建立在合作基础上,“使劳工得其劳力所获之全部”;每一阶级都要依赖其他阶级而共同生活于互爱的情形中。在一个民族中,给人民全体以生活的机会和完全的自由,是他的全部希望。放眼未来社会的远景,他提出国家各种收入中扣除供给国家政费需要以外的余额,要用来兴办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经济合作、政治开明、精神互爱、社会慈善建构成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的宏大愿景。这颗民生“社会主义”愿景的种子,一旦播下,在适当的气候、土壤和空气中一定会茁壮成长。谁能说这种愿景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之间不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呢?只是次生形态,甚

至再次生形态的理论成熟起来而演化成为壮丽的社会现实之后，原生形态的理论雏形反而容易被人们的习惯思维定势淡忘。真理是被不断发现的，不是一次完成的。每一次发现相对真理的同时，人们必定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真理的绝对性。自然科学的真理是如此，社会人文科学的真理更是如此。

## 第二章

#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在中共成立之前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的学识、为人和文章，特别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和哺育了“五四”时期整整一代先进青年。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杀害。2007年7月，张福兴在《中国1927——解密80年前中国政局的历史真相》一书中披露了李大钊遇害之谜。原来，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苏联同志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9月，中共地下党员李渤海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捕，后叛变投敌，供出李大钊隐匿情况及其他党员名单。1927年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率大批军警直扑使馆区，强行逮捕了李大钊等30余人。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经受了敌人的百般折磨和严刑拷打，表现出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品质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在《狱中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面对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的劝降，他轻蔑地回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李大钊被捕后，举国震惊，中共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面对全国营救风潮，蒋介石害怕极了，赶紧给张作霖拍密电，要求“速行处决，

以免后患”。李大钊从容走上绞刑架时,年仅 38 岁。

38 岁是事业鼎盛、精力充沛的壮年时期,李大钊却为了人民的正义事业,无私无畏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斯人虽逝,他接受和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激励和鼓舞着几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理想,谋求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

## 第一节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

李大钊 1889 年生于渤海之滨,成长在北洋军阀独裁专制、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的黑暗年代。早在求学年代,他就意识到“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迫于国势之危急,他热切希望懂得治国理政之术,求得挽救民族国家之良策,遂奔赴天津报考北洋法政学校。他从钻研阳明学说到崇信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如饥似渴。1913 年毕业后,李大钊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专业,继续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在日本期间,他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16 年,为了参加“讨袁”行动,他辍学回国。1918 年 1 月,他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开始参与主编《新青年》,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 一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1917 年 11 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密切关注国际政治的李大钊,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十月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 年 7 月,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了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同 1917 年俄国革命的异同,有力驳斥了国内对“十月革命”的种种责难和攻击。他写道:“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在法兰西当日之象,何尝不起世人

之恐怖、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sup>①</sup>他认为法国乃至 19 世纪全世界的文明，都起源于法兰西革命。他断定 20 世纪初叶之后文明的绝大变动，都将萌发于俄国“十月革命”。他富有创造性地把革命与精神联系起来，指出：“法人当日，固有法兰西爱国的精神，足以维持其全国之人心；俄人今日，有何尝无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sup>②</sup>他认为“十月革命”与俄国人道主义精神深入人心不无关系：俄国数十年来文豪辈出，各以人道主义的社会文学，与专制的宗教政治制度搏击；西伯利亚留下了无数为人道主义牺牲者的坟墓。他指出了法国人与俄国人精神的差异：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sup>③</sup>他认为法兰西革命不只是法国人心变动的表征，而是 19 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俄罗斯革命不只是俄国人心变动的表征，而是 20 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他认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sup>④</sup>对于“十月革命”，他热切呼吁人们“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sup>⑤</sup>

同年，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中他也热烈赞扬“十月革命”，指出“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sup>⑥</sup>。他认为，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代表着世界历史的潮流，无论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帝国主义，“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

①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5 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226 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226 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226 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228 页。

⑥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255 页。

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他热情欢呼：“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sup>①</sup>可想而知，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李大钊，在心中有怎样的一幅壮丽图景！

## 二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1919年6~8月，“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入狱，李大钊离开北京暂避外地，《每周评论》由胡适代理主编。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要求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偏向纸上的学说”，指责提倡这些主义的人们“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什么东西”，“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平心而论，中国有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从机会主义开始的，无政府主义、公妻主义都有，但胡适讲的只是一部分事实，他没看到更为主要的本质，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成长。

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回击了胡适。针对要不要提倡“主义”，他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而真要这么做，“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地成了社

<sup>①</sup> 《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63页。

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sup>①</sup>他认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和实用两面”,“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sup>②</sup>他从主义的理想层面和实用层面两分法出发,指明主义本身应与空讲主义的人相区分,确实抓住了论战的关键。

李大钊敏锐地察觉到争论的实质,指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他认为:“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正义的宣传呢?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sup>③</sup>社会主义曾红火一时,那时谁都是社会主义者。可是,只有那些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真谛的人才能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这一场论战,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确实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过滤的必经阶段。就社会主义理论本身而言,也是一个甄别鉴识的必要过程,没有这一过程,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 第二节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经历过民彝政治观、青春宇宙观、反

<sup>①</sup>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sup>②</sup>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页。

<sup>③</sup>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4页。



孔文化观、国民修养观等思想认识阶段,在艰辛的比较、对照、反复中,不断扬弃、超越自我,最终归结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sup>①</sup>

### 一 “政治离心主义”取代“政治向心主义”的世界潮流

1917年4月,李大钊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中明确指出,“政治之离心力”取代“政治之向心力”是一世界之潮流,亦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潮流。他认为:“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近世国民之运动,解放之运动也。”所谓解放,就是“将多数各个之权利由来为少数专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蚀、凌压、束缚者,依离心力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之谓也。于是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是皆离心力与向心力相搏战而生之结果也”<sup>②</sup>。他认为:“最近世界政治之趋势,向心主义之势力日见缩减,离心主义之势力日见伸张,此为不可掩之事实”<sup>③</sup>,俄国“昔固以向心主义极盛,而今经此政治革命之风云,离心力之创建于国民思想者,有如日中天之势,民主政治已建基础矣!工党势力达于政治矣!波兰自治矣!芬兰解放矣!妇人及犹太人之待遇逐渐改善矣!无论社会与政治,皆有由向心主义一跃而入于离心主义之势焉”。<sup>④</sup>把眼光转向东方,他发现,中国与日本“向心主义之势力恒欲依附官僚政治以与离心主义抗,而官僚亦颇欲凭借向心主义以维持其政治上之势力”,两者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环兴迭起,扰攘不绝,非政治前途之佳兆也。愿东方之政治当局,稍顾世界离心主义之大势而自觉省焉”。<sup>⑤</sup>他批评袁世凯加强集权制,“逆乎世界之趋势,反乎时代之潮流”,终将被历史淘汰。

李大钊认为,新生的政治离心力总是与传统的政治向心力相对抗、相排斥,政治离心主义必将取代政治向心主义。在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中,他指出后者取代前者

① 《先知的足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41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41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42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42页。

的历史规律,较清晰地描绘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 二 离开特有的史观去考社会主义简直不可能

1919年9~11月,李大钊写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指出:“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目的在“社会的革命”。他认为:“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与(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他认识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sup>①</sup>。这篇文章显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他发现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克思开始,在马克思以前也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没形成科学的理论与体系。只有马克思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与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开,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

李大钊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是通过经济学思想得到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把握。他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是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这种理解比较生动形象。此后,他以特有的敏锐眼光指出:“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sup>②</sup>李大钊的逻辑是:根据马克思的唯

<sup>①</sup>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8页。

<sup>②</sup>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8页。

物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作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预言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定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再根据这个预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肯定“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sup>①</sup>。能够从经济学思想史考察马克思主义,并能运用唯物史观解释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见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很不一般。

### 三 社会主义“就是反对现在经济组织的精神和运动”

1920年1月,李大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背景,指出:随着发现新大陆的欧洲殖民事业的“拓殖”,欧洲内部的商业变成了世界的商业。机械的新文明在扩大人类生产效能的同时,也频添了许多困难。“因为资本集中的结果,造成了大多数的阶级,使他们不能不受像机械一样为少数富豪所役使的痛苦,他们阶级的自觉,也渐发生了。结局社会上立起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演成阶级战争的局势”。“许多明智而且慈悲的人,不忍见社会上有这样悲惨的现象,乃想出好多救济这种社会的方法和学说,社会主义于是乎产生”。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反对现在经济组织的精神和运动”<sup>②</sup>。这种定义和我们今天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有相当距离。他的认识与对社会主义流派出现和形成的梳理相联系。他认为,社会主义学说虽然最早源于欧洲,但欧洲统治阶级反对社会改造的学说和方法,不易找出一片土壤来做试验。美洲有丰富而且低廉的土地,有自由试验这些社会改造学说和方法的空间。流入美利坚的社会主义运动分成两派:乌托邦派和历史派。乌托邦派“离开

<sup>①</sup>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9页。

<sup>②</sup>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51页。

现在的社会组织一种理想的社会,示人以合理的生活模范,欧文派和傅利耶派都是此类”,历史派“在现存的社会里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阶级的战争,纯以马克思的学说为经典”。<sup>①</sup> 乌托邦派有种种的新村运动,以试验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试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他介绍了美国的宗教新村,考察了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局限、弱点和失败。他还称欧文的事业:“虽经过很多的失败,但是也有很大的成功。他是幼稚院制度的创立者,创立工场法的第一人,也是扶助协力团体的第一人,有许多现代社会党运动学理和情状,他都曾有先见之明”,但也强调他是“一个真实的空想家”。<sup>②</sup>

《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发表 20 天后,瞿秋白发表了《评〈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他首先谈到前两三个月报纸上关于美国罢工斗争的报道,认为这就是李大钊所说的“历史派”在美洲的运动,表示“世界的进步着并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他说:“然而我们对于乌托邦一派的运动,不容易去知道,现在守常先生把它介绍过来,我们非常之感谢”<sup>③</sup>。根据李大钊介绍的材料,他认为新村“失败的原因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缺点,正为着‘非社会主义’,所以会衰落失败”。他指出,“总而言之,我们做新村运动是研究社会主义的试验”,而新村试验的失败,说明“我们只好换一个方法来试验”。<sup>④</sup> 他希望“守常先生快把那欧文派、傅利耶派、伊加利派的新村发表出来。我们可以研究研究这乌托邦派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怎么样”。

对于瞿秋白提出的要求,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讲演中作了回答。他评介了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路易·勃郎、蒲鲁东,英国的欧文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明确指出:英国行会社会主义那样的社会运动“缺乏革命之性质”,“于实行方面无大价值”。<sup>⑤</sup> 由此看来,只有透彻了解马克

①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152 页。

② 《李大钊文集》(续),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 页。

③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6 页。

④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1 卷,第 58~61 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 435 页。

思主义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理论体系的关系,才能更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髓。李大钊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 四 “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

1921年1月,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中探讨“现在的中国能否即刻实行社会主义”。针对不少人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着力发展实业的说法,他尖锐地指出:“在现存制度下谋求实业的兴盛,实质上就是要使我国的统治阶级与各国的资本阶级结合起来,这样只能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决不会带来其他任何好结果”<sup>①</sup>。他进而言之,要使人们了解为什么现存制度下不可能发展实业,必须进一步使人们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实业的方法。他认为,“劳动者能为自身的利益而发展实业需要一个过程,掌握这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sup>②</sup>。李大钊确有先见之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就是证明吗?

1921年3月,李大钊写下《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指出:“社会主义于发展实业,实在有利无害”,“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sup>③</sup>因为“资本主义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他认为,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因为中国非无资本,而苦于资本之散漫,寄放在外国银行里的,窖藏在地下的很多”。在他看来,中国有钱的人,除少数有点知识的外,都不肯拿出资本振兴实业:一是前些年受过所谓实业家的骗;二是不懂得资本利用的道理,只知守着一宗大款,父而子、子而孙地坐吃。他指出:“实行平民专政”,可以“先将这样资本强行搜集起来,一定可以大办实业,否则中国资本这样零碎散乱,那能振兴实业。恐怕今后中国实业之振兴,都要成外国资本家的掌中物了”<sup>④</sup>。关于中国劳动者,他指出,“本来是价廉物美名驰全球的,

①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55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55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72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73页。

但中国实业不发达,没有很多工厂雇佣他们,颇有供过于求之观,所以他们都跑到国外去,替那些外国资本家做牛马未免可惜”。对于中国的流氓、无赖、政客等游手好闲的人,他提出仿照俄国办法,不工作者不得面包,他们也可变为有用的劳动家。李大钊的结论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愁缺乏资本,尤不愁缺乏劳力,以此而开发地大物博的中国富源,实业大可发展。<sup>①</sup>此外,李大钊强调中国官僚势力太大,若不实行社会主义,“中国实业界的人,没有不受官僚的操纵压迫的”<sup>②</sup>。因此,他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

## 五 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如前所述,李大钊认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指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sup>③</sup>。这就提出了理想、主义或理论必须适用于被应用的环境的问题,也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地制宜的问题。

李大钊认为:“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我们这不从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不劳而获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sup>④</sup>。在这里,李大钊非常明显地涉及社会主义必须中国化的命题。他的这段话明显包含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当时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社会矛盾主要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运动的主要任

①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73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73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页。

务不是“打倒资产阶级”。其次,中国虽然不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但不等于说中国不需要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用社会主义做工具打倒官僚强盗,这里的“强盗”是指奴役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官僚”是指封建势力。李大钊强调中国社会主义者首要的使命是反帝反封建。为了把社会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实际环境,李大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民主革命任务的提出到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都有他的贡献。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确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可惜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不多。直到整个党和人民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之后,这条原则才开始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并逐渐被接受,后来演绎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 六 对“第三之文明”的企盼

李大钊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尤其是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系统阐发了东西文明的特点及我们对待东西文明应采取的态度。他从自然环境决定论出发,认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其原因则“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并进而从起居什器、思想、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等方面分析东西文明的不同之处。如:东方行家族主义,西方行个人主义;东人持厌世主义,西人持乐天主义;东人持定命主义,西人持创化主义;东人之哲学为求凉之哲学,西人之哲学为求温之哲学,求凉者必静,求温者必动;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由此可知,李大钊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过程中抓住两大文明的根本缺陷:中国文明是“不及”,西方文明是“过”。由此,他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亟待克服的八大弱点: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对于妇人之轻侮;同情

心之缺乏；神权之偏重；专制主义之盛行。<sup>①</sup>

他承认，近代以来中国确实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甚至是巨大的冲击，拒绝西方文明是不可能的。西方文化虽有许多缺陷，但西方文化代表工业经济结构的新文明，中国要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要以落后赶超先进，就必须接纳西方文化，用先进文化指导社会前进。不过，他也提出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认为，社会的进步发展，需要两种文明的共同参与，“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sup>②</sup>。

1916年8月，李大钊在《“第三”》中，以一种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循环论相结合的类似黑格尔的正、反、合的方法的发展观，提出了他所倡导的新文明“第三之文明”：“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sup>③</sup>“第三之文明”是一个高度抽象且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范畴。“第三之文明”“有其理想而无其实境。理想之第三，一旦现于实境，则已复为第一之境，而又一第三之境，又将陈于吾人之前矣。”可见，“第三”是一个螺旋上升，不断运动发展着的概念。它还是一个“理想之境”，而不是“实境”，这就赋予它一个高度抽象的含义，这“第三之文明”就是概括了一切文明的变化和过程所达到的一般本质的概念，是“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中庸之境，独立之境也”。他指出东西文明各有优缺点，“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认为“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之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sup>④</sup>。他看好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sup>⑤</sup>，把创造“第三之文明”的希望寄托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俄罗斯身

① 《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11页、第213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14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173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14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14页。



上。他看到西方的资本主义致使阶级剥削发展到极至,还导致了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等世界文明恐慌,社会主义文明在这种情势下壮大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拯救中西文明、发展世界文明的重任。

### 第三节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意义

李大钊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具传统意味的一位学者型革命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独具特色。他既从西方学来先进文化理念,也具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两者在他身上能结合得那么完美,实在不易。陈独秀受法兰西大革命激烈传统的影响,反对儒家传统激烈到甚至提出废汉字废汉语,主张以拉丁字母来取代的程度,而李大钊则中庸得多,他主张“第三之文明”,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之间找到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空间,使东西方文明的精髓都得以继承发展和集成创新。这就是他向往的“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中庸之境,独立之境”的基本内涵。虽然他曾经看好的俄罗斯后来放弃了社会主义,但李大钊的这种向往也许不会落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北京共识”的发展道路,可能就是将来世界“第三之文明”的雏形。

李大钊曾指出,“劳动者为自身利益而发展实业需要一个过程”。确实,首先劳动者自身有一个形成的历史过程,其次劳动者自身的利益所在和利益表述又有一个认识过程,再其次为实现这种利益而发展实业又需要太多太长的曲折过程。其中还要经历组建政党、夺取政权、实行政治革命,接着又需要进行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经济建设模式的确立、经济所有制的变革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变迁,再接着就是产业结构的探索、社会结构的整合以及领导方式的转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看成是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这是否可以说,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劳动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解放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

是劳动者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成长过程。

李大钊最为杰出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须应用于中国实际环境”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社会主义“理想应用于实境”的命题,既是一种了不起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一种实践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论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不久的历史环境中,他能够提出这一原则,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世致用的态度,确实具有非常重大的实践意义。这一思想原则使社会主义在中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实践效果,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视、理解、消化、吸纳,并转化为改造中国的巨大物质力量。

### 第三章

## 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陈独秀、李大钊是20年代中国知识界最卓越、最有人格魅力的两位领导人,自己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受到1920年上半年陈独秀在上海同他的一次谈话的深刻影响的结果。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领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创建中国共产党起了和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中相类似的作用。<sup>①</sup>

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新青年》中率先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后又强调“赛先生”与“德先生”,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旗帜,兴起了一场披荆斩棘、雷霆万钧之势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虽然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时间,比李大钊晚了半年多,但他转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地位和显赫声望,加上他那犀利的文笔,以至于发挥的作用和影响都超过了李大钊。

---

<sup>①</sup> 《红旗》杂志,1981年第4期。

## 第一节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

作为中国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曾经同时信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既宣传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称赞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两者都是“我们持论底榜样”<sup>①</sup>。他之所以在1920年前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因为理论战线多次论战的理论需求以及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需要。

### 一 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需要

1920年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工人运动开始为进步知识分子所重视。陈独秀在1920年1月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劝说“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他认为上海的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都有办的必要。他明确提出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sup>②</sup>。

陈独秀特别注意自己的宣传对象。创办《新青年》时,他宣传的是民主主义,宣传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他强调伦理觉悟是“最后觉悟的最后觉悟”。现在他宣传社会主义,宣传对象扩大到工人群众,他认为最高的觉悟是阶级觉悟。尽管当时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也不高,但他还是努力把刚刚学到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以他自己的方式尽快向工人群众传授。这一时期,他特别注重向工人群众了解实际情况,注重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调查当时上海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工人团体

<sup>①</sup> 《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长沙《大公报》1920年1月11、12日。

<sup>②</sup>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5号,1920年4月1日。

的情况,积极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等等,所有这些活动使他的思想感情进一步向工人阶级靠拢,并逐渐成为工人群众的代言人和组织者。他把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编辑成《劳动纪念号》,第一篇文章就是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自己则写了《劳动者的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后来,他又邀请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等人一起创办《劳动界》(周刊),和俞秀松、李汉俊、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伙友》周刊。1920年他在上述工人刊物上发表了20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宣传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才最有用、最贵重”,他们是社会的“台柱子”;他回答工人为什么受苦,工人创造的财富到哪儿去了。他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解释工人的工价问题,宣传马克思的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他非常注意提高劳动者的觉悟,灌输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最终目的。他时时批驳资产阶级散布的“工人缺乏知识”、“只懂得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他强调“减时增资是工人的应得权利”。他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自己组织起来,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控制。时机成熟后,他又派同志在上海开办了工人学校,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亲自到会发表演讲,指出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sup>①</sup>

## 二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理论需求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第一次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此时陈独秀身陷囹圄,无法参与这场论战。当时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不多,参加论战的人很少,“谈不上谁胜谁负”<sup>②</sup>。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论战或人生观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著名论战。导火索是1923年2月张君勱在清华大学题为“人生观”的演讲,认为人生观有不同于科学的特点:科学是客观

<sup>①</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页。

<sup>②</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第169页。

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科学为论理学的方法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入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源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人生观问题“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而决不能以他人之现成之人生观,作为我之人生观者”,所以“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sup>①</sup>。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刊》发表《玄学与科学》,反对张君劢的主张,认为“玄学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是很利害的,已经附在一个人身上”,提出“人生观要受论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的支配”。他从知识论、心理学、宗教神学等谈起,得出“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要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观问题上去”的结论。

这场论战形成了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三大学派,被称为现代新儒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论战。

这场论战有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当陈独秀、胡适等人高举“科学”、“民主”旗帜,鼓动向西方学习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陈独秀还表达了一种用科学充实、改造人生观的热望,称“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sup>②</sup>之际,西方近代文化却乌云笼罩。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欧洲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并试图到东方文化中寻找克服文化弊病的良药。梁启超游历西方回来后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sup>③</sup>以梁启超为代表,标志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西方战祸及种种社会危机导源于西方的人生观,而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也恰恰在于人生观。张君劢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从1923年11月起,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马克思主义者先

① 《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8页。

②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第1卷,第2号。

③ 《梁启超哲学思想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页。

后介入论战。陈独秀着重批评了玄学派的观点,指出人生观可以从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变化去解释,强调被玄学派说得神秘莫测的“意志”、“直觉”、“良心”、“情感”等,“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sup>①</sup>。他还批评了“科学派”的多元论历史观,认为胡适“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sup>②</sup>,把物的原因同心的原因并列,不分主次,会走向唯心主义。他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倾其全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释各种观点,虽然有的成功,有的不那么成功,但已实属不易。

### 三 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思想武器

1920年11月,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争论。在论战中,张东荪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和《现在与将来》,梁启超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两人强调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绅商阶级的发生是“潮流,不可能抵抗”,而发展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弊病,则可以通过“温情的”“劳资协调主义”加以“矫正”。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赞成社会主义思想,却又断言中国只有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强调中国经济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大多数民众没有知识,“较原始人类之状态所差未必甚大”,因此中国“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能“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

梁启超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反对社会革命,他认为中国中产阶级之家多,特别富豪之家少,而且没有贵族阶级。中国的经济社会分配比较平均,没有大资本家,也没有贫富的悬殊对比。既然国情

<sup>①</sup>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序》。

<sup>②</sup> 陈独秀:《答适之》。

如此,是没有社会革命必要的。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认识似乎始终没有多少改变,虽然他的思想以“流质多变”著称,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没什么兴趣。社会主义作为“五四”运动时期“最时髦”的“显学”,每一个稍微关心时局的人无不受其影响。梁启超同样也不例外,他看到战后的欧洲人对社会主义趋之若鹜,热衷不下于中国。在欧洲他对社会主义并没有恶感,赞扬俄国社会主义把“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想理想”“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sup>①</sup>。但反观中国,他认为只当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不当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救济社会经济弊病的,西方之所以要有社会主义,是因为工业组织发展偏畸,生出了弊害,而中国没有这种弊害,自然无此需要。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可能是一剂良药,在中国就不然了。他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中指出,中国今日社会主义运动与欧美最不同之一点,就是“如何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如何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成劳动者”,以及“如何对待资本家”。他强调“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之所以推崇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觉得国家权力过大或无能,均不利于经济发展。<sup>②</sup>

陈独秀与李达、李达、蔡和森等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遭到中国资产阶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因此“革命之爆发仍是必然的趋势”,“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十月革命”后,整个世界已处在“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中国若要发展资本主义,实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不仅“理所不可”,而且“势所不能”。加上中国早已是“万国商场”,国际帝国主义是不允许中国发展自己的实业的,中国要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战争”,只不过是空想,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

① 《国际劳工规约评论》,《梁任公近著》第1辑,第290页。

② 《世纪抉择:中国命运大论战》第2卷,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818~829页。



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也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 第二节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发表《纲常名教》,指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sup>①</sup>他强调:“日本人害怕得很,因此想用普遍选举,优待劳工,补助农民,尊重女权等等方法,来消弭社会不平之气。但是这种希奇古怪外国事,比共和民权更加悖谬,自古以来不曾有过,一定传不到中国来。”<sup>②</sup>他还饶有兴味地研究克伦斯基与列宁,指出克伦斯基是俄国温和派的首领,现在居然致电劳农政府,说其思想渐渐和布尔什维克接近。“世界上温和的人都要渐渐的激烈起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sup>③</sup>他感到奉为神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已经不够用了,便将注意力由法兰西转向俄国,并从德国、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受到启迪。

### 一 “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

1919年4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说:“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sup>④</sup>一向崇拜法兰西革命和法兰西文明的人,居然把“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表明陈独秀

①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6页。

② 《独秀文存》,第486页。

③ 《独秀文存》,第513页。

④ 《独秀文存》,第499页。

的思想观点开始发生变化。

同月发表的《贫民的哭声》和6月发表的《立宪政治与政党》、《吃饭问题》等,表明陈独秀开始具有阶级观点,能看到资产者与雇佣工人“贫富悬隔”,看到“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在欧、美各国,他们贫富悬殊的原因,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佣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少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所以穷苦的工人时常和开工厂的资本家为难,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就是现在各国顶紧急重大的问题。”<sup>①</sup>尤其是他明确提出:“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权夺利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sup>②</sup>陈独秀过去曾迷信过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及其政党政治,这时却认为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事情了。过去他习惯于追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鼓吹个性解放,现在却关心起大家的“吃饭”问题来了,并把它看作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大问题”。他指出:“常言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法将他止住。’我看人要吃饭,也无法将他止住。各国都有许多雄赳赳虎狼似的军警,要立什么密约便立什么密约,要侵占人家土地便侵占人家土地,要怎样横蛮不说理便怎样横蛮不说理。独有人民要吃饭,却无法将他止住。无法止住,所以成了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sup>③</sup>

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入狱。三个月监狱生活的痛苦磨炼,使他思想更加成熟,这是大学生涯、研究室工作所起不到的作用。出狱后,他写了《答半农的D-诗》,其中说:“我不会

① 《独秀文存》,第410页。

② 《独秀文存》,第534页。

③ 《独秀文存》,第536页。

做屋,我的弟兄们给我住,我不会缝衣,我的衣是姐妹们做的,我不会种田,弟兄们来给我吃。”人民受苦,“他们不能和我同来,我便到那里和他们同住。”他以这样的语言,表达他与轻视劳动人民的士大夫意识彻底决裂,“我盼望自命为知识阶级的士大夫,不要太高兴,不要以为无产阶级永远可以欺负,不要永远把他们踏在朝靴底下不当做人看待。”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思想感情和立场已向劳动人民倾斜和转移。

以汹涌澎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强大动力,以三个月的铁窗生活和思考为契机,陈独秀在1919年底正式转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并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剖析和解答中国问题。出狱不久,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中指出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与20世纪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性质与不同内容,提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表示了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告别。陈独秀在《新青年》的七卷一号《本志宣言》中明显地表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本书注)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主张“新时代新社会”不仅是“自由的平等的”,而且是“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他进一步指明新社会的“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期求更广泛的民主政治。他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sup>①</sup>此时,陈独秀已经继李大钊之后,成为一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并萌发断绝旧的政党政治、另谋组织的念头。

## 二 消灭私有财产制的“平民社会主义”

在这一阶段,陈独秀逐渐接受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基本思想。

<sup>①</sup> 《独秀文存》,第244~245页。

1919年11月,他写了《实行民治的基础》,这是他由资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过程中的代表作品。他强调民治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应包含“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sup>①</sup>他批评杜威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认为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还是不彻底的,因为“我们生活必需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他主张:“我们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消极的不要被动的官治,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sup>②</sup>

1920年1月,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决定从广东“关余里”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汪精卫、章士钊多次函邀陈独秀南下共商筹办事宜。2月,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大学即席发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提出了最为当局恼火的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他认为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是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是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苦、有产的安享;三是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在讲到信仰问题时,他提出:一是“平等的信仰”,二是“劳动的信仰”,人人应该受教育,应该常劳动,心理上总有平等的劳动与劳动的革命。在讲到用什么根本的办法去改造时,他说还不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心理上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sup>③</sup>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北洋政府不能容忍,曾派警察企图在他自武汉返京时加以逮捕。幸亏高一涵、李大钊挺身保护,他才得以化装离京。

① 《独秀文存》,第251页。

② 《独秀文存》,第251~252页。

③ 《国民新报》,1920年2月7日。

1920年3月,陈独秀发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尽管有些糊涂观念,但其主要思想是试图以唯物史观分析人口问题与社会制度、发展科学的关系。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过剩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批判,显然是吸取了《共产党宣言》的有关论断。这是陈独秀由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变的一个标志。他指出:“自从马尔塞斯死后现在八十五年间,因为资本集中,机器广行,交通发达,殖民地开拓这四个缘故,欧洲经济状况生了绝大的变化”,“毫没有收获渐减底恐慌”,“生产过剩底恐慌,居然成了经济学上一个原则”。不过他慧眼独具,指出“这种过剩的生产物,乃是资本私有制度之下,分配不均劳动者无力购买的结果,不是实际的过剩”,“这种非实际的生产过剩,一方面可以证明社会上贫困的现象不是因为生产不足,乃是因为分配不均;一方面可以证明马尔塞斯食物增加和人口增加不能保持平均速度的理论,确有不验的地方,不验的时代。”<sup>①</sup>

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表明自己对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批判了第二国际的错误观点。他放弃了“国家是全国国民所共有”的观点,认为近代国家“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权”,“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现在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政治”是“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是掠夺的机关”、“官僚底巢穴”和“资本家私有财产底护符”。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国家、政治和法律,这是“因噎废食的办法”,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除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及社会的不平等。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劳动阶级压迫在资本势力底下;劳动阶级也只有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的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去不平等的经济状况废去。”<sup>②</sup>他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

<sup>①</sup> 《独秀文存》,第293页。

<sup>②</sup> 《独秀文存》,第365页。

惩治犯罪的必要工具,如果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应有法律制裁。他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批评第二国际与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他强调:“若不经阶级战争,若不经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内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sup>①</sup>他的结论是:“一,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第二,既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的工具,也不承认现存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第三,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是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种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sup>②</sup>陈独秀的上述认识,为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 三 唯物史观: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1922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马克思学说》,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所引出的革命理论,是“经济的历史观察”和“唯物的历史观察”的结论。他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此时他已认识到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也是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要点。他还认为《共产党宣言》的精髓就是根据唯物史观说明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他引述《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的有关论述,说明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治来达到

<sup>①</sup> 《独秀文存》,第370页。

<sup>②</sup> 《独秀文存》,第371页。

他们斗争的完全目的,无产阶级的胜利与资产阶级的倾覆都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较之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准,可能要高出一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经过陈独秀的文笔顿增生气。难怪蔡和森曾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

1920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劳动节纪念号》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大表现。这期纪念号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结合的产物。他积极参加了工会庆祝“五一”节的活动。他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各业代表与各部干事联席会议,被推举为教育主任,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在全国工人运动兴起的基础上,他着手发起创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

1920年底,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中,已弄清楚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说:“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是建立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的穷人底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底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底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sup>①</sup>。他认为,马克思指明了现代生产方法的缺点在于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而救济这两大缺点,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归公,人人皆知都有工作生产底机会,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谁也不能据为己有,谁也不能租给他人收取利益;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许私人投机营业。他断言:“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克思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

<sup>①</sup> 《世纪抉择:中国命运大论战》第2卷,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891页。

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sup>①</sup>令人惊讶的是,他当时不仅意识到中国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认为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需。他指出,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不但忘了马克思派的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克思,表面上却挂着马克思派的招牌。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克思的主张,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他指出了两党的三个区别:一是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在共产党是最初的手段,在社会民主党是最终的目的;二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带有很浓的德意志国家主义的色彩,俄国共产党还未统一国内,便努力为第三国际的运动;三是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有产阶级的国家,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sup>②</sup>

#### 四 “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乏”

1920年9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考察,在演讲中为中国救亡图强开出了处方:不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不要进行阶级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1920年11月,张东荪在陪同罗素考察后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和《现在与将来》,指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sup>③</sup>。他还引筑山君自美来信,说美国农夫比中国中等人家还要好得多,可见得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他认为:“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这样,张东荪就挑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命运问题和中国社会出路问题的大讨论。

① 《世纪抉择:中国命运大论战》第2卷,第893页。

② 《世纪抉择:中国命运大论战》第2卷,第903页。

③ 《世纪抉择:中国命运大论战》第2卷,第762页。



1920年底,在《新青年》、《共产党》上展开的社会主义讨论中,陈独秀发表了《复张东荪先生的信》和《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抨击张东荪等人发展资本主义、鼓吹劳资协作、反对社会主义和否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性等主张,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乏。他认为中国是需要开发实业,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开发。按照资本主义那一套去开发,虽然一面增加财富,可是一面却增加贫困。资本主义只能使少数人免于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为此,其一必须使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保全中国独立,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的目的;其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强调: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古代的简单的均富论,而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克思之前建设在伦理上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他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分配方面废除剩余价值,消灭剥削,这就是我们讲社会主义的动机。他认为,与张东荪等人的分歧在于:现在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在这场关系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辩论中,陈独秀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理论素养,但还不能够提出中国革命的具体方略和步骤。

针对罗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的观点,陈独秀明确表态:中国人底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有心改造中国之人究竟是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还是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针对张东荪所谓“中国贫穷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仅由资本家榨压”的观点,陈独秀追问:中国对欧美比较一般的贫乏是什么缘故?这一般的贫乏能否逃出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打倒手工业时必然造成多数失业及物价昂贵底公例?在陈独秀看来,资本主义不应该分别内外,国内资本主义的掠夺方法同外来的是一样的,不过程度上的区别而已。他强调,若果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

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班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中国人中少数人免于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他的结论是“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而采取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sup>①</sup>。他认识到:“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觉悟,不能作阶级的争斗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钱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的好机会……这种状况,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sup>②</sup>

## 五 “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将误尽天下后世”

晚年陈独秀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经常思考民主问题。他在《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见》等书信和文章中都曾谈到民主,尽管未能详尽论述,但是微言大义,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sup>③</sup>他指出,“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sup>④</sup>。他认为,由专制到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便“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使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sup>⑤</sup>

在1929年8月给中央的信中,他指出:“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中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

① 《世纪抉择:中国命运大论战》第2卷,第783页。

② 《世纪抉择:中国命运大论战》第2卷,第785页。

③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04页。

④ 《陈独秀书信集》,第504页。

⑤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24~534页。

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sup>①</sup>昔日党内最严厉的“大家长”如今大力宣传起“党内民主权利”来,这正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表现:掌握大权时,要求高度集中统一;一旦失去权力,以普通人的身份便大声疾呼保护民主权利。正是由于失去了党内权威和领导地位,才使他清醒地意识到党的政策、策略的偏颇与失误;正是恢复了普通人的正常感觉,他才迫切感到党内民主的极端重要性。他反对什么事情都是自上而下的一概奉行“委派制”,这实际上造成任人唯亲、唯我独左。他批评大家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意见一概不许开口,只能贯彻执行,从省委到基层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的传达机关”。他看到了缺乏党内民主的严重危害性,使得中央“左”倾盲动主义无法抵制。党内同志以生命与鲜血代价换来的教训是,党内民主权利是有效抵制错误政策、错误路线的政治武器。一旦普通党员失去这种权利,就等于将自己的生命送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祭坛,让白色恐怖的势力任意宰割。

陈独秀还引用列宁关于党内民主权利的有关论述作为支持,指出:“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线若有小小的不正确或大大的不正确,则是否需要‘自我批评’呢?”他认为,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表现,决不是坏现象。若大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却正是党的幼稚的表现。争论的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地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于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这里,他真正开始领悟到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真正认识到党内民主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基于这样的思考,陈独秀的结论是:在组织上尽可能扩大党内需要的德谟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果有可能,省委也不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评”的自由,各级党部开会有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自由,党员之间政治上意见不同的争论,准其在党报上发表。最后,他动情地写道:“因为我不忍眼

<sup>①</sup> 《陈独秀书信集》,第449页。

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地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着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地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sup>①</sup>在当时“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情况下,陈独秀的信不可能受到公正对待。

1940年9月,陈独秀在孤寂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党的民主建设问题,并深刻反省了苏联党内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指出:“如果不实行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克格勃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sup>②</sup>陈独秀此时批评斯大林的独裁错误,虽然不合时宜(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夕),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包含着真理的颗粒,值得后人记取。譬如,他强调“‘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他把这种政权称之为“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认定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sup>③</sup>他还指出:“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于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这里面不能不包含陈独秀自己全部辛酸的经验教训,深刻之极!再譬如,他指出:“从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苏维埃制度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所有这些关于民主建设的看法,都从不同角度体现出陈独秀晚年对民主的向往与企盼。仅从这一点考察,我们可以肯定,陈独秀仍然是“五四”精神忠实无畏的实践者。

① 《陈独秀书信集》,第453页。

② 《陈独秀书信集》,第503~504页。

③ 《我的根本意见》,载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60页。

### 第三节 陈独秀社会主义 思想的现代意义

陈独秀是在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暂且不说引进了“科学”、“民主”(最初是通过“人权”)的观念,仅是在新文化运动与产业的关系上,他也发表了十分独特的见解。他说,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这里他所言的“新的政治理想”不是别的,而就是社会主义理想。他认为,“新时代新社会”不仅是自由的平等的,而且应当是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他指明新社会实行的是“真的民主政治”,就是要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他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他鄙视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希冀创立新型的为全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大众利益奋斗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他和李大钊两人一起创立中国共产党,一起描绘了创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前景。“只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今天仍是最要警惕和防止出现的。如何改进和完善执政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提高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建设廉政文化,加强“防惩体系”,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道严峻的课题。

陈独秀所认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武装起来的先进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制度。譬如,他强调“民治”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应包含“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他批评杜威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认为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还是不彻底的。他认为前人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曾建设在社会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可见他已经具备了比较透彻的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强调,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

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的动机。

正因为他具备了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他能够在中国率先认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精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特别的,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一种先知先觉的预见功能。他指出,“资本主义不应该分别内外”,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乏,强调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开发实业,主张避免“少数人免于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的局面。面对山西的“黑砖窑”事件,我们读着陈独秀的话语,内心确实能够产生一种难以平静的激动和共鸣,这就是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威力,不承认不行。“社会主义生产制”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当今中国,仍然值得探究。

陈独秀指出,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觉悟,不能作阶级的争斗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钱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的机会;这种状况,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其实,建立农工劳动团体,组建工会,维护劳动者自身利益和各种权利,正是劳动团体组织的重要职能。陈独秀的话在今天依然未失却它的功能,实在是一件既令人庆幸又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今天最为紧迫的事情,莫过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在这方面,陈独秀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他关于民主的思想,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可忽略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 第四章

# 苏俄社会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形成,既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机遇和历史环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同时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苏俄社会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与俄国革命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的设想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创立了社会化大工业的物质基础,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战胜封建主义制度的过程中逐渐稳固确立下来;另一方面也使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内在矛盾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出来,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供了基础。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资本主义仍处在早期发展时期,经济、社会与阶级矛盾异常突出和尖锐化,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镇压引发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理论得以形成的历史条件。工业革命使得大机器生产代替了小手工业生产,但工厂劳动条件极端恶劣,广大工人处境悲惨,而资本

家却凭借对工人的压榨和剥削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种状况首先引起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抨击,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由于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其深刻程度是空想社会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他们对资本主义从哲学、经济、历史、政治多个角度进行了透视分析,最终从制度上予以全面否定,并指出结束这种制度的方式是“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sup>①</sup>。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迄今都表现为某种整体)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sup>②</sup>。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侧重从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产生过程提出暴力革命。他认为:“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sup>③</sup>既然“肉搏”不可避免,那么“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sup>④</sup>。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精彩的概括:“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19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



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sup>①</sup>以上引文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确信在这个“襁褓未干”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正像先前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这一暴力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进行时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即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充分发展。他们认为,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生产力革命,在西欧和北美均已基本实现,它们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所以社会主义将“几乎同时”首先在西欧、北美等较发达的众多国家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建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其逻辑起点是他们独创的“世界历史”理论。<sup>②</sup>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同时,“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07页。

② 有关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解读,请参见张光明:《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张爱武:《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1~5页。

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sup>①</sup>。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在回答第19个问题即“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sup>②</sup>

由此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关于“谁”即“哪些国家或民族”最有条件、有资格最先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显然觉得,只有那些在当时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的民族和国家才可能发生革命“行动”,因为这些国家在普遍的世界交往(这种“普遍交往”作为一种“前提”已为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资本主义所推动和实现)中占据了优势并控制着整个世界市场,也只有它们才实现了“较发达的工业”和“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

第二,关于率先采取社会主义行动的这些国家或民族“采取行动”的“方式”。这一行动应该是占统治地位各民族和国家“一下子”、“同时”发生的。“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sup>③</sup>当然,这种“同时”或“一下子”并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时空概念,即使在这几个“文明国家”里,即使“它是世界性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仍然可能或可以发展得“较快”或“较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0页。

## 二 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行动条件和方向

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以电磁学理论及电力技术为科学技术基础、以电力和内燃机的广泛运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带动了比第一次科技革命更有效率的汽车、化工、新型冶炼等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谈到的几个“文明国家”,得到了更加迅速的提高。从1870年到1900年这短短的30年间,世界工业总产值增加了将近4倍,钢铁产量猛增了55倍,石油产量增加了25倍。<sup>①</sup>各主要国家建成了遍布全国的铁路网,轮船代替了帆船,世界贸易和发达国家的资本投资逐步扩展到了世界各主要地区,数量上也增长了几倍乃至数十倍,贸易和投资国际化逐渐成为普遍趋势。一战前,以生产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加为基础,资本主义逐步向纵深发展,生产各方面的联系逐步加强,垄断也逐步代替自由竞争在整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德国等新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重新划分世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以谋求本国垄断的最大利益。另一方面,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发达国家政治生活和阶级关系的重大调整。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但最终在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确立,而且由于各主要国家主权得到巩固,因此资产阶级统治者也就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国内问题的解决上。统一后不久,“铁血宰相”俾斯麦政府在德意志开创和实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福利制度,至一战爆发前,这一制度已初见雏形。法国共和制在几经曲折后终于确立。美国通过南北战争,维护了统一的全国政权,并利用有利的自然资源条件和正确的经济开发政策,使经济发展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后来居上,逐步在资本主义世界独占鳌头。总的来看,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在这30多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决定了它们在以后100多年直到现在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被称作欧洲社会主

<sup>①</sup> 樊期曾:《现代科技革命与未来社会》,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义史上的“黄金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欧美各国工人阶级队伍飞速壮大,在经历了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短暂低沉之后,欧美各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作为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也伴随着工人运动向世界广泛扩展,在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逐步由“富有人民革命传统”的法兰西转移到了“饱含莱茵河哲思”的德意志。不止如此,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尤其是东方也得到了传播和扩展,在部分落后国家如俄国成了吸引和团结无产阶级的重要理论武器。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无产阶级自身组织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等类似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在各国广泛建立。19世纪的最后30年,是“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sup>①</sup>的时期,列宁此话虽说稍显夸张,但对于当时充满激情的欧美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并不显得过分。然而,问题的复杂性也恰恰根源于这个时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走向分化,导致此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历史跌宕起伏,呈现出一幅纷繁复杂、引人深思的发展图景。

主要发生在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分化,是以“西欧社会主义的主流逐渐趋向改良渐进式的道路,俄国社会主义的主流却日益激进和革命化”为阶段性“断裂”标记,<sup>②</sup>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革命信念的检验为阶段性“断裂”的“试金石”,以第二国际恢复和第三国际成立为分化的最后标志。这种分化根源于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取决于各国工人阶级基于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所采取的不同形式的“行动”方式。只要有社会主义在各国的传播,就“迟早”会出现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可视为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理论的应用要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甚至实践者主观因素的差别也会影响运动发展的进程和方向。虽然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基本方向,但是历史发展中历史人物本身以及理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页。

<sup>②</sup> 张光明:《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引言第6~7页。

论实践的偶然性有时也会决定性地影响运动和历史发展的进程和面貌,这一点在诸如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sup>①</sup>。就各国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它并不排除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特殊性和具体性,而社会发展的跳跃性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具体表征。

由于一战前早已孕育着的分化,大战一开始,在西欧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那里,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矛盾立刻公开化,“革命的信念立即让位给民族的情感和对现存制度的认同”;而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却利用战争带来的机遇,在1917年抓住时机“一举夺得了政权,把落后的俄国引进了苏维埃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发生,结果就是使曾经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最终一分为二,形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地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东方广阔落后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对峙与冲突,奠定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格局,铸成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历程中种种复杂困难和全新问题。<sup>②</sup>

### 三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与俄国革命道路

科技革命的推进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其革命理论初创时的社会条件,他们以无产阶级理论家和革命家的智慧和勇气开始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发展趋势的探索。

随着资本国际垄断化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马克思没有看到他所期待的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却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持续入侵下东方各国不断高涨的革命形势。在晚年的论述中,他对贫困落后而又矛盾和危机重重的东方国家充满了鼓励和期待。他在给俄国《祖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76页。

<sup>②</sup> 张光明:《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引言》第6~7页。

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指出：“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sup>①</sup>，它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sup>②</sup>。他开始提出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为了证实这个设想，他对东方社会和人类学进行了研究。1881年，在深刻地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经济以后，他得出结论：“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它在现在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sup>③</sup>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更明确地表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过西方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sup>④</sup>

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像俄国这样一些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思想，成了今天许多研究者争论不休的问题。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的错误，而是他们没有搞清楚马克思提出此思想的限制条件。马克思认为要“跨越”资本主义，需要：第一，在政治上，东方国家首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必须进行革命。这种革命不论是什么性质与形式的,必须纳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与之互相呼应。也就是说,东方国家的革命必须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二,在经济方面,东方落后国家有一个有利的历史环境,就是比它发达得多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因此革命胜利后,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从而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生产发展到足可以支撑社会主义存在的程度。

总的来说,马克思的设想只是一种零散的纲要式的思考。这是马克思在晚年探索中的思想闪光,来不及形成系统的理论。相比之下,恩格斯对于东方社会和俄国革命的探索就更加系统和深入。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源于1875年对俄国民粹派代表人物之一特卡乔夫观点的批判。恩格斯的观点阐述主要集中在他1875年所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82年与马克思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1894年所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以及给伯恩斯坦、丹尼尔逊、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几封信当中。

恩格斯认为,虽然俄国农村公社由于其原始组织的特点,可以作为未来社会的起点,但必须有“外在的推动”,即西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而且作为这种推动的西欧革命一定要“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否则就不能为其“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也不能“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sup>①</sup>。在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进一步强调对俄国公社进行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sup>②</sup>。

单纯从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论述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0页。

都着眼于世界革命的宏观历史进程,从唯物史观的分析出发,在对东方国家尤其是俄国革命充满鼓励和期待之外,更多地强调了东方国家实现社会“跨越”所需的社会政治条件(即西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经济条件(即西欧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力条件)的支援和呼应。离开这两点,东方国家包括俄国革命,就难以实现任何社会“跨越”。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探索,是主要针对俄国社会发展形势作出的估计,当时难以估计出广大东方落后国家能够出现任何社会发展的“跨越”。而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使恩格斯得以把这一探索扩大到了广大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1886年10月9日,恩格斯在致伯恩斯坦的信中写道:“对于保加利亚人,正如对我们一样,如果他们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一直到欧洲革命爆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民族机构会成为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很好的出发点,就和现在我们眼前衰亡着的俄国‘村社’完全一样。”<sup>①</sup>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里,恩格斯有一段话充分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当西欧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sup>②</sup>“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sup>③</sup>。当然,这一判断,无论是对于俄国,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以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页。



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都只是一种发展的可能，并不具有客观必然性。如果历史发展的机遇给予这些国家这些条件，那就是实现“跨越”的“最好机会”和历史机缘，从而使本国本民族免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不幸和灾难

综合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问题和落后国家发展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他们一贯坚持的历史观。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俄国和其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可以有特殊的道路，但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之上这一点，却是毫无例外的。而且，即使可以实现“跨越”，也不能说是“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可以从村社或其他落后社会形态进入社会主义。只能在政权形式和生产关系上“跨越”，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方面，是绝不可能有“跨越”机会的。

#### 四 俄国革命及其后果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sup>①</sup>但实践证明，即使有了革命的理论，革命的运动或行动也不见得就能容易进行；或者说，革命也不一定会按照理论设想的条件和方式进行。在西欧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尚且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搞革命更不可能在现有理论中找到现成的方案。更何况，这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自己专政的开创性革命“尝试”要比巴黎公社革命宏大得多。那么，俄国革命家是怎样在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创造和利用条件”取得了革命成功呢？

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为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俄国和其他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卷入了战争，这个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随即出现了革命的形势。“战争引发危机，危机引起革命”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当然，有了革命的形势还要有对其及时把握的组织和革命领导者。当“要不要进行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革命”的问题被现实形势回答后,俄国革命的胜利就主要取决于革命者能否把握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一是经济落后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还很不普遍,工业革命也并没有彻底完成,只是部分地建立了官僚的资本主义工业;在广大农村,工业几乎没有任何的发展,再加上自然条件造成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因此农村极端落后;农村的落后不但造成严重的城乡对立,而且还造成了社会生活基本必需品的严重匮乏,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矛盾;战争进一步加剧了矛盾的发展。二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热情高涨。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在革命的呼唤下热烈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三是现存政府的无能和反动。他们为极力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采取更加残酷的手段剥削和压榨工人阶级和农民。四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自己远大政治和社会理想的强烈愿望。布尔什维克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握了这些关键问题,领导工人阶级“一举”夺取了政权,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不过,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对本国的革命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他们认为,虽然俄国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是如果没有西欧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呼应进行支持,俄国革命可能会很快遭到这些国家反动力量的干涉而流于失败。但现实情况却是,一方面,德国等西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先后失败;另一方面,经过几年艰苦斗争,苏维埃俄国挫败了外国和本国反动势力对新生革命政权的干涉和进攻,开始考虑在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了继续在国际范围内寻求革命的呼应,他们将眼光转向东方,中国革命就是其东方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

## 第二节 苏俄东方战略与中国 革命道路选择

作为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东方战略,中国革命成为苏俄一国

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寻求革命呼应的重要对象,也成为列宁社会主义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

### 一 从世界革命战略到东方战略

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一举夺取了政权,提前揭开了“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了“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sup>①</sup>列宁等人认为,俄国革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如果没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作为呼应,“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要取得完全的胜利,“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sup>②</sup>列宁设想的这一战略也被称之为“促进革命”战略。但列宁的美好预言没能实现。1920年底,随着德国、匈牙利、波兰等国革命的先后失败,这场由俄国革命促成的革命风暴很快消逝了,革命被推迟了下去。虽然欧洲革命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但苏维埃俄国党和人民誓死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挫败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涉和颠覆。加上殖民地人民风起云涌的解放斗争和各帝国主义国家逐步进入国内调整期,整体上造成了国际上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暂时的微弱均衡,苏维埃初步保持了胜利的果实。这种结果和局面不在当初设想之内,但列宁以职业革命家特有的敏锐觉察到了这些变化。他指出:“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俄国抗击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竟能延续三年之久。结果无论这一方还是那一方,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不过,这种状况就已经给了俄国领导人和民众以充分的信心,“即使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sup>③</sup>在这种情况下,预期的西欧革命短期内不会到来,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须一边“期待”,一边考虑“比较长期地进行新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建设”。对于后者,俄国现在所要做的已不像当年的革命那样仅仅是一种“序幕”的工作,而是要树立“建立新的经济关系”的“榜样”。列宁基本形成了这样的看法:虽然俄国国内的经济落后,不完全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但从国际经济的整体角度看,俄国可以利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这个“极大的因素”来促进自己的建设。“先进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帮助我们恢复经济,虽然这些国家是由那些对我们恨之入骨的资本家领导的”。<sup>①</sup> 列宁开始认识到俄国必须通过先行发展经济来保障政权的生存,并在发展中等待和促进下一轮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换言之,即俄国先进行尝试性的建设,等到西方革命胜利了,大家再共同建成社会主义。这是列宁革命战略的第一次转变。

过了一两年,欧洲各国的革命形势持续低落,革命没有再发生的迹象。与此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东方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不断高涨,这使得列宁又萌发了一个新的念头,即东方各国人民独立的革命斗争,将有可能在未来世界革命决战中发挥重大作用。“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sup>②</sup> 列宁将视线转向东方,认为东方国家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环节。列宁、俄共(布)、共产国际非常关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派了人员去做革命和建党等相关的前期工作。早期协助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为列宁的战略思想中东方战略的萌发和形成提供了直接的鲜活实践材料证明。从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文件材料上表明,这一时期在东方所做的工作,只是为未来的世界革命培养一些“准备力量”,期待他们马上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显然为时尚早。现在看来,列宁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显示了非凡的预见性,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东方国家的革命形势发展虽然比预想的要复杂,但是胜利却比预想的要快。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90页。

列宁在他逝世前一段时间里,继续思考着这一革命战略的转变问题,并最终使这一战略构想得以形成。列宁一直担心,苏维埃俄国的国力能不能使它坚持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它能不能避免同帝国主义国家在未来发生冲突呢?但后来这些问题似乎有了答案,即俄国即使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也不是俄国一国的事情,随着东方国家革命形势的发展,这种可能爆发的“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远东、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sup>①</sup>。这表明,苏维埃俄国的前途命运已经同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俄国社会主义彻底胜利的希望和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希望被寄托在东方大多数人的革命斗争上。这一思想的提出,意味着列宁社会主义战略的转变,即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把俄国革命过程与西方国家革命过程联系在一起并从西方寻求支持力量的战略,逐步转变为实现东方社会主义战略即寄希望东方国家革命运动发展和促进东方革命运动发展,进而呼应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随着东方各民族的觉醒,更多的世界人口加入到革命运动中来,革命阵营力量不断壮大,到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那天,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一起,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以上构想是列宁在东方“输出革命”战略的核心所在。

作为列宁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略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除了将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战略转到东方国家社会主义战略,列宁还对国内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即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逐步转变到新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苏俄在苏维埃保卫战争时期为了调动一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势力的干涉、进攻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随着这种手段的推进和广大民众革命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6页。

热情的高涨,这种手段被布尔什维克党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捷径,误以为由此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随着苏维埃保卫战争的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不但造成国家经济极端困难,而且迅速演变成国内政治危机。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正确的办法只能是“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原来“在经济战线上”,用粮食收集制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做法“遭到了严重的失败”。<sup>①</sup>为了应对国内危机,1921年5月,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强调把以市场为主导、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措施配套起来,实施一种由过去企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到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为主要要素的“退却”;同时对政治体制、党的领导也进行了积极调整。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以及相应的党、政方面政策的调整,对俄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俄国国内政策调整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问题经由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东方社会主义战略,极大地影响到了东方国家的革命实践。

## 二 在中国寻找革命盟友和推动国民革命

苏俄除直接帮助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外,还积极寻找可供直接借助的革命力量。自然的,在中国当时的军事力量中找到最有革命性又对苏俄最为友好的部分,并对其按照革命要求和苏俄利益进行改造就成为一项最直接的方案。但具体实施起来却不容易。1919年底1920年初,或许应该从孙中山等关注和同情俄国革命开始,直到1923年1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发表,期间几乎所有中国的军事力量甚至于军阀政府当局都曾进入过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革命“猎头”的视线,其中的纵横跌宕,辗转反复,足可写一部充满悬念的宏篇巨著。结果导致了中国国民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的“水落石出”。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报以极大的同情和期望,认为“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sup>①</sup>。1918年夏,他曾致电列宁和苏俄政府,热情地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他对处在最困难时期的俄国革命的关注让俄国革命者们备受鼓舞。列宁进行了回应,并号召两国人民共同斗争。这成为双方以后顺利接触的先声。1919~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中的对华友好表示,使孙中山对苏俄更加向往,多次表示迫切希望了解和学习苏俄的革命经验。

苏俄最早在中国与孙中山进行接触的是波达波夫将军和波波夫上校,时间大约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据波达波夫在1920年12月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报告中记述,孙是“狂热的反英者”,与北京政府和已垮台的广州政府“势不两立”;在“中国各地他都有追随者,在革命人士中他有一些忠实的朋友”。不过,他对苏俄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持悲观态度,“在各种交谈中,他不止一次表露出,他不相信我们能成功地在俄国实现共产主义”。他接受建议,决定派廖仲恺和朱执信作为他的代理人去苏俄(事实上未能成行);他同时还担心自己与俄国的交往暴露,害怕那会给他在外国租界的逗留和在中国进行的革命工作造成麻烦。<sup>②</sup>可以说,这段记载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把握还是很准确的,之后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几条。对孙中山来说,他此时关注的主要是争取得到俄国革命者及其政府的同情和帮助,并不是想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同时,他也在寻求海外尤其是欧美各国对他的革命的支持,在当时列强对苏俄新政权欲除之而后快的情况下,他自然不想因为与苏俄这样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交往影响自己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可以说,双方都在进行初步“考察”。1920年3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来

<sup>①</sup> 李新、陈铁键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国民革命的兴起(1923~192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8页。

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上校军官波波夫,后者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过此次接触并没有引起孙中山的过多重视。<sup>①</sup>

1920年夏秋之交,化名费奥多尔、费奥多罗夫的俄共(布)阿穆尔州委中国部书记刘江,到上海拜访孙中山。他在后来给其州委的报告中讲述了同孙中山会谈的情况,称孙中山为“中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南方革命运动的首领”。他与孙达成诸如联合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为反对北方政府准备条件,在远东建立领导中心,把新疆作为驻扎苏俄和华南军队的据点,开展出版事业等四点协议。他还认为当时在中国南方省份进行的运动,“可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sup>②</sup>从报告看出,刘江不但不知晓苏俄政府在远东的战略意图(当然也不可能知晓),而且他对中国政治形势的观察和把握也并不准确。<sup>③</sup>这一插曲,只能说是俄共(布)地方组织在中国行动的个案,不但对其高层的战略决策没有产生什么直接影响,而且协议内容形同空文,有价值的只是从侧面反映了孙中山当时的军事意图。

1920年秋,魏金斯基在陈独秀建议下,在上海与孙中山会面。孙向他了解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并讲述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孙中山尤其对“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方面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的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这一问题很感兴趣,并且还谈了“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以便加强联系的问题。<sup>④</sup>与其他接触者不同,作为专门负责在华寻求革命力量、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将中国情况传递到苏俄决策层的魏金斯基与孙中山建立起联系,并互相了解对方的合作意愿,使孙中山迅速在苏俄领导人中国战略选择中凸显出来。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苏俄来说也不例外。随着苏俄国内战

① 李玉珍:《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55~56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3~46页。

③ 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4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146页。



略由捍卫苏维埃政权转到国内建设,在策略上也相应地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这些转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苏俄开始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邻近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1920年10月,契切林致信孙中山,建议恢复两国贸易,建立友好关系,但孙中山于1921年6月才收到这封信。1921年后,苏俄领导人对孙中山和广州政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1919年起就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的俄共(布)党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回到莫斯科后,于1921年4月21日向苏俄领导人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广州政府、国民党、共产党的情况以及广州的革命局势,指出:“工人们非常热爱和信任孙逸仙,这是因为近年来国民党几乎是惟一一个在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工人中间开展工作的充满活力的党,也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另一个更革命的更具有鲜明阶级性和组织性的力量,自然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和在小资产阶级中比任何其他党都赢得了更大的同情。”他还准确地提到了广州军队的情况:有兵力6万人,140门大炮,但很涣散,纪律性差,不是一支像样的军队。最后,他站在苏俄远东战略的高度提出: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这是远东政策中的最迫切任务。建立这种联系的目的是要在居民中和在广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够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来反对日美资本主义的整个远东的人物。<sup>①</sup>在孙中山及其亲信接触的所有苏俄领导人及其代表中,除了1922年7月使华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外,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和他这份报告最有效地提升了孙中山在革命合作中的分量和地位。这不但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他与苏俄最高层的沟通渠道所给予他及他的报告的“沉甸甸”分量,还在于他对孙中山战略意图、国民党和广州情况的细致了解和准确判断。这份报告基本确立了孙中山及其势力在苏俄领导人物色革命力量“人选”中的优先地位。

1921年8月,孙中山在回复契切林1920年10月来信时明确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8~64页。

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他还说他已成为广州护法军政府的非常大总统，希望有朝一日入主北京时与苏俄恢复友好关系，这直接回应了契切林来信中发展中俄贸易、恢复两国关系的提议。<sup>①</sup>

孙中山对苏俄的友好和积极回应，加上其势力的上升，引起了苏俄领导人对他的进一步关注。不过在当时，他们一方面希望同广州政府交往，一方面又担心这会影响到北京政府进行的建交谈判。1921年10月，契切林致电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扬松，询问在不影响中苏建交谈判情况下苏俄与广州政府的交往问题。扬松很快回复说，只要苏俄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代表机构，就可以同广州政府进行往来。列宁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指示契切林与广州交往：“应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尽量秘密进行，要派我们的人去广州”<sup>②</sup>。列宁的指示是苏俄正式与孙中山进行联络的信号。12月，苏俄政府派出派克斯为首的使团来华与中国政府进行建交谈判，契切林向派克斯下达了同广州政府进行接触的命令。派克斯到达北京后，即召正在上海的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成员达林到京，指定他为北京外交使团与孙中山联络的全权代表，派他到广州与孙中山直接联系。达林奉命到广州，一直呆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才离开。<sup>③</sup>

1922年1月，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民党代表出席大会的代表张秋白不仅在会上发言，阐述孙中山的内外政策，而且得到了列宁的接见，还同契切林进行了几次会谈，讨论了孙中山国民党与苏俄的关系问题，这是苏俄领导人与国民党人的直接接触。会后，契切林写信给孙中山，谈到他与张秋白会谈的情况，认为双方意见完全一致。<sup>④</sup>至此，苏俄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67页。

③ 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第28～30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4页。

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的政策已经比较明确。虽然此后由于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导致孙中山避难上海,以及苏俄领导人出现了在选择吴佩孚、陈炯明等势力作为联合对象的摇摆,但经过综合考察,在越飞的努力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最终作出决定:“不管中国出现任何政府组合都必须继续在支持孙逸仙的民主组织和配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方面进行系统的工作。”<sup>①</sup>及至1923年1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发表,标志着苏联与孙中山正式结盟,也标志着苏联政府完成了在中国寻求革命盟友的全部历程。

1920年初至1923年初,苏俄密切关注过吴佩孚。但由于吴佩孚在外蒙问题上不愿与苏俄合作,也不愿在中国统一问题上与孙中山联手,再加上苏俄发现吴的势力在迅速变动的中国局势中并无优势,因此1923年1月13日越飞最后表示:“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逸仙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sup>②</sup>另外在1920年4月至1922年6月炮轰总统府之前,陈炯明也曾进入苏俄领导人的视线。他们之所以看重陈,不仅是他拥有军事实力,更重要的还是看重陈炯明的革命经历以及他的政治态度。不过事实证明,他们高估了陈的革命性。当苏俄领导人获知他以炮轰总统府的方式来解决他与孙中山矛盾的消息后,就立即断绝了同他的联系。<sup>③</sup>

### 第三节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

如前所述,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开始受到共产党国际的关注和影响。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96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96页。

③ 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第36页。

## 一 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认识的不断加深并没有使其在大革命中获得直接胜利,反而是国民党右派采取“分共”政策背叛了革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的后期领导和推动工人和农民革命运动时,出现的所谓“过火”行为触动了国民党代表的部分阶层的利益,当然这也是国民党为了取得政权而对国共合作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联共(布)、共产国际在国民革命形势迅猛推进的新形势下,仍然企图借助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右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固守国共合作的形式,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与虎谋皮”的幻想。另外,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除了在决策上受联共(布)、共产国际直接影响外,中共中央自身尤其是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也负有没能进一步争取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以及主导权等一系列责任。

南京国民政府 1927 年 9 月于“宁汉”合流后成立,标志着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逐渐彻底放弃了国民党的旗帜,开始思考和谋划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联共(布)、共产国际也终于抛弃了对与国民党联合战线的幻想,并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逐渐将工作重点转移到重视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上来。斯大林认为,革命失败是因为中国伙伴把革命推进得太快,而列宁主义要求革命的先锋队领导革命,绝对不能失去同群众的联系。与此同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面对昔日“革命同志”转向自己的枪口,紧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挽回局面。1927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在国民革命期间与共产党有较好关系的部分国民党部队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下举行南昌起义以保存自己的武装。随后召开有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的研究对策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暴动如秋收暴动、广州起义等以“响应南昌暴动”,夺取政权;起义失败后转向山区和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所进行的努力和求索丝毫不逊于国民革命时期。但所有的城市暴动几乎全部败退,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在没

有掌握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情况下,期望如俄国革命那样靠暴动夺取中心城市,一举取得革命的胜利,在中国是不现实的;比较可行的或者说迫不得已的办法应该是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虽然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仍然坚持认为游击战争的想法是多么的不“纯粹”,而将中央领导机构放在上海以便继续推动以工人阶级夺取中心城市进而领导全国革命,且党内多数人对于游击式的斗争及农民割据的办法不理解、不信任,但中国农民革命所创造的游击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方式最终得到承认,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1928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作了比较准确的分析,对下一阶段革命的开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929年,古田会议提出“从思想上建党”,成为这一时期党的建设方面的突出进展。1931年11月,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基本巩固,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一条新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家领导下得以初步开创。这条道路就是后来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中国革命之路。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了两次界定。一次是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明确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是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革命”<sup>①</sup>,并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一次是1948年4月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最终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完整概括,首次将官僚资本主义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完整表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sup>②</sup>

实际上,这一不同于以往旧民主革命的新民主革命的绝大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1317页。

分思想和理论探索在朱、毛等建立根据地之前就已基本明确。如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为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无疑要独立担当革命的领导。对领导权重要性的认识是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革命和斗争实践中付出惨痛代价后得来的,对此已没有悬念和疑惑。革命的基本动力自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而农民阶级则已被认识到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农民的重要性在根据地时期展露无遗。其他革命的力量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关于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国情的复杂性会出现不断的“交杂”,但到1948年时,共产党已从数十上百人的“幼”党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和革命艰险的磨炼而成长起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对象已出现,革命的任务自然是推翻“帝、官、封”这“三座大山”。关于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改变了民族民主革命带有的资产阶级的旧民主革命的性质,而成为新民主革命了,革命的前途也就自然成了建立革命各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并且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亦即中国革命具有双重任务,革命将分两个阶段推进,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最高奋斗目标。

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来说,认清中国革命的这些“新”民主性质并不直接具有“生存”意义,在当时的形势下如何生存下来并站稳脚跟才是关键。一位研究者对此作了深刻总结:创建一支灵活机动的军队和放弃攻打城市、立足乡村发展是中国革命运行中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共产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成功创建乡村割据的关键,在中央和各地省委的指示中并没有为这种转变提供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它是领导人个人式的决断。但在这些领导人决定走一条与中央不同的革命道路时,他们并没有形成一种理论化的认识,甚至没有一种对未来的完整设计,只是为形势所迫,在生存感受下不得已的选择。不同的个体感受使他们的决断不尽一致,革命的具体走向在“个体生存性感受”中才能找到答案。当然,革命思维的转向并不意味着困难也随之解决。怎样在乡村立足,以及如何对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队伍进行革命的改造,仍然是必须解决的难题。在党的生存和发展方面,军队的宣传和

动员以及山区便于发展的战略空间都是不容忽视的。这种转变过程也被称为“为了生存而重新适应环境”所导致的“空间维度上的转型”。这段话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所要开创的这条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出来的，这条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已有的大革命实践和理论总结中所继续坚持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语境下的唯一选择。怀特认为，中国革命是共产主义者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向农民倾斜，更重要的是将自己融入于农民，在农民中工作。这种农民的特征，还表现在农民党员比例上，1926年只有5%的党员是农民，1930年则有超过半数党员是农民。

## 二 抗战时期的共产国际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

周恩来曾在1960年6月14~15日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作报告，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作了客观系统的总结，认为共产国际成立之初，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后来各国党成熟了，共产国际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共产国际的缺点错误，主要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他将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划分为三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初期（1919年3月至1927年7月），共产国际的工作大多有益于中国革命，也有个别原则问题的错误，但中国党的领导人应对错误负更多的责任；共产国际的中期（1927年7月至1935年7月），对中国党的指导有很大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共产国际后期（1935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少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仍有影响，主要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

时过境迁，许多现在看来很清楚的问题在当时并不明了，都是付出巨大历史代价才得出的结论。作为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领导人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作为革命的当事者的中国却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和承受着这一切，率先进行革命实践探索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体会尤为深刻。毛

泽东在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刻所进行的整风运动,不仅是为了统一全党为抗战做思想政治上的准备,同时也是对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武断”甚至非常错误的指挥作出的回应。共产国际在皖南事变作出错误判断,强制要求中国共产党忍辱负重地维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sup>①</sup>拒绝毛泽东在政治军事两方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展开攻势的要求,继续援助国民政府以武器装备,却拒绝在军事上直接援助中共……这一系列事件使毛泽东最终下定决心: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但至少在莫斯科方面,延安整风并没有造成双方关系恶化。虽然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一度不满,也没有哪怕暂时中断双方的联系。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问题的核心是延安整风。正是由于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彻底清除了党内“言必称希腊(苏联)”的教条主义传统,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并使全党相信,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指导革命胜利的绝对真理。共产国际或莫斯科对于发生在延安的一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客观原因是苏德战争吸引了莫斯科的视线。对于中国革命,莫斯科主要关心的还是如何维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以便确保中国继续抗日的问题。当战争形势改变,1943年底苏军开始大举转入反攻时,季米特洛夫就对延安整风作出了反应:在1943年12月22日发了一封电报,委婉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在党内所实施的斗争,要求毛泽东不要展开反对王明等人的斗争,同时警惕康生从内部破坏党的组织。<sup>②</sup>

抗战开始前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袖在共产国际指令和共产国际代表监督下,努力思考和探索现实中国革命的道路。在革命斗争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总结和研究,作出

<sup>①</sup> 时任共产国际负责人的季米特洛夫曾说:“我们认为,决裂并非不可避免。你们不应采取分裂的方针。正相反,在依靠主张保存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的同时,共产党应采取一切取决于它自己的行动,来避免决裂。请求你们重新审查自己的立场并告知你们的考虑和建议。”见[保]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sup>②</sup> 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了独特贡献。他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在批驳顽固派反共谬论的同时,丰富和完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详细阐明了对中国革命和未来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路线和纲领政策。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出发,他科学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指出中国现实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进一步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认为从革命的阵线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不是旧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革命的领导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已经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不再是资产阶级。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这种历史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就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从革命的前途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sup>①</sup>他强调,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能去完成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而想要在这两个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是“走不通的”。他还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sup>②</sup>的基本纲领。他深刻阐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革命时期的主要经验,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sup>③</sup>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678、7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06、613页。



## 第二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论探索

中国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这种不平凡和曲折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东方战略”，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发生了种种误导和恩怨；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到上，主客观上都有一个探索和认识的过程，发生一些错误是难免的；三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执政党意识、国家职能和社会主义本质任务的认识上先后都有某些“先天不足”，对苏俄社会主义模式从模仿、强化到反思，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和无法避免的代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是中国理论界、学术界的一种流行说法，也是某些老同志心目中不容置疑的结论。但从思想史的逻辑看，却需要对这句话予以分析。其实，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又要排除国际国内以及党内的种种错误干扰和困惑，中国共产党人寻找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已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努力，其中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等人的独特的理论贡献。但是，毛泽东晚年发动“十年文革”，虽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意图，却造成了重大失误，耽误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机遇。对此，人们应当有清醒认识。因此，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上，毛泽东是一个可贵的未完成的理论探索者，而邓小平却是一个成功的理论创立者和实践设计师，这有十七大报告为据。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报告同时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上阔步前进。

## 第一章

#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毛泽东在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一整套关于新中国的全面构想，它明确提出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民主革命的目标，并勾勒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49 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主张写进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成为实际指导新中国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指针。

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设想，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将建立起一个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又有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它以资本主义为手段，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保障合法的私有产权，允许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条件下自由发展，借此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从而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同时，新民主主义社会又是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经济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同时允许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在文化

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巩固并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顺利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各得其所的方针,有效协调了无产阶级政权与国营、私营经济的关系,用三年时间出色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新中国各项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打下良好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脉络来看,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着重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关系问题以及无产阶级政权下的资产阶级政策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飞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核心突破在于它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在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坚持和保障整个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作为毛泽东思想中最具独创性的理论之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新中国初期建设提供了宝贵指导,而且也以为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日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先行探索。

## 第一节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 社会论的历史背景

1937~1946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历史背景。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一事件: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

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sup>①</sup>但从政党发展角度来看,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中国共产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意识形态上对三民主义的认同,使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必要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政治、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开始成长为一个全国性政党。

### 一 “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的舆论环境

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付出了相当代价。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向全国郑重宣告<sup>②</sup>: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作出如上承诺,使中国共产党承受着来自党内外的双重压力。党内托派指责这是“投降”;左派担心这会上当。党外的声音更加尖锐,特别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理论家”趁机从意识形态上质疑中共作为一个独立政党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中共应全然放弃自己的主义,服从国民党这“一个政党”,主张三民主义这“一个主义”。叶青(任卓宣)宣称:三民主义是比共产主义更完美的主义,“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sup>③</sup>。1938年12月,经蒋介石授意,张君勱提出中共应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364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7页。

③ 叶青:《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比较》,转引自任兆银:《毛泽东在认识社会主义历程中对六大错误思想的批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6期。

“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sup>①</sup>。

1939年9月,蒋介石发表长文《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强调三民主义是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他批判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固是重于经济,近于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和民权主义,而且共产党人倡导民生,亦只重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以民生主义为哲学基础,以“天下为公”为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基础的三民主义则是“最完美又最切实”的主义。<sup>②</sup>他强调三民主义一以贯之的“平等”主张:总理为主张中国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国际地位平等,因而倡导民族主义;为主张各个国民的政治地位平等,因而倡导民权主义;为主张各个国民的经济地位平等,因而倡导民生主义。<sup>③</sup>

## 二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

第二次国共合作使中国共产党重新以合法政党身份走上政治前台,政治军事力量迅猛增长,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sup>④</sup>1937年红军改编时拥有总兵力5万多,1938年10月增至近20万,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达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也从陕北一隅扩展到整个华北敌后地区以及华中和华南地区,在陕甘宁边区之外建立了16块根据地,拥有人口近1亿。<sup>⑤</sup>1940年共产党已成为国民党之外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共产党的理论主张与政治实践日益受到国内各界甚至欧美国家的关注:作为不同政见者,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社会未来前途持有什么样的主张和判断?共产党怀抱怎样的政治抱负和建国理想?共产党在延安所践行的社会理想在为全国人民预演着一种可能是怎样的生活样式?

① 张君勱:《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转引自《毛泽东传 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76页。

②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42页。

③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第142~143页。

④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

⑤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118页。



为了回应党内外疑问,统一全党认识,提高人民群众觉悟,争取各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产党有必要树立鲜明的旗帜,回答“带领全国人民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 第二节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 社会论的基本内涵

### 一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sup>①</sup>,完整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正式形成。基于中国的历史特点和世界革命形势,他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新中国决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sup>②</sup>。《新民主主义论》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回答当时的时局和革命问题,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勾画了未来新中国的建设蓝图,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问题;阐述了作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的新民主主义,且强调了共产党人实现最高纲领,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毛泽东认为:国体问题实际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我们的国体是“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体制是新中国将采取的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2页。

家形式,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sup>①</sup>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兼具革命性与妥协性,无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因此新中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sup>②</sup>。他批评国民党用“国民”概念掩盖一个阶级专政的实际,违背了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声明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sup>③</sup>。他表示,共产党人不拒绝使用“国民”概念,但反革命分子、汉奸等必须被排除在“国民”之外。毛泽东认为:政体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新民主主义的政体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即“民主集中制”。<sup>④</sup>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方针。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声明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sup>⑤</sup>。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实现“耕者有其田”。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国营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的农业还不能建立,但农村的各种合作经济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允许农村的富农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

济存在。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文化;它是反对封建迷信,主张实事求是、客观真理、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文化;它是大众的、民主的文化,应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文化。毛泽东强调在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中要把提高和普及结合起来,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既区别又联结。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别驳斥了“一次革命论”的“左”倾空谈主义和资产阶级顽固派的“一个主义”。他强调革命有阶段之分:“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试图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去完成,那完全是一种空想。他指出,“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他认为,共产党纲领有最低和最高纲领两个有机构成部分。最低纲领实现新民主主义,最高纲领实现社会主义,两个部分都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三民主义政治原则与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有基本相同之点,从而构成了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还存在诸多不同:民主革命阶段上有些纲领不同,如共产主义的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是三民主义所没有的;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强调的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是三民主义所没有的;宇宙观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则是民生史观;革命的彻底性不同,共产主义者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一致,三民主义者大多言行不一。他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区别于任何别的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sup>①</sup>。

<sup>①</sup>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6页。

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的具体阐发,鲜明地体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个向各革命阶级敞开大门的、具有最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施政纲领和建国方略。毛泽东对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异同的分析,对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阐述,有力地论证了共产党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党的独立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新民主主义论》有力地维护了共产党的政治形象,树立起一面足以凝聚全社会各种进步势力的革命旗帜,标志着共产党正式开启了取国民党而代之的伟大革命历程。

## 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1945年,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纲领写入向中国共产党七大提交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以文件形式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5年初,抗战胜利在望,国共冲突再度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致开幕词,话锋直指坚持专制独裁统治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他认为“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sup>①</sup>。国共两党不同的建国设想开始成为抗战胜利后的矛盾焦点。

上述两本书,一本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本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1943年3月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是国民党关于抗战建国纲领的宣言书。蒋介石阐述了三民主义的建国原理,强调民族主义在民权、民生之前。中国唯有实现独立自主的地位之后,才能实现政治、经济建设的理想。在民权主义方面,以《地方自治开始施行法》为基础,经过训政完成宪政。训练全国国民行使全权,不偏于一阶级,“使中国的政治为全民政治,而不是阶级政治”。

<sup>①</sup> 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5~1026页。

在民生主义方面,继续抗战以来的生产建设,同时为战后实施实业计划做好准备,“要使生产为全民的生产,不流于阶级斗争,亦不限于生产无计划的状态”。<sup>①</sup>“唯我独尊”、“一党独大”的想法在该书中显露无遗:“中国国民党乃是全国国民共有共享的一个建国的总机关。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sup>②</sup>

而《论联合政府》则向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指明了中国之另一种命运——“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sup>③</sup>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对《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坚持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一般纲领上,有了新的发展,提出了涉及抗战、联合政府、自由、统一、军队、土地、工业、文化教育、少数民族、外交等十个方面的具体纲领。毛泽东曾在六届七中全会指出《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的不同之处: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sup>④</sup>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方面,《论联合政府》把国家制度分为四种,比《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和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增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指出,这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在此毛泽东明确树起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旗帜。在论述具体纲领时,他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

①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四,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77~78页。

②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四,第124页。

③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页。

求的国家制度”，反映了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以及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其他爱国分子等各阶级的“共同要求”。他认为，尽管这些阶级有不同的要求，但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通过调节，“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sup>①</sup>

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方面，《论联合政府》进一步认可和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继《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不禁止”之后，《论联合政府》强调：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划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用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sup>②</sup>。《论联合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表示出更多的友好和合作态度。针对资本家最为顾虑的关于财产和劳资关系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措施只是废除带来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私有财产，“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sup>③</sup>。他郑重承诺：新民主主义制度“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sup>④</sup>。关于劳资关系问题，他指出，劳资矛盾这种显著的阶级间矛盾是可调节的，并不影响各阶级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工作。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既保护工人利益，实行八到十小时工作制，提供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权利，又“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sup>⑤</sup>

《论联合政府》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5、1056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1061页。

③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4页。

④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8页。

⑤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1082页。

毛泽东认为,国共两党的争论说到底就是要不要在抗战的同时解决农村的民主民生问题,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国民党政府的路线是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批评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农民革命是“破坏我国和平的农村”;共产党的路线是赞助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两条路线背后的分歧在于:民主民生革命与民族革命孰先孰后?尽管蒋介石国民党向国民宣称孙中山“建设之首要在于民生”的主张,并承诺“每个国民的生活与生存,都有保障”,务必实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的目的,但同时强调民族主义必在民权、民生之先,称日本的人侵使得“建设的革命工作,并未着手,而且亦无从着手”。<sup>①</sup>毛泽东则指出: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做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在此一语道破了国共两党得失成败的原因所在。半个多世纪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指出:“土地改革实为胜败最大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顺利解决了一切动员问题,“一到他们将初期的农民暴动控制在手,兵员补充与后勤便都迎刃而解”。<sup>②</sup>

###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毛泽东写于解放战争时期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完整理论形态的形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写入《共同纲领》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1947年底,国民党掀起的内战已经打了18个月,共产党由防御转入进攻,解放军主力打到了国民党统治区,解放战争已到了历史的转折点。毛泽东宣布:“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sup>③</sup>1947年12月25~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

①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四,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59、89页。

②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339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7年12月2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第856页。

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sup>①</sup>。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角度来看，《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包含了重要的新内容。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认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起来，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俗称“官僚资本”），构成了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它与外国帝国主义、国内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压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中等资产阶级。把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列入没收的行列，不仅反映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而且为未来新民主主义的国有经济找到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垄断了全国的银行、铁路、航空等经济命脉，集中着价值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把官僚资本收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可以快速有效地建立起强大的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

关于保护工商业，毛泽东认为，1931~1934年对工商业者采取的政策过左：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改中侵犯工商业者，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这些错误绝对不能重复。他设想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三种成分：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他强调，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sup>②</sup>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sup>①</sup>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3页。

<sup>②</sup>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6页。



## 四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1948年下半年,共产党拥有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到280万,与国民党军队的365万相比,军事力量对比上升到1:1.3。解放区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4;城市占全国城市的29%;人口达1.68亿,占全国人口的35.3%<sup>①</sup>。这一切预示着国共两党大决战已为时不远。

1948年9月8日,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即将开始之际,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九月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过去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工农民主专政”,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一个新发展,意味着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中和工农一起归入了“人民”的行列。<sup>②</sup>

毛泽东提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sup>③</sup>毛泽东回顾了关于政权性质提法的演变过程:大革命时期右的“统一战线”,主张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革命;土地革命时期提出“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分子是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的,因此把资产阶级民主分子排除在政权之外;抗战以来实现了与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合作,并最终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他强调,各级政府、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两字,“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他指出,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要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政府来代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新资本主义”作了评论,指出:把我们的

① 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893~1949》,第892页。

② 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人民”有明确的界定:“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6年8月版,第135页。

社会经济说成是“新资本主义”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乡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sup>①</sup>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强调是毛泽东放弃“新资本主义”说法的根本原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国营经济的建立及领导地位问题，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进一步得到强化。他认为，随着公私经济力量对比的有利变化，不能再仅仅强调社会主义因素的“政治条件”<sup>②</sup>，而应关注社会主义因素的“经济条件”。他指出：“六次大会和七次大会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后要有一个发展，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讲到社会主义因素，只讲了政治条件，没有讲没收官僚资本。……现在不提国营经济就不能解决问题了”<sup>③</sup>。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中国共产党将赢得对中国经济初步的控制权，极大地增加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的筹码。

在随后的历史实践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新中国三年经济恢复中，特别是在1950年的调整工商业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充分表明了这一理论的伟大实践意义。

### 第三节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十七大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功绩作出的公正评价，从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层面肯定了毛泽东对社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页。

② 这里所说的政治条件，是指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作者注）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0页。

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同时澄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关问题。

### 一 “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前提是把握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关系。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明确提出:“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sup>①</sup>。1948年9月,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强调:“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sup>②</sup>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没有新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新民主主义中又有社会主义的因素。1949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今后对经济构成是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国营经济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经济也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对的,但是要注意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sup>③</sup>他还针对性地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sup>④</sup>应该说,此时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清晰的。

1949年3月5~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一次

①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②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4页。

④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55页。

旨在解放南半个中国和勾画新中国建设蓝图的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农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应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他估计了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这些重要思想对以后的局势发展起了指导性作用。

毛泽东认为，适应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方针上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紧密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二是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进城后“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必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sup>①</sup>他指出，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走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这说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是理解和把握的。

## 二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艰辛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经济所有制三大改造时期之后，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在我国全面开展起来。与此同时，斯大林逝世

<sup>①</sup>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5页。

后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如贝利亚被揭露,一批冤假错案被平反,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的争论,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换等,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觉察到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sup>①</sup>这就引出了以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的问题,毛泽东由此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性问题,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1955年11月,毛泽东乘坐“港申”轮视察上海港。当时现代工业发展处于“以港兴城”年代,港口发展状况是城市经济建设的综合反映。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上海是我国第一大港,又是国际性港口,一定要把它管理好。他要求上海的干部要好好学会管理本领,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sup>②</sup>1956年1月,毛泽东视察刚完成公私合营的申新九厂和江南造船厂,在江南造船厂他参观了正在总装的我国第一艘中型鱼雷潜艇。潜水艇是用苏联提供的技术生产的,陪同参观的一位领导说:“我们不但要学会,还要超过他们。”毛泽东点头赞同,表示“要有这种勇气”。毛泽东在上海的调查研究活动,对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了重要作用。他了解到上海这样的沿海老工业基地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优势,大有潜力可挖。<sup>③</sup>1956年2~3月间,毛泽东集中一个多月时间,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广泛系统的调查研究。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由于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考虑国防安全,把工业建设重点移到了内地,上海没有大的投资,发展不快。对此,他说,“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针对有些人怕打起仗来受损失,不敢在沿海搞工业的思想,他幽默地说:“好像原子弹已经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说三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第720~721页。

② 《毛泽东的足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

③ 《毛泽东的足迹》,第407页。

千公尺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后来,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还颇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整整耽误了七年时间。”<sup>①</sup>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归纳分析了十大矛盾,论述了十大关系,明确提出如何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在产业结构上,他强调,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又强调决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在生产布局上,他强调,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内地工业也必须大力发展。在央地关系上,他强调,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前提下,扩大一些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权,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政治体制上,他认为,几个党比一个党好,各党之间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对外关系上,他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宣告:“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sup>②</sup>至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了初步探索,提出了值得我们长期注意和重视的思想和观点。

### 三 “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毛泽东在1955年3月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

<sup>①</sup> 《毛泽东的足迹》,第407~408页。

<sup>②</sup> 《毛泽东著选读》下卷,第744页。

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sup>①</sup>。他认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他估计，技术改造需要的时间比社会改革的时间更长，认为全国农业基本上完成技术改革需要20~25年的时间。<sup>②</sup>

国家大规模建设的进行，工农业生产、运输交通、物资交流的扩大，以及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的忠实于祖国、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并具有一定文化、技术水平和一定业务能力的干部，特别是工业技术干部。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指示，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sup>③</sup>。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有五个要点：一是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二是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三是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四是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五是中國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sup>④</sup>会后，全国知识界很快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①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页。

②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变迁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23页。

③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04页。

④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07页。

#### 四 “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三阐明这样一个基本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事业服务。那么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呢?当时我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领导人民取得了阶级斗争胜利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sup>①</sup>。1956年9月,八大宣布了中国“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由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即敌我矛盾、阶级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基本解决,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则逐渐大量显露出来、突出起来,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然而,从国外来看,1956年发生了波匈事件。匈牙利一部分群众受国内外反革命力量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对付人民政权,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事件发生后,我国有些人认识不清,表现动摇,许多思想观念亟待澄清。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了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农村也连续发生闹社、退社风潮。当时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新问题”都没有精神准备,心中无数,不知如何处理,以至于有些同志想用“武力解决”。全国总工会党组则通过分析,认为这些事件大部分源于“企业行政上的官僚主义”。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次讲话经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补充和修改后,于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指出:“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用民主的方法,就

<sup>①</sup>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8页。



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sup>①</sup>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产生这是“新问题”的感觉呢?主要是因为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混淆在一起。关键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他批评有些人办起事来“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他认为:“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许多事“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sup>②</sup>他还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齐鸣”方针,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在少数人闹事问题上,他指出:“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sup>③</sup>。他强调,我国是穷国,要全面持久地厉行节约。在走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上,他认为:“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sup>④</sup>

## 五 “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相继总结了“鞍钢宪法”和“农业八字宪法”,甚至提出了生态环境和人口“节育”的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共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实际的工业化道路。鞍山钢铁公司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工业企业,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走在前列,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独特模式。“两参”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就是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5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3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2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7页。

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就是指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对鞍钢报告赞扬有余，认为报告“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他指出，鞍钢过去也迷信苏联权威，但是现在他们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用“宪法”这样一个词来形容鞍山钢铁公司创造的企业管理办法，表现了毛泽东对它的高度欣赏和充分肯定，也表达了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工业管理方式的迫切心情。他在批示中甚至提出：“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要“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sup>①</sup>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毛泽东亲自总结了被称为“农业八字宪法”的农业八字方针：土、肥、水、种、密、保、工、管。有人评价“农业八字宪法”是中国古典农业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结晶，标志了毛泽东农业思想的建立。“农业八字宪法”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自然要素与人类劳动在农业生产中的关系，在“农业八字宪法”里，农业不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成为农业、工业、科技密切联系，农、林、牧、渔循环发展，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相互和谐，城乡之间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sup>②</sup>

针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自然环境大大制约经济发展的现实，毛泽东着重强调对自然环境的治理和利用，先后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1959~1960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中提出了“事在人为”这一积极改造和利用自然条件的重要思想：“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好。<sup>③</sup> 为了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要实行人口控制：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

① 《百度知道》网：“毛泽东 鞍钢宪法”。

② 苏拉密：《毛泽东时代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引自《乌有之乡》网。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27页。

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 1 200 万到 1 500 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于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sup>①</sup>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后来又放弃了关于计划生育的正确认识。

## 六 “用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对“既得利益者”不利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可能不遇到官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所讲的“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主要是指我们同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在八大曾讲过:“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sup>②</sup>。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与官僚主义进行了毕生的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曾严肃地指出:对“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历史考察,使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一极其错误的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也有正确的成分。<sup>③</sup> 党内的官僚资本主义现象在革命根据地中就已出现,但当时情况没有全国解放后严重。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毛泽东日益感到,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将危及党的战斗力,于是多次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官僚主义问题不是经过一两次打击就能解决的,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他认为,1956年发生的群众闹事问题,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更重要的因素”,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他当时认为,人民群众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正确处理。<sup>④</sup>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38~1956年),第202页。

③ 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④ 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第271页。

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的时候,更是提醒我们注意“既得利益”问题。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sup>①</sup>事实上,“既得利益集团”作为人类社会的痼疾,作为公共权力运行的伴生物,在人类历史上早就存在了。从苏共解体历史来看,由于人性的弱点和历史传统的原因,工人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但后来毛泽东对官僚主义估计得越来越严重,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初衷也主要是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他们指出,海内外总有人把“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看成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个人权力之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表面的,因而是不正确的。<sup>②</sup>可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就不能不回答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因此毛泽东研究还要深入进行。

---

① 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第272页。

② 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第7页。

## 第二章

# 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与 社会主义思想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具有丰富经济工作经验的刘少奇以中央文件、讲话、报告和批示等形式指导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实践,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实践中的具体展开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sup>①</sup>

### 第一节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 思想的时代背景

20 世纪 40 年代末,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日期越来越近,需要开始考虑解放区甚至整个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刘少奇在 1948 年底指出:“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就要开始了。……问题的复杂性是,一方面敌人还没有完全打倒,另一方面又提出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总任务”,“现在

---

<sup>①</sup> 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韩钢诠注,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3 页。

提经济建设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有所不同,这不是宣传问题,而是议事日程上的问题。”<sup>①</sup>

### 一 从农村到城市的工作重心转移

虽然毛泽东在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纲领,但这些纲领是在根据地、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提出并推行的,产生于共产党偏居乡村一隅的时期,尽管经济纲领中也涉及城市中的大小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共产党控制区域以小农经济为主,根本不需要具体面对和处理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等复杂经济问题。<sup>②</sup>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除农村土地政策以外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如私人资本主义政策、劳资政策以及官僚垄断资本收归国有以建立国营经济控制经济命脉等,还仅仅是作为施政纲领的建国构想和理论宣传。到1948年下半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解放区面积已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其中城市有586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9%;人口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5.3%。<sup>③</sup> 1949年3月,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新问题”。<sup>④</sup>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一次城市会议,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将在新中国建设实践的方方面面中逐步展开。

从经济上讲,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在于它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仍具有进步性;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社

① 刘少奇:《新中国经济的性质和建设方针》,《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电子版载人民网:[http://cpc. people. com. cn/GB/69112/73583/73601/74120/index. html](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3583/73601/74120/index.html)。

② 关于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及其局限参见于光远、韩钢:《“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第44~51页。

③ 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892页。

④ 刘少奇:《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9页。

会,这就决定了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追求。当这个包含着内在张力的社会构想真正展开为现实的时候,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将注定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核心难题和成败所系。与此相关,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城市中劳资政策与剥削问题,农村中的合作社经济与新富农问题也成为必须给予科学回答的迫切问题。

## 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构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共生并存、长期斗争的社会经济体,一种“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既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究竟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sup>①</sup>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新政权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与考验。

中国共产党早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之后,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与革命时期的暴力斗争不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式将主要是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刘少奇认为:“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证明了新民主主义制度优于旧资本主义制度之时,旧资本主义才会让位于新民主主义。”<sup>②</sup>“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sup>③</sup>。这种和平的经济竞争不可小视,其实质是社会主义

① 刘少奇:《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1948年12月22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②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948年9月初),《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③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1948年12月22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的“阶级斗争”<sup>①</sup>。斗争的结果将决定未来中国社会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争取社会主义因素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胜利一仗，仍需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并保持坚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头脑。刘少奇提出：“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不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政治上也要失败，政权也可能变……和平转变，今天还只是极大的可能性，并未最后确定，并没有解决，如犯重大错误，还是可以失败的”，因此“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面对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刘少奇强调：“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胜利的条件是具备的，国家政权、国家经济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巩固的工农联盟，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sup>②</sup>

尽管刘少奇也强调“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但更多地还是提醒全党牢记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认清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暂时性，警惕资产阶级的叛变，非如此，无法正确地坚持对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他告诫：“共产党人要高瞻远瞩，看到前途。我们与资产阶级合作要有清醒的头脑，自暂时合作之日起，就要认清总有一天要消灭它，就应时刻注意到资产阶级之叛变，好像抗战初期与阎锡山合作抗日一样，我们才不会上当。只有在与资产阶级暂时合作之开始，即认清前途，才能够在各方面的实际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sup>③</sup>临近进城掌权，共产党更多的还是担心自己犯右倾错误，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下做了“李自

① 刘少奇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一文中套用列宁的说法，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政策”。

②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③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成”，因此共产党高层一再警戒全党：时刻谨记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前途，特别是在取得政权以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中。

种种情况表明，共产党高层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上升到了政权存亡、前途走向的政治高度，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的相当警惕，<sup>①</sup>以及对社会主义前途的高度自觉。刘少奇充满信心又不失谨慎地向全党指出：和平转变有极大可能性，仍须经过艰苦的工作，才能取得胜利，如果盲目糊涂，犯重大错误，则仍有失败之可能。<sup>②</sup>

### 三 经济建设必须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和冒险主义的倾向

刘少奇在系统思考新中国经济建设之初，就十分关注未来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问题。在1948年9月会议上他强调：“经济建设问题是个新的问题，……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sup>③</sup>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时，刘少奇多次表明既反“左”又防右的路线立场。一方面，资本主义并不可怕，民主革命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需要并且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有限制地发展”，即有益于国民生计的发展。害怕资本主义，不允许资本主义发展，急于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是犯了“左”倾的错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将向无产阶级争夺国家领导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要力求发展社会主义，“我们的方针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限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去”。<sup>④</sup>因此，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味迁就资本家的利益要求，抛开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任凭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普通资本主义，这是右倾

① 参见杨奎松在《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一文中的分析，载于《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②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③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④ 刘少奇：《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1948年12月22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机会主义的做法。“左”和“右”的错误倾向都将断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

1949年6月,刘少奇在向斯大林提交的《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最后一节,明确提出反对经济建设工作中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是把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针,看作是发展普遍的资本主义经济,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作无原则的让步,对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这就必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是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他认为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必须经常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反对上述两种倾向,以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sup>①</sup>

## 第二节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涵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构想中,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环节和实践步骤,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资产阶级面对“被消灭”的未来命运,仍然能够与无产阶级实现暂时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具体阐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条件、步骤和结果,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内容。

### 一 和平消灭资产阶级

刘少奇曾这样界定“和平转变”:所谓和平转变,是指无须经过

<sup>①</sup> 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1949年6月),《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政权的推翻而完成一个革命,并不是不要斗争,而是要进行各方面的斗争竞争。<sup>①</sup> 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刘少奇论证了在中国和平消灭资产阶级,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在《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的方针》中指出:尽管在马克思看来,一个阶级的和平消灭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包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除非有国际干涉或者资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我们希望的是不流血的和平过渡。刘少奇曾粗略勾勒和平过渡的情形:把资产阶级保留一个时期,“十五年内诚恳地发展它”;在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基础上进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和平经济竞争,“使国家经济取得优势,使资产阶级没有反抗的可能性”;“一方面允许他们在一定限度内赚一些钱,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要准备拿出一部分胜利品向资产阶级实行赎买,使他们没有叛变的可能性”。<sup>②</sup>

“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这是刘少奇对私人资本的未来终结所作的描绘,以他的历史进步论的眼光看来,私人资本的终结不沾血腥,甚至不会有丝毫的伤感。在一次讲话中,刘少奇指出:“我们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资本家也会高兴,不然就会生产过剩。所以我们应该慢慢地准备走上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慢慢地准备,经过许多步骤,那时资本家就不会感到十分痛苦。”<sup>③</sup>在一次与工商业家的座谈会上,刘少奇主动谈起了资本家的顾虑:“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刘少奇自问自答,引述了与资本家宋棐卿的一次对话:“将来你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

①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② 刘少奇:《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的方针》(1948年12月22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③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头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sup>①</sup>在刘少奇看来,私有制的最终废除是在尊重私有制的基础上,让私有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完成其历史使命为终结的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即便全部私有财产被没收,资本家也“不会感到十分痛苦”;即便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资本家也会“眉开眼笑”地面对。

刘少奇在1951年的《春藕斋讲话》中更为具体地构想了在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将私人工业收归国有的过程中,可能采取的政策。他提出给资本家一定的经济和政治补偿,以赎买和捐献的方式实现私人工业国有化。对于把工厂交给国家的资本家,“可以加点薪水,叫他照样当经理,也可以给他当部长,给他政协会议的位子等。只拿出一部分代价来收买他,即用赎买的方式,使他不反对我们,所谓和平方式就是这样。”<sup>②</sup>

## 二 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具体过程

刘少奇关于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为全面的思考反映在他的《春藕斋讲话》中。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为马列学院一班学员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又名《春藕斋讲话》)的报告。他指出,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就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世界大同。这篇报告所回答的就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具体如何前进”,“前进中有何关键问题”。

刘少奇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其实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是长期准备的结果,新民主主义阶段是过

<sup>①</sup> 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5月2日),《刘少奇论中国经济建设》。

<sup>②</sup> 刘少奇:《春藕斋讲话》(1951年7月5日),《刘少奇论中国经济建设》。

渡阶段也是准备阶段,即准备进入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长期充分准备之后,社会主义因素已逐渐取得优势,资本主义因素渐渐失去反抗以及社会主义因素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替代,使得国家就可以水到渠成地采取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两个社会主义步骤,破坏私有制,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了。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刘少奇构想了在十年经济建设期间,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及其关系所发生的变化,认为五种经济成分都要发展,但比重和作用都会发生变化。国营企业发展比私人企业快,比重会增大到百分之十几、二十、三十,其领导和控制作用会越来越大。合作社经济迅速发展,比重和作用会逐渐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绝对数量上增大,但比重和作用都会降低。国家资本主义增加。个体经济发展,但比重会降低一点。上述变化又会带来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工业比重增大,农业、个体经济比重缩小;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比重逐渐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重逐渐缩小、作用缩小;政治思想上,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国家在经济中作用加强,并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工业优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合作社经济优于个体经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在逐步实现工业化的同时,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强,资本主义因素相对减弱,这将为国家最后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准备了条件。这样的发展方向“对最大多数人民有利,对党对工人阶级有利,合乎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理想是为扩大社会主义因素而斗争,但不要求侵犯私人资本主义的财产”。他认为:“这种变化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的情形。这个阶段最少十年,十年建设加三年准备是十三年。到那时看情形怎样,或再搞个五年计划,进入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sup>①</sup>

基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新的经济形势,刘少奇概括了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四个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因为不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实现工业国有化;国营经济、合作社逐渐加

<sup>①</sup> 刘少奇:《春藕斋讲话》,《刘少奇论中国经济建设》。

强；证明国营经济明显地优越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援助。他认为，以上条件“使资本家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孤立，最后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在尊重和稳定私有制基础上，私有经济自然发展到历史使命的终结的过程。

刘少奇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破坏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的两个步骤是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其核心是破坏私有制。工业国有化就是将私人工业收归国有，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农业集体化就是建立集体农场，土地和生产工具公有，农民参加劳动，计工分红。他强调，农业集体化必须建立在工业国有化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上，使用机器农具进行集体生产。

刘少奇特别批评了在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尚未准备充分就开始逐步动摇私有制的错误做法，认为这会打击私有者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生产力的无端破坏。他强调：“工业国有化是一天早晨的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通过，第二天就执行”，“从开始实行这一步的一天起，我们的国家就进入社会主义”，但“没有准备好就不能走这一步”，“工业国有化，不是逐步实行，而是逐步准备，一下实行的”。至于农业集体化，也不是逐步地、零散地进行，而是在“农业机器大批出现”、“农民相信集体化”时，“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他一再强调，农业集体化不是单纯依靠农村的条件，而是必须依靠城市强大的工业，促成生产工具的机器化变革。

经过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私有制被废除了，剥削被消灭了。社会的阶级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个国家完全由劳动人民组成，他们是工人、知识分子、集体农民、一部分个体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富农和小资产阶级都被废除了。国民经济成分也由五个变成三个：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经济。其中前两个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比重很大，大概30年后会占整个经济的90%以上。国家政权性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名称不一定改，仍叫新民主主义也可以”。

### 三 城市工作中的劳资政策和剥削问题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为日后城市工作提出了阶级路线和工作任务：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sup>①</sup>

如何用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来具体指导城市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和重建？如何在城市工作中最为棘手的劳资问题上贯彻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的阶级路线？如何看待新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剥削问题？如何在提高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同时，允许和保障资产阶级的合法经营和合理盈利，从而顺利实现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作了大量细致具体的理论解释和宣传教育工作，成为他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部分。

在解放前后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劳资问题在城市工作中占突出地位。当时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工厂开工，恢复生产。但由于工人和资本家对共产党的劳资政策都缺乏明确的认识，造成劳资关系紧张，资本家顾虑重重，工厂迟迟不能复工，以致城市生产停滞，工人大量失业。形势的发展迫使共产党尽快提出对劳资问题的明确政策，并向干部、工人和资本家进行解释宣传，以恢复城市中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949年4月，刘少奇来到华北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天津指导工作。当时天津劳资矛盾非常突出，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30%。工人普遍要求大幅增加工资，“有的工厂男工工资由60斤小米增加到360斤；学徒工工资由21斤增加到210斤”<sup>②</sup>。参照共产党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工人们还误以为城市里也应该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7~1428页。

<sup>②</sup> 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18日。转引自《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28页。

实行“工者有其厂”，因此出现了分厂、分店的过激行为，并对资本家进行清算斗争。根据时任华北局第二书记的薄一波的报告，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当时资本家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sup>①</sup>他们消极观望，不肯复工，甚至跑去香港。刘少奇在天津与工人、干部和资本家多次谈话，了解基层劳资状况，解释宣传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提出了指导劳资关系的具体方针和办法，明确了资本家和工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各自的地位和权益，同时对剥削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

#### 四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的地位和权益

在对天津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刘少奇首先对七届二中全会中的相关路线进行了解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干什么？就是要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以便一步步地战胜敌人；同时开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他强调，“这是一切城市工作的，也是管好天津市工作的总路线”。他提出：“我们三个敌人，四个朋友。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敌人阵线，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则是我们的阵线。”<sup>②</sup>他肯定了资本家是属于“我们的阵线”的“四个朋友”之一，提出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的论断。尽管我们对资本家是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但今天的重点是联合，特别是经济上的联合，资本家替国家制造东西，国家帮资本家买原料，卖产品。如果把资本家当作主要斗争对象，就是把朋友错当成敌人，是对二中全会路线的背离。他进一步指出要把城市中90%以上的人口团结起来，“在党的总路线下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

针对报纸宣传上片面褒扬工人、批评资本家的情况，刘少奇指

<sup>①</sup>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sup>②</sup>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出:在宣传上,把工人放在第一位的同时,也要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地位。因为在生产上、经济上,资本家比我们有办法,“发展生产应该首先和资本家合作,资本家在城市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

针对工人向资本家提出过多、过高福利要求的情况,刘少奇指出,即便资本家勉强接受这些要求,也无法持久。最后资本家被挤垮了,工厂关了门,工人失了业,受损失的还是工人自己。他把这种要求过高福利、只顾“劳方一利”的“左”倾做法称作“工人的自杀政策”。他强调,必须号召工人做到劳资两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图,使私人资本发展生产、解决就业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不要吃母鸡,要慢慢吃鸡蛋”,刘少奇引用天津市长黄敬这句话来教育工人不要为了眼前部分利益而妨碍了长远的利益。

刘少奇认为,新社会中工人和资本家职务有区别,但人格没有高低。资本家必须正当地适用和管理工人,“除了在职权上可以指挥工人外,其他问题上,你只能以朋友的关系去建议”,不能轻视体力劳动者,更不能打骂虐待工人。而工人强迫资本家雇请工人或把临时工都改成长期工,也是不对的。资本家有权以生产需要为最高原则,自主雇请或辞退工人。他提议:以劳资两利和尊重工人人格为原则,对旧厂规的不合理部分加以修改;“对旧厂规,经资本家修改,工人讨论,工会同意,政府批准实行后”<sup>①</sup>,大家应一致遵守,不能再出现工人不听指挥、影响生产的现象。

刘少奇在一份劳资关系处理办法的提纲中提出,工人对厂方提出的要求条件,需交由工会研究分析后,再与厂方交涉。当劳资纠纷无法商量解决时,交由政府劳动局调解和仲裁。劳动局不仅考虑工会的要求,也要倾听资本家的声音。这就为资本家“开了这样一个门”,使他们的愿望要求也能得到考虑,可以改变解放初资本家对劳资纠纷问题呼吁无门的状况。

## 五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工人与剥削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私有经济、雇佣、剥削是三个共生

<sup>①</sup>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概念。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了私有经济的存在,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私有经济和资本家的积极作用,那么翻身做主人的新社会的工人阶级该如何心平气和地面对剥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又将如何在利用私人资本发展生产的同时,维护工人的地位和权益,并实现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和引导?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现实问题。刘少奇具有丰富的工人领导经验,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初步的理论探索。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后,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工作将依靠哪个阶级呢?毛泽东批评了试图依靠贫民群众或资产阶级的糊涂想法,明确提出: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城市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着重阐发了“依靠工人,发展生产”的问题。<sup>①</sup>刘少奇参加领导过多次工人运动和罢工,对工人阶级的思想和生活状况比较了解,善于从工人切身利益出发,组织和教育工人。他对于工人工作的思考,既贴近实际,又高屋建瓴。他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城市工作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但要想依靠工人阶级,首先是要做好工人的工作。他提醒大家“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他认为,需要做好保障工人、教育工人和组织工人的工作。

(1) 要保障工人生活,并给工人以希望。政府应给工人以可能与必要的优待,当物资缺乏时,除保障军队生活外,首要的就是保障工人生活,“要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后方机关职员较高”。因为,在极端困难时,如果我们机关人员的生活比工人还苦,我们就有理由说服工人、取得谅解、获得支持。由于目前还处在战争阶段,经济上还比较困难,因此相对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未改善,因此需要向工人说明共产党坚持“为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而奋斗”的原则,给工人以希望,让工人相信现在生活苦是“为了战争,为了建设,为了将来”。他强调,如果不能给工人以希望,工人就会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一个样。

(2) 要加强工人教育,特别要重视政治教育、阶级教育,以提高

<sup>①</sup> 刘少奇:《城市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9~425页。

工人的阶级觉悟。他指出诉苦运动是很成功的阶级教育,在教育俘虏兵和土改农民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凡啃住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的,大都站稳了脚;反之,立场就不坚定,尽管讲政策,但一遇到严重困难就站不稳了,就不能坚定不移。”他列出了工人政治教育的四门课程: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政策、具体问题和具体组织工作。

(3) 要通过工会把所有工人组织起来,并成立城市工人代表会议,讨论工人生活、生产问题,以至市政等问题。把市工人代表大会作为成立市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个步骤,逐步把代表会的形式从工人向学生、街道市民推广,以培育基层民主,为成立市人民代表大会奠定基础。

做好上述经济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工作,“生活有保障,工人情绪提高了;加强教育,工人的觉悟提高了;组织工人,工人团结起来了,就有了力量”。这样,工人才成为可以依靠的,“我们与工人群众就联合起来了”。

在1949年的天津系列讲话中,刘少奇特别注意在劳资关系中教育引导工人,指出要看到工人和资本家还有很多共同利益,资本家工厂开得多,工人就业就多,生活就有保障,因此要缓和与资本家的矛盾,暂时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实现劳资两利。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剥削问题,在1948年已有所探讨。1948年2月7日,新华社为纪念“二七大罢工”25周年发表了题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社论,指出:在解放区的私营经济中,工人具有两重地位:作为劳力的被剥削者的地位和社会主人翁的地位、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因为是被剥削者,工人在自己的日常利益上与私人资本家有矛盾;但因为又是社会的主人翁、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工人便应该为了自己的长远的利益,忍受一定限度的剥削,使这些私人企业能够进行生产,并适当的发展生产,以繁荣解放区的经济,支援前线的胜利,并使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因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而逐步地有依据地发

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方向上去。”<sup>①</sup>

之后不久,1948年8月召开的中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指出:在国家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中,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只有公私关系,没有劳资对抗;在私人企业中仍然存在劳资对抗,工人处在被剥削地位,“但职工们既是在政治上、社会上和国家政权中居于领导的主人的地位,就保障了职工们可以不致受到压迫和过分剥削,而一切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生产事业的存在和发展,就加强了整个解放区的经济,因而也就有益于工人阶级。”<sup>②</sup>

刘少奇在赴天津解决劳资矛盾的过程中,在坚持上述观点的同时,对剥削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论述,提出了一些颇有洞见的观点。他论证了当时情况下的剥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考虑到生产力落后,城市开工不足,工人就业困难的情况,他指出:“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sup>③</sup>如果资本家能多开一些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是对国家人民都有利的。正如工人自己所说,如“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业”。他认为:“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中国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sup>④</sup>资本家大可以放下“剥削多,罪恶大,要审批,要枪毙”的思想包袱,同时工人也要在合理工资待遇的条件下,积极配合资本家进行生产。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与落后的封建主义剥削相比,资本主义剥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共产党在农村可以帮助农民分得土地,消灭封建主义剥削,但在城市,由于需要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共产党还不能帮助工人阶级实现经济上的完全解放,“中国工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35页,转引自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第82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第682~683页,转引自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第82页。

③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④ 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5月2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劳资矛盾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求得解决，只能尽量缓和。刘少奇特别指出：“现在工人在政治上是翻身了，但在经济上整个来讲，工人今天还不可能翻身，生活稍微改善一下是可能的，很大的改善是不可能的”<sup>①</sup>。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工人在经济上才能获得完全的解放，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刘少奇认为，剥削行为不是个别资本家的个人行为，也不是资本家的主观意识所决定。剥削行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由于害怕马克思所讲的“剥削”，有资本家根据希腊词典把剥削者翻译成“利益分润者”。如果把剥削理解成利润分配问题，那我们将来“可以加税，是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又变成国家财产，国家又‘剥削’了资本家”<sup>②</sup>，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资本家剥削的一种有效制约。

## 六 劳资问题中的“左”与右

一方面不赞成工人对福利提过高要求，另一方面又为资本家的剥削行为正名——这是不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损害工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劳资政策能代表广大工人利益吗？刘少奇在天津的系列讲话的确容易让人产生上述疑问。事实上，在天津指导工作期间，刘少奇已经向广大工人作了很好的解释和说明。

1949年4月28日，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重申：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你们的党。我们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打算，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至今28年中从没有动摇过的。他向全中国的工人作出庄严承诺：“我们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基本出发点是不动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sup>③</sup>

①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②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③ 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电子版载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3583/73601/74120/index.html>。

1949年5月5日,在天津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刘少奇谈道:“最近我到天津,资本家很高兴,工人有的可能不高兴,但是不要紧,我是诚心诚意为工人打算,工人将来会知道。”他强调:现在和资本家关系搞好一点,鼓励他们多开工厂,以解决很多工人的失业问题,这不是“投降资本家”,“真正替资本家着想,投降了资本家,那是失掉了立场。如果不失立场,鼓励了资本家,而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关系极好,发展生产,又不是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失去立场地与资本家拉关系,是犯了右的错误;但害怕与资本家搞好关系,认为和资本家关系好,就是失掉立场,也是错误的,只能说明这些人自己立场不稳,“一接头就投降了资本家”。在具有丰富白区工作经验的刘少奇看来:“共产党人不是放在箱子里不见人的,而是经风霜的,这才能考验一个人的立场。”<sup>①</sup>他在此强调的是:在处理劳资关系的问题上,与资本家搞好关系并不一定就是右。只要共产党人诚心诚意为工人阶级着想,一切事情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始终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与资本家搞好关系,发展生产的行为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刘少奇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工人和干部群众的疑虑与困惑,为在劳资两利的基础上顺利实现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营造了较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

## 七 农村工作中的合作社经济与新富农问题

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合作社经济“在社会经济构成中有极广泛而强固的地位”。它是国家经济“极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是与资本主义和平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用以帮助、领导和逐步改造广大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sup>②</sup>。刘少奇曾指出:“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sup>③</sup>。刘少奇对合作社经济一直予以高

<sup>①</sup> 刘少奇:《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1949年5月5日),《刘少奇论工人运动》。

<sup>②</sup>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948年9月),《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sup>③</sup> 刘少奇:《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1948年12月22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度重视,曾直接领导了建国初期全国合作总社的工作,对于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有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提出:要将广大消费者和小生产者组织到各种合作社中去,使合作社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中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和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文中,刘少奇提出合作社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历史作用:与投机资本斗争,与旧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组织小生产最后在极广大范围内彻底改造小生产成为大生产。<sup>①</sup>

在关于合作社的进一步阐述中,刘少奇按照合作社的功能和作用,把合作社分为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三大类,指出“供销合作社是一个关键”<sup>②</sup>。他提出了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三项基本任务:第一,是把农民多余的生产产品推销出去,并且在价格上不使他们吃亏;第二,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且在价格、质量和供应时间上都不使他们吃亏;第三,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同样在价格、质量、时间上都不使他们吃亏,能较市价便宜一点。刘少奇强调这三项基本任务是组织供销合作社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基本出发点,是“合作社在全部工作中一时也不能离开的基本目的”<sup>③</sup>。概括地说,就是使农民在商业交易的买和卖中不吃亏。

刘少奇认为,合作社必须采取一系列区别于商人资本主义的办法,才能把合作社的基本任务完成好。合作社必须忠实于农民,诚心诚意为农民办事。赚取利润不是合作社唯一的或主要的目的,而只是一个附带的目的。因此,合作社在经营上有三个基本特点是区别于商人资本主义的。<sup>④</sup> 第一,以社员的需要为中心,凡是社员所急需的产品推销和物资供应,不管利多、利少,甚至是无利的事情,也应尽力去经营;第二,把社员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凡是与推销社员产品和供应社员物资无关的事情,即使能赚取高额利润,

①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948年9月),《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② 刘少奇:《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1948年12月22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③ 刘少奇:《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1951年7、8月),《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④ 刘少奇:《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1951年7、8月),《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在合作社办理社员所要求的事业还感到人力财力物力不足时,就不要分出人力财力物力去经营;第三,在系统内部实行利润管理,在上下级合作社之间实行对于利润的适当管理,限制过高的利润,实行利润的分配,对于某些推销物资实行超额利润的返还。

刘少奇在1948年9月会议曾提出<sup>①</sup>:小生产者的向背将成为日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中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分给小生产者土地,只是建立了政治上的领导权,要巩固这个领导权,还需要以合作社的方式实现对广大小生产者的经济上的领导,带领小生产者进一步成为“小康之家”。应该说,合作社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不仅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而且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sup>②</sup>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帮助、领导和逐步改造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合作社可以保护农民利益,避免商人剥削,提高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财富;合作社是国营经济机关与广大农民小生产者密切结合的纽带,使合作社和农民成为国营经济的同盟军,在加强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的同时,“更多地加强国营经济和国家的地位”;国家通过合作社可以控制并促进城乡工农业产品间的物资交流;合作社可以培养广大小生产者的集体观念,使他们了解并接受社会主义的原则。

## 八 新富农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使亿万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伴随着农村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土地改革实质上是在农村进行了一次相对平均的土地再分配,以便重新确立土地的农民私有权。从根本上说,土改后的农村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只要私有制存在,就必然会出现基于个体劳动能力、经营才能和勤劳程度等方面的自然差异带来的阶级流动和新的阶级分化。由于共产党以阶级成分为标

<sup>①</sup>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sup>②</sup> 参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948年9月)、《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若干修改》(1948年10~12月)、《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1951年7、8月)等多篇文章,《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尺来区别不同的政策待遇,新的阶级分化给共产党工作带来了困扰。昔日加入共产党一起闹革命的贫下中农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慢慢富裕起来,买了马,雇了工。从经济上看,这是进步,应该鼓励;但从政治上看,按过去的标准,这些人的阶级成分却是“退步”成了具有剥削行为的富农,应该批判。这种政治地位与阶级地位的反向运动使得干部和群众在新富农问题上感到无所适从,是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必须面对的一个理论和政策难题。在较早完成土改的东北和山西,这种新的阶级分化问题日益引起关注和争议。

1949年12月,东北局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如何对待新富农,特别是新富农党员或新富农入党的问题。12月31日,东北局组织部在《农村支部工作指示》中对党员中存在的“富农思想”提出批评:某些党员只想个人发财,不管多数群众贫困,甚至想剥削别人。<sup>①</sup>1950年1月,刘少奇就此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有一次谈话。他认为,随着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向上发展,阶级划分的标准也应该有所提高。“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这种较为富裕农户的发展不仅不该受到限制,还应该鼓励,“在数年之后,可能与应该发展到百分之八十”。他指出:“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一百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至于将来经济发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了,雇工自然也就减少了,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对富农予以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

至于党员成为富农之后的党籍问题,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并提出“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富农也可以是好党员,现在积极发展生产,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又能主动交

<sup>①</sup> 东北局组织部:《农村支部工作指示》,1949年12月31日。转引自《刘少奇传》下卷,第692页。

公。我们“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富农党员即便现在想交公，国家也不收。他明确指出：“我们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sup>①</sup>。

1950年9月，东北局又提出劳动致富的新富农是否可以当选为劳动模范的问题，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答复，明确指出“由于富农本人也是劳动者，只要他合乎劳模条件，另加一条对雇工待遇好，亦可选为劳模。”劳动模范不是简单计算生产量的多少，必须考察本人劳动的情况。刘少奇认为选劳模“不是简单计算新富农的生产量多”，也不能是“他的雇工劳动好而本人劳动并不怎么好”，必须是“新富农本人劳动好，对劳动有新发明和创造，对雇工待遇又好，合乎劳模各种条件”。<sup>②</sup>

## 九 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评以及对农民自发势力的思考

继东北之后，另一个老解放区山西在农村经济发展中也碰到问题。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提交了《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sup>③</sup> 山西省委认为，这股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是使互助组变成为富农的“庄园”。他们提议逐步动摇私有基础，通过提高互助组织，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来克服农民的自发势力。刘少奇批评了山西省委的上述想法，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sup>④</sup>。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毛泽东也曾明确批评：“我们反对农

① 刘少奇：《东北的插犂换工和富农问题》（1950年1月23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②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60页，转引自于光远、韩钢《“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第113页。

③ 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1951年4月17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④ 刘少奇：《对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语》（1951年7月3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sup>①</sup>。

在《春藕斋讲话》中,刘少奇进一步批判了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并对农民自发力量的引导和控制方式进行了初步思考。他认为,农民的自发力量有好处也有害处,不应盲目阻止。农民的自发力量一方面对提高农业生产有利,另一方面造成了新的阶级分化,少数人变成富农,一部分农民重新破产变成贫雇农。山西省委试图通过逐步动摇农民的私有财产,提高互助组来遏制这种自发力量,这是同时犯了“左”和右的错误。“想慢慢地、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是右倾”,因为实现农业集体化“是个大运动”,必须“一片片地搞”。同时,“破坏私有财产,又是‘左’的冒险倾向”。目前农村的互助组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破坏了私有基础就破坏了互助组”。他指出:“由互助组发展到集体农庄”的提法是错误的。集体农庄是一种生产方式上的革命,需要以重工业的发展为其准备机器农具。单靠马和犁进行农业生产的互助组,即使在组织形式上怎么提高,也无法达到集体农庄。互助组、供销合作社与集体农庄之间的联系是思想上的,而非经济上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可以在思想上培育农民的集体观念,使农民认识到集体经济相对于个体经济的优越性,为将来组织集体农庄准备思想上的条件。但是在经济上,重工业、拖拉机才能为集体农庄准备条件。不具备经济上的条件,“即使思想准备好了,大家要求集体化,也是不可能组织好的”。

刘少奇强调,“群众和先锋队的目的要求有区别”,互助组的目的是为满足群众“多打粮食,买便宜东西”的当前利益,不是为了远大前途。“我们要从群众直接的切身的利益出发,来实现我们的党的远大目标”,就是用互助组来满足农民当前利益,教育农民认识到未来实行集体经济的好处。不考虑群众的当前利益,不照顾农民的生活,仅仅从远大利益出发,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去组织合作社,这是不谨慎的冒险政策。他认为,农民的自发力量不能阻

<sup>①</sup>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8年9月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 1893~1949》,第894页。

止,不可避免,但也不是任其自流。国家和合作社要对其进行适当的领导和控制:第一,用现有的互助组组织农民,使他们不破产,使自发势力带一点组织性;第二,国家贸易与合作社从商业价格政策上引导农村生产,使农民的自发性有些限制;第三,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加以调节,如让其发展的就少收税,对富农在贸易政策、税收政策上加点累进税,以限制其过快发展;第四,农村中依靠雇农,组织工会,在工资、劳动条件上限制富农。经过限制和引导的农村经济,一方面是广大的自发势力、富农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工会、党的政治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的发展。这两种潮流同时发展,不断斗争,“最后要依靠国家领导,要共产党人的脑筋不糊涂,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不是自发势力的胜利。”

## 第三章

# 陈云的经济思想

陈云长期从事经济建设领导工作,对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思想进行了艰辛探索,期间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

### 第一节 陈云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经济思想与实践

1933~1949年间,为解决根据地落后的小农经济与革命战争需要之间的供需矛盾问题,为大反攻作物资准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陈云创造性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为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经济基础。

#### 一 历史背景与任务

在革命根据地,围绕经济工作展开的斗争是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另一个战场。中央苏区根据地时期,陈云主要的工作是纠正“左”倾经济政策。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1929年共产党在赣南和闽西开辟了两块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苏区,即中央苏区,共辖21个县,占地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苏区当时非常困难,

生产力低下、交通落后、自然环境恶劣、物资匮乏。而国民党千方百计扼杀红色政权,不仅制定了军事“围剿”和“扫荡”政策,还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禁止苏区与白区间的商品流通,企图从补给方面困死和饿死苏区军民。

内外交困中,党的“左”倾经济政策加剧了苏区经济损失。1930年5月,李立三在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制定了一个“左”的《劳动法》。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继续坚持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和政策,提出工人的最低工资保障标准,要求“各种工业部门的最低工资额,至少每三个月由劳动部审查一次”;追求过高的社会福利,要求企业雇主在工人工资之外,支付全部工资额的10%~15%作为社会保险基金,并有名目繁多的“丧葬津贴费”、“婴儿补助金”、“残废老弱优恤金”等福利津贴,还规定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这个劳动法脱离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机械照搬苏联经验,不考虑中国工商业的实际情况,其实施导致私营工商业迅速衰落,非但没有带给工人福利,反而恶化了工人的生活。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地处三省交界处,下辖32个县,面积44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西、北、南面被国民党军队包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东面与日军隔黄河而对峙。“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企图控制国共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进而消灭共产党。“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在军事和经济上采取包围和封锁政策,禁止向陕甘宁边区贩运物资。这一时期财政与金融领域的矛盾日益突出,对开始正式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是重大考验。

## 二 根据地时期陈云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1933年1月到中央苏区之前,陈云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领导工人运动。1932年底,陈云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到达中央苏区,担任合并后的中央局成员、常委兼全总党团书记、副委员长,领导苏区和全国工人运动。苏区工人运动的重点之一就是经济斗争,当时的核心问题是制定正确的劳动

政策和私营工商业政策。<sup>①</sup>这一时期他与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一起,对苏区工人群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sup>②</sup>在经济政策上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 1. 修改“左”倾劳动政策

陈云认为“左”倾劳动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劳动合同不切实际。他强调:“要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深深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sup>③</sup>。通过深度调查,他指出,“左”的错误主要来自政治工团主义和官僚主义。他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等文章,深刻批判和系统纠正“左”倾经济政策。1933年6月,陈云到福建汀州视察工会工作,酝酿和研究“新劳动法”的起草问题,他和“京果业”工会一起制定了新合同条文,保留了工人八小时工作和星期日休息的权益,同时也考虑到了国民党对苏区经济封锁政策导致商店经营亏本,资方利益缺乏保障的情况,指出劳资双方的合同必须具有灵活性。新合同顺应当时实际情况,获得劳资双方的欢迎。他就此撰写《怎样订立劳动合同》,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新劳动法”。不久,刘少奇发表了《停止“强迫介绍”与救济失业工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来改订合同》、《在改订合同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也发表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共同关注苏区“左”倾经济政策问题。1933年10月,在陈云、刘少奇建议下,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通过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sup>④</sup>,受到毛泽东称赞。陈云对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后来成为1934年1月毛泽东对三种经济成分关系论述的重要根据。

### 2. 组织失业工人建立工人合作社

针对许多工会收了大量社会保险金,却不知道怎么办工人

① 朱佳木主编:《陈云和他的视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92页。

②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③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④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第191页。

的情况,陈云指出:要从工人愿意做的工作做起,而不是呆板地照我们自己所想的去做。只有工人愿意做,才能把他们推动起来。由此,工会开始注意发挥工人群体自身的力量,组织失业工人建立起织布、被服、斗笠和纸张等手工业合作社,努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粉碎敌人经济封锁。

### 3. 对内贸易自由、保护私营工商业政策

从边区实际出发,抗战初期陈云主持制定了内部贸易自由政策,以活跃和繁荣边区市场。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团结保护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经营商业、奖励区外商人来边区经商的政策。1939年4月,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发展边区商业”的政策。陈云解释:对内自由就是在不违反政府法令的前提下,不问边区内的商人或老百姓,也不问边区外的商人或老百姓,都有在边区内做买卖的自由。政府不但不用国有资本来统治或垄断,而且还要帮助私人商业及消费合作社发展,特别是奖励和保护私人商业的发展,使他们有货卖,有钱赚。<sup>①</sup>他同时强调,对内自由政策不等于放任自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破坏金融物价和边区社会稳定等行为,一旦发现,就要依据政府法令严格纠正。<sup>②</sup>

### 4. 建立健全金融制度

1944年3月至1945年9月,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开始专门主持经济工作。这一时期,大生产运动使基本生活用品和粮食可以自给自足,但棉花、布匹和工业品还需要从国统区购入。边区最大的经济问题是财政收支的巨大赤字、通货膨胀、经济不稳定。1944年5月10日,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上强调:“今后银行所有增加发行问题,必须经过财经办事处书面批示”<sup>③</sup>。5月12日,他进一步要求确定银行准备金,建立正规的有借有还的

① 《陈云文选》第1卷,第284页。

②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③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页。



信用制度,尊重银行的企业性质,放贷要收利息,汇款要收汇费。<sup>①</sup>

金融工作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货币发行问题。1943年由于要银行支持财政开支,大量发行过边币,造成物价大波动,引起社会动荡,陈云对此高度关注。他提出了“七分服从、三分独立”的政策,在与国民党法币的货币斗争中,要坚持“经济为主、政治为辅”的原则,妥善处理货币发行问题,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对维持金融稳定作出重大贡献。主要措施是:第一,在法币强、边币弱情况下,稳定法币与边币的比价;第二,把两种货币与黄金的比价联系起来,获得差价收益。抗战胜利时,边区银行的准备金已达边币发行量的90%以上,还储备了大量黄金,为中央机关离开陕甘宁、战略大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鉴于东北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9月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局,领导东北根据地斗争。陈云任东北局委员,后兼任中共北满分局书记和北满军区政治委员。期间,他卓有成效的区域性财政管理工作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评价。

#### 5. 把东北解放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

1948年上半年,东北物价暴涨。陈云认为:“东北财经工作到今天仍存在浓厚的盲目状态,其原因,一是财经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复杂,我们无经验;二是两年来我们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未深摸细摸财经问题。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sup>②</sup>。1948年11月23日,东北局《关于东北解放后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决定将东北解放区的工作重心由军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49年2月19日,陈云要求:“东北应从现在起就有意识的把经济工作作为重心。”<sup>③</sup>陈云关于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思想,对党中央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起了推动作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

①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上卷,第385页。

② 《陈云文选》第1卷,第373页。

③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上卷,第554页。

上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sup>①</sup>

#### 6. 筹划东北计划经济建设蓝图

东北地区的整个解放是在1948年9~11月的辽沈战役之后。此前,共产党正在设法把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建立的那些日伪企业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陈云对整个东北经济建设蓝图作了思考,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1) 改造日伪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是一项经济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任务。陈云指出,把国民党政府企业变为人民企业是企业性质的根本改变:过去是企业属于官僚资本家,因此一切劳动者是为少数官僚资本家创造财富,现在是企业属于人民大众,劳动是为人民大众,也为了自己。<sup>②</sup>他分析了日伪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弊端,认为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是以皮鞭和饥饿来强迫工人为日寇和官僚资本家创造利润,这不但不能使工人有自愿的高度的生产情绪,恰恰是造成工人反抗的根本原因。<sup>③</sup>

东北地区的日伪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曾掌握东北地区的铁路交通、物资资源等重要经济命脉,对其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即奠定了东北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为平津战役解放军的后勤保障积蓄了力量,为后来全国范围内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提供了经验。

(2) 提出实事求是的计划经济方法。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却没有统一的财经计划,财经工作存在浓厚的盲目性。在工业中原料、机器、人员的浪费和损失惊人。1949年,陈云主持制定了东北区综合性经济发展计划,内容涉及工、农、商、贸、交通运输、财政、物流等。1949年4月,他在对经济计划草案进行说明时,主张计划既要全面又要分层次,有的放矢。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6~1427页。

<sup>②</sup> 《陈云文选》第1卷,第358页。

<sup>③</sup> 《陈云文选》第1卷,第358页。

(3) 实行工薪改革。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生活,陈云对工薪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十分重视工人工薪问题,批评许多作行政工作的同志对生产要依靠工人阶级的观点还不明确,对工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sup>①</sup> 他主张改变以实物计算货币支付工薪的办法,采用工薪“分”计算方法,在工薪计算办法中反对平均主义。工薪改革提高了工人工资,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 第二节 过渡时期的财经工作

所谓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毛泽东认为,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陈云在过渡时期为恢复国民经济作了大量工作。1949年5月,陈云离开东北赴京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担任主任一职,开始领导全国财经工作。党内一致认为,党中央和毛泽东任命陈云为中财委主任,是再合适不过了。<sup>②</sup> 他工作得力,毛泽东多次赞扬他主管财经工作有创造性,是按中国情况办事。

### 一 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财经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 1. 财经干部缺乏

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越来越成为党的主要任务。过去因为忙于军事而掩盖起来的财经问题和旧时代的不良经济工作风气,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艰难岁月中变得日益明显。广大干部多是穷苦出身的农村干部,以前没有或很少接触经济工作,对于经济工作的规律和方法了

<sup>①</sup>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上卷,第543页。

<sup>②</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70页。

解不多甚至没有什么了解。

## 2. 军费支出巨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战争还处于尾声,西南、西北、华南及其沿海岛屿还未解放,大量土匪亟待肃清。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军费支出占到全国总支出的60%以上,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不到30%。

## 3. 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

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旧中国是一个烂摊子。国际游资和国内投机资本利用金融手段大量攫取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变相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对中国进行孤立和遏制,妄图把社会主义新中国扼杀在起跑线上。陈云认为:“不改变这种坏情况,我们就不可能稳定经济和市场秩序,并使社会的生产和流通沿着正当的轨道前进。这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和改造国民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sup>①</sup>

# 二 主要内容

## 1. “统购统销”,平抑物价,遏制通货膨胀

1949年7月,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赴上海解决支持战争、稳定上海和武汉市场物价等问题。在上海,陈云作了全面认真的调查研究,而后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提出:物价稳定的根本解决方法是从全国调集粮食和主要物资,支持上海市场供应,稳定物价。最主要的就是粮食和棉纱的供应必须充足。1952年至1953年上半年,国家粮食有40亿斤的赤字,毛泽东采纳陈云的建议,对粮、油、棉等重要物资采取“统购统销”政策。陈云看到运输不畅,大米和棉花很难运进上海,就要求增开瓶颈地段的列车,并组织内河航运,充分提高运输能力。

## 2. 回笼货币

陈云认为,要使国家财政有所好转,给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必

<sup>①</sup> 《陈云文选》第2卷,第100页。

须设法从持币阶层手中回笼货币。他主持制定了发展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高价轻工产品的政策,有效地回笼了货币。

### 3. 制止投机,稳定金融市场

陈云要求公安部门参与打击地下钱庄,查抄了大量支票、黄金、银圆和美钞,使大批游资转存银行。对物价波动引起的人民币贬值由国家给予补贴,以增强储户对人民币的信心,减少游资对市场的冲击。同时实行紧缩式财政政策,紧缩贷款,催收税款,使投机资本难以招架。

### 4. 统一全国财政工作

经过努力,到1949年9月,各地物价趋于相对平稳。但因各地在对抗物价斗争中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组织和协调,全国的物价总体水平不统一,为投机者提供了机会。1950年3月,陈云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起草《关于统一国家财政工作的决定》,提出:在中央领导下统一财经管理工作,对全国财政、现金、物资和外汇进行统一管理。期间,锻炼和培养了一支过硬的财经队伍为社会主义改造服务。

### 5. 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

1949年12月,陈云提出自1950年1月起发行一万万份公债,每份约值旧币人民币一万两千元,以弥补赤字、紧缩银根,加强国营经济的实力,恢复人民生活和发展生产。

### 6. 私营工商业和国营经济的关系问题

陈云提出,要在保证国营经济占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保护一切有利于国民生计的资本家的利益,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民生计而从事投机捣乱的人们的行为,限制私人工商业的投机性消极方面,促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sup>①</sup> 私营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8.7%。

### 7. 农村经济和城市繁荣的关系问题

陈云在长期经济工作中认识到农村的力量是搞好国民经济的基本动力,他提出,要从“中外交流”转变为“城乡交流”,通过大力推动城乡交流,促进城市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

<sup>①</sup> 《陈云文选》第2卷,第103页。

### 8. 农业与工业关系问题

陈云认为,恢复和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sup>①</sup>他提出,要从国情出发,围绕水利减灾、恢复城乡沟通交流方面加大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改良农业技术,发放农业贷款。

### 9. 国营企业比重的问題

1952年底,我国国民经济中国营经济占19.1%,个体经济占71.8%,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6.9%,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0.7%,这种构成比例不利于集中资源办大事。对此,陈云认为:“在相当长时期内,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经济互有发展的情况是必然存在的”,同时又指出,“在经济成分上要掌握恰当的比重。这种比重,要足以保证国营经济的领导,又能团结其他经济成分……”<sup>②</sup>在领导私营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时,陈云很注意把所有制改造与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防止经济过急过快发展。

1956年,陈云在党的八大发言,总结了“一五”时期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构想:一是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二是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三是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sup>③</sup>在此,陈云打开了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路的大门。

① 《陈云文选》第2卷,第143页。

② 《陈云文选》第2卷,第150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第13页。

## 第四章

# 张闻天的经济思想

张闻天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被毛泽东誉为党内少有的“明君”。他善于在农村经济工作中运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 第一节 张闻天的新民主主义 经济理论与实践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张闻天大胆进行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 一 坚持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1933 年,张闻天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与毛泽东合写《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提出了苏区资本主义发展方针和方向问题,主张通过法律和财政政策“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以发展苏区经济。1942 年,他在山西兴县农村调查后,写了《关于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在党内较早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sup>①</sup>。他

---

<sup>①</sup> 《中共党史资料》第 29 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 页。

认为“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sup>①</sup>,指出:对待资本主义的这种态度不仅是边区当前的任务,也应是整个党的任务;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内的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将来社会主义做基础”。但这种“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资本主义又有所不同。它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可以“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二是“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在落后的中国发展经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价值目标和理想社会形态,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任务,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陕北,张闻天提出“新式资本主义”设想遭到时任总书记的博古不指名的批判,指责他是“机会主义”,是“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而且要“以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但毛泽东高度重视张闻天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思想,并在1944年的一次讲话中,将“新式资本主义”概括为“新民主主义经济”<sup>②</sup>。直到1948年后,“新民主主义经济”才逐渐取代了“新式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表述。<sup>③</sup>毛泽东也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sup>④</sup>。

## 二 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构想

1948年,在辽沈战役的胜利形势下,张闻天及时冷静地提出必须把经济建设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工作要从土地运动转为生产运动,从乡村革命转为城市建设,要“城市领导乡村”。从1945年冬至1950年初,他先后在东北北部的合江和南部的辽东两地担任过省委书记,此外还以中共东北局常委身份,兼管过一个时期东

① 《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② 《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页。



北全区的财经工作。在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实践中,他分析了东北经济的五种成分及其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和相互关系,提出以国营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较为完整地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过渡方针。在东北解放区建设时期,他受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思想的启发,在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成分结构和建设方针,勾勒出引导农业和小生产者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即依据农村小农商品经济的规律和特点,发展从供销到生产的合作经济。<sup>①</sup>根据合江土改中的经验,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的未来方向,提出东北以及全国要不断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增添社会主义成分,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前进。上述思想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被吸收到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其思想精粹后来也写进了《共同纲领》。

### 三 农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性质的和平过渡

农业一直是张闻天十分重视的问题。苏联农业问题解决得不好,引起整个社会动荡。他曾反复思考中国如何吸取经验教训,走出一条自己的农业之路。从党的总书记岗位上退下来后,他主动深入基层,到陕北、晋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撰写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调查》、《米脂杨家沟调查》、《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和《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等近几十万字。他认为,在这块位于晋绥根据地边缘的农村地区,虽然抗战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仍然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地区未曾经过土改,但由于战争的影响和革命政权的成立,封建势力还是受到了削弱,地主变卖土地和分散土地较多,少数地主改为自己经营,成为经营地主。多数农民由于“减租减息”政策,获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不少农户

<sup>①</sup> 《张闻天文集》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7页。

乘地价便宜之机购置土地,中农户数有所增加,也有少数中农上升为富农。

基于对西北农村落后经济状况的分析,他认为:“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体贴农民疾苦,这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他还指出:“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达,工人生活比今天中国小地主好得多,可见落后国家的地主,日子过的不如先进国家的工人。”<sup>①</sup>他提出在革命政权下大力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设想,具体说就是发展富农经济,衰弱农村封建经济,中农向富农发展,地主向富农转化,发展的趋势是新民主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资本主义”。他认为,富农不同于靠地租剥削的地主,而是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民,这种方式在特定历史时期是进步的,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此党的政策不应阻止土地自由买卖,而应引导农民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发展。对于地主,他提出可以不采用过去土地革命的办法,而是通过党的政策法令,促使地主将封建剥削方式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除经营农业外也可以投资工商业。他称这种方式为农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方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曾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②</sup>但新中国成立后有相当一段时期党反复强调要“兴无灭资”,甚至提出要叫资本主义迅速在中国“绝种”,其结果是资本主义未能消灭得了,却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现在一些西方经济学者在盛赞当前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时,往往把中国经济称作“带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式资本主义”。

① 《张闻天文集》第3卷,1994年版,第1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3页。

## 第二节 张闻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

### 一 国内外历史背景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述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应坚持的许多重要思想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党的八大作了理论准备。这是中国共产党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独立自主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与实践的重要标志。同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指出八大召开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从当时情况来看,1956年上半年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一五计划提前完成。1956年9月15~27日,八大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肯定了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但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两年后,由于中央对全国形势的错误估计,于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提出了总路线,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试图在短期内超英赶美和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冬,尽管毛泽东对“大跃进”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問題有所察觉,但并没有改变其

基本主张。1959年,“庐山会议”发动了对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全国陷入捍卫“三面红旗”的狂热之中。1959~1961年,中国大地遭遇了一场为时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使全国的经济工作遭遇重大困难。

## 二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探索

张闻天曾直接参与过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工程的谈判与落实,在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后他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撤职后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如何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为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上面,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努力使经济工作恢复到八大确立的正确路线上来,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重要基础。

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夕,张闻天撰写了大量经济研究文稿和笔记。他联系三年自然灾害的现实问题,批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思想进行清算。1971~1975年,被监禁在广东肇庆的张闻天撰写了四篇文章,这就是八万字的“肇庆文稿”。他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曲折经验,进一步系统批判了“左”倾思想的错误,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任务、阶段和发展规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党的路线是否正确,正确的程度有多大,政权是否巩固,巩固的程度有多大,最后都要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来衡量。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好,社会主义应该保障人民的富裕生活。生活好了不会资本主义化,相反,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物质、文化等方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建设不起来。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与资产阶级法权、平均主义具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不是要把富的拉穷,而是要把穷的拉富。对国家的贡献大,得到的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裕是应该的,光荣的;相反,不爱劳动,贫穷落后

是可耻的。

张闻天很重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他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殊性必须在生产关系中得到充分论证。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强调:要研究、认识和掌握客观经济规律,脱离了或者违背了普遍的经济规律,就不可能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就是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论”,认为生产应有节奏地进行,要保持积累与消费的相对平衡,过早改变生产关系,反而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大胆运用《资本论》中的某些经济范畴,并在调查基础上提出开放全国市场的建议,可惜这种可贵的探索不久却被当作“修正主义”而遭批判。1963年,他在《关于生产关系两重性问题》中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问题,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sup>①</sup>。张闻天还提出,要重视管理,主张社会主义要借鉴资产阶级先进的管理思想,提高社会生产力。

长时期“左”的思想影响蒙蔽了理论探索的客观性,有些学者甚至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共同的普遍经济规律。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实际上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实现突破,而张闻天的探索意义重大。他的基本思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立的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十分契合。

<sup>①</sup> 《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459页。

## 第五章

# 邓小平的党建思想

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逝世于1997年。他于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70余年，期间经历了三落三起，个人命运跌宕起伏，却百折不挠，始终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他丰富的党建思想，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贡献。

### 第一节 邓小平在抗战时期的党建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小平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担任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129师政委，和师长刘伯承一起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兼任中共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在七大当选中央委员。他在抗战时期对党建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推进党内民主，反对“以党治国”，即党权至上、权力本位，反对因党的机构和职能全面权力化、行政化而引起国家政权机关职能和权威大大弱化和边缘化。

苏联在20世纪30~40年代形成的中央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对中国共产党有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仿照苏联模式在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斗争中,矫枉过正的对敌斗争使“左”倾思想发展,党的建设缺乏民主精神。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苏联的治国模式最终必然降低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他明确提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即“党对政权采取指导与监督”的政策,党不直接干涉政权和包办政府事务。党的权力只限于“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而“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sup>①</sup>

### 一 加强党的领导,强调建立党组织

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方式在敌占区建立党组织是邓小平建立党组织的基本思路。他认为没有党的组织,就没有党的建设,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3年2月,他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中强调:“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建设,没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党的领导不贯彻于武装、政权、群众组织等各系统中,党的领导发生错误,都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建设。”<sup>②</sup>

### 二 反对“以党治国”,初步提出党内外监督的民主思想

1941年4月,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中提出:“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sup>③</sup>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

### 三 党政分开

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中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政策,即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65页。

<sup>③</sup>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4页。

党在认真研究政策基础上，“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党的指导机关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于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

## 第二节 初步形成执政党建设思想

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后，党内一些干部不同程度地滋长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歪风邪气。1956年，邓小平在八大提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的历史性课题。他认为，既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监督还是党外监督，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党的传统作风，即毛泽东在七大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sup>①</sup>

1957年5月，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中，邓小平指出这种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最直接；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和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无党派和民主党派人士的监督，加强党的纪检会与政府的监会会的监督工作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sup>②</sup>。

1962年2月，邓小平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威信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上。领导人不可能什么事都做得百分之百的正确，不可能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问题在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4～215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0页。



于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让不让别人批评,听了正确的批评能不能接受和照办。有错误,自己讲,而且讲够,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就可以使大家心情舒畅。这样做绝不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sup>①</sup>

1962年11月,邓小平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中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他认为,干部要能上能下,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要有党的生活的监督,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要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要加强干部交流,这能锻炼干部,便利工作。要加强干部学习,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sup>②</sup>

1965年,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中,邓小平回顾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发展成熟的历程,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他重申毛泽东在七大时对党风的概括: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他强调: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这样,就可以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发展为路线性的错误;就可以使党员和干部从正确经验中受到教育,也可以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sup>③</sup>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8~33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46~347页。

### 第三节 初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

#### 一 必须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1965年,邓小平在向亚洲一名共产党领导人介绍经验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相信毛泽东同志总结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每一个党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够赢得革命的胜利”,“如果说我们的经验,那就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sup>①</sup>

#### 二 正确评价领袖在历史中的作用

领袖的作用与一般历史人物有区别,但对领袖的评价也不能庸俗化。1960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指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sup>②</sup>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

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不要急于创新和发展马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40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83~284页。

克思主义,创新的前提首先是认真研究国情,研究世界,取别人强国富民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教条主义就是脱离自己的现实。”同时,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要善于学习,“苏联的许多经验是好的,但是如果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就坏了。”<sup>①</sup>

关注百姓民生,坚持群众观。邓小平认为,建设工作不能忽略群众需要,“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能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脱离百姓民生的形式主义不仅不能厉行节约,也对党的形象十分有害。<sup>②</sup>

提倡艰苦奋斗。他批评建设工作中“亏本不碍事,国家贴得起”的错误态度,指出:“苏联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这样的。甚至国民党也不敢这样搞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多得很,但是办企业比我们好。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sup>③</sup>

#### 四 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发展思路:“猫论”

1961年后,广大农村再次自发兴起“包产到户”的做法。安徽省委对此加以支持和引导,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制度。邓子恢、陈云、邓小平等均表示赞同。1962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中国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成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他还引用了刘伯承常说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67~26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67~26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65~266页。

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sup>①</sup>著名的“猫论”由此而来。“猫论”直接针对凡事都要从意识形态、从政治着眼，凡事都要先问问教条的思维习惯，意义重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

## 第六章

# 模仿、反思、强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20 世纪 30 年代,在苏联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一般称为斯大林模式,其最基本的特征表现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几乎单一的所有制模式,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与政企不分的政治体制。这一模式形成后,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列宁和“十月革命”在各国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威望,联共(布)在共产国际中居于核心地位,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对东欧各国给予过大力支援,苏共在欧洲 9 国共产党情报局中握有强大权力,加之苏联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东欧和中国、蒙古、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都在一定程度上搬用了这种模式,并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达到鼎盛时期。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三大时期:一是“以俄为师”,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模仿和确立时期。从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至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中国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二是“以苏为鉴”,改革斯大林模式时期。1956 年苏共二十大至 1964 年夏,中国出现了探索社会主义新路的高潮。三是“反修防修”,斯大林模式强化时期。1964 年下半年至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错失了发展的良机。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1992 年十四大,斯大林模式被扬弃,中国开始“走自己的路”,形成并逐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 第一节 “以俄为师”——斯大林模式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明确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sup>①</sup>选择斯大林模式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与现实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抉择。

### 一 斯大林模式在中国推行的历史条件

近代以来,中国的一代代志士仁人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结果却是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越来越深。“很奇怪,为什么先生都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于是人们对学习西方的“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sup>②</sup>。与此相反,在列宁领导下夺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维埃政府,声明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俄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形象牢牢植入中国爱国者心中。从此,他们抛弃向西方学习的兴趣,转而向俄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广泛传播开来,经过几次思想交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的主流,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努力奋斗的方向。

按照苏共方式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为在中国推行斯大林模式作了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准备。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社会主义的主流逐渐趋向改良渐进式道路,而俄国社会主义的主流却日益激进和革命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为契机,曾

<sup>①</sup> 《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49年10月8日。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经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最终一分为二,从此形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地区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运动和东方落后地区共产主义运动长期对峙与冲突的局面。在两大社会主义派别中,中国人一开始就选定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正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①</sup>。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这就确定了借鉴斯大林模式的思想基础。在苏俄和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于 1921 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sup>②</sup>中国共产党宣布:“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sup>③</sup>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sup>④</sup>

新中国诞生前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和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倒”的国际战略,这为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推行创造了国际环境。作出这一抉择,与新中国建立前后所面临的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有直接关系。从政治方面看,当时美国不但拒不承认中国新政权,而且力图拼凑一个“联合阵线”,孤立新中国,把它排挤出国际政治生活。1949 年 5 月,艾奇逊强调“应当强烈地反对任何国家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草率地承认共产党,而且应当继续努力争取相关国家认同(尤其是英国),以便有望在这个问题结成联合阵线。”<sup>⑤</sup>而苏联一直对华采取和平外交政策,并援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苏联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即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57 页。

③ 《“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796 页。

⑤ 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 1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6 页。

率先给予外交承认,推动了东欧、亚洲等地一些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不同级别的外交关系,粉碎了美国拼凑孤立新中国的“联合阵线”的图谋。从经济方面来看,美国对华经济封锁。美国认为,中共要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并重建国家,势必寻求外援,离不开与西方的贸易,“正是在对华经济关系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的最有效的武器”<sup>①</sup>。相反,苏联却在经济上给予新中国以巨大援助。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苏联帮助中国援建 144 个项目(后增加到 156 个),并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知识及各种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联援助建成的项目,涉及包括军工在内的众多大型工业企业,填补了许多空白,奠定了我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增强了我国的经济自立能力。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苏联给我国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sup>②</sup>美苏双方对华态度的差异,促使中国人民作出选择。要取得较好的和平建设环境,获得经济援助和政治承认,中国必须同苏联结盟,倒向苏联,这决定了中国在国家建设上必然选择斯大林模式。

## 二 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中国在各方面都应以苏联为榜样,掀起了大规模的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从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到如何建立新政权的各种机构,从基本原则到各项具体制度,无不考虑苏联的经验,很多方面甚至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

<sup>①</sup> 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 1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6~107 页。

<sup>②</sup> 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9 页。



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sup>①</sup>同时,苏联也把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原则加以推广。斯大林认为,苏联的道路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照搬这个模式。因此,中国学习苏联,实际上就是学习斯大林模式。

向苏联学习,实际上就是学习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与实践,而这方面最权威的教科书就是秉承斯大林旨意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该书实际上是对斯大林模式经验和理论的全面总结,在内容上具有突出领袖个人、突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突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特点。该书被毛泽东称赞为“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sup>②</sup>。实际上,这本中共“干部必读”书在宣扬个人崇拜、路线中心、大党主义、单一模式方面,都有不好的影响。

### 三 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的学习集中体现在经济体制方面。模仿苏联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推动工业化,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对生产进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并通过工资等级制实行按劳分配。

为了实现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我国一再强化所有制的革命,期望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动了这种变革。中国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以引导农民走合作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sup>②</sup>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7页。

化道路来实现的,在农民自愿互利原则下,通过国家典型示范,引导农民经过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在这种政策方针指导下,1956年底入社农户达1.17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占87.8%,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后到1953年底以前,通过调整工商业、“五反”运动等,对私营工业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实行了经销代销,使这些私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在此基础上,国家通过实行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确立了对企业的国家所有制。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和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实现了公私合营,标志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我国还模仿斯大林模式,运用指令性计划组织管理经济活动。这一活动主要体现在“一五”计划的编制与实施上。五年计划是苏联的发明创造,是苏联制定国民经济远景计划的一种主要形式。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1年春天开始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着手编制。为了更好地制订和实施“一五”计划,1952年8月到1953年5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袁宝华回忆说:“我们代表团此次去苏联的目的,就是要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请苏联帮助设计和援助的项目。所以,为了使我国的五年计划同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相衔接,我们开始学习和讨论苏联的五年计划大纲草案。”<sup>①</sup>中国代表团还专门听苏联专家讲课。1953年6月,代表团回国不久,中央要求国家计委参考苏联意见,对五年计划纲要再修改一次。<sup>②</sup>1953年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中央政府对工业发展蓝图、计划指标和计划贯彻程序都作了明确规定,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建立起来。

在按劳分配原则实行方面,我国运用行政办法对职工的劳动

<sup>①</sup> 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sup>②</sup> 柳随年等:《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量进行估算,依据劳动量和劳动强度确定不同工种的工资等级,与苏联的做法基本一致。在就业方面,“一五”期间随着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逐步扩大统一分配劳动力的范围。从大专、中专、技校毕业生,到干部、工人、复员退伍军人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此后,自行就业、自谋出路就被统一分配所代替。1957年1月,又规定各单位对多余的正式职工、学徒不得裁减。这样就形成了统包统配、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劳动体制。在工资体制方面,1954年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后,着手实行全国工资制度的统一。1956年国务院颁布工资改革方案,规定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统一的职务等级工资制;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职务、职称等级工资制;国营企业按行业和企业规模分别制定各类职工的等级表,工人实行五级或八级的等级工资制;职工的定级、升级都按全国统一规定,地方和企业无权机动处置,但企业可根据条件自行决定计件工资和建立奖励制度。这三方面是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是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确立的最基本表现。

应该说,当时学习苏联有其必然性,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必要性。在中国这种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又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之中,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要搞工业化,除了斯大林模式,不会有其他更好的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7年建设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蒸蒸日上的局面,经济和社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发展,人民群众也得到了较多的实惠,这一切充分证明了当时我们选择斯大林模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 第二节 “以苏为鉴”——反思斯大林模式

历史发展到了1956年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对国内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我党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结果发生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重大转变。

## 一 苏共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推动了“以苏为鉴”思想的提出

自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到1955年,苏共中央领导人开始悄悄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提法也发生了变化:一是在宣传工作中开始批评个人崇拜现象,改变了过去对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的倾向,从强调斯大林的个人作用转到主要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二是不再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而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三是开始评论斯大林工作中和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如农业政策问题、肃反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问题、个人的历史作用问题等;四是苏共明确提出要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这些变化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4年4月,毛泽东在对《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批语中说:“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在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在京某些应当阅读的同志(如李维汉,安子文),请考虑酌定。”<sup>①</sup>5月,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也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必须注意这几个文件中所说的问题。

苏共党内意识形态的变化,使我党从对斯大林及其模式的迷信中有所醒悟。195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的问题,强调:“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sup>②</sup>毛泽东这段话是有感而发,表明他已在重新考虑如何评价斯大林和苏联经验问题。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明确提出“以苏为鉴”的思想。但这些都还是领导人在理论和思想上的应对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84页。

<sup>②</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507页。

活动,并没有成为自觉改革斯大林模式、探索自己道路的起点,因为外部条件当时还没有成熟,改革的时机尚未到来。

## 二 苏共二十大成为由全面学习苏联走向反思苏联经验的转折点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错误,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这为人们打破对斯大林及其模式的迷信,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和思考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提供了契机,为各国系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6年2~4月,中共中央多次开会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应当“更加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sup>①</sup>

在“反思”过程中,毛泽东考虑得比较多的,首先是从已经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指出,应该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sup>②</sup>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否认矛盾就是否认辩证法。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过其性质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认为斯大林不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常常混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

<sup>①</sup>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14~15、23~24页。

<sup>②</sup>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毛泽东等领导人在谈到斯大林另一个“左”倾错误时还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社会主义法制”。<sup>①</sup>通过对斯大林错误的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照搬照抄苏联的一套，要走中国自己的路。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及“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从苏联学来的好经验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有益作用。这种建设模式对于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建设，奠定中国工业化初步基础，充分发挥了其优越性。但从苏联“抄”来的一些不好的经验，在实践中也暴露了许多弊端，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如经济体制方面，所有制改造过快过急，形式过于单一；中央对计划、财政、干部、物资、劳动工资等包揽过多，统得太死；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特别是财权太小；市场范围太小，统购包销，流通不畅；过分强调条条管理，割断了地区内不同部门、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等。对于这些弊病，毛泽东与党中央有所觉察。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学习苏联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sup>②</sup>。显然，他已意识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走了教条主义照搬照抄的老路。这种让人“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sup>③</sup>的状况，“当然不应该是长久之计”<sup>④</sup>。在发现斯大林模式弊端之后，毛泽东与全党认识到，必须从建国初期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束缚中摆脱出来，中国的建设道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适合国情。

### 三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起点

我国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是以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

<sup>①</sup> 参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sup>②</sup>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页。

<sup>③</sup>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sup>④</sup>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1页。

大关系》为起点的。这篇报告与同年9月召开的八大,稍后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60年代初调整时期的正确举措交相辉映,形成了我党“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指向。其成果主要有:

在所有制结构上。鉴于苏联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教训,陈云在八大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格局。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sup>①</sup>这些设想尽管没有付诸实施,但当时能这样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样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难能可贵的。

在工业化道路上。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农,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和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工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毛泽东批评了苏联这种错误做法,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sup>②</sup>1959年,毛泽东又从社会扩大再生产规律角度阐述了农轻重关系问题,提出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sup>③</sup>。要适当调整重、轻、农比例,用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多增加积累的做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农、轻、重”的概念。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从此,我国开始走上了以坚持独立自主、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正确处理国民经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6页。

③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济各项比例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鉴于苏联把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对地方卡得很死、企业和地方独立性很少的弊端,我国初步提出了改进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1956年初,国务院“五办”在汇报中指出,国家统收统支对企业卡得过死,厂长只有200元到500元的机动权,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说:“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sup>①</sup>“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sup>②</sup>。“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sup>③</sup>。李富春提出了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建议。根据这些思想,八大确立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以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计划、财务、干部、福利设施等方面的权力。1957年初,中央又进一步研究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成立了陈云主持的中央经济五人小组,以后经过半年多调查,提出了《关于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并经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于1958年开始执行。这三项规定,总的精神是根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单位,以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这三项规定的执行是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在农村,1956年初至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1959年5月至反右倾运动前、1961年3月至1962年夏推行的“包产到户”,对农村经营管理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成效很明显。

在处理不同利益主体关系上。鉴于苏联只重视国家利益,忽视农民利益,中央强调实行统筹安排,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在国家 and 农民的关系上,苏联曾实行过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7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8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9页。



两种制度，一是义务交售制，二是余粮征集制，毛泽东认为都不妥，指出：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搞得很苦，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而“实行余粮征集制，势必要对农民翻箱倒柜，这个办法实在不妥。我们有 22 年的根据地经验，历来实行征收公粮和购买粮食的办法，使我们有可能不走苏联那样的弯路。”<sup>①</sup>他提出在与农民的关系上，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只有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团结几亿农民，巩固工农联盟。不过对这一思想的实践也有曲折，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无偿征收农民和生产队财产的做法，引起农民不满。但这种错误倾向很快被制止。在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主张废除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的错误观点，认为废除商业、对农民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强调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原则问题。这些举措制止了错误倾向，缓和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在领导体制方面。鉴于斯大林个人专权和搞个人崇拜的教训，中央提出了一些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设想与措施。八大期间，毛泽东提出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团结，反对宗派主义，主张在党中央增设几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以加强集体领导。他还对国外代表团说过：“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则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sup>②</sup>他多次提到在二届人大上一定要辞去国家主席，并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只得连任一届。他甚至考虑在适当时机不再继续担任党的主席，党中央也赞同这个意见，八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

①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选载》（4），《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

②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8 页。

席一人”。这些说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注意到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

在政党制度方面。鉴于苏联搞一党制的弊端,我党主张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应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纲领》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执政、参政的多党合作关系。毛泽东曾谈及:“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sup>①</sup>“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sup>②</sup>党内曾有人认为“民主党派是为争取民主而成立的,现在有了民主,其任务已尽”,甚至说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拔不拔去都一样”。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批评了这些错误认识,强调共产党对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周恩来反复阐述实行这一方针的历史由来和现实必要性,指出“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sup>③</sup>。这些思想勾画了我国政治体制建设的基本框架,对于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意义重大。

在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方面,鉴于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我党主张对反革命分子要少捉少杀,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反革命越搞越多的观点,认为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他提出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是对苏联教训的汲取。他善于用辩证观点看待肃反问题,指出反革命是消极因素,但可能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3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0页。

③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促其转化为积极因素。他援引苏联的例子说：“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他认为在我国条件下，反革命“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这种转化观点正确指导了我国的肃反工作，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针对苏联和国内学术批评中存在的简单粗暴的作风以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我党进行了大量探索，最为突出的就是在科学和文化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十大关系时，确定“双百”方针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文化事业的重要方针。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sup>①</sup>。5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sup>②</sup>9月，八大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sup>③</sup>；“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制，是错误的”<sup>④</sup>。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双百”方针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讨论”，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并且认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sup>⑤</sup>这一方针极大地解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调动了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254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348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4页。

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直到现在仍然是党对科学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

### 第三节 “反修防修”——斯大林模式

在“以苏为鉴”的反思中,毛泽东虽然认为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又明确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将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他认为:“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将斯大林“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必然引起混乱。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借斯大林问题掀起反苏反共浪潮,波兰、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南斯拉夫铁托等人公开批评所谓的“斯大林主义”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随着中苏关系变化造成的国际形势的紧张,以及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发生偏差,为维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中共中央提出了“反修防修”的战略任务,对斯大林模式采取否定之否定即重新肯定的态度,推动了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强化。

#### 一 中苏论战严重干扰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在中苏关系史上,1958年是风云突变的一年。1956年,苏共二十大虽然使中苏之间出现了裂痕,但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尚未根本改变。然而,从1958年春开始,由于相继发生了长波电台事件、共同舰队事件和解放军炮击金门事件,双方的矛盾和冲突日趋尖锐。1959年又因中印边界武装冲突、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使关系进一步恶化。中苏之间的争论已不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而是迅速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等方面,事实上到1959年底,两党两国关系的逆转已无法挽回了。

从中苏双方一开始产生分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认定问题出在赫鲁晓夫身上,是由于赫鲁晓夫未能正确对待斯大林,并提出诸如“和平过渡”等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错误观点,而中国方面

为了坚持原则,不得不对苏方错误进行适当批评。毛泽东认为,1958年后的变化表明苏共和赫鲁晓夫未能接受正确批评,越走越远。1959年底1960年初,他得出结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也像南斯拉夫的铁托一样,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而中苏之间、国际共运中所出现的问题,根子全在这里。于是,中苏关系史和国际共运史上出现了一场“大论战”。1960年4月,以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为由,中共中央组织撰写了总题目为《列宁主义万岁》的3篇文章,全面批判各种修正主义观点。文章把铁托作为“靶子”,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其矛头所向实际上很清楚。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报复行动,包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对中共的围攻,下令撤走所有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中苏之间几乎所有的合作协议等。此后,双方关系不仅进一步恶化,而且两党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方面的争论和冲突也日趋白热化。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又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由不点名转向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关系处于破裂的边缘。

中苏论战和两国关系的恶化,对我党内在指导思想日益“左”倾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作用。随着论战的升级和激化,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从国内情况看,当时因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和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出现了要求“改革”的苗头,如农村中很多干部和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促使毛泽东更加关注如何在中国开展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最早于1964年春节正式提出国内“防修反修”问题。“四清”、“五反”被视为国内“反修防修”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一些试点单位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和平演变”的典型。他在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谈话时说,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这三个部是农工部、联络部和统战部。邓子恢等关于农村工作的正确主张被概括为“三自一包”(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并被当作“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王稼祥向中央的建议,被歪曲地概括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要和、对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支援要少),并被当作“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此后,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党的工作重点,党和国家工作发生了长时间、全方位的失误。

## 二 1964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由反思走向全面维护斯大林模式的转折点

1964年5~6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将正在制定中的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解决人民“吃、穿、用”的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改为重点建设三线国防工业基地,以防止大规模外敌入侵,并正式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强战备和“反修防修”双管齐下。毛泽东强调,必须在党内、国内“反修防修”,开始在全国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夺权斗争”。这是在特定国际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为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作出的反应,也是中国共产党由“以苏为鉴”走向全面维护斯大林模式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我党尤其是毛泽东个人对国家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和控制不断加强,促使中国进一步运用斯大林模式在战备上的优越性来大力加强国防,使中国经济、政治等体制上的斯大林模式更加突出和强化。

我党固守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有其思想认识上的原因。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加上“左”倾思想的发展和历史的局限,我党领导人逐渐中断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虽有缺点,中国不能照搬照抄,但基本方面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坚持。毛泽东一再强调:“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建设的共同道路”。<sup>①</sup> 随着中苏论

<sup>①</sup>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8、73页。

战的进一步升级,到苏共二十二大和中苏两党公开大论战阶段,双方对斯大林评价的分歧也进一步扩大,赫鲁晓夫变本加厉地否定、攻击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则竭力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等由基本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发展到基本肯定和固守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并将其推向极端。

### 三 斯大林模式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强化

中国又一次强化了斯大林模式,具体表现在:

#### 1. 推行“一元化”领导,致使权力高度集中

“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夺权斗争,从夺基层党政领导权开始,发展到夺取中央各部门领导权,在政治体制的剧烈变革中,推行“一元化领导”,致使权力高度集中。这一时期的“一元化领导”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64~1966年农村四清运动期间,普遍采用了让原领导班子靠边站,由几十倍之多的外来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取代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全面实行四清工作团队的“一元化领导”;1966~1967年冬季,各地农村普遍出现了从几个月到一两年的无政府状态,各种“造反派”,“保守派”组织纷纷“夺权”、“反夺权”、“再夺权”;1968~1970年是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领导”时期,毛泽东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同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革委会在人员构成上实行“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大多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带有强烈军事管制色彩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最后便是革委会和党委会合二而一时期,在这一体制下,党组织恢复工作,党委书记兼任革委会主任,革委会和党委会在组织上已经合为一体,但是由后者构成前者的上层核心部分。一元化领导体制与斯大林模式下苏共的一元化领导有着相同的本质特征。

#### 2. 现代迷信运动盛行

以神化毛泽东为核心的现代迷信运动盛行,禁锢着人们的思

想。1964年5月,在林彪支持下,《毛主席语录》迅速发展到手一本、人人争读的局面;社会文化中出现了各种怪异现象,如原有的广告牌全都取消,形成了到处刷上毛泽东语录的“红海洋”;工厂、机关、学校上班后,先搞一个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翻来覆去地背诵“老三篇”,还搞“早请示、晚汇报”,人人学跳“忠字舞”。林彪称颂:“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sup>①</sup>这对于把个人崇拜推向极端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林彪、康生宣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sup>②</sup>在他们推动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也日益严重起来。首先,大量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和执行,基本上都要有毛泽东的提议、同意或批准,民主机构成为毛泽东意见的表决器;其次,各种政治运动基本上都是按毛泽东的意愿开展的;再次,“文化大革命”后期许多重要职务的任免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最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必须获得毛泽东的支持才能正常开展。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对国民经济等领域的调整、治理也是在必须获得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一旦失去这种支持,工作就会出现反复。由此可见,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个人专断与当时苏联对斯大林的情况相比,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 3. 对公有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反修防修”斗争中,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经济体制方面得到进一步强化,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

(1) 大搞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追求所有制形式的“一大二公”。由于一些非经济的原因,在相当多的经济领域内,生产资料私有制几乎消失,全民所有制成为唯一的经济成分。1966

<sup>①</sup> 于南:《10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sup>②</sup> 郑谦、张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将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取消资本家定息;把大型合作商店逐步转为国营商店,把大量的小商小贩转入国营商店的代购代销店。此后大批城镇集体工商企业,不是合并就是转为国营,或下放到农村人民公社。各种舆论工具大力宣传“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认为“大比小革命”。农村几度掀起经济核算单位“升级过渡”高潮。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受到冲击,“穷过渡”被强行推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总数由1966年的74755个降到1978年的52781个。这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做法,将原来由于生产、条件、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的穷队和富队在分配上拉平,实际是穷队“共”了富队的“产”,既损害了富队利益,挫伤了社员干部的积极性,也没有调动穷队的积极性,结果是“共同贫穷”。

(2) 减少或取消自留地。一些地区提出“多一分自留地就多一分私心”、“自留地种得好就是私心重”的批判口号,为解决“三自留”(自留地、自留时间、自留人)和所谓“三争”(个人和集体争季节、肥料、劳力)问题,大砍自留地,有些地区甚至干脆取消了社员的全部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这种做法侵害了社员的利益,给他们种植家庭生活用菜和经济作物造成了极大不便。

(3) 限制甚至消灭个体经济。1967年掀起旨在取消城乡个体经济的“升级”、“过渡”热潮,对无法“升级”、“过渡”的个体户则采取“死一个少一个”、“人死收摊”的办法,进行自然淘汰。一些地区采取命令手段,强行规定社员饲养家禽、家畜只数,甚至提出“鸡头不许超过人头”。还有的地区采取抄家办法,没收家庭副业财产,称之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出社会主义的步”。

(4) 限制和取消集市贸易。农民到集市出售自己生产的鸡蛋、蔬菜,都被扣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罪名,大批农村集市贸易被勒令取消,自发进行交易者遭到批判和没收。

#### 4. 以建设稳固的战略后方为经济发展的重心

1964年5、6月间,中央工作会议在重新拟定“三五”计划时,提

出要以国防建设为中心,以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为出发点编制规划;修改后的“三五”计划确定建设稳固的战略后方为经济发展的重心,确定了三线建设方针。要在较短时间内,在西部和西北部建立起一个敌人战略核武器打不到、能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实行工农结合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基地,进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在国际形势推动下,“四五”计划比“三五”计划更强调战备。1965~1975年,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这是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经济建设目的方面强化的表现。

#### 第四节 “斯大林模式”强化的原因

虽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许多有益且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和尝试,但终究只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细枝末节进行修补,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该模式的基本框架,斯大林模式反而进一步强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一 未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但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却未能及时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作出了过高估计,甚至为进入共产主义设定了时间表,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于是,不顾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现实,离开生产力片面强调变革生产关系。同时,对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触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改

革,如农村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丝毫不留情面地当作“修正主义”予以严厉批判。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包产到户”打击了集体,有利于单干,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修正主义,并说即便是赫鲁晓夫,他也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sup>①</sup>1964年2月,他与金日成谈话时又进一步说明:“三自一包”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sup>②</sup>这样,在一系列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为目的、以“夺权斗争”为手段的“反修防修”运动中,对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被扼杀了,而斯大林模式却得到了维护和加强,根本不可能对斯大林模式作改革性的突破。1989年5月,邓小平对中苏论战发表了总结性意见:“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争论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③</sup>。

斯大林模式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形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借鉴这一模式具有必然性。但是这一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只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之一。“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sup>④</sup>这种在“原产地”都没搞清楚的建设模式,却被当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模式。毛泽东虽然与斯大林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上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是基本轮廓还是相吻合的,而与赫鲁晓夫则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立场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可以说,中苏论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一次碰撞,而“文化大革命”则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20世纪60年代中叶中国社会主义

①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8~509页。

②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实践的一次冲突。

实际上,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定下了基调,即:“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sup>①</sup>他没有讲明这种原则是指什么,但我们可以判断,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要和苏联保持原则一致,即遵循斯大林模式。这一原则在八大得到了体现。八大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定下的基调,是要突破苏联的束缚,不是从体制层面的突破,只是在方法上思考,力图寻找一种能将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更快更好的途径。这是毛泽东对突破斯大林模式的理解,也是党的认识在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

## 二 未搞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的问题

由于认定“斯大林模式即社会主义模式”,我党无法接受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在中国借鉴斯大林模式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南斯拉夫已经开始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尝试,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以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方法,这是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体现。但毛泽东认定南斯拉夫出了修正主义。1962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的电报中说,要同“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毫不调和的原则性的斗争”,以“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sup>②</sup>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更是让我党无法接受。毛泽东曾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sup>③</sup>我党在国际上指责南斯拉夫、苏联等国的改革,开始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影响巨大的中苏大论战。毛泽东认为:对“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37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7页。

教训”<sup>①</sup>，否则也“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sup>②</sup>。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就必须防止中国出现类似南斯拉夫和赫鲁晓夫那样的改革，必须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这场公开大论战的非理性化和极端化，直接导致我党更坚定地维护斯大林模式，无法正确、冷静地进行有关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模式。

### 三 对斯大林模式的再肯定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在日趋激烈的中苏论战中，为了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我党必须维护斯大林，为了维护斯大林，不能不肯定斯大林模式。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之否定，是与他于苏共二十大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情绪变化相吻合的。毛泽东“喜”的是“揭了盖子”，即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而大胆否定斯大林模式的一些具体做法，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路；“忧”的是“捅了娄子”，即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和国际上的反共逆流，因而必须出面独撑危局，维护斯大林的形象，也就不能不维护斯大林模式。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毕竟不能从主观需要出发，尤其不能单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而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不管是什么模式，都可以而且应该借鉴；凡是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不管什么模式，都要予以大胆的否定。这就是研究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轨迹得出的正确结论。

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经历了模仿、反思、强化的过程。随着“反修防修”斗争的不断升级和斯大林模式的不断被强化，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再思考。中国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全面启动，直接同这一模式被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8页。

<sup>②</sup>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2页。

强化所造成的危机相联系。“反修防修”斗争不仅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推向极致,充分地暴露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和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从而推动我党认真总结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主要是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带来的后果。可以说,没有对斯大林模式的这种再反思,就不可能在“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就发生真理标准大讨论,并通过这场讨论重新树立实践的最高权威;没有“反修防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社会危机,也不可能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耗尽以前就开始市场取向的改革。对斯大林模式的扬弃,必然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革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但这个改革并不是对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对体制的革命性变革,是模式的转换。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和基本结论,领导中国人民重新开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征程。

## 第三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形成

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和长期的过程。他“三落三起”的人生磨砺对理论创立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使他能够有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思考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但真正触动他思考大局问题和理论难题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10多亿中国人的生存问题,就是他所讲的“球籍”问题,促使他反思和搞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另一个就是“时代主题”问题,究竟是“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正是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邓小平率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思考重大战略决策思路,转换工作重心,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邓小平理论有三大组成部分,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民族振兴与社会主义振兴相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确把握“时代主题”问题上。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倡导思想解放,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概括社会主义本质,形成社会主义全面进步、全面发展的理论。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不容讨论,实现祖国统一的信念坚定不移,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性,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对世界多作贡献相统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江泽民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正像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走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系统的价值规范、行为准则和组织原则,提供了一整套公共社会发展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先进理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是成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社会主义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战略指导思想。



## 第一章

#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978年12月,74岁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重要地位。他所面对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尽管当时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已有两年,但受“文化大革命”中极“左”错误的影响,国内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抉择。古稀之年的邓小平勇敢地承担起艰巨的历史使命,在随后的12年里,率领包括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在内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地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领导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邓小平理论。

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邓小平的不朽功勋。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尊称邓小平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强调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1997年2月19日晚,邓小平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称邓小平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

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邓小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十五大报告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是邓小平留下的珍贵遗产。

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对邓小平也有很高的评价。邓小平在1973年3月第二次复出，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之后由于工作出色，毛泽东在1973年12月提议他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1974年6月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后，毛泽东在1974年10月提议他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他又在毛泽东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从整顿铁路秩序开始，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抓稳定，抓秩序，恢复生产，见效非常快。毛泽东称赞他有能力，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周恩来也曾当众盛赞他：“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就邓小平个人而言，他吸取了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对个人崇拜现象十分警惕，在自我评价方面异常清醒。他真心实意地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把这个事业视为千秋万代的事业，同时他又清醒地知道自然规律不可改变；他坚信为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安全着想，必须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决定从自己开始，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他认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要让国家逐步兴旺起来。他真诚地表示，国家发展了，自己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能这么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能这么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幸事。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就曾指出：如果党允许我今

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十年后,1989年9月,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中央负责人商量自己的退休问题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他认为: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希望对自己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1989年11月,邓小平在十三届五中全会卸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实现了他多年的退休夙愿。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报告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

虽然在自我评价方面低调而谦逊,但是当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时,特别是当情势危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安危,有可能动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由他领导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时,邓小平就会显得非常坚韧不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动摇”。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邓小平的性格是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边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从古稀之年到耄耋之年,从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到一名普通的退休党员,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紧密联系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懈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在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下顺利发展。1989年退休时,他对继任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说“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大的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着停顿甚至倒退的危险。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决心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过问这个特别大的问题,在1992年初春毅然决然地踏上南下的列车,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意义深远的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

重大认识问题,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有力地推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下定决心,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新的阶段。

## 第一节 领导思想路线拨乱反正,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奠定思想基础

实践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需要不断地分析新机遇新挑战,认识新形势新任务,解决新课题新矛盾,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才是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思想基础。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启动初期,并不具备这个思想基础。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延安整风之后在全党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已经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破坏得面目全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长期盛行,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已成为禁锢中国人思想和行为的精神枷锁。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就必须首先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重新恢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然而,当时思想路线拨乱反正面临着巨大的阻力,而且阻力主要来自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这决定了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决非一夕之功。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之后,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问题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在1977年2月开始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sup>①</sup>,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这些做法直接危及到了1977年8月十一大重申的“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伟

<sup>①</sup> 《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

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奋斗目标的实现。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者,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20年,犯了一系列“左”倾错误,作出了很多错误的决策和指示;在生命的最后10年,他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四人帮”等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得政治局势动乱不已,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后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如果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按照毛泽东晚年那些错误的决策和指示去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而这正是邓小平梦寐以求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坚决批判“两个凡是”,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核心任务,就是正确回答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认识和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sup>①</sup>

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当然不能回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但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经由“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毛泽东在众多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已近乎于“神”,是不可能有任何缺点和错误的。这种不健全的社会大众心理状况,使得那些鼓吹“两个凡是”的人,能轻易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反之,如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则具有很大的“颠覆性”,要冒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政局动荡。而且,对毛泽东的评价决不是对毛泽东一个人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评价必然地会与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四者之间存在一损俱损的关系。前车之鉴就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在苏联内外引发的巨大动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因此遭到重创。幸运的是,邓小平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正是他运用过人的政治智慧,稳扎稳打,非常慎重、非常成功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难题,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 一 初步反对“两个凡是”

1977年2月,华国锋提出要坚持“两个凡是”,邓小平当时尽管尚未第三次复出,但他从全党全国社会主义事业大局出发,在和王震谈话时马上明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sup>①</sup>4月,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指出,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sup>②</sup>7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复出并发表讲话,解释了“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准确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sup>③</sup>

不过,“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并非“两个凡是”的直接对立物,仅靠它还不足以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还能共存。例如,1977年8月十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一方面吸收了邓小平的观点,指出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一方面又仍然对“文化大革命”给予高度肯定,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提出“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些表述,邓小平显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5、157、15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62页。

是不赞同的,但他当时并没有公开予以反对。事实上,邓小平之所以会在1976年4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被打倒,主要原因就是他不愿意与毛泽东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妥协。当毛泽东多次提出希望邓小平肯定“文化大革命”时,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作违心之言,每次都予以婉拒,还自称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sup>①</sup>。

从十一大政治报告来看,对于邓小平来说非常重要,十一大重申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奋斗目标,他满怀憧憬,“迫不及待”地要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大干一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初,自告奋勇分管军队、科学、教育和外交等方面的工作,并协助华国锋领导国务院全面工作。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遭到严重破坏,真可谓千头万绪,百废待兴。邓小平工作繁忙,日理万机,无暇深入思考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问题。而且,当时“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尚未激化,加之他也没有分管宣传理论工作,因此他虽然在自己的工作中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很注意坚持做到实事求是,但他在对“两个凡是”提出初步反对意见之后,并没有对当时在党内占主流地位的“两个凡是”思想进一步展开系统的揭露和批判。

## 二 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驳斥“两个凡是”,倡导“实事求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由此认真关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他非常务实,不是纯粹地就思想路线空谈思想路线,而是从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强国的紧迫需要出发,高度重视思想路线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在胡耀邦的支持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32页。

下发表的,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当时,林彪和“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远没有完全粉碎,“两个凡是”是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存在诸多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思想僵化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工作中敢于根据实际情况,形成新思路、新方法、新动作的人往往动辄得咎,处处被掣肘,这直接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各项具体工作的顺利开展。即便是邓小平,也难免在工作中受到思想僵化者的干扰和指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历时7个月、精心修改多次之后终于发表,是触及“禁区”的大胆举动。该文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效应的观点:凡有超越于实践并且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受实践的检验;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被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sup>①</sup>

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很快就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他开始明确、坚定、毫无保留地予以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时,正值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之际。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针

<sup>①</sup>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对当时的争论,特意专门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重申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强调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思想来个大解放。<sup>①</sup>邓小平这次讲话受到了“两个凡是”坚持者的攻击,他们指责邓小平在分析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政治工作问题时,所说的“新的历史条件”和华国锋讲的“新时期”不一样,是在唱对台戏。<sup>②</sup>这种无谓的攻击促使邓小平更加鲜明地支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正面回击了一个多月来“两个凡是”坚持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和攻击。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各省市报纸广泛转载,强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充分肯定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指出:究竟应该怎样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确实不是一个小问题,这里涉及一个是真捍卫毛泽东思想还是假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文章批评一些人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熟读《实践论》,但一听到实践标准,就如临大敌,认为这种思潮同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刚刚恢复和发扬起来的实事求是、凭事实讲话、敢于提出和研究新问题的优良作风,站在对立面,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毫无疑问反映了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的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sup>③</sup>

当时,邓小平还作出不少努力,试图引导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各方尽快达成共识。他在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张者、支持者、反对者、观望者沟通时,都明确表示自己的赞同意见。1978年7~8月,他先后同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文化部负责人谈话,表明自己的态度。但邓小平的努力收效并不明显,要扭转当时那些顽固主张“两个凡是”的人的错误认识,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3~11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61页。

③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解放军报》1978年6月24日。

在中央层面就真理标准问题形成共识,决非易事。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不断对《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施加压力,明确要求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一花独放”,对真理标准问题“就是不表态”。<sup>①</sup>

虽然在中央层面无法达成共识,但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仍然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利用各种工作机会驳斥“两个凡是”,倡导“实事求是”。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唐山、天津等地视察期间,大力倡导“实事求是”,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指出: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sup>②</sup>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最初5个月,中央层面虽然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但双方要么是通过媒体表达立场,要么是在各自主管领域内对下属表明各自的立场。受“个人崇拜”的长期影响,党的各项制度建设非常不健全,当时在中央层面缺乏一种正常的民主商谈机制,持不同意见者难以面对面地坐下来进行直接、平等、民主的辩论和交流。非常时机需要采取非常机制。为了打破僵局,叶剑英率先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让争论各方面对面地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叶剑英的提议很快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认为“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sup>③</sup>。

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召开之前,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央层面争论各方

①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7~38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01~402页。

提供了一个面对面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机会。这次会议的原定三个议题都是经济问题,但后来在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决定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从揭批林彪、“四人帮”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时指出,中央应该对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给以考虑和决定,他列举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给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和陶铸、王鹤寿等人平反,把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移交给中央组织部,肯定彭德怀,肯定天安门事件,批判康生。<sup>①</sup> 这些问题直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说出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心声。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的发言,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接下来,在原定议题之外,会议专门讨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等重大问题。与会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积极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促使华国锋作了自我批评。<sup>②</sup>

邓小平及时抓住中央工作会议创造的有利局面,开始利用工作机会,和主张“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等人正面沟通。1978年11月25日,邓小平在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一起听取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汇报后,当即指出: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对毛主席的评价不可以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sup>③</sup>

邓小平敏锐把握中央工作会议中的新动向,决定趁热打铁,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的内容集中到反映真理标准问

① 《陈云文选》第3卷,第23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0~14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34~435页。

题、发扬民主问题、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sup>①</sup>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顺利发展。他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由于时机尚不成熟,他在讲话中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给出具体的评价,仅指出“文化大革命”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作。<sup>②</sup> 这次讲话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7年十五大报告高度评价这次讲话,认为它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后于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会议取得的所有重大成果都在全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149页。

上得到确认。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提出要明确党的思想路线,深入讨论了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对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暂时搁置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认为不必匆忙作出评价,这既不影响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邓小平对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取得的成果非常满意,他称赞这两次会议集中呈现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希望把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全国发扬开来、坚持下去。<sup>①</sup>至此,他认为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已经基本告一段落,接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实现政治路线和解决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齐心协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按期完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深刻的伟大的革命”<sup>②</sup>。

### 三 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阐述了当时中央层面争论各方初步达成的共识,但其中很多提法与十一大政治报告相比,变化非常大,譬如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阶级斗争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无从得知中央决策层思想变化的前因后果,不少人一时之间难以转过弯来,产生了很多思想上的疑问。在国外,也很快出现了中国“非毛化”的说法。在1979年1月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出现了不少过激言辞。有的发言者对建国以来所有的重大运动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批评,有的发言者对毛泽东的批评接近于否定。而1978年11月开始兴起的“西单墙”运动,此时也发展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61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

得如火如荼,一些演讲者措辞激烈地要求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民间政治组织,其中不少在言论上十分出格。例如,“中国人权小组”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解冻社”发表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它分裂人类;“民主讨论会”鼓吹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声称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不应该搞四个现代化,应当实行社会改革,搞资本主义。<sup>①</sup>

这些言论直接触碰到了邓小平所坚守的底线。就邓小平个人而言,无论个人际遇如何,他始终坚信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sup>②</sup>正因如此,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果断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保卫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sup>③</sup>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17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6~184页。

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后,相当多的人都把四项基本原则看成横空出世的新东西,这与邓小平的看法存在很大出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而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sup>①</sup> 1979年9月4日,邓小平就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问题提意见时,进一步把时间往前推,强调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30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指出过去的30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公开发表长篇国庆讲话,指出: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样,依靠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力量,我们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纠正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终于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sup>②</sup>

#### 四 对思想路线作用认识的深化

如前所述,邓小平从来不是孤立地看待思想路线问题,他总是非常务实地把思想路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考虑。第三次复出之后,面对国内普遍贫穷落后的状况,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飞速发展,他急切地希望迅速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力图以此证明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他心目中,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是第一位的。十一大召开之后,邓小平在工作中全力以赴地推进社会主义四个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5页。

<sup>②</sup>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现代化建设。只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受到思想僵化者的干扰破坏之后,他才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大力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倡导重新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倡导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身体力行。他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模范践行者。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针对一些人提出的“涉及党的十一大路线一些提法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的疑问,他明确表明态度: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否则下次代表大会怎么会提出新的提法呢?党的十一大制定的路线,也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对于实际情况认识的变化,由历次中央全会特别是三中全会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今后也还可能作某些必要的调整。<sup>①</sup>

既然党的路线可以调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根据什么来调整党的路线呢?邓小平认为,对党的路线进行调整,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对于实际情况认识的变化”,这样一种思路体现出的正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至此,邓小平开始认识到思想路线不仅关系到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而且对于正确地制定和调整政治路线,也具有重要作用。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sup>②</sup>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3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193页。



## 五 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思想路线拨乱反正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非常慎重。即便是在毛泽东已经逝世三年之后，对这些问题仍然没有作出权威结论。从1979年叶剑英的国庆讲话来看，虽然指出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但批判的矛头则完全指向林彪和“四人帮”，不但没有直接批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反而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先是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随后又对‘四人帮’进行了多次的批评和斗争”。这次讲话同时公开宣布：“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sup>①</sup>。讲话发表以后，党内外、国内外反映都很好，但也有人认为这个讲话与给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给“文化大革命”作全面、具体的总结这个要求来讲还有距离，还不能令人满足。当时很多同志都希望，在开“十二大”的时候，应该对30年的历史，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作出总结。<sup>②</sup>

这个总结就是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公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起草工作在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下进行，从1979年10月开始启动，本来预计在1980年底完成，但由于难度太大，超过预期，最终用了约20个月才最终完成。难度主要在于需要平衡很多因素，需要做到既不回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要继续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历史地位。从发表的决议稿来看，对于毛泽东晚年严重错误的严肃批评，在当时确实具有颠覆性。因此，为了尽量减少决议出来之后的冲击波，就要尽量使决议的起草过程同时也成为达成共识的过程。为此，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先拿出提纲，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提纲定下来之后，拿出草稿，

<sup>①</sup>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sup>②</sup> 程中原：《在历史转折过程中邓小平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草稿基本成型之后，再历经党内4000人大讨论、40余人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的讨论等多轮讨论和修改。如此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最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从决议起草工作启动到最终正式通过，邓小平自始至终发挥了关键作用，多次提出重要意见。

1979年10月下旬，综合党内外、国内外对叶剑英国庆讲话的反映，邓小平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开始起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sup>①</sup>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提出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要求：一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使党内、人民的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他特别强调第一项要求是“最核心的一条”，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同时他还明确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要对毛泽东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sup>②</sup>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特别谈到了“文化大革命”部分，一方面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一方面强调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sup>③</sup>。

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公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思想路线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决议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意见和要求，对毛泽东作了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评价，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7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29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303页。

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既分析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也没有遗漏他在此期间为党和国家所作出的一些重要贡献。决议认为,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 error。决议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概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并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分别予以专门阐述。在此基础上,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决议批评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两种错误态度,一种认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一种则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决议认为:这两种错误态度的成因相同,即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检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 error 区别开来。

## 第二节 领导政治路线拨乱反正,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奋斗目标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目标,今天中国人的基本

共识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中叶，国民经济发展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奋斗目标的确立决非轻而易举。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曾经两次遭遇搁浅。

早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提出要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认为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但遗憾的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阶级斗争成为统领一切的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就此被长期搁置。期间，人大活动也被长期中断。

10年后，1975年1月召开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提出：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报告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强烈反映了邓小平的心声。1975年9月，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强调：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sup>①</sup>为了实现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快马加鞭地着手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整顿，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很快他又被第三次打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又被搁置起来。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屡遭搁浅，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晚年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之间存在激烈冲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强调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98页。

搞政治斗争,势必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人人自危,哪还有心思学习掌握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本领和知识,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呢?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必然导致现代化建设任务被搁置和延误。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邓小平在观察思考问题时总是从大局出发,非常讲政治,但他同时又很务实,强烈反对空头政治。虽然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讲,现代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层面上的问题,但邓小平却从政治高度来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领导全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为党的政治路线,激发了全党全国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持久热情。

### 一 倡导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为党的政治路线

十一大虽然重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但却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深入揭批“四人帮”是推动当前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如前所述,“以阶级斗争为纲”与现代化建设很难相容,邓小平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很早就认识到不能无限期地揭批“四人帮”,必须为其设定终止条件。1977年8月,他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sup>①</sup> 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sup>②</sup> 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谈到部队揭批“四人帮”运动问题时指出:有几条杠杠作为验收运动的标准是很重要的,不然,要把运动进行到底,底在哪里,摸不着。运动不能老搞下去,到一定时候要转入正常。<sup>③</sup> 其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8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02页。

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意见》。11月，中央工作会议采纳邓小平的提议，讨论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从揭批林彪、“四人帮”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虽然中央层面就这个转移达成了共识，但要在全党和全国真正实现这个转移并不容易。受长期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影响，从高级干部到普通百姓，很多人已习惯了“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要月月讲，天天讲”等说法，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转移显得非常突兀，难以理解。作为工作重点转移的倡导者，邓小平肩负着解疑释惑的重任。在解疑释惑、促进工作重点真正转移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基本立场也越来越明晰，概括而言就是：不能用经济取代政治，还是要讲政治，但要反对空头政治；政治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党的政治工作要有助于实现人民的利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政治工作可以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在经济落后、亟需发展经济的时期，党的政治工作必须把重点放在经济工作上，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他在很多工作场合发表讲话，一再重申和阐明这些基本观点，努力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明确反对空头政治，提出了衡量党委领导绩效的标准。他认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他强调对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sup>①</sup>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

根本的利益。他号召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sup>①</sup>

1979年7月28日，邓小平接见白如冰等人时明确提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四个现代化；搞现代化就是要加快步伐，搞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搞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最大的阶级斗争；不发展生产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sup>②</sup>7月29日，邓小平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sup>③</sup>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直辖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强调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要用发展经济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sup>④</sup>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向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sup>⑤</sup>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指出：（中国高速度实现现代化）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sup>⑥</sup>邓小平在此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最初表述。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从80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18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4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4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196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73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

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他指出:叶剑英在国庆讲话中说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段话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他要求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要坚决地按照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走下去。<sup>①</sup>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专门讲了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指出:从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逐步确定了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强调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sup>②</sup>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五天后,这个总任务庄严地写入了党章。党章中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这标志着新的政治路线得到了全党的正式认可。

## 二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目标

十一大提出要“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时,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多数中央领导人都十分乐观,认为艰苦奋斗20多年之后,中国一定能在20世纪末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从1960年到197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000多美元增至5000多美元,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00多美元增至近500美元,而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9~249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4~276页。



我国 1976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 410 美元。<sup>①</sup> 在这么低的起点上,即使是要在 20 世纪末赶上发达国家在 1975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也必须使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3% 以上。如果考虑到期间我国的人口增长因素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继续增长因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必须远远超过 13%,这种持续的超高速增长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 1976、1977、1978、1979、1980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是 410 美元、390 美元、230 美元、260 美元、290 美元,非但没有高速增长,反而总体呈现递减态势。但在当时,我国不仅缺乏与国际接轨的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统计指标,而且还曾连续多年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导致党和政府的决策缺乏科学的、可靠的依据。

#### 1. 过于乐观地直接沿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标准

1977 年 10 月,邓小平会见日本三冈访华团时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所讲的赶超世界水平,就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sup>②</sup>

1978 年 2 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 1985 年要建设 120 个大项目,其中包括 10 大钢铁基地、9 大有色金属基地、8 大煤炭基地、10 大油气田、36 个大电站、6 条铁路新干线和 5 个重点港口。同时提出,到 20 世纪末工业生产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农业生产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公布之后,引发了国外的诸多疑虑。在接下来近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在多个外交场合一再重申中国将在 20 世纪末如期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8 年 4 月,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友好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争取在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的科学技术比较接近世界先进水平。5 月 7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www.worldbank.org](http://www.worldbank.org)。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217 页。

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声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能够做到。<sup>①</sup> 5月28日,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时指出:现在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有根据的,不是讲空话,有信心,但也不容易,有好多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sup>②</sup> 6月,邓小平在与卢旺达总统会谈时指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我们清醒地估计了形势,是可以实现的,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工作,也需要吸收国际上最先进的东西,而不应当关起门来建设。<sup>③</sup> 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期间指出:中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sup>④</sup> 1979年2月,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指出:中国人民在争取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中,有许多方面要向创造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美国人民请教。<sup>⑤</sup>

## 2. 放低标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在与国外政要就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进行的多次交谈中,邓小平对我国现代化具体目标的思考也愈加深入。从当时国内情况来看,由于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不少大项目进展困难。从国际情况来看,尽管邓小平一再表明中国要开放,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但要真正打开长期封闭的国门,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来自国内的阻力和来自国外的猜疑,决非易事。综合这些因素,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模范践行者,务实的邓小平开始发现必须降低预期目标。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首次采用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一提法,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0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1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2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10~41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85页。

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 50 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 70 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3 月 23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 70 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实际上,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西方工业发达国家 1976、1977、1978、1979、1980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快速递增,分别是 6 200 美元、6 980 美元、8 070 美元、9 440 美元、10 320 美元,<sup>①</sup>在这期间我国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逐年增大,即便是要在 20 世纪末达到发达国家 70 年代的水平,也有很大难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1979 年 10 月,邓小平在中共省、直辖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首次正式谈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他在这次讲话中客观地降低标准,把目标设定为到 20 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 000 美元,实践证明这一目标是切实可行的。他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 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 300 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他强调,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讲空话是达不到的。<sup>②</sup>

### 3. 提出建设“小康之家”与翻两番的目标

从沿用发达国家标准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康”社会目标,表现了邓小平的求真务实精神。1979 年 12 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关于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问题时,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www.worldbank.org](http://www.worldbank.org)。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94~195 页。

家”。到 20 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1 000 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sup>①</sup>

1980 年 5 月,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詹姆斯·卡拉汉时指出:我们头脑里开始想的同我们在摸索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有差距,我们的雄心壮志是在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经过摸索,肯定了一点,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不同于包括你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中国人口太多,要达到你们那样的现代化,人均年收入 5 000~7 000 美元,不现实。中国平均每人年收入达到 1 000 美元,变成“小康之家”,这就是我们的目标。<sup>②</sup>

1980 年 6 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和加拿大社论撰写人访华团时指出: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来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也要根据现在中国的薄弱基础来决定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非常艰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每个人增加一美元的收入,就需要 10 亿美元。尽管 30 年来,我们建立了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初步基础,但毕竟底子薄,管理水平也低。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科学、教育方面的损失很大,耽误了一代人,缺乏人才。这就是现实。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定得太高了办不到。<sup>③</sup>

1980 年 9 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董事代表团时,进一步降低了预期,提出了翻两番的目标。他一方面强调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是坚定的,也是有信心的;同时指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争取 20 年翻两番,到 20 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800~1 000 美元,进入小康社会。<sup>④</sup>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37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631~63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644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670~671 页。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时指出: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1000美元还是高了一点,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我们把20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800美元的水平上。<sup>①</sup>

1982年9月,十二大报告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

#### 4. 重视人口问题

在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现代化基本衡量标准的情况下,要更快地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有效控制人口增长速度。邓小平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

1980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拉斐尔·萨拉斯一行时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是想多生孩子,我们的人口问题现在已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每年增加的人口把我们增加的生产抵消了很多。我们制定了控制人口的计划,争取到20世纪末不超过12亿。这个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的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sup>②</sup>

1981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最高领导人拉斐尔·卡尔德拉时指出:我们正在控制人口的增长,我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在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如果每年人口增长2%,不仅会新增加2000万人口的就业压力,而且建设成果也会因此抵消。控制人口增长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是一件比实现四个现代化更难办的事情。<sup>③</sup>

1981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把计划生育问题当作一个战略问题,试图在较短的时期内使人口年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五至六,争取在20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否则经济的增长就会被人口的增长抵消。我们有些地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836~83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7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729~730页。

的经验证明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sup>①</sup>

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尽管作了很多努力,在我国控制人口增长仍然非常难。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在1%以上。从1986年到1990年,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更是高达1.4%以上。全国人口总数在1995年就提前突破12亿,从1978年的9.5809亿增加到了12.1121亿,净增2.5312亿。这种人口高速增长趋势在1995年才开始扭转,随后逐年降低,从1995年的1.055%降至2003年的0.601%和2004年的0.587%,1999年全国总人口为12.5909亿,比预期目标多了近6000万人。<sup>②</sup>

#### 5. 确立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虽然“小康之家”和翻两番设定了到20世纪末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但邓小平对此并不满足,他认为实现这个目标还不足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考虑如何确保实现翻两番的同时,他坚持认为,要证明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放弃瞄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标准,就必须参照这些更高的标准,努力使社会主义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既然实践已经表明中国在20世纪末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他就把目光放得更远,开始积极规划设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远景目标。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指出: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达到小康水平。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sup>③</sup>

1984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把实现翻两番的进程细分为前10年和后10年两步,指出:前10年主要是为后10年的更快发展做能源、交通、原材料、智力四个方面的准备。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747页。

② 数据来源: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417页。

际资金的合作。<sup>①</sup>

1987年4月,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阿方索·格拉一行时,阐述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更重要的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sup>②</sup>

1987年5月,邓小平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时指出:我们制定的政策是搞70年的政策。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实现现代化要70年时间,即本世纪20年、下个世纪50年。到了下个世纪50年代实现第三步目标,就可以说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搞对了。<sup>③</sup>

1987年10月,十三大报告阐明了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至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远景目标基本设定。

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4545.6亿元,198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2050.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199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9810.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提前5年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199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0142.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2001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591元,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价计算,折算为1023美元,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3~54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83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86页。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了1 000美元大关。<sup>①</sup>在此基础上,2002年11月,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在21世纪头20年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不仅强调要使经济更加发展,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而且提出了要使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等一系列要求,标志着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知涵盖了经济、政治、科教、文化、社会、民生在内的更为宽广的综合视角。(按: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方法自1992年起改为国内生产总值,本文为叙述方便,仍用原方法。)

### 第三节 领导组织路线拨乱反正， 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常青常新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但如果能坚持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确立的正确组织路线,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持任人唯贤,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干部,那么就应该能继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能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能及时及早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政治路线。

然而,实际情况是,在这一时期,党的组织路线逐渐遭到破坏。毛泽东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逐渐背离了他原来的正确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如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他接触实际少了,个人专断作风逐步发展,严重损害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直至犯下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组织路线受到严重破坏。林彪、“四人帮”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实行以派性为标准的组织路线,挑起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分裂各族人民的派性斗争,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他们只讲派性不讲党性,火箭式地提拔与自己沆瀣一气的人担当要职。他们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宣传天才决定论,把革命领袖当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每句话都是真理、都要永远照办的神。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鼓吹“知识愈多愈反动”的奇谈怪论,任意破坏历史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如果继续坚持这样的组织路线,只能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背道而驰。

要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常青常新,就必须对组织路线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和健全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恢复和发展群众路线,并以党性为标准,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德才兼备的各级领导人才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各类建设人才,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担负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

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直接涉及到领导权力格局的再分配,因此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比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面临的阻力更大。邓小平以对党对社会主义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坚定地领导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 一 倡导恢复和健全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制原则

实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是希望在民主与集中之间达到一种双赢的平衡状态,但实际上这种理想状态非常难以达到。民主与集中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往往是民主多了,集中就少了;集中多了,民主又少了。邓小平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

在实行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制原则方面做得很好,他非常希望能够恢复到那种状态。但由于后来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制原则长期遭到严重破坏,要恢复起来非常难。即便是邓小平自己,也常常不得不在民主与集中之间走政策钢丝。从1977年到1979年,针对当时民主太少的弊端,邓小平把重点放在强调民主方面。这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影响到了集中,因此1980年初邓小平又强调民主是有条件的,不能破坏集中。当集中太多了时,1980年8月邓小平又大力倡导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随后一时之间民主又太多了,于是1980年12月他又开始强调集中。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要恢复和健全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制原则,仅仅依靠政策是不够的,必须有行之有效、具备约束力的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整套操作制度。而且,为了避免这种制度成为摆设,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必须自觉地身体力行,并且有能力、有魄力自上而下地予以推行。

### 1. 力倡民主

1977年7月,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回顾了毛泽东1957年提出的“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目标,提出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他同时倡导学习毛泽东在党的建设领域中的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充分发扬民主等思想。<sup>①</sup>8月,邓小平在十一大致闭幕词时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sup>②</sup>10月,邓小平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教授及夫人时指出:我们的很多制度都要恢复起来,但中心问题还是党内的集体领导。<sup>③</sup>1980年4月,邓小平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时指出:我们强调集体领导,是鉴于国际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4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8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22页。

验。集体领导并不排除某一个主要领导人的特殊作用。<sup>①</sup>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sup>②</sup>随后,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邓小平的讲话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1979年3月,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访华时,就民主集中制问题与邓小平交换了意见,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过去一个时期,发扬民主确实不够,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因此在一个时期内,要着重强调发扬民主这一面。这方面也会出现问题,而且已经有些问题,这是预料到的,并不奇怪。我们不能因为出现这些问题就不发扬民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加强法制,做广泛的教育工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法制是不行的。<sup>③</sup>

1979年5月,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访华时,询问邓小平是否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18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146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6页。

考虑在中国实行“自由化”，邓小平回答：我们从来不提“自由化”。我们从来都提民主集中制，现在这样提，以后也是这样提。过去民主缺乏，民主不够，以后要着重发扬民主，因为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很好的集中，但不能搞无政府主义。民主集中制和发扬民主不矛盾。我们现在需要安定团结，把大家团结起来，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我们要发扬民主，也要加强法制。<sup>①</sup>

1979年6月，邓小平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党内负责人会议上谈到民主与法制问题时强调：我们制定法律的步伐要加快。确实要搞法制，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遵守法制。以后，党委领导的作用第一条就是应该保证法律生效、有效。没有立法以前，只能按政策办事；法立了以后，坚决按法律办事。<sup>②</sup>

## 2. 强调集中

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党内的民主和纪律都是必要的。民主比民主集中制含义更广泛，但民主是有条件的，不能破坏集中。党在和平时期执行民主集中制，说起来容易，搞得不好也会发生各种问题。不让党员讲意见不对，但讲了意见后还要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他强调：要加强党的组织领导，搞好民主集中制，处理好党政、党群以及党和其他组织的关系。<sup>③</sup>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期，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他强调了集体领导、集体接班问题，同时指出必须把分工负责的制度建立起来。他建议中央和国务院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

## 3. 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1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27～52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95～596页。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弊端,大力强调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指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他严厉批评了家长制作风,指出: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他强调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集体领导也要有个头,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对日常工作要负起第一位的责任。在党委的其他成员中,都要强调个人分工负责。要提倡领导干部勇于负责,这同改变个人专断制度是两回事,不能混淆。<sup>①</sup>

邓小平这次讲话被国内外普遍视为“放”的信号,国内民主气氛变得空前活跃,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受到冲击。一些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积极串连,公开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散发反动传单,传播政治谣言。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341页。

制度的方针的同时,特别指出“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sup>①</sup>。

#### 4. 正确认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非常注意把自己放在集体领导的范围内,自觉维护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1981年11月13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是有些新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当然,也不否认个人的作用,比如说我个人在里面起了我自己应该起的作用。许多具体政策、具体问题,有的是这个同志提出的,有的是那个同志提出的,并不都是我一个人提出的。可以这样说,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最后是集体决定的。我们也有一条经验,个人干预问题过多并不好。<sup>②</sup>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时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10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

1989年6月,政治风波平息之后,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分析了领导集体与核心的关系,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他希望第三代领导集体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他认为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9~360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84页。

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他强调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我们党和国家历来的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具体解释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我们讲得太少。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sup>①</sup>

1992年10月,十四大报告在评价邓小平时,充分尊重了邓小平的意见,采用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提法,指出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同时指出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报告还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并就如何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了一些构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宪法规定的一项根本制度。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实行党的生活会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维护大局、加强团结的模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只有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和有效实施,增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顺利前进。

## 二 倡导恢复群众路线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初,根据当时党内、科学、教育、军队等工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0~1351页。

作方面普遍存在的脱离群众、不容乐观的状况,在多个场合积极倡导恢复群众路线。他深知发扬民主是走群众路线的基础,因此他在倡导恢复群众路线的同时,经常强调要发扬民主。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针对当时学风方面普遍存在的一言堂、压制讨论等不良状况,着重指出: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他要求各级党委领导机关少发文件,多到下面跑跑。<sup>①</sup>8月18日,邓小平在十一大致闭幕词,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sup>②</sup>8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提出:要恢复军队的传统作风,即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群众路线的作风。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是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所必需的。这是科学研究机构党委实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sup>③</sup>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办什么事也得走群众路线。人民内部要有充分的民主,这样才能拿出好的主意来。<sup>④</sup>

1978年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之后,邓小平主要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条政治路线的要求来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sup>⑤</sup>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谈及当时针对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7~5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8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6~11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



经济比例失调进行的涉及面很广的调整工作遇到的不利形势时,指出: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大大小小的乱子,使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sup>①</sup> 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要培养、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要使他们懂得,不只是年轻就能解决问题,不只是有了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是最根本的一条。<sup>②</sup>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sup>③</sup>

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并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会变得毫无意义。邓小平不仅积极倡导而且积极实践群众路线,前文所述的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深刻认知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 三 确立领导干部选拔标准,推动领导干部年轻化

2007年,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领导干部选拔标准的基本规定是: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一领导干部选拔标准是在1982年十二大通过的《中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8页。

共产党章程》中最早提出的。邓小平在确立这一标准特别是推动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主政初期,平反了许多冤案、假案、错案,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同志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或担任相当原来职务的工作,但紧接着凸现出来的问题就是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年龄偏大,精力不济,难以胜任繁忙的工作。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了干部队伍老化的严重状况,认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推动领导干部年轻化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大问题,是组织路线方面最迫切的问题。但当时不少老干部不愿意退休,阻力很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率先垂范,克服重重阻力,成功领导废止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起了领导干部退休制度。

其实,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已经认识到领导干部必须年轻化。1975年1月,“四人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夺权失败,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工作,遭到“四人帮”的嫉恨。邓小平时年71岁,而“四人帮”中最年轻的王洪文仅40岁,他仗着年龄优势,公然叫嚣“十年后再看”。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邓小平,他跟李先念等人谈论此事,迫切感到“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sup>①</sup>。

#### 1. 倡导重视接班人问题,初步提出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解决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问题之后,组织路线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在1979年9月底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为了推动领导干部年轻化进程,邓小平就组织路线和接班人问题集中发表了一系列讲话。

1979年7月21日,邓小平指出:大问题是接班问题,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要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不能论资排辈。<sup>②</sup>7月28日,邓小平明确指出: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选择培养接班人,这是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最大的问题、组织路线第一位的问题。人才要放到领导位置上,不然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0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36~537页。

锻炼不出来。思想要解放,把庙腾出来,选年轻的。<sup>①</sup>7月29日,邓小平指出:组织路线最大的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要趁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了选干部的两条主要标准: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sup>②</sup>8月9日,邓小平指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要提到自觉的高度。要真正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选不准还可以换嘛。这是百年大计,是基本建设。<sup>③</sup>

1979年9月25~28日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的成果主要体现在9月29日叶剑英的国庆讲话中,他代表中央提出了选拔领导干部的三条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sup>④</sup>

## 2. 积极做老干部的思想工作,提出选拔领导干部的“四化”标准

十一届四中全会后,为了推动贯彻落实全会的要求,加速领导干部年轻化进程,邓小平积极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动员工作,逐步提出了选拔领导干部的“四化”标准。

1979年11月,他强调老干部第一位的责任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任何一个老同志和高级干部,合乎不合乎党员标准和干部标准,就看他能不能认真选好合格的接班人。他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并说:“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sup>⑤</sup>。三个多月后,1980年2月23~29日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该草案对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废止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39~54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40~54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44~545页。

④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1~227页。

织上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他提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sup>①</sup>为了推动建立干部退休制度,邓小平决定先从自己做起。1980年9月10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带领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共同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老干部要把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作为第一位的、庄严的职责。这项工作做不好,就要犯历史性的的大错误。这项工作做好了,我们的事业完全有把握继续下去,我们的老干部就再一次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初步提出了干部的“四化”标准,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革命化)的前提下,使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sup>②</sup>

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省、直辖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对未来10年的干部交接班问题提出了初步设想,认为前五年主要是培养接班人,后五年是确定各级干部的退休年龄,推动干部到了年龄就退休。<sup>③</sup>

1981年7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时正式谈到了干部的“四化”标准,指出要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sup>④</sup>

### 3. 推动机构精简,带头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度

1982年初,干部制度改革工作从思想动员阶段进入自上而下大规模实施阶段。当时计划用两年时间,在机关精简四五百万干部,其中中央一级要精简三分之一。对这个计划,国内外普遍不看好,认为困难很多,很难成功。邓小平也预计精简中有可能发生示威游行、贴大字报等问题,但他认定:“没有别的选择,这件事不能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331、33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0、36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4~38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60~761页。

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sup>①</sup>。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他强调搞精简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进和出,进摆在第一位,要选贤任能,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sup>②</sup>

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会见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指出:干部老化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差不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算是第一个试验。<sup>③</sup>

从邓小平关于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历次讲话来看,他一贯的思想就是认为年轻化是唯一的出路。1986年10月24日,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日方客人指出年轻人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问他对此有没有担心,他一如既往地指出:年轻人思想开放,最支持改革。他们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干部要年轻化,否则没有出路。<sup>④</sup>

总体来看,尽管邓小平多次呼吁,甚至带头辞去一些职务,但全党的干部年轻化进程进展仍然十分缓慢,邓小平对此很不满意,他决心继续从自己做起。10月30日,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谈话,共同约定在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不仅不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11月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到了领导层干部年轻化的时间表,即1987年十三大前进一步,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sup>⑤</sup> 10月20日,在十二届七中全会上,针对许多代表“小平不能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97~79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6~40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0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48~1149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52~1153页。

退”的呼声,邓小平多次给予答复和解释,表示他不退不行。最终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经过议论和研究,提出了让邓小平半退的妥协办法,即先退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全退。11月2日,十三届一中全会规定邓小平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只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与此同时,陈云、李先念也实行了半退。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商量自己退休的问题,认为自己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希望把退休时间定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退的方式越简单越好。他审时度势,提出十四大以后不搞顾问委员会,就搞退休制度,这比最初的时间表提前了5年。<sup>①</sup>同一天他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郑重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1月9日,十三届五中全会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的辞职信,统一了认识,同意了他的请求。1990年3月20日至4月4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992年10月,十四大高度赞扬邓小平等老同志为废止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保证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后继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 第四节 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领导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及时总结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积极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领导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5~316页。

## 一 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中,“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一直是一个基本命题。但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有哪些区别、社会主义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优越性等问题上,却有针锋相对、截然相反的观点。“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大力鼓吹“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宁要没有文化的社会主义,不要有文化的资本主义”等荒诞观念。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全国上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认识相当混乱,广东省甚至出现了“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是资本主义”这样的错误规定。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成为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是造成贫穷落后局面的重要思想根源。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澄清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从理论上阐释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有哪些区别,社会主义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优越性,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科学的解答。邓小平在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总结了多年的探索和思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①</sup>这是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精辟回答。

(1)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过程中,对建国后30年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了很多思考,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为深刻。1977年,全国钢产量只有2300万吨,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2.8亿吨,在邓小平看来,这些低水平的经济指标根本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0年4月到5月,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主义”。他批判了“四人帮”“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说法，认为其本质是“社会主义就是穷的”，而这“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他认为，不能“空讲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他指出，建国30年期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而“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sup>①</sup>

(2) 社会主义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长期被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对此十分反对。1978年3月，他指出，“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分配时“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要“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总的目的是“鼓励大家上进”。他主张，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作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他指出，各行各业都要实行考核制度，而且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经常的。职工提级要根据考核的成绩，合格的就提，而且允许跳级，不合格的就不提。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于干得好的、干得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sup>②</sup>

第三，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在改革开放历程中，随着开放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国内外时常有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31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1~102页。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矛盾提出疑问。邓小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也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认为,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就能保证在改革开放中继续坚持社会主义。1978年10月,在回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这一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sup>①</sup>1979年3月,他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sup>②</sup>1980年8月,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关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的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sup>③</sup>1984年10月,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指出:“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sup>④</sup>1985年8月,他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4~35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91页。

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sup>①</sup>10月,他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进一步指出:“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sup>②</sup>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驳斥了一些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说法,指出那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他认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鼓励大家多搞点‘三资’企业。”<sup>③</sup>

(4)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看来,“穷的社会主义”是无稽之谈,他1979年7月在青岛明确指出要“搞富的社会主义”。不过,他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人口众多,全国人民的收入不可能同步增加,因此改革开放之初,他多次倡导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认为这样一方面可以把其余地区、其余人激励和带动起来,另一方面“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sup>④</sup>。针对这种不平衡政策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问题,他多次强调要共同富裕,不能搞两极分化。1985年3月,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sup>⑤</sup>5月,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13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37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5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

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sup>①</sup>8月,他指出在改革过程中“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并强调“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sup>②</sup>

## 二 探索和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方位覆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的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的艰辛可以想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不畏艰辛,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实践中,科学回答了怎样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 1.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全党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工作中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他深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兴旺发达。

但是,从国际上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初,受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美国和苏联对中国当时的发展状况与发展前景都存在错误的看法。例如,美国媒体和政界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落后,中国无足轻重,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认为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中国就可以暂时“吞下”像台湾地区那样的问题;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sup>③</sup>而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3月24日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的长篇讲话虽然被视为中苏关系解冻的早期信号,明确承认了中国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但同时又攻击中国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存在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与准则的观点。从我们国内来看,情况也不容乐观。在推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经济领域出现了严重犯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5~378页。

罪活动,而一些青年人似乎失去了理想,觉得什么都是西方的好。

邓小平坚信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同时认为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为了向党内外、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邓小平在1982年9月1日致十二大开幕词时郑重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号召中国人民:要“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他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sup>①</sup>

十二大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六大以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高举的一面伟大旗帜。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总结性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sup>②</sup>

## 2. “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认为,要证明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大力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长期错误批判,致使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滋生了大量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我国社会生产力的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sup>②</sup>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发展速度大大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实行改革,不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被葬送。<sup>①</sup>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坚信:“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sup>②</sup>，“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sup>③</sup>。不管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他都始终如一地倡导改革、支持改革,为开创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 领导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第三次复出之后,邓小平首先在自己分管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中大力推进各项改革。复出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在1977年8月4~8日主持召开了为期五天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仔细听取了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就新中国成立后17年全国教育战线工作的估计、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科研和教育体制与机构、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后勤工作和学风等问题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国务院决定从1977年起对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宣布要对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进行重大改革,内容包括: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直辖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理直气壮地把文化考试作为择优录取的主要依据之一等。<sup>④</sup>由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在实际上已被废止。社论见报后,人们奔走相告,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形成了多年没有的读书高潮。1977年底,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了高校招生考试,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27.3万名学生,新生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高度肯定了高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

④ 《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1日。

校招生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提出要“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并满怀热情地宣告“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sup>①</sup>

(2) 力倡“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978年10月,邓小平在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sup>②</sup> 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认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认为“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sup>③</sup>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向党内外正式宣告要“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受长期“左”的思想和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经济工作中失误所造成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现象日益严重。为此,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改革”主要是指改革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同月,国家经委决定在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这是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150、152页。

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的中心工作”。9月末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

(3) 支持农村包产到户。从改革的具体进程来看,农村改革是我国改革的突破口。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由于长期受到严重破坏,整体十分薄弱,全国粮食产量有限,长期突破不了3亿吨大关,无法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社会能否保持安定,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否发展,农民生活能否好起来。有鉴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提出必须集中主要精力尽快把农业搞上去,要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并决定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在草案讨论试行过程中,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农村能否实行包产到户,对此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观望。在中央领导人中,邓小平最早支持包产到户。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他明确支持万里在安徽搞包产到户,鼓励万里不要争论,实事求是干下去。<sup>①</sup>半年后,在1980年初国家农委召开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安徽省代表介绍了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好处。5月,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农村政策问题时,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指出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sup>②</sup>9月底,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会议纪要,同意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认为这是联系群众、发展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3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

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随着包产到户政策在全国的推广,全国粮食总产量快速提高,从1980年的31 822万吨迅速增至1984年的40 712万吨。

(4) 推进城市改革。农村改革的成功,为进一步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虽然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但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远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城市经济中普遍存在吃“大锅饭”的现象,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不高,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的种种损失和浪费都很严重,城市经济的巨大潜力远未挖掘出来,加快改革已成为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当时一些西方国家政要认为中国城市改革步伐太慢,经济效益提高不显著。显然,寻找城市改革的突破口已成为当务之急。

1983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指出,农村的责任制可以用到城市,但基本经验还是要城市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积累,同时要开始进行一些试点。1984年初,邓小平专门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经济特区,欣喜地发现办特区的路子走对了。2月24日,邓小平明确提出要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允许它们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广州、大连、宁波、温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5月中下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定加快城市改革的步子,从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入手,把各项改革措施初步配起套来,同步进行。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划了全面改革蓝图,要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



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一“决定”,认为它体现了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sup>①</sup>

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多个场合乐观地谈到中国改革的前景。他看到了城市改革相对于农村改革的复杂性,预见到会出现一些差错,但认为这影响不了大局,城市改革一定能成功。他认为农村改革三年见效,城市改革也能在三年至五年内看到显著的变化。他充满豪情地“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sup>②</sup>。但随着城市改革的快速推进,1984年末出现了电力供应和交通运输紧张、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货币发行过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等问题,国际上有人对此看得比较严重,猜测我国改革会因此而停止。中国的改革开放会由此而停止吗?对此,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强调我国的改革政策不可逆转。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强调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改革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同时,他也指出,改革是有风险的事,改革涉及到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sup>③</sup>6月,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sup>④</sup>7月,邓小平在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改革的意义在于为下一个10年和下世纪的前50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改革必须坚决干下去。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sup>⑤</sup>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唯一的道路。”<sup>⑥</sup>后来,虽然出现了1986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8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1~132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94页。

年末的学潮、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但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成功排除了干扰，改革事业继续前进。而且，邓小平早在1990年末就已睿智地指出：“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sup>①</sup>。这一论断已被实践所一再证明。

(5) 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的改革，城市改革不单涉及到经济领域，而且涉及到文化、科技、教育、政治等领域。其中，政治体制方面长期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等问题，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邓小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但他同时坚持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绝对不能损害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曾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但这项改革当时因多种原因而没有具体地实行。1986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时明确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权力下放。<sup>②</sup>6月，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sup>③</sup>11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有三个目标，即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sup>④</sup>

1986年末，合肥、北京等地发生了学潮。对学潮的分析和思考，促使邓小平在1987年3月提出了评价一国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的三条标准：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sup>⑤</sup>6月，他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17～111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16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18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

调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sup>①</sup> 8月,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共产党的领导丢不得。<sup>②</sup>

1987年10月,十三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最终要用“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这些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来检验改革的成效;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决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所谓“大民主”。报告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报告强调:“各项改革都要注重试验,鼓励探索,注意找到切实的过渡措施和办法,做到循序渐进。各地条件和情况不同,改革不能‘一刀切’”。

十三大带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宽松氛围,但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使社会局势发生了动荡,稳定成为我国当时压倒一切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再次放慢。1989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一方面肯定“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一方面强调“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国家必须保持稳定”。<sup>③</sup> 6月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24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285页。

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sup>①</sup>。6月16日,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sup>②</sup>。199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强调:“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sup>③</sup>。

(6)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改革开放历程中,邓小平始终十分注意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但国内外仍时常会就改革开放姓“资”还是姓“社”这一问题引起争论。1985年间,国际上对中国经济改革前景出现了两种评论,一种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一种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邓小平对此予以回应,肯定地表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强调,改革是革命性的变革,改革的目的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的好的政策。<sup>④</sup>28日,他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强调,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改革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要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sup>⑤</sup>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在改革中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1987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得时,自我评价是“实事求是派”,强调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两个相互依存的基本点:一是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二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sup>⑥</sup>10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135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139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249页。

是属于人民的”，“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sup>①</sup> 1988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sup>②</sup> 1989年9月，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sup>③</sup>

1992年初，针对当时有人说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改革开放趋于停止、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局面，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明确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姓“资”还是姓“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sup>④</sup>。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由此踏上了新的征程。五年后，十五大高度评价邓小平南方谈话，称它“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 3.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善于吸收借鉴国外各种先进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3～25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26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83页。

成果和经验。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严重歪曲毛泽东关于自力更生的指示，把引进世界上的任何先进成果和经验都谴责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其结果是使我国与世界隔绝，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邓小平深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sup>①</sup>，他认为：“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sup>②</sup> 他始终坚定不移地倡导和支持对外开放。

(1) 科技领域对外开放。有鉴于科学技术方面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非常明显，在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一方面指出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一方面强调“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指出“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实践证明，开放政策使我国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

(2) 开放对外旅游。旅游业对外开放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外汇不足问题。1977年8月，十一大重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之后，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大中型技术设备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但首先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外汇不足，缺乏支付能力。这时，有位华侨提出，中国把旅游事业搞好，随便就能挣二三十亿外汇。<sup>③</sup> 经过几个月的慎重考虑，邓小平认为开放对外旅游不仅能赚外汇，而且能为返城知识青年提供很多就业机会，他在1978年4月指出“旅游业可以大大发展，算是一个新行业”<sup>④</sup>。5月，他同意了外交部和国家旅游总局等部门提交的《关于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请示》报告。此后，我国对外旅游业开始快速发展。1978年10月，邓小平提出旅游业要力争在20世纪末达到年创汇50亿美元的目标。<sup>⑤</sup>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8~40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36~13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3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03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98页。

数据显示,我国 1999 年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达到了 141 亿美元,2007 年更是高达 419 亿美元。

(3) 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邓小平开始只考虑一般性地加强国际经济贸易和经济往来,后来因外汇支付能力的限制、国外人士的建议、亚洲“四小龙”发展经验的启发等原因,才进而考虑引进外资、搞合资经营、外商直接投资等对外经济合作方式。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对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和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提出的“中国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这一建议,给予了肯定。11 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期间,注意到新加坡国民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积极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经济合作,注意同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sup>①</sup>。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1979 年 1 月,邓小平在同胡厥文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指出:“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sup>②</sup>1979 年 7 月,他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谈到对外经济合作问题时进一步指出: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合资经营风险是双方承担;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sup>③</sup>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陆续成立了不少中外合资企业,但直到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三资”企业在我国才真正快速发展起来。

(4) 先后提议试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 14 个港口城市。在 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赞同习仲勋和杨尚昆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地区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2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56~157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532~533 页。

意见,希望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并认为叫“特区”比叫出口加工区要好。根据他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这个意见。7月15日,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1984年初,为了寻找城市改革的突破口,邓小平专门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先后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sup>①</sup>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很快就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步伐。

(5) 利用国外智力。1983年7月,邓小平同万里等谈话时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过去我们是宴会多,客气多,向人家请教少,让他们帮助工作少,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工作的。”<sup>②</sup>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9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成立。其后,引智规模不断扩大,交流渠道不断拓展,引智领域不断拓宽,引智地域日益宽广,引智主体日益多元化,引智管理职能不断创新,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海外人才和智力保障。

(6) 推动开发开放浦东。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9月,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搞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要搞几个大项目,表示我们的信心”。<sup>③</sup>1990年2月,邓小平同朱镕基谈话,赞成上海开发浦东,认为上海条件比广东好,起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54~95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8~321页。



点可以高一点。<sup>①</sup>3月初,他强调“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sup>②</sup>,后来他在南方谈话中还提到“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sup>③</sup>。4月,李鹏在上海正式宣布中央同意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时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指出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他还指出,不要因为“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而害怕其发展。<sup>④</sup>实践证明,开发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7) 对所有国家开放。对于对外开放政策比较常见的一个误解,就是以为仅仅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1984年11月,邓小平指出:“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力嘛。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sup>⑤</sup>1987年6月,邓小平再次强调:“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sup>⑥</sup>。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局势动荡不已,1990年3月,邓小平特意强调:“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sup>⑦</sup>

(8) 注意克服对外开放中的风险。对外开放过程中存在的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0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8~99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要风险,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能对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构成严重威胁。1978年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询问邓小平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邓小平在回答时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sup>①</sup>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回答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的提问时指出:“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sup>②</sup>1980年8月,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敏锐地提出:“四个现代化将使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样不可避免地引起私人投资问题。这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对这样一个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是“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同时指出“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sup>③</sup>12月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sup>④</sup>。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被侵蚀,以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都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犯罪活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时泛滥。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了打击犯罪活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行动的长期性,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sup>⑤</sup>

#### 4.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经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2~13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23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35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4~37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379页。

非常明显。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成为禁区，经济上极度缺乏民主，从生产、流通、分配到消费，从宏观政策到微观决策，政府“看得见的手”对经济领域的掌控无处不在。企业失去了流通和分配方面的自主权，失去了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方面的决策权，成为单纯的“生产车间”。在农村，农民和生产队都没有经营自主权，不能自主决定种什么、种多少，养什么、养多少，其结果就是等、靠、要成风，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越来越少，贫穷落后成为普遍现象。相对于计划经济的“有形之手”，市场经济用“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让市场供求关系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微观经济主体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和自负盈亏的义务，必然会想方设法谋发展，其结果就是能充分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使经济充满活力。当然，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发展历程也表明，如果从根本上排斥政府的规制作用，完全对市场放任自由，也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现代政府必须善于综合利用计划（规划）和市场这两种经济手段。

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排斥市场作用所带来的种种弊病，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他领导下，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经济体制中引入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因素，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同时，他也看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能够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他希望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增强经济活力的同时，能继续保持这一优势。

从1964年开始，我国曾多次兴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但农业并未因此而摆脱落后局面。13年后，在1977年11月召开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上，围绕着我国农业是否要继续开展“学大寨”运动，突击搞“穷过渡”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978年9月，邓小平在长春指出“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认为“取消集贸市场”、“自留地完全取消”和“小自由完全没有了”都不能学，强调“全国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sup>①</sup>邓小平这次讲话肯定了集贸市场的作用。12月，邓小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8页。

平亲笔拟出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提纲,其中提到:“国内市场很重要”,“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sup>①</sup>这意味着邓小平对市场 and 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持认可态度。

从国际上来看,1979年我国与一些西方企业进行合资谈判时,它们全都提出合资公司的产品要以在中国市场销售为主。由于对市场机制的长期极度排斥,我国当时经济形势相当困窘,政府财政吃紧,企业没什么盈余,人民群众也没什么积蓄,国内市场容量十分有限的现实成为合资谈判的重要障碍。作为对外经济合作的倡导者,邓小平对市场作用的认识由此而更为深刻。当时,天津在引入市场因素方面起步较早,1979年8月邓小平视察天津时就提出“生产要根据市场的需要”,并建议“天津的市场要面向全国,而不是光面向全市。要打开商品的销路,可以发广告,全国订货嘛”。<sup>②</sup>

1978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时,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sup>③</sup>在1980年1月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等主张。<sup>④</sup>5月,他就姚依林谈到的生产资料应同生活资料一样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从根本上改变物资管理办法的问题时指出:“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势在必行”<sup>⑤</sup>。

但在经济建设的具体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利益诉求上存在差异,导致“计划指导”和“市场调节”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5~44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44~54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92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36页。

常发生冲突。1982年7月,邓小平深有感触地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指出:“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sup>①</sup>对于这一问题,一个多月后召开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即认为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市场调节部分不作计划的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后者作为前者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这个方针为市场开了一个小口,但仍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从全国来看,苏州农村在80年代初发展迅速,1982年末已有不少社、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800美元,提前17年实现了邓小平在1982年6月提出的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的目标。1983年2月,邓小平特意赴苏州视察,得知苏州社队企业是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得到快速成长和发展时指出:“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sup>②</sup>。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十二大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决定”对我国计划体制的基本点作了概括,认为我国总体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决定”区分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认为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两者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决定”提出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决定”还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等主张。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一“决定”,认为它写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1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86~887页。

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初稿。<sup>①</sup>

在推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现象。1985年10月,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问邓小平:“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邓小平的回答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他强调,这样做没有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sup>②</sup>

虽然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商品经济”写入了中央文件,但一些党内高层人士并不接受这一提法,他们坚持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以致影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1987年2月,邓小平和中央负责人谈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等问题时明确提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sup>③</sup>10月,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报告认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计划工作必须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不能把计划调节和指令性计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

划等同起来。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应当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应当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1988年通货膨胀和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一些人指责这是“市场取向改革”的结果,主张恢复“计划取向”。一时之间,“市场”又成为禁区,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为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邓小平多次发表讲话。1989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提出: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他强调:“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sup>①</sup>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提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sup>②</sup>1991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鼓励上海“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sup>③</sup>在邓小平的努力特别是南方谈话的直接推动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30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着手实施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大工程。

#### 5.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生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显著。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倒行逆施,残酷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致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1977年的时候,这个差距是20年。从科研人员数量来看,当时美国有120万,苏联有90万,我国仅有20多万,其中还包括很多老弱病残人员,很多科研机构都没有25岁到35岁的人,科研队伍后继乏人。邓小平一贯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自称为科学技术部门的“后勤部长”<sup>①</sup>,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1977年间,邓小平多次谈到科技发展问题。他强调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sup>②</sup>,“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sup>③</sup>。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sup>④</sup>上,我国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应该“先学,学得好,才能赶超”<sup>⑤</sup>,“要以现代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老老实实地、虚心地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学习中创新”<sup>⑥</sup>。他重视调动和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提出“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sup>⑦</sup>,要消灭“束缚科学发展的紧箍咒”,要鼓动科技人员“敢想、敢研究,给他们创造条件,鼓励创新”<sup>⑧</sup>。他注意到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科研比重很大,希望我国科研机构和企业对科技工作“想得远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6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00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84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06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60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77页。



些,看得宽一些”,既“要派人出去学习”,也“要请人来讲学”<sup>①</sup>。

1978年3月18日到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讨论并通过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邓小平在开幕式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他认为“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要求“在努力提高现有科学技术队伍的水平,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的同时,大力培养新的科学技术人才”。他提出,要科学地组织管理和领导科技事业,要在研究所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sup>②</sup>

邓小平对科技事业与教育事业的密切关系有深刻的认知。1978年4月,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指出: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sup>③</sup> 1987年11月,他指出:“我们的发展战略规划,第一位是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sup>④</sup>。

随着科学技术工作的推进,邓小平认识到如何加强科技队伍的管理和人才培养与使用,是一个大问题。他认为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他提出,要考虑怎样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要想办法打破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sup>⑤</sup> 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使新的经济体制有利于技术进步,使新的科技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sup>⑥</sup>

发展科学技术需要政府的财力支持,由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8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10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17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60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7~109页。

政府财政状况整体窘迫,因此虽然中央在战略上非常重视科技工作,但实际上对科技工作的财力投入极其有限,这严重制约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国外来看,1985年美国开始立项实施“星球大战”计划,欧洲开始实施“尤里卡”计划,高科技发展态势咄咄逼人。1986年3月,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以“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为题致信邓小平和胡耀邦,恳切地指出: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应该不甘落后,要从现在就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而不能等到10年、15年经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否则就会贻误时机,以后永远翻不了身。<sup>①</sup>邓小平对此高度重视,亲自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要求“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sup>②</sup>10月,邓小平指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sup>③</sup>经过广泛论证,中央于11月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邓小平善于从战略高度看待科学技术问题。1988年9月,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强调“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要求中央负责人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注意加强科技方面的投入。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脑体倒挂”、知识分子待遇偏低的现象,邓小平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使他们感到有希望”。<sup>④</sup>10月,他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强调:“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

①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713.htm>。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0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3~18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

席之地”，“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sup>①</sup>同月，他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指出：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sup>②</sup>

十四大以来，中央决策层高度重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1992年十四大报告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1997年十五大报告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2002年十六大报告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深化了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在2006年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

#### 6.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一直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邓小平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所作的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并且运用这一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一国两制”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1978年7月到8月，中国和日本进行了艰苦的缔约谈判；同年7月到12月，中国和美国进行了艰苦的建交谈判。无论是中日缔约谈判还是中美建交谈判，台湾问题都是必谈的问题。邓小平积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28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54页。

极探求妥善解决台湾问题的合理方式,萌生了“一国两制”的构想。7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指出“中国人之间自己会找到一个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其中包括在解决方式上尊重台湾的现实。”<sup>①</sup>10月,邓小平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重申“如果台湾回归中国,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中国将正视美国和日本在台湾有大量投资的现实。<sup>②</sup>11月,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他明确提到“根据现实情况”,祖国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sup>③</sup>。1979年1月,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他承诺“如果台湾人民感到它的现行制度要保持一百年,也可以”<sup>④</sup>。

英国政府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英国想在新界租期于1997年6月30日到期后继续维持在香港的统治,于是决定试探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传达了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政府接触、了解中国政府对确定1997年后香港地位的态度信息。邓小平会见麦理浩时提出了更为清晰的关于“一国两制”的设想,即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中国政府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同时他还强调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不能讨论。<sup>⑤</sup>

两年后,1981年4月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彼得·亚历山大·鲁伯特·卡林顿一行访华时询问中国将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邓小平的回答是:香港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sup>⑥</sup>9月,叶剑英宣布了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38~33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9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2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67~46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00~501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29页。

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sup>①</sup> 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这9条方针政策公布后,在国际上得到了良好反响。

1982年4月,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访华时询问邓小平对处理香港问题的考虑,邓小平再次重申“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强调如果中国1997年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他承诺会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各种制度不变,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sup>②</sup> 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一是“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二是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繁荣问题,进行友好磋商。三是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在未来的15年内不出现大的波动。<sup>③</sup>

从1983年7月到1984年9月,中英间先后举行了22次会谈,最终形成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3个附件。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邓小平总是在关键时刻作出重要指示,直接推动了最后协议的达成。1984年5月,邓小平强调:“我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sup>④</sup>。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明确提出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他强调“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提出“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他指出,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标准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7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12~81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1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78页。

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求爱国者“爱祖国，爱香港”，不要求他们“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sup>①</sup>7月，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一方面强调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不会改变”，一方面承诺保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sup>②</sup>

“一国两制”的构想从萌生到成熟，在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建交、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香港、1999年澳门成功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的具体实践日益丰富，证明了这一构想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毫无疑问，继续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也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 三 领导创立邓小平理论

在邓小平看来，理论问题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重要问题。在他领导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改革开放举措出台前后，总是伴随着理论上的激烈争论。虽然邓小平认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主张“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sup>③</sup>但争论几乎总是无法避免。其实，正是在不断的争论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积极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勇于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禁区，大胆进行理论创新，高度重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对新的理论命题进行检验和探索，成功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创立过程中，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是三个关键节点。

#### 1. 十三大报告勾勒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

1987年10月，十三大报告对邓小平率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6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所作的探索和回答,作了理论总结,勾勒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其中包括一系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科学理论观点,主要是: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十三大报告认为,这些观点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科学轨道。<sup>①</sup>

## 2. 十四大报告系统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1992年10月,十四大报告赞扬邓小平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sup>②</sup> 报告从九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sup>③</sup>

<sup>①</sup> 资料来源:人民网, [www. people. com. cn](http://www.people.com.cn)。

<sup>②</sup>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

<sup>③</sup>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18~221页。

第一,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第三,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第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第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第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并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第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第八,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第九,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3. 十五大报告深刻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1997年9月,邓小平逝世半年后,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作了高度评价,把邓小平与孙中山、毛泽东并称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三位伟大人物。<sup>①</sup>报告把十四大所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称为邓小平理论,认为邓小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

<sup>①</sup>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页。

者，<sup>①</sup>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邓小平理论。<sup>②</sup>

十五大报告深刻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强调“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sup>③</sup> 报告从4个方面深刻论证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sup>④</sup>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

①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8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1~12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8~9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9~11页。

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20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对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对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第四,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 第二章

# 陈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秉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邓小平协力合作,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作出了很多重要决策,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 第一节 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 拨乱反正方面的贡献

#### 一 支持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期间以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全国广大党员、广大人民的拥戴,“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小平能否复出、何时复出的问题变得非常敏感,但当时中央高层的意见并不一致。华国锋在1976年10月明确要求中宣部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1977年3月10~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在讲话中仍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时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委员的陈云观点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在3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书面发言,郑重提

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他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并说：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sup>①</sup>这三个“完全”，充分反映了陈云对邓小平的高度信任。陈云的提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在陈云、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努力下，1977年7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由此第三次复出。

## 二 提请中央处理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关于这一点，本编第一章第一节已有叙述，在此简述如下：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提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他具体列举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在陈云发言的推动下，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改革开放的方针、民主集中制建设等重大问题，开得非常成功，为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 三 关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从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起，陈云就善于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都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制订了很多科学的决策，为党建理论的体系化和完整化，为保持党的先进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12月，时年73岁的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他担任这一职务长达9年，直到1987年10月十三大才退出一线工作，卸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改任中顾委主任。他从纪委工作角度出发，高度关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党的

<sup>①</sup>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他认为,当时中纪委的重要职责就是按照十一大党章的要求,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即“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指出,做好这件事,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在9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sup>①</sup>

1980年11月,陈云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发表意见,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认为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他还指出中纪委的工作方法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sup>②</sup>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集体决策原则,指出“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有一人说了算。这必须是一项规定。从公社起直到中央常委,一律照此办理”<sup>③</sup>。不过,如何真正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体领导、集体决策,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难题。

1982年1月5日,陈云在中纪委编印的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上写下批语,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sup>④</sup>。陈云的批语当天就转给了邓小平等其他中央常委,得到赞同,邓小平还在陈云的批语中加写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sup>⑤</sup>1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就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改革开放后第一场严打风暴就此兴起。他强调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在陈云的直接领导

① 《陈云文选》第3卷,第239~243页。

② 《陈云文选》第3卷,第273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第280页。

④ 《陈云文选》第3卷,第273~274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96页。

下,严打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遏制了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势头,对保证改革开放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sup>①</sup>

为健全党内民主制度,1982年12月3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允许党内有不同意见。他指出,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sup>②</sup>

1984年10月17日,陈云在中纪委常委会《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上写下批语,明确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sup>③</sup>

1985年9月23日,陈云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抓党风的好转,仍是全党的一件大事。一是各级党组织要重视。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三是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在内。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sup>④</sup>

1987年1月16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党内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sup>⑤</sup>

十三大召开前夕,1987年10月19日,陈云在中纪委第九次全体会议上对中纪委工作作了总体评价,认为“成绩是主要的,也存在不足,需要改进”。他同时强调:“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sup>⑥</sup>。

① 中国社科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光明日报》2005年6月14日。

② 《陈云文选》第3卷,第275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第275页。

④ 《陈云文选》第3卷,第351~352页。

⑤ 《陈云文选》第3卷,第359页。

⑥ 《陈云文选》第3卷,第363页。

## 第二节 陈云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

### 一 风格稳健

陈云在党内长期负责财经工作,以风格稳健著称。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非常赞成全党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在12月10日的东北组发言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sup>①</sup>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指出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sup>②</sup>

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必须弄清楚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国家是一个9亿多人口的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不估计到这种情况,整个经济搞不好。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农民。<sup>③</sup>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今后决不要再作超英赶美等不切实际的预言。<sup>④</sup>

### 二 重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

陈云认为,国民经济要做到综合平衡、有序发展。电力、运输必须先行,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钢铁工业内部、各工业部门之间、农业与工业之间不能比例失调。他强调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

① 《陈云文选》第3卷,第235页。

② 《陈云文选》第3卷,第248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第250~251页。

④ 《陈云文选》第3卷,第281~282页。



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他还提出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sup>①</sup>

### 1. 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要脚踏实地

1979年9月18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指出,基本建设战线太长是1970年以来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对经济进行调整,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要改变基建投资超过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状况。他提出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要根据30年来的经验,找出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合理比重。他指出,不能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为人民币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也不能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他认为,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他主张从1980年起去掉基建投资中的赤字,使基建投资计划脚踏实地。他认为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要在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sup>②</sup> 1994年2月,陈云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指出,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sup>③</sup>

### 2. 纠正单纯突出钢的做法

“以钢为纲”曾经长期是我国工业发展的主导方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建设鞍山钢铁厂作为首要任务,计划实施成效显著,从1952年到1957年,全国钢产量从135万吨迅速增至

① 《陈云文选》第3卷,第250~254页。

② 《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268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第380页。

535万吨,增长了3倍。早在1959年5月,针对当时过高的钢铁指标问题,陈云就提出要区分钢材的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钢的产量要根据煤炭、机械、铁道等部门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来定。但是陈云的意见并没有被真正采纳,毛泽东仍然坚持单纯突出钢的做法。然而,“单兵突进”的做法注定不能持久。1960年钢产量达到了空前的1866万吨,但这同时也是强弩之末,后来不得不搞调整,1961年钢产量就迅速降至870万吨,其后钢产量连年波动,直到1971年才超过1960年的水平,达到2132万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如何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上,中央层面存在不少争议。1979年3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单纯突出钢,不能持久。搞钢,就要煤,要电,要有色金属,等等。突出一点,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他主张要有两三年最好是三年的调整时间,使国民经济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使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反对单纯突出钢,并不是不要钢。实际上,1979年在宝钢上马还是下马的激烈争议中,最后就是陈云拍板决定“干到底”的。宝钢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第一个特大项目,投资规模达214亿元(约占当时国家财政年收入的20%),需要大量外汇进口设备、技术和专利。宝钢1978年12月23日破土动工之后,很快就使财政吃紧、外汇吃紧,不少人主张让宝钢下马。从1979年5月开始,陈云在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多方征询意见,实地调查研究,反复比较考虑,最终在1979年6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八点意见,号召大家“同心协力,把宝钢建设好”,“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应该做出榜样来”<sup>②</sup>。后来的实践证明,宝钢是我国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一座桥梁、一个平台。国际上发展大型钢铁企业的成功经验,首先通过宝钢的吸收、消化、再创新,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经营理念、管理

<sup>①</sup> 《陈云文选》第3卷,第380页。

<sup>②</sup> 《陈云文选》第3卷,第259~262页。

制度和充满活力的运作机制,然后向中国其他的钢铁企业,乃至各个行业扩散、传播。正是因为有了宝钢的示范效应,我国的钢铁工业才得以更快地借鉴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跨入飞跃发展的新阶段。在短短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我国钢铁产量的世界排名从 1978 年的第 5 位上升至 1996 年的第 1 位,钢材产品的质量、能耗等技术指标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并最终推动了我国整个工业的全面、快速发展。<sup>①</sup>

### 3. 建设要有重点

1983 年 6 月 30 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财力物力只有那么多,不分轻重缓急,大家一齐上,你挤我,我挤你,势必因小失大,处处被动。他提出动员全党全民集中财力物力保重点,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他认为农业、能源、交通是重点,一批骨干企业的建设和改造是重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点。他希望大家一齐支援重点建设,支援骨干项目。<sup>②</sup>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国民经济表现出明显的短缺经济特征,各种物资都很匮乏。从农业来看,粮食产量连续几年在 2.8 亿吨左右徘徊,与 4 亿吨的目标相距甚远。陈云在 1978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他建议进口一些粮食,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sup>③</sup> 1979 年 3 月 8 日,陈云写了一份提纲,其中谈到:“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sup>④</sup> 3 月 25 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

<sup>①</sup> 张励、黄金平:《陈云与宝钢建设》,《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 年第 5 期。

<sup>②</sup>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323~324 页。

<sup>③</sup>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236 页。

<sup>④</sup>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246 页。

次会议上强调：粮食一定要有人管。钢铁是硬的，粮食更硬。<sup>①</sup> 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sup>②</sup>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我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全国粮食总产量在20世纪80年代初迅速增长，在1984年突破了4亿吨，一些领导干部就此认为农业方面没有什么问题了。当时报纸上还大量宣传“万元户”，刺激得不少农民对种粮食失去了兴趣，一心只想从事农副业发家致富。针对这种情况，1985年9月23日，陈云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10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粮食生产要抓紧抓好。<sup>③</sup> 不过，迄今为止，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是尚待很好解决的关键问题。1986年以后，我国粮食总产量也是连年波动，2007年为5.015亿吨，尚未达到1999年的最高点5.08亿吨。<sup>④</sup>

#### 4. 关注资源与环境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陈云是比较早关注资源与环境问题的。

1979年6月17日，陈云给李先念、姚依林写信，提出要尽早注意全国各地的水资源情况和工业污染问题。他指出农业要用水，工业要用水，人民生活要用水。有些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今后工厂的建设必须注意到用水量。有些工厂因为矿藏关系只能在当地开办，有些工厂可以而且应该在有水的地方办。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对现已办了的工厂，哪些还未处理污染问题的，应该心中有数，逐步加以改变。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患于先，这是重大问题。<sup>⑤</sup>

① 《陈云文选》第3卷，第258页。

② 《陈云文选》第3卷，第280~281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第349~350页。

④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www.stats.gov.cn。

⑤ 《陈云文选》第3卷，第263页。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群众,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保护资源与环境的重要性,致使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呈现不断加剧趋势。1988年8月27日,陈云又提笔给李鹏、姚依林写信,谈到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sup>①</sup>

1988年10月8日,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谈到农民不重视农家肥、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后硬拼设备、带病运转的问题,指出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sup>②</sup>

1990年6月6日,陈云在张光斗、陈志恺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上写下批语,指出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sup>③</sup>

陈云去世5个多月之后,可持续发展终于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郑重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要根据我国国情,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克服

① 《陈云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② 《陈云文选》第3卷,第365~366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第375页。

各种浪费现象。综合利用资源,加强污染治理。<sup>①</sup>

### 三 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陈云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奠基者之一。早在1956年,他就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从正面肯定了市场的概念、功能和机制,具有相当高的前瞻性。在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

#### 1. 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丛生,主要表现在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计划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计划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有鉴于此,陈云于1979年3月8日指出,1917年后苏联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工作制度的主要缺点就是只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忽视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忽视市场调节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思想上没有“利润”概念,变成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市场调节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他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应该有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两种经济,要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他认为,在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但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sup>②</sup>

#### 2. 以计划经济为主体

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房租很低,只能作修理

<sup>①</sup>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3~464页。

<sup>②</sup> 《陈云文选》第3卷,第244~247页。

费,甚至抵不了修理费。国家补贴一年共计有 200 多亿元。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他认为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从最后的经济结果看来,现在的办法,小的方面不合理,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sup>①</sup>

陈云在 1985 年 9 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指导性计划并不等于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即不制定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sup>②</sup>

### 3. 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

1981 年 12 月,陈云在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该调出的物资,必须按国家计划调出。全国建设的进度,必须有先有后,有重有轻,按全国计划办事。<sup>③</sup> 1982 年 12 月,陈云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谈到十二大提出的分两步、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指出为了给后 10 年比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大革命、大建设,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当然,地方上的小革命、小建设也要搞,但必须以大革命、大建设为主,这也就是局部服从全局。否则,不分大小,齐头并进,国家吃不消。他赞成《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加强计划工作的各项规定,如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家计委审批,计划外追加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必须经过计委综合平衡后报国务院审批,突破固定资产投资的计划都必须事前按照隶属关系报请上级批准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

①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278 页。

②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350 页。

③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307 页。

证我们的大革命、大建设取得胜利。只有把国家的大革命、大建设搞好了,各地的小革命、小建设才有切实的保障。<sup>①</sup> 1988年10月,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sup>②</sup>

#### 4. “鸟笼经济”思想

1982年12月,陈云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提出了“鸟笼经济”思想。他指出,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他认为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搞活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sup>③</sup> 陈云形象地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比喻为“笼子”和“鸟”,认为两者在经济整体发展中的比例不一定是此消彼长,而很可能是相互地增长和发展。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

① 《陈云文选》第3卷,第318~319页。

② 《陈云文选》第3卷,第367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第320页。



## 第三章

# 江泽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江泽民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1989年6月他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率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2002年十六大他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卸任国家主席,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卸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些职务均由胡锦涛接任,实现了新中国历史上最高权力的首次平和移交。

### 第一节 国内政治风波危及中国共产党 执政地位之际,江泽民临危受命

1988年夏秋之后,国内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加剧,改革遇到种种困扰:一是在刺激经济活力的同时没有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收入分配悬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二是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现象越来越多;三是经济秩序混乱,全民下海经商,地区之间开展以经济封锁为特征的“经济大战”;四是改革停滞不前,进退维谷。改革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被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淹没,各种抱怨改革的民谣广为流传。<sup>①</sup>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交

---

<sup>①</sup>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第500~501页。

互作用下,终于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1989年5月20日,邓小平同陈云、李先念等开会,提议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危难之际被选择担当重任。5月31日,邓小平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一直要讲到底,提出要改换领导层,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要胸襟开阔,要取信于民,干出实绩。他提议新的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要很好地团结。他明确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他就坚决退出。<sup>①</sup>6月16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等谈话,要求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领导集体及其核心江泽民。<sup>②</sup>6月23~24日,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江泽民在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面临危难之际,被选择担当重任。他很快就下定决心,以林则徐的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自勉,义无反顾地迎接新的职务带来的重大挑战。<sup>③</sup>

## 第二节 积极应对各种经济风险, 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

### 一 成功治理通货膨胀

物价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当物价上涨过猛过烈时,往往会对政府构成政治压力,引起政局动荡,甚至导致政府下台。当物价短期内大幅下跌时,往往会过度挤压生产者的盈利空间,引发经济萧条,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77~127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81~1282页。

③ [美]库恩(Kuhn, R. L.):《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153页。

一个合格的政府必须注意对物价进行宏观调控,使之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涨跌区间之内,以免引发大的政治危机。

1988年,我国爆发了通货膨胀问题,这是1978年以来累积起来的隐性通货膨胀的一次集中释放。从1978年开始,政府多次大幅度调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87年全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比1978年上升了约100%,但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平均仅上升了约50%。<sup>①</sup>为了维持购销价格倒挂,政府不得不从并不宽裕的财政收入中挤出资金对物价进行补贴。这种补贴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1978年是1%,1979年迅速提高到7%,1980年进一步提高到10%,1981、1982、1983年达到最高点14%,1984、1985、1987年是13%,1986年是12%。<sup>②</sup>这样高的补贴使得那些年本来就吃紧的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连续多年出现财政赤字,迫使中央决策层在1988年下定决心进行物价闯关。

1988年4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把猪肉、鲜蛋、白糖、大路菜四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同时把价格放开。北京从5月15日开始对这四种副食品试行零售价格变动。从市场反应来看,5月15日之前很多商店都有货不卖,等着涨价。5月15日之后涨价的商品也不限于这四种副食品,很多商品都跟风涨价。由于市场物价管理跟不上,市场秩序变得比较混乱,违法经营活动增多,哄抬物价、乱涨价现象十分突出,抢购风潮多次出现,8月份甚至出现了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抢购商品的情况。而1985年以来在价格双轨制下滋生的大量“官倒”,也趁机频繁倒卖各种紧俏商品,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对之深恶痛绝。治理通货膨胀成为中央决策层的当务之急。

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把1989、1990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定为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要求1989年物价上涨幅

①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www. stats. gov. cn)相关数据测算得出。

②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www. stats. gov. cn)相关数据测算得出。

度必须明显低于1988年,此后几年每年物价上涨幅度必须控制在10%以内。10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要求进一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确保1989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但治理整顿工作遇到的阻力很大,一些领导干部甚至公然为已经激起群众公愤的“官倒”作辩护。物价上涨态势在1988年末、1989年初非但没有扭转,反而越演越烈。与1987年相比,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上升了18.5%,其中12月比1987年12月上升26.7%。1989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继续大幅上涨,与1988年同期相比,1月上涨了27%,2月上涨了27.9%,上半年平均上涨了25.5%。<sup>①</sup>

当时不少人认为通货膨胀是改革带来的后果,对改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提出怀疑。针对这种情况,1989年3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指出:要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分析形势,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这样才能防止片面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才不至于在改革顺利的时候盲目乐观,看不到潜在的矛盾和问题,才不至于在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悲观失望,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把形势看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sup>②</sup>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要求江泽民、李鹏等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要抓紧惩治腐败。<sup>③</sup>江泽民当天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分配不公矛盾激化的直接诱因,提出要整顿经济秩序尤其是流通秩序;要重视廉政制度建设,集中力量坚决及时查处各种以权谋私的违法行为。<sup>④</sup>此后,各地频繁传出惩治腐败的消息,声势越来越大,办案工作相比前几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各级监察机关都把开展反腐败斗争、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放到突出位置,集中力量查处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官倒”和奢侈浪费等方面的案件。监察部重点查办了35个大要案,有些重要案件由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亲自批办、督促

①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www. stats. gov. cn。

②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3~4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81~1282页。

④ 江泽民:《认真消除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求是》1989年第12期。

和指导查处。一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得以突破,既起到了惩一儆百的作用,又增强和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反对腐败的信心和斗志。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治理,截止于1990年2月底,全国撤并公司7万多个,占公司总数的24.5%。从1989年10月开始,通货膨胀问题基本解除。当月物价上涨幅度迅速下降到了7%左右,1990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水平仅比1989年上涨2.1%,1991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水平仅比1990年上涨2.9%。<sup>①</sup>

## 二 积极推动经济发展

但在通货膨胀被抑制的同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大放慢,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8年的11.2%迅速下降到1989年的3.9%、1990年的5%和1991年的7%,<sup>②</sup>直接危及到了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的实现。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并强调:“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sup>③</sup>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迅速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作出积极回应。1992年2月底,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并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1992年3月,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强调抓住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1992年6月,江泽民在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座谈会上指出,既要始终抓住浦东和三峡工程这两个重点,又要注意充分发挥沿江各省的优势和特点。<sup>④</sup>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要求“走

①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www. stats. gov. cn。

②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www. stats. gov. cn。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378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06~209页。

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sup>①</sup> 同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指出:“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不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都要为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一条要成为我们不可动摇的原则。”<sup>②</sup>

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积极领导和部署下,中国经济开始连续多年高速增长。1992、1993、1994、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2.8%、13.4%、11.8%、10.2%,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7733亿元,提前5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sup>③</sup>

### 三 慎重处理“好”与“快”、“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通货膨胀问题又开始出现。全国商品零售价格1992年比1991年上涨5.4%,1993年比1992年上涨13.0%,1994年比1993年上涨21.7%。<sup>④</sup> 1993年6月22日,邓小平同江泽民谈话时强调要控制市场物价。<sup>⑤</sup> 当时,不少外国领导人和外国经济学家都很关注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怀疑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慎重处理“好”与“快”、“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很好地化解了这些怀疑。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十四大要求“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同时要求“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并提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sup>⑥</sup> 这些表述显示出,关于速度与效益、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那时还没有明确的思路。

1993年3月,十四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经济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的要求。“快”换到了“好”前面,反映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24~225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55~256页。

③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www.stats.gov.cn。

④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www.stats.gov.cn。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1~1362页。

⑥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25~227页。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表述反映出在经济效率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提高效率是当时的紧迫任务。

1995年9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论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正确处理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把速度和效益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sup>①</sup>在此,速度位于效益之前。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十五大提出,要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sup>②</sup>2000年1月,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子。<sup>③</sup>与十五大相比,中央决策层开始从关注经济发展转向同时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十六大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sup>④</sup>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指出:“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字面上来看,从十四大到十七大,相关表述似乎好像走了一个轮回。当然,实际情况则复杂得多。总体来看,就是在经济发展过慢时要更多地强调“快”和“效率”;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国家经济实力大幅增长之后,要更多地强调“好”和“公平”。

#### 四 全面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78年以来,对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党内长期存在争论。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虽然时有争论,但在以邓小平为核心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62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9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510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0页。

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国逐步把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生活,对加快经济发展起了显著作用。1982年9月,十二大提出要在经济工作中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1988年爆发通货膨胀问题后,治理整顿期间重新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管理。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党内外对改革开放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争论得十分激烈,一些经济学家公开质疑改革的市场取向,认为这会导致中国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段时期对市场机制作用的限制,使1989~1991年经济发展速度大大放慢,邓小平对此深感不安。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sup>①</sup>。南方讲话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激发和增强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动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 1. 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命名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提出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他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命名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认为这一体制有三个主要特征: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合理调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节社会分配。<sup>①</sup> 12日,邓小平同江泽民谈话,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指出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sup>②</sup>

4个月后,十四大报告充分吸收党内外意见和建议,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当也完全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相较于6月9日的讲话,这里特别提到了外资经济。1992年是我国对外开放范围和领域明显扩大的一年。与1991年相比,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增长2.5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62.7%，“三资”企业数目增加近80%，“三资”企业出口额增长44.1%。<sup>③</sup> 与外资经济迅猛增长的情况相适应,从1992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开始从统计国民生产总值变为统计国内生产总值。二是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相较于6月9日的讲话,江泽民在这里特别提到了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三是在宏观调控上,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相较于6月9日的讲话,江泽民在这里突出了整体利益观。报告特别提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作持久的努力,又要有紧迫感;既要坚定方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198~20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7~1348页。

③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www. stats. gov. cn。

向,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推进。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sup>①</sup>

## 2. 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之后,党内外都希望中央再进一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说法,以便更好地组织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经过精心准备,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包括五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主要环节:一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四是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五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sup>②</sup>

## 3. 制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表

1995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制定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表:在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sup>③</sup>这个时间表并不要求在全国各地同步推进这一过程。早在1994年6月江泽民考察广东时,就指出不可能在所有地区都同时、同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认为,经济特区应该走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24~228页。

② 资料来源:人民网, www. people. com. cn。

③ 资料来源:人民网, www. people. com. cn。

在前面,在全国继续起深化改革的试验作用。<sup>①</sup>

#### 4. 探索如何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在中央决策层构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一直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由此直接派生出来的问题就是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具体构成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1994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处于“主力队员”、“明星队员”地位,一定要使它们充满生机和活力,发挥好主导作用。<sup>②</sup>但当时实际情况是,1992年后国有经济成分的增长速度一直大大落后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主力地位岌岌可危。1992年全国工业增加值比1991年增长20.8%,国有企业仅增长14.4%,国有企业亏损面为26.4%。1993年全国工业增加值比1992年增长21.1%,国有企业仅增长6.4%,国有企业亏损面上升至30.3%。1994年全国工业增加值比1993年增长18%,国有企业仅增长5.5%。<sup>③</sup>

国有工业企业在发展速度上远远落后于其他经济成分的工业企业,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忧虑。1995年6月,江泽民在长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的道路。他认为: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只能搞好,只能加强,而决不能削弱;只能形成新的优势,而决不能失去优势。<sup>④</sup>9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任何动摇、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做法,都会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他还提出了衡量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四个方面的标准:一是在社会总资产中要保持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占优势;二是国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375~376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367页。

③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www.stats.gov.cn](http://www.stats.gov.cn)。

④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41~442页。

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三是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四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断发展壮大自己。<sup>①</sup>

1995年的数据显示，达到前两个标准没什么问题，但满足后两个标准则问题比较大。1995年末国有工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比重虽已从1985年的74.6%下降到了53.7%，但加上集体工业，公有制工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仍高达77.5%。在煤炭采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电力煤气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等行业中，国有企业都拥有支配地位。但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国有企业前景不容乐观。199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比1994年增长14%，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仅增长9.5%，国有企业仅增长7.2%，均没有达到平均数。1996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比1995年增长12.7%，其中国有工业仅增长6.4%。而且，国有工业企业的负担远远高于非国有企业，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支付离退休金及福利费占当年产品销售利润的15.0%。不过，虽然国有企业整体表现欠佳，但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情况仍远远好于国有中小企业。1995年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总数仅占全部工业企业单位数的0.2%，但其资产占44.5%，工业增加值占29.2%，上交税金占48.8%。<sup>②</sup>有鉴于此，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讲话时阐明了“抓大放小”的方针，即“集中力量抓好国有大型企业，对一般国有小型企业进一步放开搞活”。<sup>③</sup>

1997年9月召开的十五大在理论问题上作了重要突破，在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扩充了公有制经济的范畴，指出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衡量标准也务实地缩减为两个：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针对过去主要从“量”的角度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68~469页。

②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www.stats.gov.cn。

③ 资料来源：人民网，www.people.com.cn。

来理解这两个标准的做法,报告指出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质”主要表现为控制力和竞争力。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即使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也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报告提出了国企改革的三年短期目标,即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报告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指出把国企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三改一加强)结合起来,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sup>①</sup>

从1997年起,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步伐大大加快,“抓大放小”、“三改一加强”工作进一步展开,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取得新进展。1997年末,虽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仍然落后于平均数,但扭亏增盈取得了一定效果,国企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11.9%。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企业效益再度滑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企业亏损额达1023亿元,比1997年多亏21.9%,<sup>②</sup>国企改革三年目标看起来极有可能落空。为了确保实现三年目标,中央决策层在1999年下半年开始积极行动。

1999年8月,江泽民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国企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阐述推进国企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导方针: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and 改组国有企业,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大力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切实解决国有企业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建立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sup>③</sup>

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

①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9~22页。

②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www.stats.gov.cn。

③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80~387页。

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重申了国企改革三年短期目标，还进一步提出了长期目标：到2010年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 and 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sup>①</sup>

1999年11月，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国企改革发展三年目标是阶段性的攻坚战，非常关键，一定要打好。实现这个目标，可以大大增强全党信心，为实现十年目标奠定基础。他特别指出，要处理好改善企业外部条件和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关系，国家要在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方面采取措施，企业要眼睛向内，着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机制。他强调指出，国企如果不在建立新制度、形成新机制方面下功夫，即使有了好的外部条件，也发挥不了应有作用。<sup>②</sup>

2000年6月，针对国企改革中大的抓得不够、小的放得过快过多、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的现象，江泽民在西北地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着重谈了公有制和国有经济的重大意义。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他强调，国有经济比重的减少应该有个限度、有个前提，不能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大中型企业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省市区也必须掌握一批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中型企业。<sup>③</sup>

资料显示，1999年国企战略性改组取得了初步成效，重点行业组建了一批大企业集团，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始实行债权转

① 资料来源：人民网，www.people.com.cn。

②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440～441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71～72页。

股权,资产负债结构得到改善。国有工业企业扭亏增盈出现了转折性变化,一批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了困境,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亏相抵实现利润 9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7.7%,是 1995 年以来的最好水平。到 2000 年,十五大确定的国企改革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快速增长,实现利润 2 392 亿元,比 1999 年增加 1.4 倍。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 10.1%,是 1994 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有工业都实现了整体扭亏或盈利增加。<sup>①</sup>

中央决策层在探索如何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同时,对迅猛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包容度、认可度也在不断提高。1995 年 9 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正确引导、加强监督、依法管理,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sup>②</sup> 1997 年,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sup>③</sup> 2002 年,十六大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sup>④</sup> 2007 年,十七大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 五 及时做好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工作,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由党和政府主导,中央决策层必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不断出台相应的政策。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

①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www. stats. gov. cn。

②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第 469 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第 20 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第 548 页。

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改革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财政、金融、外债、外资、外贸、就业、分配、农业、工业、商业、企业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现,亟须制定相应的政策予以解决。在一次又一次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相关事务进行决策的实践中,中央决策层日益清楚地发现:在确定某些政策时,片面性和盲目性较多,自觉性和坚定性不够,该限制或禁止的,该鼓励或放开的,常常不能及时决策和予以明确。这主要是因为决策时对相关问题和风险因素缺乏深刻的认识和透彻的分析。

有鉴于此,1996年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开展我国经济发展风险预测和对策研究。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1996年8月,江泽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做好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工作:一要充分认识搞好经济发展风险预测和对策研究的重要性。经济风险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往往会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必须从政治高度对待经济风险问题,进行经济发展风险预测和对策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高驾驭经济工作全局的能力,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二要切实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预测和防范工作,包括加强经济发展风险的监测和预测,抓紧制定化解和抗御经济风险的对策,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明确、严格的工作责任制。<sup>①</sup>

对经济发展风险的主动防范,使中央决策层在经济工作中开始掌握更多的主动权,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也由此显著增强。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治理通货膨胀取得显著成效,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涨幅从1995年的14.8%回落到1996年的6.1%,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以17.07%的速度高速增长。1997年下半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通货紧缩状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压力增大。中央及时调整政策,积极抑制通货紧缩,作出了扩大内需的重大决策,将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

<sup>①</sup>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37~546页。



场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保证了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以 10.95% 的速度高速增长。从 1998 年开始,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同时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调控经济运行,成效显著。从 1998 年到 2002 年,尽管我国一直存在通货紧缩问题,但国内生产总值始终以较高速度增长,1998、1999、2000、2001、2002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分别为 6.9%、6.2%、10.6%、10.5%、9.7%。<sup>①</sup>

### 第三节 锐意创新,全面捍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一 面对世界社会主义低潮,坚定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陷入低潮,国内外不少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怀疑,有的甚至失去信心,西方国家共产党人纷纷退党。国外反华势力认为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乱得差不多了,中国也只要推一下就会倒。国内也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这样那样的忧虑,一些党员、干部程度不同地产生了“信仰危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此的回答是: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1989 年 9 月 29 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向国内外郑重宣告: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up>②</sup> 1989 年 12 月,江泽民在会见英国首相特使柯利达时,阐明了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四个重大区别:一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在艰苦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东

<sup>①</sup>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7》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sup>②</sup>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第 69 页。

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是由其前身社会民主党演化而来的；二是人民军队久经考验，是钢铁长城；三是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不同于东欧一些国家是由苏联军队解放的；四是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优良传统，重视民族气节，决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他据此指出：一个有 11 亿多人口、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5 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是那么容易被推倒的吗！<sup>①</sup> 1989 年 12 月，江泽民在党建理论研究班上指出：不管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怎样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进一步把自己的党的建设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好，保证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立于不败之地。<sup>②</sup>

1990 年 9 月，江泽民在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时指出：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但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已经崩溃。我们要承认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但我们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同时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当代世界的根本矛盾。只要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实力，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强加给别的国家，但别的国家也别想扭转我们的社会主义航向。我们就是要以实际的最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来回答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sup>③</sup>

十年卧薪尝胆、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了伟大成就。2000 年 6 月 28 日，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是指引世界上处于剥削制度压迫之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变自己命运、获得社会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同时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sup>④</sup>

①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第 82 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第 88 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第 135～136 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第 77～78 页。

## 二 积极探索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

为了更好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江泽民率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际经验,进行理论创新,积极探索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

继1987年十三大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之后,1990年12月,十三届七中全会总结此前三年贯彻执行这一基本路线的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即:一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二是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专心致志地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三是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采取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多种形式,通过设立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和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五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并对它们加强正确的管理和引导;六是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七是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八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九是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

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十是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实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十一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十二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sup>①</sup>

这十二条原则基本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多方面的要求。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把党的基本路线和这十二条原则归总为: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sup>②</sup>他着重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初步勾画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1997年,十五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指出三者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这一布局长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 三 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党永

<sup>①</sup> 资料来源:人民网 [www. people. com. cn](http://www.people.com.cn)。

<sup>②</sup>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152~153页。

葆生机与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常青常新。要使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就必须对党的建设常抓不懈。1989年的政治风波暴露出了当时松懈的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风波平息之后,邓小平谆谆告诫江泽民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sup>①</sup>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率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倡导领导干部讲政治、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1999年在全国大规模开展的“三讲”教育特别是1999年末举行的历时五个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三讲”活动,对1989年以来的党建工作进行了大回顾、大检阅,发现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仍然存在不少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全党离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仍然有相当距离。例如,一些党的基层组织长期处于松松垮垮、软弱涣散、瘫痪半瘫痪状态,在群众中非但起不了政治核心、战斗堡垒作用,反而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声誉和形象;一些党员、干部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模糊甚至动摇,个别人甚至公开宣扬私有化;不少党员、干部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不信先进的唯物论、无神论,却信“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一些领导干部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到了利令智昏、无法无天的地步。江泽民由此痛感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一场信任危机,党的整个肌体正面临着一种健康问题。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恢复党的整个肌体的生机与活力,要在21世纪继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把党真正锻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进行理论创新。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党如何更好地做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82页。

好“三个代表”这一重大课题。他强调所有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这“三个代表”，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sup>①</sup>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决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因此他一开始就从战略思维上对“三个代表”思想作了定位，并积极采取行动，推动全党认识、把握和努力实践“三个代表”思想。

2000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时发表长篇讲话，诚恳地指出：怎样使我们党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充满活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如何使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他强调这些问题就是提出坚持“三个代表”要求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他强调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应该贯穿“三个代表”要求。他特别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必须把“三个代表”要求贯彻落实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他提出要把“三个代表”要求贯彻落实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坚持“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根本宗旨、根本任务的集中体现，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提出的根本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用“三个代表”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坚持、体现和贯彻“三个代表”要求。<sup>②</sup>这次讲话之后，理论界开始关注“三个代表”思想，报刊上开始大量涌现学习、研究和宣传“三个代表”思想的文章。江泽民很注意理论界的反映，他与理论界积极互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研究和阐述“三个代

<sup>①</sup>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3页。

<sup>②</sup>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5~31页。

表”思想。

(1) “三个代表”思想回答什么问题。2000年6月,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坚持做到“三个代表”。<sup>①</sup>

(2) “三个代表”思想是重大的理论创新。2000年6月,江泽民在兰州主持召开西北地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时,重申“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同时把创新从传统的狭义的科技创新扩展为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在内的一个广义范畴,指出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其他一切创新都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推动、影响下进行的。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树立了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指出全党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同时必须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不断为实践提出新的理论指导。全党同志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共同研究和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新的重大战略问题,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真正做到“三个代表”。<sup>②</sup>

(3) 系统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简称七一讲话),明确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基本内涵:一是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

<sup>①</sup>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4页。

<sup>②</sup>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64~69页。

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三是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sup>①</sup>

(4) 按照“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深化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应该把他们当中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他强调: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sup>②</sup>

七一讲话引发了很多争论,其中争论的焦点是私营企业主到底能不能入党。有人发出公开信,指责私营企业主偷税漏税,进行了许多非规范以及非法的经营行为,加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是造成腐败日益猖獗的主要温床,他们批评七一讲话为私营企业主入党敞开了大门。

2001年8月31日,江泽民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

<sup>①</sup>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72~281页。

<sup>②</sup>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70~292页。



班上讲话,对七一讲话作了深入阐述。他全面肯定七一讲话,指出:七一讲话中所回答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都是实践的发展已迫切要求解答的。不解答这些问题,就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会影响党的建设发展。七一讲话并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我代表中央讲的。七一讲话是对新的实践的科学总结,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反映了全党的意志。他强调,七一讲话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定不移地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了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他直接回应了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问题,指出: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全国私营企业已达176万户,从业人员2000多万。无论是从经济实力来看,还是从人数来看,分量都不轻。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现实,不争取这支社会力量,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上去,那在政治上对党是很不利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割开来,推到对立面上去。如果还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和旧中国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那些概念来解释当今的中国社会,解释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各种经营投资活动,显然是不适合的。他谈到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出: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就是按规律办事,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的所有的话都当成不可更改的教条,那就会损害乃至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他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积极开动脑筋,认真思考问题,共同努力把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他回顾了党的理论建设历程,谈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指出:注重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的事业就

会受到损害,甚至发生挫折。党的事业要前进,必须有回答和解决新问题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为什么在这个时机要集中回答一些重大问题呢?从根本上说,是党的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否则我们就不能更好地前进。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sup>①</sup>

从客观效果来看,七一讲话确实解开了束缚私营企业发展的紧箍咒。2005年以来,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私营企业最有活力。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地区投资企业增长相比,私营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一直是增长最快的,2005、2006、2007年分别增长25.3%、24.4%和26.7%。<sup>②</sup>

七一讲话为起草十六大报告定下了基调,而要确立“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地位,就必须把“三个代表”思想写入十六大报告。在十六大报告起草过程中,江泽民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02年2月18日,江泽民指出,十六大报告要提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基本要求,要充分反映七一讲话提出的重要提法和观点,并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有针对性地进行阐述;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sup>③</sup>9月18日,江泽民在十六大文件起草组会议上指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我们13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和开拓的结果。13年的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要始终做到党一贯坚持的“三个代表”。这既是13年来党和国家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也是我们继续开拓创新的行动指针。只有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三个代表”的要求才能真正得到落实。<sup>④</sup>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33~344页。

②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www. stats. gov. cn。

③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39~441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15页。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十六大作主题报告,从多个方面对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权威论述:

(1) 始终坚持“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性。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历史方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开放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

(5)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一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二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三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四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6)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在全党兴起一个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党员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带头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模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模范,勇于实践、锐意创新的模范。<sup>①</sup>

2002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党的建设,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要着眼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干部、指导党建工作的实践,认真落实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这一重大政治任务,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思想建设。他认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努力,率先垂范。<sup>②</sup>

200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了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工作。会议指出,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会议强调,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就是要使全党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在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上取得新的成效,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sup>③</sup>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36~542、568~569页。

② 资料来源:人民网, www. people. com. cn。

③ 资料来源:人民网, www. people. com. cn。

2003年6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出版。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指出,这是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重要举措,是党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纲要”全面、准确、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精神,有助于人们准确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准确把握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自觉实践“三个代表”,身体力行“三个代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各项工作,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sup>①</sup>

在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江泽民大力倡导理论创新,党内外理论创新氛围日渐浓厚。十六大之后,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大大加快,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锐意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sup>①</sup> 资料来源:人民网, [www. people. com. cn](http://www.people.com.cn)。

## 第四章

# 苏东剧变的反思和启示

1989~1991 两年多时间内,苏联和东欧地区发生了一场“政治地震”:执政的共产党变质、垮台,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变色、解体。对此,西方发达国家右翼分子弹冠相庆,狂妄叫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将在 20 世纪死亡!即使是一些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也不能不为之困惑: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苏联共产党,为什么“只有 20 万左右的党员时,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有 200 万左右的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有 2 000 万左右党员时,却瓦解了?”<sup>①</sup>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一个“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sup>②</sup>的社会主义大国,怎么说解体就解体了呢?一时间,几十个原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改变了方向,西方许多共产党也更换了名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了最低谷。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一个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历史性地提到中国共产党面前。这对现存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来说,无疑是巨大挑战,但在同时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意味着重大机遇。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就是为了探索

---

① 林炎志:《笑迎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建设》,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2 页。

② [俄]列·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 页。

一条有别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苏东剧变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不同于苏东的改革开放,在扬弃斯大林模式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初步形成,但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面临一系列疑虑和困惑,而这些疑虑和困惑的产生显然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与传统社会主义理念发生了冲突和碰撞。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剧变无疑为中国共产党彻底扬弃斯大林模式,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束缚提供了历史机遇和外部动力。

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反思和借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澄清疑虑,解决困惑,实现理论突破:一是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了“是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的问题”。二是既防“左”,又防右:解决了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深化了基本路线的内涵,从而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三是界定社会主义本质:解决了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四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解决了经济体制改革朝哪里去的问题,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五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第一节 反思的基础:改革 成就与思想困惑

从中国社会主义与苏东社会主义的关系来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大体经历了两大阶段,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前一个阶段表现为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反思、强化(参见本书第二编第六章)。尽管其间有自己的创造,有自己的探索,“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大失误甚至就是在区别于苏联道路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但“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

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sup>①</sup>在这一阶段，中共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总体上不成功。后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对斯大林模式的扬弃和突破。这个阶段又以苏东剧变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剧变前和剧变后。在剧变前，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克服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发展，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历史性转变，但仍然存在一系列思想疑虑和理论困惑。这些历史性转变和理论困惑构成了后来对苏东剧变进行反思的基础。因为，如果我们继续斯大林模式或实行苏东那样的改革，那么中国就难逃剧变的厄运，也就失去了“反思”的最根本的基础；如果我们在探索过程中没有理论困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完全成熟，也同样没有“反思”的必要。这些历史性转变具体表现为：

(1)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真正实现了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却一直没有完成的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1987年十三大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2) 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转变。我党在思想认识上长期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在理论上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探索建立有效的经济体制过程中，关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以及要不要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一直存在争论。直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争论才有了定论，但此时仍然强调把商品经济放在计划框架内来调控。十三大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明确了“社会主

<sup>①</sup>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实现了我国经济政策支点的重大转变。但计划与市场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全党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说,在理论上还是没迈过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这个传统观念的坎。

(3) 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共存的转变。改革开放前,“一大二公”被当成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从私有制向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转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2年,十二大提出了坚持国营经济为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方针。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将过去一直提的“国营经济”为主导改为“国有经济”为主导。1987年,十三大首次把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写进党的文件。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肯定了这一点,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明确了中外合作企业的法律地位。在所有制改革上,我党采取的是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情况下,实现所有制主体多元化的途径,即先不触动国有经济的产权问题,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而就国有经济本身,直到90年代初,都在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这个圈子里打转。

(4) 从平均主义到“先富”、“共富”的转变。伴随经济运行机制和所有制改革,也进行了分配制度的调整,总趋势是从平等分配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主张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促进发展,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分配改革首先是通过恢复实行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等长期被作为“物质刺激”而遭受批判的手段开始的。真正的工资改革是从1985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开始的,强调企业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从1986年起,对专业

技术人员进行职称制度改革,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按照专业技术职务确定工资。在进行工资制度改革的同时,也进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1983年开始在部分地区对新招工人试行劳动合同制,1986年将劳动合同制扩大到所有的新招职工,1991年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工资和劳动的改革,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系统内部,即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其改革方向,是由国家制衡逐步转向市场制衡,由平均主义转为效率优先。在计划经济系统之外,如私有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带有市场的性质。随着工资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个体、私营、三资等多元经济成分的兴起,非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这大大调动了各个生产主体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效率,但同时又带来了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问题,而且这个差距不仅体现在地区、城乡之间,而且体现在不同经济成分、不同行业 and 不同人群之间。

(5) 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转变。虽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不完全认同斯大林模式的“两个平行市场”论,主张借鉴外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建设社会主义,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并未实现向西方国家的开放,即使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也因中苏关系的恶化、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而受到损害。因此,新中国的经济等方面基本上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后,从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起,我国对外开放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层层推进,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的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城市遍布全国所有省区。全方位开放不仅是在经济上对外开放,也包括思想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

(6) 从权力集中、民主法制不足,到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转变。长期以来,在政治体制上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严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严重不足甚至受到破坏。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作了许多努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逐步完善和发展。一是构建社会主义法制体系。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颁

布实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纠正了 1975 年宪法中的错误。全国人大常委会把立法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修改、审议和通过了许多重要法律草案，构建起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二是发展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受到严重破坏，政协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各民主党派基本上停止了活动。改革开放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恢复，统战工作得到健康发展。1982 年，十二大明确提出我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推动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进一步发挥作用。三是健全集体领导，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四是十三大决定实行党政分开，把党的领导明确限定为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这样，中国实现了从权力过分集中、民主严重不足、法制极不健全，向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转变。但政治体制如何同经济模式的转换相适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然面临艰难而巨大的改革和建设任务。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近 10 年探索的基础上，十三大首次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意味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经过对各专题的分解性认识之后又在总体上有了一个综合性的、比较清晰的轮廓。

但从改革实践看，在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和失误，在现实生活中滋生甚至蔓延了一些消极腐败现象，特别是 1989 年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使一些人在反思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时，没能得出正确答案，并部分地陷入了误区。譬如有人提出：是不是应该将“反和平演变”也确立为一个工作“中心”？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计划与市场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出现的“西化”和反对西化之争仍然没有解决，是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老路上去，还是像苏东那样“全盘西化”？在所有制改革上，随着国有经济外围私有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如何理解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及推动国企改革？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如何

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如何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日益凸现在我党面前。如果不克服，不解决，就会成为阻碍前进的思想障碍。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苏东剧变后，我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内因归结为执政党内出了“叛徒”或“机会主义”，把外因视为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还有部分人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试图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如果按这一思路和逻辑去认识问题，那就应该大抓阶级斗争。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建设是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是中心。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早在1990年3月，苏东还在变迁过程之中时，就明确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sup>①</sup>

那么，苏东剧变前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呢？实际上，苏东是注意经济建设的，每个国家都有严格制定的“五年计划”，甚至“经济战略”，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也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有数据显示，1913年沙皇俄国的工业总产值只及美国的6.9%，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80%，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强国。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也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40多年时间里，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的工业—农业国。<sup>②</sup>但它们并没有明确而一贯地把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置于一切工作的中心。<sup>③</sup>在苏东社会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

② 周新城：《对苏东剧变原因的分析与思考》，《北京高等教育》2001年第2~3期。

③ 俞邃：《苏东剧变之后对社会主义的若干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2期。

主义各国实践中,一方面,工作重心在很大程度上先是搞国内阶级斗争,后是与美国争霸。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后期长达30多年时间里,苏联一心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东欧各国追随其后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展开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实行“国防优先”战略,先进技术不是用来提升和发展国民经济,而是应用于军事领域。这使得从60年代起,两大阵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赫鲁晓夫在《最后的遗嘱》中承认: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人民的吃住标准并没有多大提高,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比不上沙俄时代。另一方面,由于苏东各国一直固守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经济上不去,不能适应激烈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和要求。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后,虽然推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却没有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是把改革推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使原来就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民经济进一步走到了崩溃边缘。剧变前夕,苏东各国经济形势严重恶化,有的国家经济已从原来的低速增长变为负增长,物价急剧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出现了“东德不如西德”、“匈牙利不如奥地利”的尖锐横向对比,这不仅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而且导致人民思想混乱及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危机,为国内外党内外敌对势力的进攻及和平演变提供了条件,也为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提供了温床。这无疑是苏东剧变的基础原因。<sup>①</sup>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最后一任总书记拉科夫斯基在谈到波兰演变的教训坦承:波党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没有搞好,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搞好了,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办。经济搞不好,人民不拥护,说话没人听,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

苏东剧变的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和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

---

<sup>①</sup> 韩振亮:《对苏东剧变原因和历史教训的再认识》,《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1期。

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1990年3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及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影响和应采取的对策时指出:“我的意思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sup>①</sup>接着,在苏联解体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反复强调一定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他尖锐而明确地提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sup>②</sup>

邓小平之所以以如此斩钉截铁的语言、如此鲜明的态度否定两个中心的错误观点,提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长期不变,就是为了解除人们在这个时期的重重顾虑,就是要告诉人们苏东剧变的深层根源还是在经济上,经济上不去,西方和平演变的土壤就难以铲除。

邓小平坚持“一个中心”,并非认为处于非中心的问题就不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无疑是很重要的。十四大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反”,是像过去那样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全民群众性政治运动,还是重在正面教育,实行上下内外有别;是放在一定范围内还是作为中心。如果搞全民群众性政治运动,把反和平演变当作工作中心来抓,那实际上没有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邓小平因此一再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sup>①</sup>从发展的内涵来看，邓小平提出的主要是经济发展，也就是物质文明建设，同时也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紧紧把握这个硬道理，强调“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在党的旗帜上，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 第三节 既防“左”，又防右

是不是经济没搞好，苏东就必然要垮台呢？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国经济状况一定程度上比苏东还要糟糕，为什么他们垮台，我们却顶住了风险？这是值得深思的。正是基于这个角度的分析，关于苏东剧变的主要教训，在剧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除了内部戈尔巴乔夫这类“叛徒”掌了权和国外敌对势力颠覆以外，就是政治上反自由化不力和对群众缺乏教育，甚至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看成最重要的教训。<sup>②</sup>也就是说，苏东社会主义主要是被右所葬送的。再联系当时国内政治风波后治理整顿中出现的问题，社会上明显出现一种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想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一个中心”的地位有所动摇，而且“两个基本点”也面临挑战。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尖锐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sup>③</sup>在这里，所谓“左”，就是墨守陈规，不敢改革开放，在苏东表现为固守斯大林模式，在中国表现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所谓右，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苏东表现为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②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会主义”，在中国表现为“动乱”，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苏东的演变过程就是明证。

在备战和战争环境下，以一国社会主义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上表现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尤其是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在政治上强调阶级斗争，搞党政一体化、领导干部终身制和任命制，民主法制不健全；在对外关系上，以意识形态划线，搞“两个平行市场”和“两大阵营”。这种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且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二战后东欧各国（当然还有建国初期的中国）所效仿。但后来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不适应和平建设时期的需要，尤其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新科技革命推动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模式在总体上变成了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不改革，显然是没有出路的。

事实上，苏东各国在斯大林后的几十年里，已经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也不断地进行了改革尝试。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前南斯拉夫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随后，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也开始了自己的改革。第二次改革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代表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领导的改革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第三次改革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波兰盖莱克领导的改革最引人注目。第四次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领导并推进的经济、政治体制“根本改革”。

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的三次改革，基本上都是在原来体制下采取一些修补措施。这主要是因为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与内容，没有意识到改革的革命性意义。在实践中死抱具体的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以及相关的政治文化体制的组织管理模式不放，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如计划经济等看成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区别的本质属性，看成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范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甚至还组织了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样，原有体制的弊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克服，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



决,经济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改革一直裹足不前。从波兰的历次改革过程中可以看出,改革都是被动的,都是为了应付危机,改革不是真正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目的,而是为了继续维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保加利亚、捷克的改革基本停留在口头上,且反复多变。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则拒绝改革。总之,这三次改革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既没有从根本上改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与方面,也没能根据时代的变化与要求适时地根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这样一来,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还在,经济运行质量不断下降,人民群众没有从改革中得到真正实惠,对改革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不足,既延误了发展的时机,也为后来的演变埋下了隐患,成为敌对势力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借口。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苏联的经济状况,上任伊始的戈尔巴乔夫提出实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1985年4月,苏共的“加速”经济发展战略,在苏共二十七次正式通过。加速发展战略目标之一是想通过“公开性”的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为政治体制改革开路。但事与愿违,结果证明“加速”发展战略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后果是使民主的发展速度脱离了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超过了苏联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经济体制改革受挫,戈尔巴乔夫继而转向搞政治体制改革。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是“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在政治制度上主动放弃党的领导权,主张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在经济制度上主张私有化,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张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等。一句话,就是“要根本改革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就是“要炸毁一切”,就是要全面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由此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盘资本主义化。此次改革从总体上突破了斯大林模式,但不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彻底改革旧体制”,而是把“改革”变成“改

向”，即“彻底摧毁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实施这种改革，苏东社会主义各国才迅速地走上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戈尔巴乔夫虽然把“民主化”、“公开性”喊得比谁都响，但个人专断很厉害。从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当时许多党的高层领导包括政府总理都由他“钦定”，甚至连“解散苏共”、宣布党中央“停止活动”这样的大事，都是由他个人说了算。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共对社会和改革进程的领导力不断削弱直至丧失，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民族的全面危机和失控，最终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东欧各国的改革，尽管各自的变化过程和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与苏联一样，大都是朝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发展。

从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剧变历程来看，有右葬送了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有在发生右的倾向之前，“左”为其被葬送作了某些准备的问题；有的国家还直接是“左”葬送的，比如罗马尼亚，由于顽固地把“左”的一套坚持到底，结果失败得更惨，不仅亡国亡党，而且领导人亡头亡命。

相比较而言，中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改革路线。首先，在观念上把改革看成是一场新的革命。1985年3月，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sup>①</sup>。后来又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sup>②</sup>这意味着改革不是固守原有的体制与机制不放，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这从根本上克服了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苏联改革囿于思想观念不够解放而导致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失误。其次，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把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即体制）两个方面，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对象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等；而不是社会主义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

制度本身。

基于对苏东演变的全面分析和正确把握,也基于对中国改革的经验总结,面对国内“反和平演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想倾向,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尖锐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sup>①</sup>警惕右,就是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警惕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防“左”,就是要防止因为怕资本主义而不改革开放,防止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上。和以往的每一次谈话一样,邓小平在提到一个“基本点”时,必须要强调另一个“基本点”。他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止二十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sup>②</sup>

1992年10月,十四大报告对“左”和右的表现进行了详细论述: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之后,既防“左”,又防右,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搞改革与建设的思想,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和中央领导人讲话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中不断得到确认和坚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更加明确,也更加坚定!

#### 第四节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

显然,苏东剧变之所以发生,有“左”的原因,也有右的原因。为什么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右倾势力会起来而且能改变党和国家的面貌呢?根本问题还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没搞上去。为什么经济没能搞上去,停滞并落后于资本主义?根本原因是在于改革没搞好,迈不开步子。如此追问下去,就会发现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sup>①</sup>。长期处于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想搞清楚,也没有条件、没有能力做到。

那么,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看来,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长期以来,他们以为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模式的样子。表现在思想认识上,就是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描述。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上,长期局限于生产关系和制度特征的层面,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及其具体实现形式和实现程度看作是否搞了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成熟程度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或者说,把苏联模式所反映的基本特征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生产关系方面片面追求“升级”和“纯粹”,在分配问题上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在生产组织和经济管理上追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所以,苏东各国改革起步虽早,但终究谁也无从摆脱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每一步改革都要碰到“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sup>②</sup>的问题。当实践的结果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已明显暴露出传统社会主义的体制弊端时,传统社会主义仍然只能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sup>②</sup> 林蕴晖:《从苏东剧变看什么是社会主义》,《炎黄春秋》2007年第9期。

将自己局限在旧体制范围内,最多在旧体制内做点局部改良。这样,原有体制就越来越失去生机和活力,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导致轻工业、农业发展长期滞后,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周边国家相比差距越拉越大。最后,苏东社会主义被自身弊端所否定,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大挫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苏东垮台不是由于缺少导弹,而是因为缺少面包、火腿。“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sup>①</sup>。如果这样也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人们抛弃它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这个教训不可谓不大!

尽管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sup>②</sup>。但是,这丝毫也不说明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实质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并善于从本质角度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他首先从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谈起,强调:“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sup>③</sup>“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sup>④</sup>1980年5月,他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概念,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sup>⑤</sup>“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sup>⑥</sup>1986年他提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sup>⑦</sup>这两大原则概括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本质新概括的雏形。在这以后,邓小平又反复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和消灭贫穷,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消灭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

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等不同角度,揭示和阐述社会主义的特点和本质。

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sup>①</sup>。经过10多年的反复思考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②</sup>他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sup>③</sup>

显然,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概括,不再囿于传统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制度特征上的描述,而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价值三个层面全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强调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突破了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为完全解决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就突破了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盲目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大二公三纯”的传统观念,为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强调“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突破了搞平均主义结果导致共同贫穷的传统观念,恢复了社会主义对广大人民群众吸引力和凝聚力。总之,社会主义本质论不再把社会主义局限在僵死的定义之中,而是提供了一个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应该体现和遵循的原则,它的提出从理论上根本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姓“社”姓“资”的问题,为今后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拓展了空间。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 第五节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众所周知,尽管资本主义之前就有商品经济,但真正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时期,而迄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计划经济开始的,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计划就是社会主义,市场就是资本主义。苏东剧变后,人们似乎更坚信这一点,因为苏东剧变前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就是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结果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变质了,解体了。于是,国内一时间出现否定改革开放、批判“改革的市场化”、担心改革的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的思想倾向。

为了破除人们的思想顾虑,继续推动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sup>①</sup>要敢闯,关键是往哪里闯。邓小平点破了社会主义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然而,跨出这一步可是多么的不容易。

在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经济上的计划体制,而且主要是指令性计划。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这种体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种体制虽曾起过积极作用,尤其是对战争和革命后的经济恢复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战争与革命时代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国民经济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型国有企业已由几百个发展到成千上万个,传统的集中统一计划体制日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完全集中统一计划已经不切实际,其弊端一步步暴露出来。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陆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它们在扩大企业权限、放松或放开价格管制、鼓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等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在理论上提出了计划和市场相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结合的模式。但总体上仍没找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正确途径和有效形式。<sup>①</sup> 由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始终未能突破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传统束缚,没有脱出计划经济的框框,先后进行的改革至多也只是在原有体制范围内进行“修缮”。它们的改革多半是浅尝辄止,或半途而废,加之具体政策中犯有许多错误,致使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增长缓慢,苏东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败下阵来。这是苏东为我们提供的反面教材。苏东剧变,宣告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至少是宣告其过时了,这种情况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到了突破传统计划体制的有利时机。

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10 余年的探索,具备了相当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准备,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轮廓已初步显现。<sup>②</sup> 随着改革的深入,对“计划”本身的认识与过去已有很大不同,由原来的“计划就是法律,它必须是指令性的”转变为“计划不一定是指令性的,也可以有指导性计划,而且将来主要是指导性计划”;由原来的“计划不仅管宏观参数,也管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计划主要管宏观参数,除了极个别的重要产品以外,计划不必管微观领域”;由原来的“计划实施方式是采取实物指标体系,实行直接的计划分配”转变为“计划实施不一定都采用计划指标(特别是实物指标)体系,而应当更多地运用经济政策和价格、税收、利率等经济参数来调节经济活动”,等等。这种对计划认识的改变具有重大意义。它在不改变“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这个传统看法的前提下,把“计划经济”的具体内容改变了。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条经验:先不改变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传统提法,而是改变它的内容。其内容一步一步地从量变到质变,成为既成事实之后,再推翻传统提法。<sup>③</sup> 与此同时,中央多次对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作出理论阐述,为正确解决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指明了基本方向。<sup>④</sup>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

① 《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0 页。

② 《薄一波文选》，第 574 页。

③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1～332 页。

④ 《薄一波文选》，第 577 页。



上的讲话》中认为：“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个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1992年1月，薄一波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阅的《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广泛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应该有市场调节。计划和市场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的东西，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和统一在一起。尽管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有制基础不同，性质有别，但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都应该遵从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各自所应遵循的特殊规律。<sup>①</sup>换言之，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它们的有机结合已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sup>②</sup>

实质上，邓小平早在1979年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谈话时就已讲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sup>③</sup>1989年政治风波后，国内理论界有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潮，批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于1990年底同党的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但没有形成文字印发，也没有广泛传达。<sup>④</sup>1991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同地方领导同志说了类似的话，同样没有形成文字广泛传达，只是3月下旬，《解放日报》发表了三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透露了邓小平春节期间在上海的一些讲话内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公开发表了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

① 《薄一波文选》，第587页。

② 《薄一波文选》，第58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④ 龚育之：《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纪念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百年潮》2002年第1期。

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sup>①</sup>

这个精辟的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得对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的认识和社会改革理论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其后,理论界空前活跃,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会纷纷召开,那些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人沉默了。当然,私下仍有议论:有人认为这是邓小平个人的谈话(因为从职务上看,当时邓小平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不代表中央意见;也有人认为邓小平事先不经过中央同意就对重大问题发表谈话,是非组织行为。但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确认邓小平的谈话,并将谈话内容作为中央精神组织全党学习。虽然这次讲话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几乎重复了1990年和1991年的谈话,但不同的是,从理论上把这个问题同如何观察和判断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起来,形成了正式的文字,为党中央所赞同,给予高度评价,在党内印发了正式文件,从而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写进《宪法》修正案第七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轮廓框架作了设计。这样,市场经济这个长期被当作社会主义异端的经济制度,终于和社会主义这个词连接起来了。<sup>②</sup>

尽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一种经济方法和经济手段,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共有,但在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体制、运行机制非但不可能独立地存在、孤立地运转,而且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因此,还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sup>②</sup>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第335~336页。

的。”<sup>①</sup>所以,我们提出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笼统地提市场经济体制,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立市场时,必须注意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使之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服务。

## 第六节 关于党的建设

虽然苏东剧变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党的内部出了问题”<sup>②</sup>应该是其中一项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第二、三代领导核心对此是有共识的。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讲话中明确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并要求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sup>③</sup>1992年春,他又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sup>④</sup>这些都是针对党的历史任务和现实问题提出的要求,也是他总结苏共垮台教训得出的结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依照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聚精会神地抓紧了党的自身建设”,<sup>⑤</sup>并且始终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sup>⑥</sup>。

如果从党的自身建设探寻苏东剧变原因,问题又出现在哪里?这同样“需要全面深刻地加以总结”,“总结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有新的发展”。<sup>⑦</sup>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页,都有同样的表述。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⑤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85页。

⑥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⑦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第410页。

## 一 思想建设方面

在党的思想建设上,苏东执政党的主要失误表现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从斯大林中后期开始,由于苏共对马列主义存在严重的理解误区和形而上学的曲解,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特征的描述当作社会主义本质本身,把以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尤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加以固化、神圣化和普遍化,到处推广。以至于教条主义在苏东国家横行,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甚至把学术分歧意见也视为不同政见,并加以压制和打击,导致党的指导思想日益僵化与混乱。赫鲁晓夫上台后,一方面大反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一定程度上丑化了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提出“三和两全”一系列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路线,后来又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理论。

勃列日涅夫虽有所修补,但基本上坚持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们总的来说都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重视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关系超前变革所造成的生产关系与现实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结果是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苏东各国不仅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反而使社会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恶化,党和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普遍下降,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在人们心中黯然失色。总的来看,斯大林之后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东共产党,主观上是想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则是不自觉地违反了马克思主义。<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继承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和“三和”路线基础上,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苏东各执政党提倡“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在政治上主张多党制和西方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

<sup>①</sup> 肖枫:《苏联解体的深层教训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理论前沿》2002年第4期。

上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允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或舆论工具上公开发表与党的决议不同的意见。这些主张的推行,导致党内思想混乱,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对苏共、诋毁革命导师的思潮甚嚣尘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销声匿迹,而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和腐朽糜烂的思想意识大肆泛滥。戈尔巴乔夫在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实际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主动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这一点连资产阶级政治家都看清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说戈氏新思维的“严重危险在于瓦解了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从而最终导致共产主义的“大失败”。

苏东共产党在思想建设上犯了先“左”后右的错误,先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后又跳到背离和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毋庸置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进行理论创新,苏东执政党也确实曾积极进行了理论创新,但它们未能处理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所谓的理论创新逐渐演变为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由于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丢掉了先进文化的灵魂,失去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资格,自乱阵脚,才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攻势面前迅速败下阵来。

我们党对此有清醒认识。江泽民曾明确指出,苏东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归根到底是苏东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sup>①</sup>

有鉴于苏东执政党思想建设上的失误,我们党在苏东剧变后不久提出“切实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sup>②</sup>,提出和开展了一系列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举措。从1989年到2002年,党中

<sup>①</sup> 见靳辉明:《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实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sup>②</sup>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央先后在全党进行“三个基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知识)教育,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四个如何认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斗争带来的影响)教育,等等。结合思想建设的具体实践,我们党就如何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在理论认识上不断深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同时强调“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sup>①</sup>，“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sup>②</sup>。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根本的是坚定不移的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十六大又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 二 组织建设方面

苏东执政党之所以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尤其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时出现了偏差。长期以来,苏东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在组织上只强调集中的一面,“民主”成了徒有虚名的摆设,党内民主缺乏。虽然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原则是集体领导,但实质上仍然是个人专断。在领导干部选拔上,采用干部委任制和事实上的终身制。在干部教育和管理方面,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多。这样不仅使干部队伍老化,思想僵化,个人崇拜盛行,而且使各级领导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接班和交替经常出问题。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另一个方向逐渐抛弃民主集中制。苏共二十八大的新党章与民主集中制渐行渐远:一是在少数服从多数原

<sup>①</sup>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35页。

<sup>②</sup> 江泽民: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则方面,以保护少数为由,允许党员在党的各级刊物上发表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二是在下级服从上级原则方面,强调民主,推行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使集中徒有虚名;三是在党内派别活动方面,允许横向组织活动,允许成立不受党委领导的党组织、党的俱乐部、理论研讨会等。1991年,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新的纲领草案,则完全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强调共产党“独立自主”,党的组织“广泛自治”,允许党员“围绕纲领自由结社”,即正式承认党内的派别活动。这导致苏共一下子变成组织庞杂、党心涣散的政治组织,最终导致党的瓦解。

苏共的教训是深刻的。而我们党则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sup>①</sup>,江泽民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他提出要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并针对实际存在的民主不够和集中也不够的情况,要求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在具体领导方法上,提出“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十六字方针,为实现党委集体领导和科学决策指明了途径和方法。提出干部队伍建设是党建的关键性工程,要按照“四化”标准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和任用干部,加快干部制度的改革,“党要管党”,强化党内监督,严肃党纪。<sup>②</sup>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上,强调“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sup>③</sup>。在十五大提出:“党的基层组织都要……努力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群众完成本单位任务的坚强战斗堡垒。”<sup>④</sup>在党员队伍建设上,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转变组织的思想观念,用新的党员标准,把社会各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总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的是把党建设成坚强领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

②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3页。

③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6页。

④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导核心,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sup>①</sup>。

### 三 党风建设方面

人心向背的变化是苏东剧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sup>②</sup> 苏东各国党在执政初期,能够注意党群关系,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但随着执政党地位的变化,权力的扩大,党内开始滋长官僚主义作风,具体表现为主观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工作不负责任、不关心群众疾苦。与官僚主义作风相伴的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到后期,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不仅没有被制止,反而愈加盛行、泛滥,各国共产党日益脱离群众,甚至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苏联解体前,《西伯利亚报》作了一项以“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为题的民意调查,在被调查者中,当人们被问及“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均为2%,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了85%。<sup>③</sup> 这说明苏共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完全丧失了代表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宗旨,完全丧失了作为共产党的基本要求,所以它的垮台是必然的。

苏东各国执政党由于丢掉了人民群众这个根基,最终被人民所抛弃,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们党从苏东剧变中吸取教训,不断告诫全党:“党的作风状况,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sup>④</sup>十五大明确指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强调“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sup>⑤</sup>。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党风建设问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系统阐述了党风建设的基本内涵、战略任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页。

③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④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第531页。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0页。



务、总体要求,有针对性地确定了党风建设的途径与方法。

苏东剧变后的 10 多年里,我们党在不断反思和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时,始终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着眼于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不断将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逐渐形成一系列成功经验。如果将这些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苏东党的垮台从根源上说就是没有实现其作为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作用。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既是对党的 80 年历史经验的新总结,尤其是对我们党在苏东剧变后 10 多年党建经验的新总结,同时也是对苏东各国政党历史经验教训的新总结。正如胡锦涛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深刻总结我们党和世界上一些政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理论内涵来看,“三个代表”思想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三者有机融合在一起,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新的历史任务的新概括,对全党提出的新要求,对党建理论的新发展。这个“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个代表”思想为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提出了现实要求,指明了努力方向。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如何不断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问题。二是“三个代表”思想成为衡量新时期党的建设成效的标准。如果说“三个有利于”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那么可以说“三个代表”思想就是“三个有利于”在新时期的引申和转换,是检验我们新时期一切工作,特别是党建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sup>①</sup> 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有机统一中建设好我们的党,这是我们对 21 世纪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大思路,一大创新。

<sup>①</sup> 尹德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与党的创新》,《探求》2000 年第 4 期。



# 第四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创新发展

正如中国革命经历了长期探索,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确立了科学革命观一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长期探索之后,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平发展的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上。胡锦涛强调:“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今天的发展既是昨天发展的继续,又是明天发展的基础。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蕴含着中国几代人的理性探索,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血,也反映了多年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既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丰富思想,又着眼于世界发展趋势、立足于新的发展实践,进一步回答了我国怎样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以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现了从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转变,开始实现从非平衡发展到相对动态平衡发展思路的转变,进一步端正了“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属问题,解决了发展动机和发展效果相统一的问题。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从理念、政策到思维方式上自觉把握平衡与非平衡发展的关系达到了新的水平,这也是党的执政能力迅速显著提升的重要标志。同时,也表明中华民族人文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意义,就在于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世界观回应,也是与政绩观、群众观、人才观、荣辱观相结合的世界观体系;既是对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也是当代先进文化理念的集中体现;既是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成果,也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交融汇合的产物。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经验结晶,它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 第一章

#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科学发展观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完成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面临着加快经济增长、加强社会建设、保护资源环境等多重压力,这就决定了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成功经验,又不能重复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

## 第一节 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

### 一 催生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背景

#### 1. 综合国力竞争的形势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二战后世界走向多极化,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种可测、不可测的挑战很多,有的还比较严峻。如: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还在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美国

等西方大国利用各种手段干涉他国内政等。当今世界各国关系,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和竞争。目前各主要大国都已瞄准未来5~10年,设法在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中抢得先手。美国把21世纪初定位为维持其“一超”地位的“机遇期”,俄罗斯视未来5年为其强国战略的“重大考验期”,日本有“经济新生计划”,欧盟有“电子欧洲”计划,印度有“跨越性发展战略”,综合国力竞争趋于白热化。我国要在大国关系新一轮调整中处于主动、有利地位,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必须依靠本国的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以高新科技为主导,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科技革命。这场革命以信息科技革命为先导,以新材料科技为基础,以新能源科技为动力,以海洋科技和空间科技为内拓和外延,以生命科技为新世纪战略重点,突飞猛进,引起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高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这场革命创造了新的技术经济体系,产生了新的生产管理和组织形式,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国际间科技、经济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产业技术升级加快,经济结构加速重组。各国特别是大国都在抓紧制定进入21世纪的发展战略,力图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各国更加重视科技人才,教育的基础作用愈益突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金融、信息三大要素的普及,经济资源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各民族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和联合的程度日益加深,世界经济呈现全球化趋势,相互渗透,交往、联系更加密切,没有哪个国家能长久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总体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随着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世界经济正处在新一轮恢复和增长期。各国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全球化进程对我国的影响更加明显,随着中国的发展更加融入世界,中国怎

样发展自身便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 2. 国外对发展问题的探索

西方国家对发展问题的探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经历了一个理性反思的成长过程。二战后,西方工业国家大都受到物质匮乏的困扰,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也普遍感到自己贫穷落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追求经济增长、消除物质匮乏或贫困状态作为自己最迫切的愿望。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发展,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经济增长论应运而生。其中代表性的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等人的大推进平衡增长理论、缪达尔达的经济发展理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发展理论、艾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等。作为传统的发展观,经济增长论是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最初探索,它把“发展=经济增长”,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发展的标准与目的。随着实践发展,传统发展观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无法实现持续增长和真正的发展。如经济发展不能自动实现公平、平等社会目标,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给全球带来了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这种“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现象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或“恶的增长”。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传统发展观的弊端和不足。这种反思是从关注生态问题开始的,各种取代传统发展战略的发展观应运而生,诸如“基本需求战略”、“边增长边分配战略”、“公平增长战略”、增长极限论、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等。1962年,美国科学家蕾切尔·卡森发表《寂静的春天》,对杀虫剂 DDT 破坏大自然危害生命的行径进行了尖锐谴责,提出了人类如何同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发展=经济增长+自然生态”的发展极限论。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又把人的发展作为发展观的一个中心问题提了出来。7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对新发展观作了系统论述。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未来学派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轰动世界。报告把经济增长、城市化同人口和资源等环境问题联

系起来,提出了全球性的生态、人口、环境、资源等问题。报告把自然生态纳入整个发展系统,指出了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对于帮助人们从传统发展观的种种误区中走出来,发挥了巨大作用。发展极限论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发展观,但也存在诸如忽视科技进步、忽视人的积极能动作用等不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以积极姿态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即要重视经济发展,要重视人的发展,并把人与自然的协调以及子孙后代的发展都作为发展观内含的问题来考虑。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在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充分表明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对于人的关注在新的发展理念中凸现出来,产生了“发展=经济+自然+社会+人”的综合发展观、“以人中心”的发展观等。综合起来看,相对于传统发展观,新的发展观念主要实现了三大转变:一是从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增长第一”的经济发展导向转为提倡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二是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转到以人中心的发展;三是不惜以破坏资源、环境、生态为代价追求经济的一时繁荣转到主张可持续发展。

发展最初主要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马歇尔等经济学家都曾关注国家如何变得富裕繁荣,如何使财富更平均地分配。在他们心目中,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动力,文化、历史、社会和政治则作用不大。社会变迁、政治发展、民主化来自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最终会带来社会和积极的积极变化,使社会富裕、中产阶级壮大、民主化实现。与这种狭义的发展概念相比,广义的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还包括文学、艺术、科学的昌盛,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秩序的和谐,国民素质的改进等,既要经济繁荣,也要社会进步。主张广义发展的主要有激进的发展主义和弗兰克、桑托斯、阿明等人倡导的新马克思主义,认为要从更大的视野角度研究人类的社会、经济、科技、环境的变迁。他们因拉美“出口外向”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失败而对西方发展理论和



模式提出批评并予以否定。他们认为,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处于对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依附地位,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从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论,到伊万斯、卡尔多索的“依附性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不无启迪。他们认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满足人的需求和进一步的愿望,是使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的需要与欲望方面得到持续提高。我国有专家认为,发展是在人类生存条件被基本满足后,为满足其进一步的需求和愿望所付出的正向行为的总和,具有不可逆性、进步性、正向性及关联到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性。在乌尔里希·贝克的“世界风险社会”视野中,发展意味着风险及其积累,现代化社会是一种人为技术、制度制造和积累风险的社会。风险紧跟着“进步”,就像影子跟着光一样。在持有“反思性现代化”或“第二现代化”发展观论者心目中,整齐划一与多样性同时存在,但分化和多样性越来越主宰现代化,多样性在各个方面都构成了“第二现代化”的核心概念,成为这种世界观的基本范畴。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提供了经济快速发展机遇,也造就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多重困境。全球化的经济效应,是全球财富增量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内部的少数群体。全球化的政治效应,表现为霸权政治与协商政治、单极政治与多极政治矛盾加剧。全球化的社会效应,表现为社会生活“同质化”趋势与贫富分化、阶层分野同时并存。全球化的文化效应,造成物质生活丰裕化与人们精神生活贫乏、物质至上、个人至上、生命意义空虚化之间的鲜明反差。作为参与全球化并获得较大发展的几个国家之一,中国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全球化带来的困境与矛盾,在人口、资源和环境方面的问题格外突出。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治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风险社会,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严峻考验。

综上所述,应对全球化并反思发展问题,是一个关涉全球普世价值的全球意识问题。新的发展理念提出发展的三重价值标准:维持生存、自我尊重和自由。发展除了必须提供食物、住房、卫生保健和安全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之外,还必须提供就业机会、教育

条件,对文化和人的自尊给予更多的关注,特别是要使个人和国家摆脱对其他国家的屈从和依附,摆脱对愚昧和使人类痛苦的力量屈从和依附,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选择范围。资源、环境、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相继被提出,标志着对以往发展内涵的补充和革命性创新。伴随着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入,以人为中心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观念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所推崇。

我党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些研究成果,科学发展观就是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在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 二 60年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特别是30年改革开放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根据

从近现代开始,中华民族追求发展的思想源远流长。从学习西方宗教的太平天国、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辛亥革命,一直到“五四”前后我国思想界的四次大论战,包括1915~1927年东西文化论战、1933年中国现代化讨论、30~40年代中国文化出路论战、20~40年代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论战,无不渗透着谋求中国发展的思想及其策论。择其要者,有严复翻译《天演论》输入社会进化论思想直接导致章炳麟的“种族革命”理论;有孙中山从“振兴中华”到提出“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和“三大政策”;有梁启超从“保国保种”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论;有陈独秀、胡适高举“科学”、“(人权)民主”大旗到陈独秀所说的“欧化”、胡适所讲的“西化优于东方化”成为东方各国的发展趋势。在中国现代化讨论中,以“现代化”概念取代“西化”概念,引出了整个中国出路即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当时参与讨论者大多数不赞成“私人资本主义”取向,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有受国家社会主义、统制经济、自足经济思想影响的,也有受法西斯主义思潮影响的。而以恽代英、杨明斋、杨铨为代表的“以工立国”论与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以农立国”论的辩论,实际上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

者宣传中国走工业化道路的成功典范。在谋求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贯穿其中的有孙中山的新“民权”思想、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思想,一直到毛泽东的“民众”思想即倡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对于形成科学发展观理念有极为重要的精神启迪。

科学发展观形成的主要历史根据是中共领导的60年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和30年改革开放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摆在共产党面前,发展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中心任务。八大提出了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观点,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后来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面对苏东剧变、亚洲金融危机、严重自然灾害等各种严峻考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前进。

科学发展观是在马克思发展理论复苏基础上形成的。因为种种原因,在20世纪50~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的研究曾经停滞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当时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权威观点是关于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的观点,而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和消费社会则完全被排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野之外。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概念被描述为单线的发展图式,唯一动力是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力而只研究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不讲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只讲中央统一计划。历史证明,对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忽视,给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30年改革开放实践不仅解放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而且打破了人们对马克思发展理论的成见,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构成了理论探索的研究主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其关系相继成为理论研究的兴奋点。

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提出来的。非平衡发展与相对动态平衡发展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思路 and 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时间内采取非平衡发展模式是当时发展形势所迫。毛泽东当年并不是不要经济发展,他曾亲自研究农业生产经验、亲自制定“鞍钢宪法”、亲自提出“十大关系”,但他过分强调打破平衡的经济大跃进,强调以生产关系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邓小平为了夺回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宝贵时间,抓住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国际和平环境,主张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利用非平衡发展的速度和效益,明智地抓住机遇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江泽民明确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提出了“现代化建设十二大关系”和“科教兴国”战略,但对于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对于非平衡发展中涌现的大量矛盾和问题则来不及处理和解决。

“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是一致的”。真正实现从非平衡发展到相对动态平衡发展思路的转变,是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多瓶颈因素和矛盾凸显之后,特别是对2003年“非典”事件反思后所实现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的提出,实现了从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转变,端正了“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属问题。在实践和理论、历史与现实的映照和反思中,开始形成了“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都必须让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的价值原则。标志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总体要求,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思想,丰富了这一思想的时代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新高度。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表明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是党的执政能力迅速显著提升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使中华民族人文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

### 三 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要求和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直接时代背景

科学发展观的直接催生剂是十六大以来新的实践及其发展

要求。

(1) 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这是科学发展观产生的现实依据。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发展阶段,若举措得当就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若应对失误则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如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排名世界第四,但许多农村还主要依靠传统手工工具和畜力耕地,大多数工人仍以体力劳动为主。工业生产主要靠消耗自然资源,技术含量偏低,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现象很严重。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列第133名。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曾公开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到位,社会经济活动相当程度上仍由政府唱主角,企业的主体地位远远没有确立,许多地方的招商引资往往是一种类似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政府行为,实际效益比较低。国有企业缺乏活力和竞争力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资产责任人没有把责任真正承担起来,国有资产以多种方式流失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显存在,公共权力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衡,腐败现象蔓延趋势没有从根本上予以遏制。

第三,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2001~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的 actual 收入下降2.4%,全体劳动者的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比印度还低。在我国的城镇居民家庭中,10%的高收入

家庭拥有居民家庭总财产的将近 50%，而 10% 的低收入家庭仅拥有居民家庭总财产的 5%。

第四，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我国城乡收入比例已经达到 5：1 甚至 6：1，比 20 年前高出近 3 倍。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将近 70%，但花费的卫生费用只占卫生总费用的 33%。1991～2000 年，全国新增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 14% 投入到农村，其中 89% 属于人头费，真正专项的农村卫生经费只有 1.3%。

第五，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等消极现象比较严重，行政成本很高，行政效率很低。1978～2003 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 28 倍，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 87 倍。

第六，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电视、电影和各种文化娱乐形式空前普及，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期望值越来越高，央视春节晚会越来越难办。但社会道德滑坡现象也十分严重，一些格调低下、庸俗腐朽的娱乐方式比较流行，不少洗浴场所、按摩中心、高档宾馆藏污纳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不少地方和领域远没有占领意识形态的主阵地。

第七，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现在在我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但各种利益群体的差别和分化也越来越明显，社区、社团、社会建设和管理有不少漏洞。

第八，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2)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有直接的、内

在的联系。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经过 20 年努力,建设一个能够惠及 10 多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20 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这种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完全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在 2000 年进入小康社会时确定的 16 项检测指标和小康临界值中,到 2002 年起码有三项没有达到。进入 21 世纪后,农民收入增长率连续 3 年下降,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艰巨任务,即如何解决好城乡差别问题、区域发展中的差距问题,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此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方针。

(3) 2003 年的“非典”疫情直接刺激了科学发展观的产生。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虽然前后只有两个多月,但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旅游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业造成很大损失,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社会生活都因疫情而被打乱。当时随着“非典”疫情的蔓延,整个中国人心浮动,社会发展的滞后性暴露无遗,警示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要搞好公共卫生、教育等各方面工作,要把对人的关爱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党中央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及时研究和部署防治工作,取得了抗击“非典”的重大胜利。同时,中央也深切体会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在抗击“非典”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不久,中央提出要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

##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要求和意义

### 一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

2003 年 4 月,胡锦涛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防治“非

典”的情况,强调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积极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7月,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指出: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胡锦涛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探索促进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

2004年2月,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上指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坚定不移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十一五”时期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6月,中宣部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公开发行,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sup>①</sup>

2007年6月,胡锦涛在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

<sup>①</sup> 《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实科学发展观,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并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了四点要求: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10月,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十七大报告完整准确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核心、基本要求、根本方法,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系统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 1.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对“为什么要发展”、“什么是发展”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这是对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重申。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sup>①</sup>

### 2.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靠谁发展”、“为谁发展”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是“以人为本”的人的发展,即“每个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取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将是

<sup>①</sup>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①</sup>。“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所以与其他发展理论相区别,就是以“每个人的发展”为逻辑起点,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发展和另一部分人的不发展,同时人的发展又是指每个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这才能够体现“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都必须由人民共享”的精神实质。人民是每个人的总和,“每个人的发展”是能够把“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直接连接起来的唯一逻辑中介。“每个人的发展”之所以还不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因为还未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发展水平,还仅仅是社会主义阶段的目标追求和价值起点。“每个人的发展”并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的发展,而是社会关系中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发展,以区别于抽象的人道主义或人性论的逻辑起点。科学发展观总体上就是分析、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状况、趋势及其规律,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所以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根本所在。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在发展问题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更加关注发展的主体、动力和目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

(1) “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和价值,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

(2) “以人为本”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相信谁、为了谁、依靠谁,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3) “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首位,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4) “以人为本”就是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这强调了发展的社会主义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总体上看,“以人为本”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抉择、方向引导和实践主体,所回答的是立足什么求发展、为了什么去发展、依靠谁来实现发展等根本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核心就是心脏,就是活的灵魂。只有牢牢坚持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才能为发展确定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归宿,确定应有的实践主体和动力来源。

### 3.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是对“怎样发展”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 4.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最初只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还没有把其作为根本方法。胡锦涛在“6·25”讲话中第一次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并在十七大报告中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 二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十七大报告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四点根本要求,揭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路线保障、社会保障、动力保障和政治领导保障,体现了党在发展问题上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七大在党的基本路线表述中增加了“和谐”两个字,完整表述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

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在现阶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工作任务,就是注重解决各种突出的社会问题,确保社会和谐发展。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我国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正是改革开放促进了快速发展。现阶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就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机制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结合点,使改革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站在完成党执政兴国使命的高度,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更好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 三 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思想,成于邓小平理论,发展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项长久性的主题,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走自己的路”这一探索主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格局；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科学发展观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理念，它科学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向前推进并形成新的形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有机整体和复杂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的历史过程，要正确处理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特别强调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高目标。

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是否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产生是实践的客观要求。科学发展观建立在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全面回顾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发展历程、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之上，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源的理论。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又指导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过程就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过程。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得到广泛认同,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变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社会建设被正式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之中,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延续 2000 多年的农业税被免除,国家财政的支农力度持续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展开,建设现代农业速度明显加快。2004、2005、2006 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 6.8%、6.2% 和 7.4%,增幅连续 3 年超过 6%,是 1985 年以来的首次。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为我国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抑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2006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实现 3 年来的首次由升转降。“十一五”规划提出 8 个刚性指标,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出了硬性规定,既表明中央在经济发展上“好”字当头、“好”中求“快”的信心和决心,也使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了可靠“抓手”,树立正确政绩观有了具体内容。

## 第二章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和利益多样化的时代,保持执政党对于13亿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不仅必须具备符合我国国情的完整的执政理论体系,而且要有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体系。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我国战略机遇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和谐发展是预防经济增长黄金期衍变成为社会矛盾突发期和高发期的重要原则和根本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经济增长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增大,也不仅是行政管理改革和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文价值基础。这个基础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人,都是为了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和谐社会,就是一个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福利不断提高的社会。



## 第一节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它离不开现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发展的新特点。

从国内看,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这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加速转型时期,这既是“黄金发展时期”,也是“矛盾凸显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将是一个多事之秋。在社会转型加速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特点,尤其是一些不和谐因素越来越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已从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劳动、资本、自然资源、技术等四大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很大变化,我国经济增长遇到了新的制约。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据测算,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3.24。2000年全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2005年家庭人均年收入基尼系数已高达0.496,家庭人均年收入最高20%的人占有58.4%的收入份额,而最低20%的人仅占3.0%,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sup>①</sup>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现状看,大部分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是好的,但由于政治机制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一些领域

<sup>①</sup> 《2006年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状况调查报告》,《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4页。

的腐败现象严重,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也影响群众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败坏了社会风气。政治制度不健全,政府职能界定不清,利益关系的确立与调整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决定,掌握“公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转移及掠夺他人和国家的财富,并把这些财富合法化,导致了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据调查,84.5%的人认为靠关系或后台找份好工作很容易。可见反腐败的任务非常艰巨,党自身的建设与完善迫在眉睫,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社会领域出现了新变化,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转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21世纪的头5年,城市化率提高了6.8个百分点,每年有1700多万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这种社会结构转变的速度和深刻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济体制转变和社会结构变动,引起社会成员分化和利益格局调整,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形成了复杂的阶层关系和利益关系。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各种利益群体的一些利益要求难以得到满足,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人们的社会心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普遍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要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发展的离散态势,主流意识形态普及面临新的挑战;道德取向和道德秩序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一些社会成员心理失衡、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成为引发社会不和谐的因素。<sup>①</sup>

从国际看,世界很不安宁,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

<sup>①</sup> 《2006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27~28页。

渡的重要时期,美国企图称霸世界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称霸的斗争还在反复较量;一些西方势力打出“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在意识形态领域“打没有硝烟的战争”,企图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继续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战略,动摇我们的理论基础和价值信念。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互相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恐怖活动依然猖獗,地区和国际形势仍然很严峻。

## 第二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挑战和风险,解决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属于社会建设范畴。对社会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社会建设相对薄弱,满足不了人们多方面的社会需求,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出现了不协调现象,社会建设的紧迫性日益显现。

2002年,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个奋斗目标之一。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执政党的五种能力之一提了出来,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求全党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并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此次全会特别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充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使其从一个理想性概念变得具有可操作性。全

会要求: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sup>①</sup>

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全面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他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正视国内矛盾和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已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他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sup>②</sup>这是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内容的描述,也是其基本特征。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还重点强调要做好十方面的具体工作。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①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6/26/content-3138887.htm>。

的思想已越来越完整。

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一五”规划建议,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十一五”规划的重要任务,指出“要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sup>①</sup>。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成熟标志。“决定”从酝酿、起草到通过,历时8个多月,作了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经过50多次修改。“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定位、指导思想和原则、目标任务、总体要求、战略部署和关键问题作了深刻论述:

(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定位。“决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sup>②</sup>。这段话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性质定位作了简明概括。

(2)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总要求。“决定”强调: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同时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决定”还指出:“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sup>③</sup>。2005年2月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内容特征在此被视为构建过程中的总要求,并提出重点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就为其具体的构建工作明确了方向。

①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

(3)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决定”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制定了到2020年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主要有九个方面:一是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方略全面落实,人民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二是城乡、区域差距扩大趋势得到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生活更加富裕;三是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四是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五是全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六是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七是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备,社会秩序良好;八是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九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局面。<sup>①</sup>这九项目标任务的重点是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符合人民的心愿,有极强的亲和力,增强了其实现的动力,体现了“四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以人为本”的思想。

(4)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遵循的原则。“决定”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规定:一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一切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强调要做好“五个统筹”工作,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清洁、安全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推进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创新,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四是必须坚持民主法制,强调一方面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另一方面要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逐渐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是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

<sup>①</sup>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

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六是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强调党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这六条原则是我们党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为准则,它为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提供了重要保证。

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虽没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专门论述,但整篇报告都渗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与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一致。特别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sup>①</sup>,并阐述了两者的内在统一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只有通过科学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不断地促进社会和谐。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 第三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定位和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中处于什么地位?它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建树中处于什么地位?它与科学发展观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是我们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定位和意义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曾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百年试

---

<sup>①</sup>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发展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之上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而存在,而我国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中国的体制是从苏联那里来的,但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何走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到,也不能从苏联那里拿来,必须结合我国实际、通过实践来不断加以回答。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正确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前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尝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结束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混乱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破除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思想理论禁锢,科学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实践起点。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带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各种有利条件。<sup>①</sup>

<sup>①</sup>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6/26/content-3138887.htm>。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提出的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不仅体现了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高度统一,而且体现了最高社会目标与当前奋斗纲领的有机统一。它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既是对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当代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潮流,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和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新贡献。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不仅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全世界热爱和平、渴望美好生活的人们的共同愿望。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带领全体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新成果,它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全世界的和谐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在理论范畴、层次和角度上有区别:前者是价值取向、社会状态;后者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但科学发展观和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是有机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既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

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sup>①</sup>

构建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合乎逻辑的展开,它拓展了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的科学内涵。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飞跃,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推进到社会结构层面,必然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党的执政目标之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意味着我国将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的现代化总体格局,这大大丰富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涵,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处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各种问题提供了更完整、更科学的坐标系。<sup>②</sup>

---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7页。

② 常修泽:《和谐社会的价值、特征和构建思路》,引自南方网:<http://www.southcn.com/nflr/llzhuanti/hexie/hxlw/200503180499.htm>。

### 第三章

##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它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并受其制约,是处于一定经济关系之中的人们的利益和需要的反映,它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强力支撑。社会价值体系是一个包括核心价值体系和一般价值体系的完整的、内涵丰富的价值观系统,其构成具有层次性。社会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由核心价值观构成的核心价值体系,由里到外则是由一般价值观构成的处于从属地位的其他价值体系,主要包括伦理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对其他层次的价值观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各个层次的价值观依据核心价值观来确定其内涵。各个层次的价值观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各个层次的具体价值观内涵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调整或变化。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对人类未来社会价值诉求的基本看法和总体要求,是几千年来人类所追求的社会价值理想的一种延续,是对一种更人道、更平等、更自由的合理社会的理想价值诉求,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这一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积极扬弃的基础上的,是在吸取以往人类一切文化中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以人民利益为目标的新型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同样包含了社会

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一般价值体系,它是由核心价值体系主导的多元价值体系构成的价值系统。

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就会失去社会前进的方向,失去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力量之源。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在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对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整合功能。当前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抓住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和根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第一节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时代背景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十七大报告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我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当前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和价值观现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的复杂背景。

### 一 当前我国的社会思潮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综合表现形式,当前我国的社会思潮的特点是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反映,主要有以下特点:

(1) 复杂多样,主流的与非主流的思想观念同时并存。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也存在清浊激荡、良莠并存的现象。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先进与

落后、创新与保守等思想观念的矛盾冲突相互交织。

(2) 利益主导,社会思潮的产生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导向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动,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利益。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引起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矛盾的冲突,使人们原有的利益归属、价值判断和情感亲疏受到冲击与震荡。

(3) 自由互动,信息化网络化思想交流方式日益形成。网络正在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和思想交流的重要方式,它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界限,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极大地改变着舆论传播、思想交流、生活内容和行为方式。网络信息传播的开放性、互动性、隐蔽性、随意性、便捷性和发散性,使信息来源难以预测,信息内容难辨真伪,信息流向难以控制。

(4) 开放交融,国外思潮和国内思潮相互影响。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加剧了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各种国外思潮不可避免地涌入我国,其中不乏有可以学习借鉴的真知灼见,但也有很多容易造成思想混乱的错误观点。<sup>①</sup>

## 二 当前我国的价值观状况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是针对当前社会价值追求和道德取向状况提出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一组调查数据充分说明了这一现状。

在调查中设计了一些与价值观相关,但相互之间并不是和谐一致以便防止诱导性的提法,让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取向作出选择。从调查结果看,虽然理想追求仍居重要位置,认为“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和“为社会作出较大贡献”这两个说法上“比较符合”和“很符合”自己情况的人分别占68.3%和77%,然而对照起来,“只求家庭生活舒适和睦”、“希望赚更多的钱”、“充

<sup>①</sup> 衣俊卿:《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转引自“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讨会”大会发言材料。

分发挥个人才能”、“追求个人生活情趣快乐”则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选择“很符合”和“比较符合”的人分别达到 91.6%、88.3%和 82.1%和 79.4%。另外有近 1/4 的人追求“做官”,超过 1/3 的人追求“出名”,社会价值追求呈现一种离散态势。

此调查还设计了一二十个相关的道德命题,请被调查者表达他们同意的程度。调查数据显示,同意(很同意+比较同意)“守信用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的人占 98.2%,同意“滴水之恩,也一定要报答”的人占 95.1%,但同意“人生就应该要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人也超过半数,占 54.6%,而同意“有关系或后台硬,要找份工作不是件难事”竟然占到 84.5%,同意“善良正直的人常常会吃亏”的人也占到 69.8%。不难看出,我国社会在总体上执守着道德底线,但道德取向和道德秩序也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sup>①</sup> 归结起来,上述价值取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价值理性在日常生活中日趋衰落。在实际生活中,如果人们坚守价值理性,往往会失去很多好处,这迫使不少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放弃了对价值理性的要求,只追求工具理性,追求手段的有效性。把一切都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甚至把人也看成工具。这就导致了终极价值观念的缺失,价值观念的一致性难以形成。

(2) 功利主义思想盛行。人们把价值原则建立在“趋利避害”的人生和心理需求的基础上,把自己构想为道德权威的统治者,不择手段地追求快乐和幸福,而这样的快乐和幸福本身缺乏最后的价值根基,所以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精神虚无的荒漠。

(3) 榜样道德悬置,大众道德缺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社会中英雄榜样层出不穷,对于形成良好道德风尚起了促进作用,但近年来榜样道德与大众道德产生了严重分裂。榜样道德标准过高,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于是榜样们只能是“高处不胜寒”的道德

<sup>①</sup> 《2006年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状况调查报告》,《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荒漠中的几朵鲜花,而大众道德却因缺乏秩序、规范和相应的引导,成了干涸的荒漠。

(4) 道德规范实效性差。虽然我国历来重视道德教育,并把一些关系人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规范法制化,但目前人们道德观念淡化,以往意识形态所主张的价值导向脱离社会现实的根基,勤劳和艰苦奋斗不被当作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整个社会出现道德滑坡的现象,甚至有时法律的执行也缺乏道德基础,其主要的原因就是道德规范的外在化,道德自律性体系日益他律化,使其不能转化为人们内在的道德需要。

(5) 公平正义的伦理精神难以实现。我国处于转型期,由于缺乏完善的“规范因素”,社会上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制约,以至于原先具有正义价值导向的人会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这种行为,从而造成了非正义行为的泛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加大,各种层次上的公平难以实现,不和谐因素不断出现。若手段并不合乎价值要求的时候,就不坚守价值和法律,只追求手段的有效性,必然会引起社会紧张;社会不公一旦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就必然酿成社会动荡。<sup>①</sup>

### 三 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理政、安民固邦的经验教训的必然选择

任何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需要有主导价值观的强力支撑,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社会文明形态的发展,都内在地要求社会成员具有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品质、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广泛认同的共同价值标准,社会发展就会失去根基。古今中外,不乏先例。先秦典籍《管子·牧民》中就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后来逐渐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体系,成为

<sup>①</sup> 郭丽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导向的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我国封建社会 2000 多年超稳定结构的精神支撑。在西方,资产阶级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形成了一套以个性自由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体系,无论是对摧毁封建制度,还是对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世界,美国和新加坡都把培育国民“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国家战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一些国家的教训也十分深刻。苏联解体实际上就是从核心价值的扭曲与蜕变开始的。正是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全盘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任由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泛滥,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历史和现实表明,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的方向盘,是一个国家的稳定器;能否构建起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体系,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sup>①</sup>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建设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不断完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制度的同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在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性。能否构建起科学完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是否完善、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在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思想文化思潮相互激荡情形下,在国际交往中,应该通过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提高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不仅要发展硬实力,也要发展软实力。发展软实力既可以增强内部凝聚力,形成强大的文化认同感,也可以缓解外界对我国硬实力发展的不利反应,为硬实力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软实力本身也是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因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

<sup>①</sup> 刘云山:《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讨会上的讲话》。



值体系是发展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sup>①</sup>并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sup>②</sup>还特别强调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的重要性。其后,宣传思想战线积极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框架已基本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多元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简而言之,三个关键词是把握它的关键:“社会主义”是其性质定位;“核心”表明其处于统领主导地位,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灵魂;“体系”表明其包含着多层次的丰富内容。

十七大报告总揽全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了系统论述: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定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sup>③</sup>任何社会的价值体系都是该社会价值观的集合体,是建立在该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积

<sup>①</sup>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22 页。

<sup>②</sup>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第 22 页。

<sup>③</sup>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34 页。

极扬弃,是在吸取以往人类一切文化中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以人民利益为目标的新型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整个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它是对一种更人道、更平等、更自由的合理社会的理想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多层次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密切相关的结构明晰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四个不同层次的内容、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处重要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这些内容在不同层面上支撑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告诉我们:伟大的共同理想基于伟大的共同事业;离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提示我们: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指导,就无法铸就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启迪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之中;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要求我们:社

会主义社会应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就无法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一致,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谐发展的基本保证。

(3) 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途径。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是人民精神风貌的决定性因素。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六届六中全会作了五方面的说明:一是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于现代化建设各方面;二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三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四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五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全社会诚实守信意识。<sup>①</sup>

十七大进一步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五个基本

<sup>①</sup>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第22~23页。

途径: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sup>①</sup>

###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根本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定、要求和目标取向。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在新形势下鲜明地亮出我党在思想、文化和精神上的旗帜;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成员的思想独立性和观念差异性不断增强、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明确地树立一个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相适应的价值准则,一个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

(1)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世人展现了我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带领人民成功探索出一

---

<sup>①</sup>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4页。

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和体制。与这些根本性的制度和体制相适应,必然有一个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核心内容作出清晰的界定越来越迫切。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一面旗帜,鲜明地亮出这面旗帜,就是要昭示人们,不论社会思想观念如何多样多变,不论人们价值取向发生怎样变化,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不能动摇的。

(2)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歌德曾说,世界历史的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信仰问题是世界历史的最重要问题。处在改革发展关键期的中国也正是如此。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党就会瓦解、社会就会动荡、国家就会分裂。对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思想基础作出科学概括和清晰界定,明确其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使之容易为全党全社会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在今天社会思想观念和人们价值取向日益多样的情况下,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明确揭示了我们共同思想基础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将会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加自觉地维护我们的共同思想基础。

(3)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引导全社会在思想道德上共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越来越呈现出层次性。不能因为存在着多层次的思想道德而降低甚至否定先进性的要求,也不能不顾人们思想道德的客观差异,用一个标准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那么,用什么来引领人们在思想道德上不断提升和进步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先进性要求,又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广泛性要求;既坚持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兼顾了不同层次群众的

思想状况；既体现了一致的愿望和追求，又涵盖了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和引领力，是联结各民族、各阶层的精神纽带。

(4)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既相互融合又相互竞争，不同文化既相互借鉴又相互激荡。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既挑战着国家主权的内涵，又冲击着人们的国家观念、民族认同感。国家之间的竞争，既表现为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又越来越反映在软实力之间的较量。在软实力中，最关键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它直接反映着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民心、鼓舞斗志，提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竞争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此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只有抓住了这个根本，才能树立和谐的理念，培育和谐的精神，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塑造和谐的心态，才能营造和谐的舆论氛围，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共同的理想信念。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 第四章

#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胡锦涛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村的发展与建设始终都是根本，在农业社会是，在工业社会依然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尤其是。其实“新农村”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这个口号最早提出是在1953年，斗地主、分田地，通过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1956年中国政府又提出建设新农村的目标，随后的中国农村改革也提到新农村的建设。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行，新农村建设并没有列入中国政府的工作日程。

1979年，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带有很大的试验性质，但很成功。遍布全国的农业大包干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也一度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发展高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伴随着诸多的“疑惑”和“不安”。比如安徽的“傻子瓜子”雇工事件，对于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的争论相当激烈。但邓小平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sup>①</sup>当然结果是显然没有。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发展一方面表明了农村经济中巨大的发展能量,也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路径借鉴,但也表明了发展非常不均衡或者不稳定。因为如果没有政策支持等措施,农村中的改革幼苗很容易夭折。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分田之后,农村组织瓦解了,组织资源完全丧失了。人民公社实行了这么多年,加上几次大的运动,传统的建立在地缘关系和学员关系之上的组织被破坏了。现在,公社也没有了,农村因此成为一个无组织的荒漠。”<sup>①</sup>因此,“三农问题不是单纯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而是如何建立农村社会新的公共制度空间、文化空间和新的组织方式,甚至是再次把工作和政策的重心重新转向农村,这就给三农问题赋予了更深的意义。”“本来分田责任制是农民兄弟的伟大创造,不仅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也的确使得粮食大增产,问题是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有的地方在分的时候把一个拖拉机也拆散了,一家分一个零件回去,也有的地方再没有人(或者有人但再没有能力)去从事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了。”<sup>②</sup>现在,党的“十一五”规划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这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回归,而是更高层次的演进,体现了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要寻找到新的载体和新的思路,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006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鲜明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新农村建设总体要求、实施原则和具体任务作出了部署,强调:“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此前不久,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sup>①</sup> 黄平等:《我们的时代——现实的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sup>②</sup> 黄平等:《我们的时代——现实的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第116页。



之所以提出新农村建设,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我国是农业大国,但农业是全国的弱势产业,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慢,消费不旺,主要是农村问题,我国奔小康的最大障碍和主要任务也体现在“三农”问题上。“三农”问题已成为社会热点,面对其他产业的大发展,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支柱,农业不能成跛脚。二是中国现在的城乡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及社会保障优劣程度等都在继续扩大。只有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能够公平地享受经济和社会成果,才能建成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三是中国总体上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支持力度的财政能力。还有就是,因为农民收入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购买力低下,这对国家经济增长非常不利,而打开这一市场的第一把钥匙就是让农民富裕起来。

那么,党中央在 2006 年全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在何处?简言之,“新”就是诞生于新时期,开拓了新思路,塑造了新农民,蕴含了新的历史意义。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诞生于新时期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诞生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时期新阶段,具体来说:在经济方面,具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我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力”。近四年来中央已经连续发了四个中央一号文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逐步调整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由原来的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 87.6%,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 43%,国家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总体上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

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新农村建设也是全国经济发展大局的需要。农村有很多因素对发展全国经济具有吸引力。据有关专家测算,农村人口每增长1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不论是城市市场还是农村市场,总之,市场上产品的消耗就是对经济的推动,换言之,就是拉动内需。

(1) 在政治方面,纳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目标要求。缩小人民收入差距是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目标。目前来看,收入差距已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还存在于农村社会成员之间。首先,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其中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福利水平、生活水平指数等方面城乡差距较大,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是3255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493元;而且重要的是,这个差距和改革之初相比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除了经济收入差距之外,就是农民享受到的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比如教育、卫生、文化等和城市差距非常大,这方面的差距甚至超过了在收入方面的差距。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消除城乡之间的这种差距,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为和谐社会的全局建设奠定基础。其次,农民阶层开始分化,农村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阶层的分化和合理流动是积极的,是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体现。但“不同阶层主要是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和其他农民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有的已相当悬殊”<sup>①</sup>。这些其他农民阶层主要从事农业种植为主,过大的差距,无疑将会对农业生产导致消极的影响,前几年出现了“抛荒”、“弃耕”等不正常现象,近年来,由于中央的农业政策优惠,减少了“抛荒”、“弃耕”现象,但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现象。

(2) 在实践方面,国内外已经有了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先例。一个是韩国的“新村运动”。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推行优先发展

<sup>①</sup> 辛鸣主编:《十六届六中全会后党政干部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工业化战略,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工业,使韩国工业在 10 年间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农村的资源和发展机遇被盘剥,发展停滞,矛盾重重。1970 年 4 月,韩国政府发起了“新村运动”,以“勤勉、自助、合作”为宗旨,寻求传统农村的现代化之路。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即增加基础设施投入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国家出台各项配套政策,以及增加资金投入推广新技术应用等。其启示在于:政府大力引导;资金大量投入;民心大范围凝聚。还有就是国内的新农村建设经验。在国内,江西、四川等省都在新农村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比如要科学规划,要培育农民的主体地位,要整合农村资源,要实事求是等,都是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开拓了新思路

(1) 从纵向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也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

从 21 世纪头 20 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 21 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重视组织领导,确立领导部门,建立组织机构。韩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展“新村运动”时就成立了专门的“中央新乡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专门负责“新村运动”的政策制订和落实。我国在新农村建设上有相关的领导部门,但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其次要注重政策的长期性和连续性。无论何种政策,最忌讳朝令夕改,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亦然。因此,在“三农”政策的制订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上一定要科学、符合农村实际、符合农民要求。

(2) 在横向上更加注重全面推进。

新农村建设覆盖面比较广泛,纵横交错,呈现出一个立体形象,概括起来就是 20 个字,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管理民主”。生产发展包括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新型农业人才的培养,以及农村非农产业的培育等,要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奠定物质基础。生活富裕是农民在吃、穿、住、行、用、医上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生活程度达到较高的层次。既要保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又要保证政府相应补贴的跟进,比如农村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这两大保障在城市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和制度,但在农村仍然处于试行和探索阶段,没有最终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传统的农村社会医疗费用还没有纳入保险体系,很多家庭因为看病导致贫穷。还有一部分农民,思想中存在着积攒“养老金”的想法,把生活中消费的很大部分积累起来,留作养老。正是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滞后,人们用于积累的资金远远大于消费的资金,所以生活水平不高。对于政府来说,不仅仅要探索各项可行的制度,还应在一些基础设施的改建上增加投入,比如自来水管、道路、信息通讯设施等。乡风文明,这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精神层次的要求。村容整洁就是农村规划建设有序,卫生整洁。管理民主,就是农村政治民主,人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又能够统一集中。从纵深方向来看,新农村建设的这五点内容是逐渐深入的,是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再到政治文明的深入发展,也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包含了协调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 (3) 在实践中更加注重联系实际。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在建设过程中要注重政策与实际的联系。以江西赣州为例,“赣州市在新农村建设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基本原则,反复强调要坚持‘三个防止’,即防止把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新农村镇建设、防止政府包办代替、防止急躁冒进,做到‘三个符合’,即符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搞超前消费和过度建设,不增加乡村债务和农民负担;符合当地群众的利益愿望,不搞强迫命令,不做表面文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搞无效益产业,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让农民得到实惠、受

到农民欢迎的政策措施。”<sup>①</sup>赣州市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做法有效防止了 20 世纪 50 年代人民公社时期所犯的急躁冒进的错误。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塑造了新农民

(1) 要培养具备一定技能的新型农民,增加农民收入。

“科技致富”、“科学种田”已经不是新鲜的词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农民科学致富的能力。尤其是在工业“反哺”农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应该有目标、分批次、分类型地对农民进行培训,使他们不仅“专”,而且“精”,能够在一定的专业和职业化培训后,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成为工业在农村投资的主导者,成为农村致富的带头人,带动后富起来的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基础。

(2) 要把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和培育技能结合起来,塑造高素质新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长期忽略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互动作用,经济发展与人的素质提高并不成正比,国民素质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文化建设上的空缺,直接导致人民在文化上空虚,在道德上失衡。所以,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不仅要注重培育农民的新技能,更要注重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不能生活水平上去了,思想道德素质滑坡了。要用“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农民,注重培育农民拥有一种积极向上、健康的生活态度,一种是非分明、善恶有别的道德标准,一种行善除恶、追求真理的价值观念。如此,就是要塑造出新时期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

(3) 要把新农民推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地位。

“农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也是新农村

<sup>①</sup> 陈昭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第 275 页。

的建设主体和受益主体。”<sup>①</sup>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动力之一。因此,新农民的培育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培育新农民,新农民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与建设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农民本身。新农民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在村民自治中发挥作用,为村务的处理建言献策,为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担当起主要的角色,发挥主人翁的作用。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蕴含了新的历史意义

200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0 030亿斤,和2006年相比增长了70亿斤,增幅大约是0.7%。同时,农民收入增速加快,2007年收入水平迈上了新台阶,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 140元,比2006年增加了553元。从农民收入增长的绝对额来看是历史上农民增收最多的一年。增幅扣除了物价指数之后和2006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9.5%。

在目前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基础薄弱的农业还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1) 是发展农村经济、协调城乡关系的战略选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行,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困境的突破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是从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协调城乡关系的战略高度作出的正确选择。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关乎现代化建设成败与否的重要前提。正确处理城乡之间的关系,以工带农,以农促工,形成良性的循环发展体系,经济社会才能走上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过去,我国没有很好地处理

<sup>①</sup> 陈昭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城乡社会矛盾突出,影响了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是把立足于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农村经济市场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的组成部分。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方面的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存在的矛盾直接影响着全国的安宁与和谐。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3)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工作思想的成功实践。

“三农”问题在我国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从2004年以来连续的四个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更是表明了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其中尤其突出的是2000年从安徽开始,2003年全面铺开的农村税费改革。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从此,这个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并在汉初形成制度,在中国延续了

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当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农业税条例》,只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毕竟已经迈出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步。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是农村发展观的转变,在这里,农村不再是单纯的农业,不再是仅仅向城市提供农产品的地方,而是具备多样化生产方式的、可以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重建组织和文化秩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 第五章

# 创新型国家

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这类国家称之为创新型国家。其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2006年1月,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基本指标是,到2020年,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要从39%提高到60%以上,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要从1.35%提高到2.5%。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实施正确的指导方针,努力走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坚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环境,培养造就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2006年6月,胡锦涛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迈出新步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实现新突破。

从系统论的学科知识来说,创新型国家系统工程是包含了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的宏大工程。国家的创新活动就是在政府的宏观制度规则下,如何有效地推动创新机制、创新主体、创新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和互动发展,达到资源的最有效的配置,

从而产生一种内在的创新动力,促进科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新时期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具有深远的背景和长远的思考,同时,这也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 第一节 世界潮流的发展和 创新型国家的提出

现今时代,科技创新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不断推动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进入了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一轮变革之中,继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掀起了又一场革新性运动,高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席卷全球。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国际竞争力不断加强的国际背景下,为了应对世界科技创新带来的巨大影响力,解决我国目前所面临核心技术创新力不足等问题,经过党中央几代领导人艰苦努力、不断探索,适时地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把创新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具体来说,要从毛泽东时代谈起。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指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此外,毛泽东还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sup>①</sup>在党中央科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国家集中和调动了一切可利用资源,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短期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研发体系,并取得令世界瞩目的累累硕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率领全国人民开创建设有中国特

<sup>①</sup>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根据国际科学技术与经济的新态势,形成了科技发展新的战略思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2000年6月,江泽民在西北地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则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质量的竞争。”

2006年1月,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阐述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到2020年使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这里,创新型国家提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非常困难。加之我国人均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供应严重不足,只有科技进步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出路。还有就是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企业普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对外技术依赖严重,出路只能是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将其放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八个着力点之首。

## 第二节 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

(1) 顺应时代发展对于提高竞争力的要求。

从世界经济论坛近几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来看,不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亚洲邻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创新力都远远高于我国。下面这个简单的图表是近三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和亚洲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比较,不难看出我国国际竞争力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与各国的差距确实很大。2007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美国之所以能够排名第一,重点在于美国拥有了比较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包括高度先进而且创新力强的公司和高效的生产要素市场,优秀的大学和教育体系同企业研发能力的强强联合也是美国竞争力提高的重要原因。反之,这些也是中国国际竞争力落后的原因:中国还没有形成高效运转的创新系统,高校和企业的研发还处于“两层皮”的状态,等等。因此,顺应时代发展对于竞争的要求,我国必须走上创新国家的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国家。

2005~2007 年部分国家全球竞争力排名

国家	年份		
	2005	2006	2007
美国	2	6	1
芬兰	1	2	6
瑞典	3	3	4
瑞士	8	1	2
日本	12	7	8
韩国	17	24	11
中国	48	54	34

(2) 根本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

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没有意识到资源、能源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对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能源有限性的认识非常有限。当前,资源短缺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已经被中国高层关注,徐匡迪 2004 年曾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中国的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尽管矿产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是石油探明储量只有世界的 8%,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8%,铝只有平均水平的 10%,铜为 26%,铁是 45%。中国的石油和铁矿石现在对外依存度都已经超过 1/3。为此,中国实现工业化必须走一条科

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sup>①</sup>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亟待解决,现实逼迫中国必须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生产方式,发挥科学技术的创新功能,使更多的新能源、新工艺、新产品不断出现,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资源,利用高科技手段实现无污染能源的重复或循环利用,包括核能、太阳能、风能等。从而转变对煤炭、石油的强度依赖。但无疑,这种转变生产方式最核心的部分只能是技术上的创新。

### 第三节 建设创新型国家体系的几个重点环节

#### (1) 引导者——政府。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离不开政府这一角色,其中政府有两大职责必须明确:提供制度保障;加强宏观管理。制度保障即政府要为创新型国家工程创造大的软环境,为企业创新、技术创新、理论创新等自主创新活动开辟绿色通道,使国家的环境有利于创新成果的产出和转化,这也是国家在制度层面上需要作出的努力。宏观管理则是指国家为创新主体提供技术方面的服务,比如成立科技管理机构,制定科技管理政策,推动科学研究等。这也要求政府必须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经验,在技术管理层面做好服务工作。

#### (2) 主体——企业。

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通过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再次重申,要让“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有关专家指出:“摸前沿、定方向专家是内行,但要讲应用,企业最有发言权。说到底,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利用市场的力

<sup>①</sup> 徐京跃、常志鹏:《徐匡迪:降低能耗是中国新型工业化的一个核心》,引自: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37/2403941.html>。

量配置科技资源,就是以企业为主体和纽带,实现科技资源最有效的调配。”<sup>①</sup>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能否承担起这个重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所在,如何培育我国企业占领自主创新的制高点,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都是值得深思和探索的问题。

### (3) 重点突破——科技与经济相结合。

科技与经济相结合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目前我国科技与经济处于“两张皮”状态: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则很难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没有做到很好的协调发展。突破这个难题,就需要发挥政府宏观管理作用,搭建经济与科技相结合的平台,让希望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聚集的科技园区和以高校、科研院所聚集的大学校区之间紧密结合,使科技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经济为科技的进步提供物质支持,形成良好的互动发展格局,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深入发展。

### (4) 重点关注——“人”的力量。

这里重视“人”的力量,既是指“人才”的“人”,也是指“以人为本”的“人”。也就是说,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一方面要重视“人才”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一方面也要重视创新的成果要为全体人民所共享。重视人才的培养,也就必须重视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切实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此外,还必须重视人才的使用和培训,探索建立人才发展的科学机制。重视创新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就是要继续坚持“以人为本”,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创新成果应用于事关民生的工程,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作出贡献。

<sup>①</sup> 潘霞:《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人民日报》2002年12月7日。

## 第六章

# 和谐世界：共建共享

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作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演，号召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并对建设和谐世界提出了四点建议：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这标志着中国正式把“和谐世界”的主张介绍给了全世界并使之成为中国正式的政策主张。此后，胡锦涛在访问越南、英国以及参加APEC会议，温家宝总理在访问法国过程中，都向各国介绍了中国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sup>①</sup>

在提到“和谐世界”理念以前，更多地被提到的词语是“和平发展”，这个理念要从温家宝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谈起。为应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这两种论调对中国发展的不利影响，2003年12月温家宝访美期间，曾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思想：“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

---

<sup>①</sup> 库世昌：《简析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世界”思想的原因》，《湘潮》（下半月）2007年第7期。

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选择的道路可以称为和平发展之路,但同时中国的发展是在和平的国际空间里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不会危害到世界任何国家,只会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

## 第一节 “和谐世界”思想 提出的背景探析

“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它是中国缓解世界矛盾,促进世界和谐的一种尝试,是国内构建和谐社会,追求和平发展的自然延伸和真实需要,也是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外交日益成熟、自信的产物,这一思想的提出有着坚实的基础,它根植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是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升华。<sup>①</sup>

之所以提倡世界和谐,是因为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对中国而言,其中一个重要或者说关键的原因就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威胁论”又一次沉渣泛起。其内容包括因为中国人口太多,所以要达到欧美同等生活水平则地球吃不消,会向全世界输出难民,买走属于西方国家的资源、粮食、水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品等。拿破仑将中国比作“东方睡狮”的名言,无疑是指出了中国的潜在威胁。

平心而论,这种担心并非无稽之谈。问题在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意味着对地球上有限资源的竞争。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对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关键是如何通过

<sup>①</sup> 杜运泉:《论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与实践》,《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途径,改变对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煤炭的无限依赖,发展更多的太阳能、核能、风能等清洁能源。这是破除“中国威胁论”的最终途径。

“中国威胁论”的前身是“黄祸论”,<sup>①</sup>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包括日本)中以美国炒作最为卖力,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苏联也兜售过“中国威胁论”。确切地说,“中国威胁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曾炒作“中国威胁论”。<sup>②</sup>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时,西方出现了“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这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这种论调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高能耗性和扩张性,必将随着全球能源的紧张而失去发展的动力,导致国民经济的最后崩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避免不了的威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在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西方国家制造的这两种荒谬的论调,无非是对中国近年来经济、政治、科技发展趋势的一种试图打压的非正常手段。正如李肇星曾指出的,在中国境外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论调至少有三种情况:一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威胁其他国家;二是说中国军力太强大了,威胁其他国家;三是说中国消耗的石油等能源太多了,威胁其他国家。

胡锦涛曾强调:“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有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sup>③</sup>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发展不会给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带来威胁和灾难,相反,中国的发展是立足世界,也必将为世界的共同繁荣而努力。“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① 饶本忠:《“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探析》,《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饶本忠:《“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探析》。

③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9月17日。

促进共同发展。”<sup>①</sup>中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会成为威胁其他国家发展的“资本”，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将致力于更多的国际事业，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为世界上更多国家和民族的人民谋福祉。中国在国际上的实际行动和表现，已经赢得了众多国家的肯定，树立了正面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和”的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和合”思想，国要和平统一，家要和睦幸福。

“以和为贵”——要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充满了“要和”的思想，不论是治国还是齐家，古人一贯主张“和为贵”。其中最早对“和为贵”进行阐述的是孔子，“理之用，和为贵”就是孔子的名言。2 000多年后的今人提出了“和谐世界”，是对“和为贵”在传统文化上的解读和宣扬，也是在思想上的继承和发展。不论任何时候，只有和平，才有发展；只有安宁，才有幸福。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幸福，都对“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体现出“和”的珍贵来。那些战乱不断的国家和地区，那些炮火连天的岁月，何来幸福？我国一贯主张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事务，这还是处于“和”的一个比较低的层次，只强调各国之间的互不干涉内政，各守其道，相安无事。“和”的一个更高层次应该是各国间不仅要互不干涉内政，更应该相互联系、共荣共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共同努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提出的“和谐世界”。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和谐世界”的提出，表明我国增深了对“和”的理解，对“贵”的认识。

“和而不同”——如何和？“以和为贵”提出了“和”的重要性，“和而不同”则道出了“和”的内涵——如何和？孔子从辩证的角

<sup>①</sup>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度,指出了“和”与“同”的辩证关系,胡锦涛在提出“和谐世界”时指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是“和而不同”的世界,而不是“大同世界”,就是对孔子思想的最好运用。由此,胡锦涛强调:“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sup>①</sup>。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华运用到处理国际事务当中,不仅表现了中国在国际思维中的大智慧,也同时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决定了各国必然存在利益的分歧和价值取向的不同,战争和争端并不是消除这些差异的正确方式。

“天时地利人和”——最高境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论在处理国际事务、国家事务还是社会事务上,“天时、地利、人和”都一直被奉为经典原则。“人和”从人的角度提出了“和”的重要性,也是对“和”的更高层次的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和谐世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理念上从国内走向世界,和谐社会所重视的价值原则“以人为本”也必将成为世界共同认可的原则。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和谐是最高境界的和谐,也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上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 第三节 和谐世界：共建共享

“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理论在国际空间内的扩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从国内走向国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和谐世界”的理念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中国而言,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还必须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起,在构建东亚以及亚洲的区域和谐的基础

---

<sup>①</sup>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上,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让世界人民共享“和谐世界”的理念。我国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推动“和谐世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了实际努力和重要贡献,彰显了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大国风范,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潜能。

经济上,保持国内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贡献力量。中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和谐发展的世界,世界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中国和谐发展,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2005年,成思危曾在首届青年华商峰会上指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只占世界的4%,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是20%。2004年,中国的外贸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5400亿美元。中国内地外汇储备量居世界第二位,加上港、澳、台后,中国的外汇储备量居世界第一位。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然而,历史是不能止步的。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国际社会中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十七大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活力,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政治上,走科学发展、和平发展之路。“和谐世界”的提出,一方面是我国应对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作出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对和谐社会理念的一种国际宣传。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维护秩序的价值观念不仅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分重要,同时也为我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提供了理念支撑。

文化上,宣扬“和合”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世界多极化发展,文化也越来越多元。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多元文化是文化繁荣的标志,但是从意识形态上讲,多元文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往往成为某些国家和地区挑起纷争和战争的

借口,世界至今仍不得安宁,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我国“和谐世界”的提出,宣扬了一种文化之间沟通、融合的“和合”理念,提倡尊重他国的文化,倡导各国之间要增进理解,增加包容,增强对话,以达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共生共长的“和谐境界”。和谐的世界文化格局,不仅仅能够让各民族的文化精华被世界共享,更能够推进世界各国经济的交融,进而推动国际社会向着美好的方向前进。

外交上,为构建和谐区域、和谐大国关系而努力。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漫长的100多年间,中国从不曾奢谈国际地位,因为,那是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苦难岁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国际上渐渐地有了自己的声音,但是国际经济政治的秩序规则仍然掌握于欧美一些少数的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政治实力突飞猛进,为我国的外交增添了很多砝码,使得许多国际事务的处理也注意了中国的声音。站在世纪之巅,无疑,我国也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外交大国。我国将在外交上做出怎样的表率?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我国外交活动的奋斗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我国将致力于在建设区域和谐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的大国关系。这其中包括大陆和台湾的两岸关系,中国与韩国、日本、俄罗斯等邻国关系,整个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以及中国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共享共建的“和谐世界”也是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比较合理的世界,我国也将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上互相尊重、互帮互助、共享和谐。

“和谐世界”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有利外部条件。“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与坚持,不仅是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也是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一个秩序良好的国际环境,一个公平合理的政治经济国际和谐机制,都将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换言之,这是中国提出和谐理念,从国内走向国外的过程,也是和谐理念升华的过程。

十七大报告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从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高度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这不仅标志着中国探索“和谐世界”理念的成熟,也表明了中国对于构建“和谐世界”的高度重视。

## 第七章

#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早在 1979 年就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sup>①</sup>他一贯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sup>②</sup>对于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舆论界一直有很多中肯的评论。自中国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剧变后开始引起全球舆论的高度关注，其中特别是“后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北京共识”视野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议论，更是吸引人们的眼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特殊视角对于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许不会没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第一节 “后社会主义”视野中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虽然“后社会主义”概念最早是法国著名左翼社会学家阿兰·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3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 页。

杜汉纳 1980 年在《后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的,但他是从社会预测理论角度作出“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人类社会正在步入后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的。他有社会影响的主要作品是《后工业社会》和《行为社会学》,他的《后社会主义》一书并未译成英语,在英语世界没有大的影响。以后的社会主义研究者都承认“后社会主义”概念实际上是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最早提出的,而且具有十分不同的内涵。

### 一 “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

1982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引发西方思想家对它的关注,其中出现了很多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解释。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最早在 1989 年《关心亚洲学者学报》第 21 卷第 1 期就发表了题为《后社会主义: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明确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称为是一种“后社会主义”,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描绘“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二是描绘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他认为,“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社会主义的原有概念陷入矛盾时,试图以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他坚决反对一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吸收了资本主义因素,就得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结论。<sup>①</sup>

与提出“后社会主义”概念几乎同时,1992 年美国很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发表了《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认为人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结束了,1989 年不仅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也同样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垮台。当代世界依然可能是一个市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但那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即“信息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社会受到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关系的支配,而是知识和社会劳动者在社会中具有战略位置。阿里夫·德里克本人并不赞成“后资本主义”的概念。

<sup>①</sup> 《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第 3 页。



进入 90 年代以后,“后社会主义”概念进一步被广泛使用。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前第一副总理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用这一概念来描述放弃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也有学者将“后社会主义”概念进一步扩大,泛指苏东剧变以后的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所谓“后社会主义”一般是西方学者对原先实行以苏联模式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反省、改革后,所选择的新发展道路的称谓。“后社会主义”者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教条化的社会主义,而“后社会主义”则是相对成熟的、符合各社会主义国家实情,以社会发展、公平、民主、效率为理念的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思潮,研究的共同主题是转型、“后社会主义”人类学以及公民社会。

## 二 “后社会主义”是带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阿里夫·德里克在《关心亚洲学者学报》上发表的《后社会主义: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最早提出“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它的最初意义是要区别于传统概念上的社会主义。德里克在论证“后社会主义”时,对当代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特点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一些复杂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引人入胜。他指出,“后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在这各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条可以取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道路,但不再有统一的理论,而带有各国的特色。<sup>①</sup>在德里克看来,“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预示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社会主义陷入危机时,使人们能够以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既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又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既要同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相结合,又要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他同意保尔·费尔阿本德关于认为社会主义理想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观念不无理由。他强调,社会主义选择在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民

<sup>①</sup> 《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第 2 页。

族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道路是资本主义的说法,都是脱离实际的。然而,他又认为,中国已将社会主义扭曲得难以辨认,中国的发展前途未必是社会主义。他之所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感到“捉摸不定”,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中国现阶段“理想同现实隔离”,虽然社会主义的理想仍被视为最终目标,但“对制定现实政策不再起直接作用”。德里克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开放创造了一些新的发展可能性,其中之一就是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紧急发展手段的余地,甚至比资本主义的选择余地还要大。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不再向资本主义挑战,而是谋求容纳资本主义,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约的发展目标。德里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清新地意识到“后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不取决于社会主义对未来有什么理想,而取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间为争夺未来而进行的全方位斗争。<sup>①</sup>

德里克明确指出,所谓“后社会主义”,指的是社会主义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的状况:一是由于社会主义理想在其历史过程中的演变,它已经失去了其作为一种政治元理论的统一性。这部分是因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感到有必要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要求结合起来,同时还因为社会主义在不同的民族背境下要吸收不同的民族特色。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受“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结构的制约,这是所有此类结合的历史前提。三是这一前提就是保持警惕,从而确保结合的进程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后社会主义”也必然是后资本主义的,但不是作为资本主义之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表现为既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又试图克服资本主义的缺陷的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自身的种种缺陷,以及求助于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克服这些缺陷的种种努力,都是由对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种种缺陷的认识决定的。因此,“后社会主义”总是力求避免回到资本主义,无

<sup>①</sup> 《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第43页。

论其多么依赖后者来改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由于这个原因,并且也是为了使“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结构具有合理性,“后社会主义”一面力图使作为人类共同目标的含糊不清的未来社会主义理想保持生命力,同时又拒绝它在决定当前的社会政策时发挥内在作用。<sup>①</sup>

### 三 与资本主义的妥协并非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而是使中国回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必要一步

阿里夫·德里克指出,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坚持认为,与资本主义的妥协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内部的一次创新,最多也不过是一次暂时的迂回,目的是巩固社会主义,并推动社会主义取得更高的成就。<sup>②</sup> 这一政策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道路上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立起来的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为前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从未具备过这一社会主义的前提,而是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一个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先进的社会形态与落后的经济基础之间的差异(矛盾)是由中国社会主义遭遇的种种问题造成的。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长期阻碍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为了具备社会主义必要的经济前提,以便向共产主义迈进,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历史地看,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所谓的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与资本主义的妥协实际上并非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而是使中国回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必要一步。只有经过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

德里克进一步追问,对已经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倒退的这种解释,尽管听起来在理论上讲得通,但仍然没有阐明已经在倒退的社会主义如何才能再次向前迈进,现存

<sup>①</sup> 《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3页。

<sup>②</sup> 《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3页。

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如何回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上来,是借助资本主义的手段进一步巩固自身,还是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进行创新。在这里,德里克强调,在中国,这种问题甚至可能更为严峻,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给人们带来了对于乌托邦主义的负面印象,它代表了跨越社会主义的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沟壑的唯一一次历史尝试。<sup>①</sup>

德里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元历史设计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必须适应中国的特殊情况。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是作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是由毛泽东在1940年首次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表现为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取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它不仅能够满足社会主义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响应民族自主发展的需求。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再次把社会主义确立为历史发展的目标,它一方面需要暂时从资本主义中获取经济动力,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防范,它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直到中国具备了社会主义的条件。在德里克看来,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汲取了孙中山的社会观和政治观。孙中山是中国的第一位政治领袖,他在1905年把社会主义列入了民族主义的政治纲领之中,他值得人们纪念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民族主义之父,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之父。孙中山很早就不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可行的发展选择,而且提出把社会主义作为更好的发展道路。孙中山坚信竞争作为一种发展动力是有价值的,但是由于他从英国的经验中看到,自由竞争会产生阶级分化和冲突,因此他确信,社会主义是抑制资本主义不良后果所必需的。换句话说,他的社会主义构想不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只是要控制资本主义。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要求国家政策的制定要确保这种控制。<sup>②</sup>

德里克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向资本主义的复辟或倒退,因为正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设置了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的界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所扮演的

① 《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3~34页。

② 《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5页。

角色不是推动社会进一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固理想，而是意识形态的卫道士，目的是防止滑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必须向资本主义作出某些妥协时，社会主义却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最理想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起源于“后社会主义”。

#### 四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变革，社会主义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

德里克重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是对资本主义的重大修正。借助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这种制度在意识形态和结构上的局限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范围内劳动分工的一部分。“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概念表明了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他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某种看法，而从历史上看，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关系背景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变革，社会主义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在不同的民族背景下，这种特殊的走向不仅是由特殊的民族历史遗产决定的，而且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特殊关系的历史决定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并非是对国内资本主义作出的回应，而是对国外资本主义的回应。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它在作为一个完整学说的社会主义的瓦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向资本主义开放为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一是有了较大的经济选择的空间（甚至比资本主义经济选择的空间还要大，资本主义尽管有其自身的灵活性，但还是将一种重要的选择——社会主义——排除在外）；二是比以前有了更多民主的可能性，因为它放弃了对强制性乌托邦主义的信仰；三是有了更丰富的文化选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随着人们对全球文化多样性的重视而增加。<sup>①</sup>

德里克强调，“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危机中提供了以新的和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意识形态领域为了适应上述变化而进行的斗争所

<sup>①</sup> 《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第42页。

付出的唯一代价可能就是社会主义概念本身。自社会主义产生之日起,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构想就不认为在未来社会主义可以不折不扣地取代资本主义,而是认为社会主义主要是为了完成资本主义提出的任务,换句话说,它一直在受一种未来理想的制约。社会主义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即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构想未来各种可能性的源头。<sup>①</sup>他认为,“后社会主义”一词并非要描绘什么,而是想指出,一种激进的未来观必须超越上个世纪以来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概念。因此,我们必须超越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但又不能抛弃它所提供的视角,因为这种视角提出了批判性地观察当代资本主义或其他社会的重要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社会主义”一词具有相当重要的开放性。

## 第二节 “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近年来,在国际学术舞台出现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热”,在海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于这些思潮的性质,人们各有自己的评判,但他们在研究中不约而同地涉及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价问题。仔细研读他们的看法,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没有受益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选择,这一点对于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将有深远意义”。然而,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见解绝不是无原则的吹捧,而恰恰是建立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审慎分析基础之上的。

### 一 制度扩张和全新商品生产:当代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两个基本策略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他的《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中明确

<sup>①</sup> 《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第43页。

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或生产方式，它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出现的最有弹性、最具适应性的一种生产方式。”<sup>①</sup>这里詹姆逊指出了资本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弹性和适应性的特征。在詹姆逊看来，资本“它借以克服这种危机的两个基本策略是：制度的扩张和全新商品的生产”<sup>②</sup>。詹姆逊把资本主义的“民族时期”、“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和“全球规模”资本主义时期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扩张的三个历史阶段。这与美国圣利欧大学的艾拉·索贺于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全球化与人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位来自美国的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者发表了题为“全球化：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分析”的演讲，他声称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全球经济融合，这一经济融合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局部融合、区域融合和全球经济融合。在他看来，形成民族国家的局部融合，是随着16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开始，到20世纪中叶基本完成。区域融合开始于欧盟的形成，以及美加墨经济自由贸易区的出现，东盟10+3的出现等。一旦区域超级大国的合并过程完成，高度经济全球化融合将会出现。詹姆逊虽然认同资本主义制度扩张的历史三阶段理论，然而他对于马克思预言的“世界市场的决定性胜利”即“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的结论则采取质疑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新时期的内在阶级动力几乎没有时间发挥作用，尤其是新出现的劳工组织形式和政治斗争都适应已经改造了的商业世界的全球化规模。”<sup>③</sup>

詹姆逊更为重视的是克服制度危机的第二个基本策略，这就是“全新商品的生产”，即诉诸革新，甚至技术“革命”。他特别看重后现代跨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时期诉诸原子能和电脑技术，认为：“这些技术既有能力生产新型商品，又是开拓新世界空间的工具。”<sup>④</sup>他不仅认为这些新技术“缩小”了地球，而且根据新的规模重新组织资本主义，因此，他认为依据信息或电脑描写晚期资本主义

①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②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08页。

③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09页。

④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09页。

的特点是适当的。詹姆逊强调,晚期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后现代性即它的文化性,也就是“迄今人们所知的商品物化和消费主义等现象”。在他看来,“今天,文化已大部分成为商业,这个事实导致的结果是,过去被认为是经济和商业的大多数事物,现在也变成了文化,对所谓形象社会或消费主义的各种判断都应该包容在这个特点之下。”<sup>①</sup>他认为,虽然热衷于消费主义并不是客观地形成的,但消费主义将被证明具有历史性意义,“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作为生活方式的消费主义”<sup>②</sup>。詹姆逊并非一般地肯定消费主义的历史存在,更为深刻的是他进一步指出,商品化观念虽然是一种结构的非道德化的观念,然而,“一种道德化政治恰恰易于在对社会的结构认知和测绘受到阻碍的地方发展起来。今天,宗教和弱势民族的影响可以解作社会主义的失败所激起的愤怒,和以新的动机填补那个空缺的绝望的盲目尝试。”<sup>③</sup>

## 二 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消费主义取得文化主导权

毫无疑问,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目中,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消费主义取得文化主导权。这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对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中可以得到明证。在他们看来,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被推向极端,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到次要地位,所谓品位、风格、差异的能指被发挥到极致。而媒体广告则割裂虚构商品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将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以及欧美风情等意象,伪造成消费主义的虚假意识。人们高消费的热情造成严重的社会心理失衡,出现了炫耀性消费、超前消费。在贝尔看来,资本的贪婪攫取性和精神气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杜宁则认为,消费主义伦理主导的高消费必然引发环境和资源危机。法兰克福学派则尖锐批评“虚假需求”和“消费异化”造就了人性的危机。鲍德里亚则干脆认为消费符号是一种“话语权力系统”。人们在“欲

①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15页。

②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15页。

③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15页。



购情结”的分析中意识到新传媒技术与资本主义的渗透与联结。应该看到,西方大众消费是在大众基本生活有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出现的,而发展中国家许多城市还存在规模相当庞大的依靠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群体,但社会上奢侈性消费势头却愈演愈烈,甚至还出现了新贵群体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其中包括酗酒、嫖娼、吸毒、赌博等成为一部分人表现自我的生活方式,贫困、温饱、小康、富裕并驾齐驱。在社会上一部分人还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同时,却出现了追求炫耀性消费、奢望性消费的“共时性”。在消费主义文化中,商业性传媒遮蔽了真正的人,隐匿了自然的美,阻断了时间的历程,混淆了人生的阶段,在我们是誰、能够怎样、应该怎样等问题上陷入了虚假的价值观。媒体广告的效果建立在形象、颜色、精巧的技术制作、联想、隐藏的冲动之上。在广告的世界里,异性的青睐、社会成功、事业成就与人生的幸福,所有这一切都不必通过诚实、品格和艰辛工作取得。消费主义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同化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形象的人侵甚至出现极端产品,如鲍德里亚所说,变性人、某些男性心中有女性情结,可能因为在消费社会中,女性的“身体”变成了一种“最美的消费品”,做这样一种消费品会得到人们欣赏的种种好处。鲍德里亚说,仿真和代码已经主宰了整个世界,言下之意,物质统治了人的精神。消费已成为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成为获得身份的商品符码体系和符号信仰的过程。“粉丝”是一个非理性的组合,是狂欢的群体。鲍德里亚认为,人们之所以依赖于电视所制造的“超真实”,与人们缺乏交流、心灵闭锁和相互之间充满误解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真实展示了鲍德里亚所指出的“意义的毁灭”。

出于种种直觉的预见,詹姆逊认同“资本主义本身是一股革命力量,它以相同的方式生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不能满足的需求和欲望”的可能性。在他的心目中,永久的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和难以驾驭的资本运动、形象社会、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结合、新的世界网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当今世界体系中的自治性的丧失、民族地区要赢得自治性和生存或摆脱世界市场的不可能性,

所有这一切携手并进时,一种晚期资本主义难以解决的困境便出现了。他预料,正是现实中成熟的结构矛盾使人们自觉地期待着新的可能性,人们可以通过“忠于否定”而保持这一困境的活跃,“而恰恰通过保持那个地方的活跃,新的事物才有可能出乎意料地从那里出现。”<sup>①</sup>十分显然,詹姆逊从“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在制度扩张和全新商品生产两个侧面刻画了资本主义的当代进展及其内在困境,具有深刻的批判性。

### 三 苏联解体、乌托邦的意义、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

正是领悟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极限与内在困境,詹姆逊站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重新分析评价了苏联解体的命题、“乌托邦”的意义和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对于苏联解体,与众不同的是,詹姆逊独特的见解是:“苏联的解体并不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失败,反倒是由于共产主义的成功。”<sup>②</sup>在他看来,如果人们像西方普遍认为的那样把共产主义解作实现现代化的纯粹策略,在许多年前,苏联正是在某些方面的迅速的现代化被认为实际上已经赶上了西方的,他强调这正是引起西方官方焦虑的一个视角。他还认为苏联解体的“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分化”,是20世纪80年代更大的世界格局的组成部分,掩盖了包括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一种结构腐化。他强调这种结构腐化是与所谓的金融资本密切相关,像金融资本一样疏远自身,偏离其生产之源。他认为资本的不同时刻都似乎有一个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过渡到买卖投机,在这种投机中,价值脱离了生产源,并进行更加抽象的交换。诸如效率、生产力、财政能力等范畴都是比较范畴,只能在几种不平衡的现象相互竞争的一个领域里才能发生影响。苏联是在它试图融入一个正在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时代过渡的世界体系时“变得”毫无效率因而解体的。这个体系据其自身的运作规则而以极高的生产速度运转,这是苏联辖域内的任何生产所无法媲美的。在消费

<sup>①</sup>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16页。

<sup>②</sup>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13页。

主义、新信息技术等文化动机的驱动下,由于精打细算的军事技术竞争、债务的诱惑和密集商业形式的共存而造成的紧缩,苏联社会引进了一个不可消解的矛盾。这是它不可能存活得更长的一个因素。这就好比“在没有准备好太空服的情况下就开始鲁莽地打开飞船的舱门,因此使自身及其制度屈从于标志着外部世界特点的无比强烈的压力。”<sup>①</sup>应该说,詹姆逊的分析判断,要比所谓苏联由于“私有化”而解体的理论深刻得多,要比所谓苏联由于“民主化”而解体的理论来得更加合理。对于全球金融资本运作、新军事技术竞争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压力,必须具有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条件,才能谈得上全面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获益匪浅。

关于“乌托邦”的意义,虽然在《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中,詹姆逊在谈及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威胁时有所涉及,但未能充分展开论证。1994年11月,他在美国杜克大学与到访的李泽厚的谈话中则对于乌托邦的意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平心而论,我们国内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乌托邦”的看法,远没有詹姆逊那么高瞻和那么远瞩。他指出:“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够成功地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选择,这毫无疑问对于全球的任何一块地方都是重要的,将有深远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产生出一种理想社会的新的乌托邦观念,我以为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想这恰恰是当代西方社会不断失落的东西。苏联人说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所以已经死亡了。他们认为乌托邦是恶魔,是束缚人的残酷的东西,那么,你如何拯救乌托邦呢?”<sup>②</sup>他认为,资本主义也提供各式各样的梦想,金钱梦,消费梦,只有从“集体心理”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纯消费意识形态的魅力。他强调:“在美国,消费是绝对反政治的,它使消费者对任何集体价值漠不关心。消费把个人紧紧地束缚在市场上,对一切社会改革都置若罔闻。”<sup>③</sup>詹姆逊指出,作为教师的知识分子,我们所能做的是意识

①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14页。

②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56~357页。

③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57页。

形态方面的斗争。“我是说,我们应该给大众提供有用的思想和理想,但是同时也需要批判和揭露各种教条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谬误。比如,在美国一个普遍的假设就是市场万能,金钱万能。我们的任务便是始终如一地去告诉人们,这个看法是错的,自由市场的破坏性一面是不容忽略的。所以,我们要批判金钱和市场万能的意识形态。当然还有一个更积极的任务,那就是继续维护理想。”<sup>①</sup>

对于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当代中国人来讲,维护共同社会理想和共同道德标准是至关重要的。相比较而言,詹姆逊的感受是深切的,他说:“现在美国存在各种各样非常重要的、局部的斗争,如黑人运动、女权运动等。不同的群体都在为各自的解放而抗争,却不是出于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目的。对于这些政治运动我们不应该抱否定态度,因为这是唯一在进行的斗争。不过这些运动都是分离的、割据的、自顾自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将它们和大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那就是社会改革。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sup>②</sup>由此看来,我们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具有重要使命的社会改革,其意义深远,在这方面詹姆逊关于乌托邦的意义的提醒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 四 对于市场经济的社会权力结构,乌托邦的集体理想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

在讲到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问题时,詹姆逊以极大的热情鼓励说:“我认为中国会有较好的条件,至少国家政体还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还存在公有制等。这些都是中国的历史造就的。所以,我想很显然,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环境更有利于接受进步的思想。但是,我想有很多内部和外部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中国的发展进步。比如,美国就不希望你们成功,不希望你们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我相信中国也有一些人不要什么新模式。他们宁可要金钱、消费等。所以,我想不管怎样,一定形式的斗争是必要的,

①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60页。

②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61页。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揭露这些势力。”<sup>①</sup>他对于中国某些方面的了解,也许比我们中国人本身还要透彻。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权力结构,不是单纯意识形态可以改变的,只要资本存在,意识形态的“幻象”的客观性和“商品拜物教”就依然存在。在这方面,詹姆逊谈到的“乌托邦”的集体理想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对于抵制自由市场破坏性的作用不容忽视。“要市场经济又不要市场社会”何以可能?

第一,“公有”、“民本”传统的重要性。显然,在这里传统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相互反对,但有两个共同观点:崇古精神和土地公有的思想或文化传统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浙江许多集体经济转制,依然保留了很多集体经济的特征。土地使用、分配关系、人际关系、劳动雇佣关系和私企党建活动等体现了很多“民本经济”的特色。

第二,“等体”生存方式的惯性。詹姆逊说:“看一看在苏联发生的事也许有所助益。我相信,一个曾经有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出集体的习惯和生存方式。这些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另一方面,苏联的例子也表明,也许这些集体习惯和生存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显得很脆弱。这里涉及的一个政治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这个过程发生得究竟有多快?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资本主义和市场。那是一股侵蚀力很强的势力。集体性的东西建立很难,摧毁则很容易。金钱是瓦解所有集体性的东西最基本的形式。”<sup>②</sup>他谈到了匈牙利经济社会学家卡尔·波莱尼的著作《伟大的变革》中所提出的“市场具有无限的破坏力”的观点,他强调:“但我们看到的是,当市场来临时,各种集体力量却在保存、发展自己。所以,我认为如果集体力量找到保存、发展自己的方式,这将是一股无比巨大的力量。”<sup>③</sup>马克思曾经在东方社会理论里谈及“跨越卡夫丁峡谷”命题时指出,关键在于

①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60页。

②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63页。

③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63页。

公有因素力量与私有因素力量之间最终谁战胜谁。詹姆逊的观点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有相接近之处。他的睿智和聪慧还在于关注到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地方：“我认为在美国，除黑人运动以外，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谁在抵制资本的侵蚀作用。我这个问题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金钱在中国不也正在到处流动吗？我谈论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保留下来？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些生活方式有抵抗力吗？我想仅仅靠维护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是行不通的。如何去加强这些生活方式的抵抗力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能摧毁一切。怎么去抵制资本主义的势力呢？”<sup>①</sup>詹姆逊的提醒不是无的放矢的，应该对我们具有极大启示。他进一步论证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关生产方式的人类学。我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创造出它自身的生活方式。我们希望社会主义能做这样的事。但是，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而且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相比，它们还处于初级阶段。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独特的生活样式加以发展。”<sup>②</sup>

认真读懂詹姆逊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纲”，也许对于今天的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没有启迪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永远是属于全世界志士仁人的。

### 第三节 “北京共识”视野中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就进一步彰现，软实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引起了全球舆论的高度关注。2004年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

<sup>①</sup>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64页。

<sup>②</sup> 《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65页。

提供新模式》。该文对中国 20 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

### 一 “北京共识”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而不是靠外国因素推动

雷默的文章在国际媒体中引发了更多的评价与议论。2004 年 5 月 20 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刊登的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5 月 24 日,墨西哥《每日报》刊登的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5 月 27 日,英国《卫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7 月 20 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对中国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他国家可分享到中国经济的成果。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2004 年底,俄罗斯《远东问题》双月刊第 5 期刊登俄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撰写的长文,列举了评价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际意义的主要标准,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及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鲜活的榜样、提供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垄断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明矛盾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2005~2006 年以来,国际媒体、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问题的关注,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不断升温,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讨论中来。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先后出版了《当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中国世纪》等几十种专著,对中国经济崛起

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作出了种种评析,而“中国模式”是国际媒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话语。

雷默之所以能够提出“北京共识”,据他自己的介绍,是基于他与中国的大学、智囊团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进行 100 多次非正式讨论得来的。他认为,“北京共识”既涉及经济变化,也涉及社会变化。它是利用经济学和统治权改善社会。他承认,中国的发展和富强不能由任何其他国家照搬。他提出,不管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否,“北京共识”都已经引出一系列的新思想,这些思想与来自华盛顿的思想截然不同;适用于发展的“北京共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一大变化,一个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不成熟的改革进程已经转变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改革进程,它像连锁反应一样进行,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而不是靠外国因素推动。他进一步认为,“北京共识”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sup>①</sup>

## 二 “北京共识”的三大定理

雷默讲道,以目前的速度,中国正每隔 10 年将产出(及收入)翻一番。世界银行估计,自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让三亿人脱贫,这是历史性的成就。这种变化速度意味着中国并非表面上看来的那样;它不能被简单归类,因为它已是今非昔比。按量子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的观点,这是一个参与从本质上改变结果、速度干预衡量方法的地方。他在 1927 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中国不存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这摧毁了传统的分析方法。我们必须满足于可以让各个部分以某种不确定

<sup>①</sup> 《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7 页。



性在其中活动的框架。<sup>①</sup>

由此,他具体提出了构成“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第一定理,就是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与“旧物理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后沿技术(铜线)入手开始发展的主张不同,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光纤)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第二定理,是要求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既然混乱不可能自上加以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工具。它超越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这是管理中国发展的巨大矛盾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中了希望、野心、恐惧、误报和政治的不稳定混合体,只有这种混沌理论才能够提供有意义的组织。中国对待发展的新态度强调混乱管理。这是党内思想库时兴研究社会学和危机管理等学科的原因之一。第三定理,就是自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这一新的安全原则极为重要。中国名副其实的崛起正在重新构建国际秩序。中国官员对这个国家和平崛起的兴趣源于他们的这种担心,即中国现在向世界大国加速迈进的势头可能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从而损害中国成长及保持稳定的国内和国外均衡的能力。<sup>②</sup>

这里,雷默提出了西方领导人观察中国问题的传统方法的错误所在。他认为,随着变化造成的引力日积月累,造成使中国团结一致的所有旧的纽带发生扭曲,国内均衡将难以操控。不过,即便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看待中国的权力的衡量尺度也需要调整。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近20多年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变革的先锋者。中国共产党无疑正在吱嘎作响,发出噼啪的爆裂声,但是这些噪音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毁灭性的。与苏联相反,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中国共产党目前正患上多动症。它被命运所困扰,对调整和试验过于关心。

<sup>①</sup> 《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第11~12页。

<sup>②</sup> 《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第12~13页。

### 三 “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

在雷默看来,在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会遇到某些国家研究中国的兴起并努力寻找自己能够在本国实现其中哪些奇迹的趣闻轶事。他曾遇到过东南亚某国的一位发展部长的发问:“为什么我们的经历与中国如此不同?我们与他们一样。我们有低成本劳动力。我们的政治体制很强大。我们做错了什么吗?”从越南河内新近创造的“稳定、发展、改革”的经济口号中,可以看到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讲话的影子。世界银行召开了一次北京会议,主题是“其他国家能从中国学习什么?”具有性格魅力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都朝北京十分赞赏地点头。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的以贸易为基础的走出去战略现在也成了一项让思想全球化的任务,将“北京共识”带入生机勃勃的文化市场。他赞同中国的学者的观点:“‘走向全球’的开放战略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究竟是什么使得北京发展模式能够吸引他国,也就是“北京共识”的魅力问题上,雷默说:“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能量转换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从三个方面传播它的能量:首先,作为旧式的华盛顿发展理论的反应,“北京共识”具有某种反冲动能。其次,由于中国对地方化独一无二的需求,中国的这一新概念在学习它的国家里会引发某种连锁反应。最后,中国的经济崛起既有可能帮助其他贸易依赖国赚钱,也有可能影响它们的财富。中国的经济崛起就像是一块磁铁一样,把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紧密相连。根据不对称防御的概念和“所有国家生来平等,无论大小”的哲学让许多国家对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抱有希望。

最后,雷默提醒中国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仍需要保持自己一贯拥有的“艰苦奋斗”传统,并在国家未来的发展中,“提高透明度”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sup>①</sup>

<sup>①</sup> 《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第22~24页。

跋

##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经历了三种形态,这就是从理论学说、社会运动到基本制度的发展。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转变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从社会主义学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是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以及一大批无私无畏的社会主义者实现的;而从党的基本纲领到国家基本制度,却是由从列宁、毛泽东到邓小平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毕生精力才逐渐建立的。然而,当代社会主义的形态正在出现“价值形态”的现象。

近年来,法国社会党领袖、政府前总理利奥内尔·诺斯潘多次强调:现今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教条体系,而是人们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远景设想”。在他们心目中,当代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普遍放弃用一种制度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而只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系列基本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从“制度替代”转向了“价值替代”。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确实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力量,但资本扩张的自然机制“却不知向何处去”。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提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建立一个并非一切都是商品的社会,不是由市场实行统治的社会,而是价值高于利润逻辑的社会。他们强调全球化不应建立在单边主义的基础上,而应是促进均衡的和多极的世界。同时围绕“机会均等”要求建立一个包括“被社会排斥者”、平民阶

级和中产阶级在内的“新阶级联盟”。

毫无疑问,我们并不赞同诺斯潘所谓的社会主义由“制度替代”转向“价值替代”的结论,然而它的合理之处,就是社会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就是社会主义不仅是制度,而且是一整套价值体系。所谓“文化是制度之母”,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不仅要创立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而且必须在文化意识上确立一整套适应并主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离开合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引,市场经济自身发展不可能克服资源生态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风险。认清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在瑞典等少数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确实创造了不少好东西,这是他们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制度好经验的结果。但是,毕竟社会民主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病床旁边的医生和护士”。根据中国社科院徐崇温研究员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瑞典,95%的生产资料掌握在100个大家族手中,17个资本集团支配着国民经济命脉,仅占人口总数的0.2%的人口控制着全部股票的2/3,仅占人口总数5%的富翁约占全部财富的1/2以上。以致在社会民主党政府提出“雇员投资基金方案”时,仍遭到大大小小雇主的激烈反对,使得试图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有所触动的“基金社会主义”流于失败。离开了“制度替代”社会主义就不是完整的科学学说、健全的社会运动,只能停留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纯价值批判的层面。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是否可以说,社会主义实际上存在四种形态,即理论学说、社会运动、基本制度和价值体系。中国人四次认同社会主义的角度和深度是不一样的,第一次是认同社会主义的重点是理论形态,第二次是认同社会主义的重点是社会形态,第三次是认同社会主义的重点是制度形态,包括认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结合;第四次是认同社会主义的重点是价值体系,从“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到深层次的正义公平、普遍幸福理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对社会主义的四次历史性认同是一个步步深入、逐渐认同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的四种形态是一个有机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且四种形态的历史演进是递进上升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恰恰是解放和发展人的本质力量,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和发展中国人的本质力量,改革开放30年恰恰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突出表现在“共建共享”的历史创造精神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体不是别人,而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或者司法权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只是在人民授权范围内行使国家管理某些权力的执行者,任何机构和个人决不能未经人民授权或者超越人民授权,成为人民之外或者人民之上的治理国家的主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就是在价值观念层面上确立人民群众权利本位的目标取向,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基础。换言之,就是要唤起人们的价值主体意识、公民权利意识,就是要使人们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切身利益。

总结近30年的改革开放史,使我们对于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的重要性,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体会。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史,人们不难意识到,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亿万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创造活动和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历史进程。虽然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处于低潮,但是在当代中国却是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这都是我们把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精髓,制定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政策所致。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使近三亿人脱贫,近两亿人进城,近一亿人进入中产阶级,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一定能够使整个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使中国跻身于世界经济政治大国的行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标志性事件。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一定能够越走越宽广,中国人的富民强国梦和世界和平发展梦一定能够圆满实现。同时,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后 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一书,从立项、酝酿、写作到修改,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写作团队撰写分工情形如下:由程伟礼承担“前言”,“总论”,第一编第一、二、三章,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第四编第七章,“跋”。由王继停承担第一编第四章。由张琳承担第二编第一章第一、二节,第二章。由李元承担第二编第三、四、五章。由徐觉哉承担第二编第六章。由戴雪梅承担第三编第一、二、三章。由轩传树承担第三编第四章。由郭丽双承担第四编第一、二、三章。由冯莉承担第四编第四、五、六章。最后由程伟礼、戴雪梅统稿。定稿。

2009年3月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

作者 = 程伟礼, 戴雪梅等著

页数 = 439

SS号 = 12233067

出版日期 = 2009.03